

第三册 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

卷六·塞多纳德

安多纳德

耶南是法国那些几百年来株守在内地的一个角，保持着纯血统的旧家之一。虽然社会经过了那么多的变化，这等旧家在法国还比一般意料的为多。它们与乡土有多多少少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根深蒂固的连系，直要一桩极大的变故才能使它们脱离本土。这种依恋的情绪既没有理智的根据，也很少利害关系；至于为了史迹而引起思古之幽情，那也只是少数文人的事。羁縻人心的乃是从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感觉，觉得自己几百年来成了这块土地的一分子，生活着这土地的生活，呼吸着这土地的气息，听到它的心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动，像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感觉到它不可捉摸的颤抖，体会到它寒暑旦夕，阴晴昼晦的变化，以及万物的动静声息。而且用不着景色最秀美或生活最舒服的乡土，才能抓握人的心，便是最朴实，最寒素的地方，跟你的心说着体贴亲密的话的，也有同样的魔力。

这便是那南一家所住的那个位于法国中部的省份。平坦而潮湿的土地，没有生气的古老的小城，在一条浑浊静止的运河中映出它黯淡的面目；四周是单调的田野，农田，草原，小溪，森林，随后又是单调的田野……没有一点胜景，没有一座纪念建筑，也没有一件古迹。什么都不能引人入胜，而一切都教你割舍不得。这种迷迷忽忽的气息有一股潜在的力：凡是初次领教的都会受不了而要反抗的，但世代受着这个影响的人再也摆脱不掉，他感染太深了；那种静止的景象，那种沉闷而和谐的空气，那种单调，对他自有一股魅力，一种深沉的甜美，在他是不以为意的，加以菲薄的，可是的确喜爱的，忘不了的。

耶南世代住在这个地方。远在十六世纪，就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里或四乡：因为照例有个叔祖伯祖之流的人，一生尽瘁于辑录家谱的工作，把那些无名的，勤勉的，微末不足道的人物的世系整理起来。开头只是些农夫，佃户，村子里的工匠，后来在乡下当了公证人的书记，慢慢的又当了公证人，终于住到县城里来。安东尼·耶南的父亲，奥古斯丁，做买卖的本领很高明，在城里办了个银行。他非常能干，像农夫一样的狡猾，顽强，做人挺规矩，可并不太拘泥，做事很勤，喜欢享受；因为嘻嘻哈哈的好挖苦人，什么话都直言无讳，也因为他富有资财，所以几十里周围的人都敬重他，怕他。他个子又矮又胖，精神抖擞，留着痘疤的大红脸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从前出名是个好色的，至今也还有这个嗜好。他喜欢说些粗野的笑话，喜欢好吃好喝。最有意思的是看他吃饭：儿子以外，几个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推事，公证人，本堂神甫等等，——（耶南老头儿是瞧不起教士的，但若这教士能够大嚼的话，他也乐意跟他一块儿大嚼，）——都是些南方典型的结实的汉子。那时满屋子都是粗野的戏谑，大家把拳头往桌上乱敲，一阵阵的狂笑狂叫。快活的空气引得厨房里的仆役和街坊上的邻居都乐开了。

后来，在夏季很热的一天，老奥古斯丁只穿着件衬衣下地害去装酒，得了肺炎。不出二十四小时，他就动身往他世界去了，他不大相信什么他世界，但像内地反对教会的布尔乔亚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内还是办妥了所有的教会

仪式，一则使家里的妇女不再噜苏，二则他对这些手续也无所谓……三则死后之事究竟也不可不知……

儿子安东尼接了他的买卖。他也是个矮胖子，一张绯红的喜洋洋的脸，不留胡子，只留鬓脚，说话急促而含糊，声音很响，常常有些剧烈而短促的小动作。他没有父亲那种理财的本领，但办事能力还不坏。银行因为历史悠久，正在一天天的发达，他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下去就行了。他在当地颇有善于经商的名气，虽然他对事业的成功并没多大贡献，他只是很有规律很肯用心罢了。做人很体面，到处受到应有的尊重，他殷勤，爽直，对某些人也许太亲狎了些，真情也流露得太多了些，有点儿平民气息，可是不论城里乡下，他人缘都很好。他虽不浪费金钱，却很滥用感情，动不动会流泪，看到什么灾难会真诚的难过，使受难的人感动。

像多数内地人一样，政治在他思想上占着很大的地位。他是表面上很激烈而骨子里很温和的老革命党，偏狭的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并且学着父亲的样反对教会。他是市参议员，像同僚们一样以捉弄本区的神甫或本城妇女所崇拜的宣道师为乐。法国小城里的反教会的举动，永远是夫妇争执中的一个节目，是丈夫与妻子暗斗的一种借口，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避免的。

安东尼·那南对文学也很有抱负。跟他那一代的内地人一样，他颇受拉丁文学的熏陶，有些篇章能够背诵如流；而拉·风丹纳，鲍阿罗，服尔德等的格言，十八世纪小品诗人的名句，他也记得不少，还写些摹仿他们的诗。他熟人中有这个癖的不止他一个：而这个癖也增加了他的声誉。大家传诵他的滑稽诗，四句诗，步韵诗，折句，讥讽诗，歌谣，有时是很唐突的，可是不乏风趣。口腹之欲的神秘在诗中也没有被遗忘。

这个壮健，快乐，活泼的矮个子，要的太太和他性格完全不同。她是当地一个法官的女儿，叫做吕西·特·维廉哀。这家特·维廉哀其实只是特维廉哀，他们的姓像一块石子从上面往下滚的时候一分为二，变了特·维廉哀。他们世代都当法官，是法国老司法界中的人物，对于法律，责任，社会的礼法，个人的尤其是职业的尊严，看得很重，做人不但诚实不欺，而且还有些迂腐。在上一世纪里，他们受过吹毛求疵的扬山尼派的影响，至今除了对耶稣会派的轻蔑以外，还留下一点悲观和郁闷的气息。他们不从好的方面去看人生，非但不想克服人生的艰难，反而想加些上去，好让自己更有权利怨天尤人。吕西·特·维廉哀就有一部分这种性格，恰恰和她丈夫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相反。她又瘦又高，比他高出一个头，身段长得很好，很会穿扮，可是大方而不很自然，使她永远显得——仿佛是故意的——比实际的年龄大，她非常贤淑，但对别人很严，不许有任何过失，几乎也不容许有任何缺陷：大家认为她冷酷，骄傲，她对宗教很虔诚，为了这个，夫妇间常常争辩。但他们很相爱，尽管争辩，彼此都觉得少不了。至于实际的事务，两人都一样的不高明：他是因为不懂人情世故，一看到笑脸，一听到好话，就会上当，她是因为对于商业全无经验，从来不预闻，也不感兴趣。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做安多纳德，一个是儿子，叫做奥里维，比安多纳德小五岁。

法国姓氏之前冠有“特”字，为贵族之标识。故特·维廉哀（即姓氏前冠有“特”字）与特维廉哀（特字根本即姓之一部分）所表示的出身完全不同。

安多纳德是个美丽的褐发姑娘，一张法国式的妩媚而忠厚的小圆脸，眼睛很精神，天庭饱满，下巴很细气，小鼻子长得笔直，——好似一个法国老肖像画家所说的，是“那种清秀的，很有格局的鼻子，有种微妙的小动作，使她显得神情生动，表示她说话或听人说话的时候心中很有点儿细密的思潮”。她从父亲那儿秉受着快乐的无愁无虑的脾气。

奥里维是个淡黄头发的娇弱的孩子，身材跟父亲一样矮小，性格却完全不同。小时候不断的疾病大大的损害了他的健康；虽然家里的人因之格外疼他，但虚弱的身体使他很早就成为一个悒郁寡欢的孩子，爱幻想，怕死，没有一点儿应付人生的能力。天生的怕见人，喜欢孤独，他不愿意和别的孩子做伴，觉得和他们在一起非常不舒服，他讨厌他们的游戏，打架，尤其受不了他们的凶横。他让他们打，并非因为没有勇气，而是因为胆怯，不敢自卫，怕伤害别人，要不是靠着父亲的地位，他可能被小朋友们折磨死的。他心肠很软，灵敏的感觉近乎病态：随便一句话，一个同情的表示，或是一句埋怨，就能使他大哭一场。比他健全得多的姊姊常常嘲笑他，叫他泪人儿。

两个孩子非常相爱；可是性情相差太远，混不到一块儿。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幻想。安多纳德越长越美；人家告诉她，她自己也知道，心里很高兴，编着些未来的梦。娇弱而悒郁的奥里维，一接触外界就觉得格格不入，便躲在他荒唐的小脑子里去胡恩乱想。他像女孩子一样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他。既然过着孤独生活，不跟年龄相仿的同伴往来，他便自己造出两三个幻想的朋友：一个叫做约翰，一个叫做哀蒂安，一个叫做法朗梭阿：他老是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从来不与周围的人在一起。他睡得很少，空想极多。早晨，人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往往把赤裸的两腿挂在床外，出神了；再不然他会把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双手浸在脸盆里，他也会出神的。在书桌上写字或温课的当口，他又会几小时的胡思乱想；随后他忽然惊醒过来，发觉什么也没做。在饭桌上，人家和他说话，他会吃了一惊，过了两分钟才回答；而回答了半句又不知自己要说什么。他迷迷糊糊的听着自己的念头在胸中窃窃私语，过着内地那种度日如年的单调的岁月，被一些亲切的感觉催眠了。——空荡荡的大屋子只住了一半；有的是可怕而挺大的地窖和阁楼，上了锁的神秘的空房，百叶窗都关了，家具，镜子，烛台，都遮着布；祖先画像上的笑容老是在他的脑子里，还有帝政时代的版画，题材都是轻佻的与有德的故事。外边，马蹄匠在对门打铁，锤子一下轻一下重，呼吸艰难的风箱在喘气，马蹄受着熏炙发出一股怪味道；洗衣妇蹲在河边捣衣，屠夫在隔壁屋子里砍肉；街上走过一匹马，蹄声得得；水龙头轧轧的响；河上的转桥转来转去，装着木料的沉重的船，彼纤绳拉着在砌得很高的花坛前面缓缓驶过。铺着石板的小院子有块方形的泥地，长着两株紫丁香，四周是一大堆风吕草和喇叭花，临河的平台，大木盆里种着月桂和开花的榴树。有时邻近的广场上有赶集的喧闹声，猪叫声，乡下人穿着耀眼的蓝色上衣。……星期日在教堂里，歌咏队连声音都唱不准，老教士做着弥撒快睡着了，全家在车站大路上散步，一路跟别人（他们也以为全家散步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脱帽招呼，——直走到大太阳的田里，看不见的云雀在上空盘旋，——或者沿着明净的，死水似的河走去，两旁的白杨瑟瑟索索的发抖；……然后是丰盛的晚餐，东西多得吃不完，大家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谈着吃喝的问题，因为在座的都是行家，而讲究吃喝在内地是桩大事，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家也谈到商情，说些笑话，还夹着一些关于疾病的议论，牵涉到无

穷的细节……而这孩子坐在一角，不声不响像头小耗子，尽管咬嚼，可并不怎么吃东西，拼命伸着耳朵听。他把大人的话句句听着，凡是听不大清的，便用想象去补充。像旧家的儿童一样给几百年的印象刻得太深了，他有种奇特的天赋，能够猜到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而不太了解的思想。——还有那厨房，充满着神秘的血腥和各种味道，老妈子讲着奇怪而可怕的故事……最后是晚上，蝙蝠悄悄的飞来飞去，妖形怪状的东西教人害怕，那是他明知在这座老屋子里到处蠢动的，例如大耗子和多毛的大蜘蛛等等。随后是跪在床前的祈祷，根本不听自己说些什么；隔壁救济院里响起声音不平匀的钟声，那是女修士们睡觉的钟；——然后是雪白的床，给他躺着做梦的岛……

一年最好的时节是春秋两季在离城几里的别庆中过的日子。那边，一个人人都看不到，尽可以称心如意的幻想。像多数小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两个孩子于是不跟平民接触的，他们对仆役和长工还有点儿恐惧，有点儿厌恶。他们秉承了母亲的贵族脾气，——其实主要是布尔乔亚脾气，——瞧不起劳力的工人。奥里维成天骑在一株槐树的枝头读着奇妙的故事：美丽的神话，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童话，《天方夜谭》，或是游记体的小说，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常常渴想遥远的世界，做着漫游海外的梦。一个小树林把屋子遮掉了，于是他自以为在很远的地方。但他知道离家很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不大喜欢独自走远，他已经在大自然中迷失了。四周尽是树木，从树叶的空隙里可以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杂色的母牛在草原上啮草，迟缓的鸣声冲破田野的静寂。尖锐的鸡啼在农庄间遥相呼应。仓屋里传出节奏不匀的捣杆声。成千成万的生灵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活跃。奥里维不大放心的瞧着一行老是匆匆忙忙的蚂蚁，满载而归的蜜蜂像大风琴的管子一般轰轰的响着，漂亮的蠢头蠢脑的黄蜂到处乱撞，——所有这些忙碌的小虫似乎都急于要到一个地方去……哪儿呢？它们不知道。无论哪里都好！只要是到一个地方……奥里维处在这个盲目而满是敌人的宇宙内打了一个寒噤。他像一头小兔子，听到松实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声音就会发抖……花园的那一头，安多纳德发疯似的荡着秋千，把架上的铁钩摇得吱格吱格的响，奥里维听到这个才放了心。

她也在做梦，不过依着她的方式。她成天在园子里搜索，又贪嘴，又好奇，笑嘻嘻的像画眉般啄些葡萄，偷偷的采一只桃子，爬上枣树，或是在走过的时候轻轻摇几下，让小黄梅像雨点似的掉下来，入口即化，跟香蜜一样。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一眨眼她就把从早上起就在打主意的一朵蔷薇摘到手，往花园深处的夹道中一溜。于是她把小鼻子竭力往醉人的花心中嗅着，吻着，咬着，吮着，随后把赃物揣在怀里，放在她不胜奇怪的眼看在敞开着衬衣底下膨大起来的一对乳房中间……还有一件被禁止的，挺有意思的乐事，就是脱了鞋袜，赤着脚踏在小径的凉快的细砂上，潮湿的草地上，踩在阴处冰冷的、或是给太阳晒得滚热的石板上；再不然她走入林边的小溪，用脚，用腿，用膝盖，去接触水，泥土，日光。躺在柏树荫下，她瞧着在阳光中照得通明的手，心不在焉的尽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像缎子一般的皮肤，她用蔓藤和橡树叶做成冠冕，项链，和裙子，再加上蓝蓟，红的伏牛花，和带着青的柏实的树枝作点缀。她把自己装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然后她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伸着胳膊拚命的打转，直转到头晕眼花，才往草地上倒下，把脸钻在草里，莫名其妙的纵声狂笑，不能自己。

两个孩子就是这样的消磨他们的日子，只隔着几步路，却各管各的，——除非安多纳德走过的时候想要弄一下兄弟，抓一把松针扔在他鼻子上，或

是摇他的树，威吓他要把他摔下来，或是冷不防扑在他身上吓他，嘴里叫着：“呜！呜！……”

她有时拚命要跟他淘气，哄他说母亲在叫他，要他从树上爬下来。赶到他下来了，她却上去占了他的位置不肯走了。于是奥里维叽叽咕咕，说要去告她。可是安多纳德决不会永远待在树上：她连安静两分钟都办不到。骑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够了，气够了，看他快要哭出来了，她就爬下来，扑在他身上，笑着摇他的身子，喊他“小傻瓜”，把他摔在地下，拿一把草擦他的鼻子。他勉强挣扎，可不是她的对手，于是他仰天躺着，一动不动，像条黄金虫，细瘦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结实的手按在草地中，装着一副可怜的屈服的脸。这时安多纳德忍不住了，看着他打败而认输的神气放声大笑，突然把他拥抱了，撒手了，——但临走仍不免用一把青草塞在他嘴里表示告别，那是他痛恨的，只得拚命的吐，抹着嘴巴，愤愤的叫嚷，她却笑着赶紧溜了。

她老是笑着，夜里睡着的时候还在笑。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醒着，正在编故事，听到她的傻笑和在静悄悄的夜里断断续续的说梦话，常常吓了一跳。外边，风把树吹得簌簌的响，一只猫头鹰在哭，远远的，在树林深处的农庄里，狗狺狺的叫着。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奥里维看见重甸甸黑沉沉的柏树枝像幽灵一般在窗前摇曳，那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是让他松了口气。

两个孩子笃信宗教，尤其是奥里维。父亲公然反对教会的言论使他们听了骇然，但他让他们自由，骨子里他像多数不信教的布尔乔亚一样，觉得有家族代他信仰也不坏：在敌方有些盟友总是好的；将来的事，我们也没把握。并且他虽不信教，还是相信有神的，预备到必要的时候把神甫请来，像他父亲一样办法：那即使不会有什么好处，也不见得有害；一个人不一定因为相信家里要着火才去保火险的。

病态的奥里维很有点神秘的倾向。有时他觉得自己不存在了。又温柔，又轻信，他需要一个依傍。平日忏悔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痛苦的快感，觉得把自己交托给无形的朋友非常舒服；他老是对你张着臂抱，你可以尽情倾诉，他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原谅；在这种谦卑与爱的空气中洗过了澡，灵魂净化了，得到了休息。奥里维觉得信仰这回事那么自然，不懂别人怎么会怀疑；他想，那要不是由于人家的恶意，便是上帝特意惩罚他们。他暗中祈祷，求上帝开恩，点醒父亲。有一天在乡下参观一所教堂，奥里维看见父亲划了个十字，不禁大为快慰。在他心中，《圣徒行述》是和儿童故事混在一起的。他小时候认为两者都一样的真实。童话中嘴唇破裂的史格白克，多嘴的理发匠，驼背嘉斯伽，他都是很熟的；在乡间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留神找那黑色的啄木鸟，嘴里衔着觅宝人的神奇的草根，而迦南与福地，经过儿童的想象也就成为蒲尔乔或贝里区域的地方了。当地一个圆形的山岗，顶上矗立着一株小树好像枯萎的羽毛一般，在他眼里仿佛就是阿伯拉罕燃起火把的山头。麦田尽处，有一堆枯萎的丛树，他认为就是上帝显灵的燃烧的荆棘，因为年代久远而熄灭了的。后来到了不再相信神话的年纪，他仍旧喜欢拿那些点缀他的信心的通俗传说来陶醉自己，觉得其乐无穷，他即使并不真的受这些传说之骗，心里却极愿意受骗。因此有个很久的时期，他在复活节以前的星期六留着神，想看那些在星期四飞出去的钟从罗马带着小幡飞回来。后来，他终

圣迦南为圣经上巴勒斯坦之古名，福地为其别名。蒲尔乔与贝里均法国地名。

圣经载：上帝化身为燃烧的荆棘，向摩西启示他的使命。

于懂得那不是真的，但听到教堂的钟声仍不免仰着鼻子向天空呆望；有一回他似乎看到——虽然明知不可能——有一口钟系着蓝丝带在屋顶上飞过。

他极需要浸在这个传说与信仰的世界里。他逃避人生，逃避自己。因为长得又瘦又苍白，身体娇弱，他非常痛苦，听人提到他这个情形就受不了。他天生的悲观，那没有问题是从母亲方面来的，而悲观主义在这个病态的孩子身上特别容易生长。他自己可不觉得，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这十岁的孩子，在休息时间不到园子里去玩，反而关在自己房里，一边吃点心，一边写他的遗嘱。

他写得很多，每晚都要偷偷的写日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因为他除了废话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写作在他是一种遗传的癖好，是法国内地的布尔乔亚——这个毁灭不掉的古老的种族，——几百年相传下来的需要，每天写着日记，直到老死，用着一种愚蠢的，几乎是英雄式的耐性，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饮所食，详详细细记录下来。而且只为自己，不为别人。他知道谁也不会读到这些东西，自己写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再看的。

音乐对于他像信仰一样是避难所，可以躲掉白天太剧烈的光明。姊弟俩都有音乐家的心灵，——尤其是奥里维从母亲那里秉有这种天赋。趣味是并不高明的。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方面指导他们：内地人听到的音乐不过是本地的铜乐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逢到什么节日——阿唐的杂奏曲，教堂里的大风琴所奏的罗曼斯，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在声音没校准的钢琴上所弹的，华尔兹或卜尔加，通俗歌剧的前奏曲，莫扎尔德的两三支朔拿大，——老是那几支，弹错的音符也老是那几个。家里招待宾客的时候，那就是晚会节目中的一部分。吃过夜饭，凡是能弹琴的都被请出来献技：他们先红着脸推辞，终于拗不过大家的请求，便背一个他们拿手的曲子。在场的人个个赞美艺术家的记忆力和完满的技巧。

差不多每次晚会都得来一下的这套玩艺，把两个孩子对于晚餐的乐趣完全给破坏了。要是两人合奏什么巴尚的《中国旅行》或韦勃的小曲，他们因为彼此搭配得很好而还不怎么害怕。可是要他们独奏，那简直是受罪了。照例安多纳德总比较勇敢。她固然觉得厌烦得要死，但明知逃不了，也就毅然决然的在钢琴前面坐下，开始弹她的轮舞曲，乱七八糟的，把这一段搅糊涂了，那一段又弹错了，然后停下来掉过头去向大家笑了笑：“啊！我记不得了……”

说完了她跳过几拍子重新开始，一口气弹完了。然后，她因为大功告成而很快活，在客人的赞叹声中回到座位上，又笑着说：“弹错的音很多呢！……”

可是奥里维的脾气没有这么好说话。他受不了在人前献技，成为大众注意的目标。当着别人说话，他已经够痛苦了。演奏，尤其为那些不爱音乐，——（他看得很明白，）——甚至对音乐觉得厌烦，而只为了习惯才请他演奏的人演奏，更使他觉得是种专制，为他竭力反抗而没用的。他拼命的拒绝。有些晚上，他竟溜之大吉，躲到一间黑房里或走廊里，甚至顾不得对蜘蛛的恐怖而一直逃到阁楼上。可是他越撑拒，别人的请求越迫切，话也更俏皮；同时又引起父母的责难，而他反抗得太放肆的时候还得挨几下巴掌。结果他仍旧得弹奏，——当然是弹得很坏了。过后，他因为弹得不好在夜里很伤心，因为他是真正爱音乐的。

小城里的趣味并非老是这么平庸。有过一个时期，两三个布尔乔亚家里

的室内音乐还弄得不坏。耶南太太常常提到她的祖父，很热心的拉着大提琴，唱着葛吕克，达莱拉克和斐尔东的歌曲。家里至今藏着一厚册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因为那可爱的老人像裴辽士所说的安特列安先生一样“很喜欢葛吕克”。但裴辽士立刻心酸的补充一句：“他也很喜欢毕岂尼”。或许他更喜欢的倒是毕岂尼。总之，在外曾祖的收藏中，意大利歌曲占着绝大多数。那些作品便是小奥里维的音乐食粮。当然是没有多少实质的养料，有点像人们拼命塞给孩子吃的内地糖食，可能吃倒胃口，永远接受不了正当的食物。但奥里维嘴馋得很，决没有倒胃的危险。正常的营养，人们是不给他的。没有面包，他就拿糕饼充饥。这样，西玛洛查，巴西哀罗，洛西尼，就成为这个忧郁神秘的儿童的保姆，在应该喂他乳汁的时候把他灌了醇酒。

他常常自得其乐的独自弹琴。他已经深深的受到音乐的感染。对于所弹的东西，他不求了解，只知道消极的吟味。谁也没想到教他学和声：他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一切与科学或科学精神有关的，在他家里完全是陌生的，尤其在母系方面。那些司法界中的人都是人文主义的头脑，遇到一个算题就弄昏了。他们提起一个进经纬局办事的远房兄弟，认为是个奇人。可是据说他结果还是为这种工作发了疯。内地旧家出身的布尔乔亚，思想很健全很实际，可是因为肚子塞得太饱，日子过得太单调而有些迷迷忽忽，以为自己的人情世故是了不得的法宝，只要靠了它，世界上没有一件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们差不多把科学家看做艺术家一流，比别人更有用，但不及别人高卓，因为艺术家至少是一无所用的，而一无所用就有点近于高雅。科学家却近乎耍手艺的工人，——（这便是不大体面的地方），——更有学问而有些疯癫的工头，在纸上固然很能干，但一出他们数目字的工厂就完了！要没有通情达理的，富有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的人做科学家的领导，科学家决计干不出什么大事来的。

不幸的是，这种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并不像这般明理的人所想的那么可靠。他们所谓经验只是一些奉行故事的老例，所能应付的仅限于极少数极平易的事。倘若出了件意外，必须当机立断的处理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银行家耶南便是这一等人。因为什么事都跟意料的一模一样，都是依了内地生活的节奏准确的重演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业务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他接了父亲的事，可并没对这一行有什么特殊的才具；既然从他接手以后一切都很顺利，他就归功于自己的聪明。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老实，认真，通情达理，就行了，他预备将来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而并不问儿子的兴趣所在，正像他的父亲当初对付他一样。他也不替儿子作事业方面的准备，让孩子们自生自长，只要他们做个好人，尤其希望他们幸福，因为他非常的疼他们。因此他们对人生的战斗连一丝一毫的准备都没有：简直是暖室里的花。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吗？在环境安定的内地，在他们有钱的，受人尊重的家庭里，有着一个慈爱的，快乐的，亲热的父亲，交游广阔，在地方上占着第一流的位置，生活真是太容易太光明亮了！

安多纳德十六岁。奥里维正要举行初领圣体的大典。神秘的梦想把他搅得昏昏沉沉。安多纳德听着醉人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好似四月里夜莺的歌声填满了青春的心窝。她感到身心像鲜花似的开放，知道自己长得俊美而又

葛吕克与毕岂尼为十八世纪两大歌剧作者，在法国竞争甚烈，当时爱好音乐的人分为葛吕克派与毕岂尼派。

听到人家这么说，不由得非常快活。父亲的夸奖，不知顾忌的说话，尽够使她飘飘然。

他对着女儿出神，她的卖弄风情，照着镜子顾影自怜，无邪而狡狴的小手段，使他看了直乐。他抱她坐在膝上，拿爱情的题目跟她打趣，说她颠倒了多少男子，有多少人来向他请婚，把一个一个人的姓名举出来：都是些老成的布尔乔亚，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丑，把她急得大叫大嚷，继之以大笑，把手臂绕着父亲的脖子，脸贴着父亲的脸。他问她谁能有那个福气被她挑中：是那个为他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呢，还是那胖子公证人。她轻轻的打他几下，要他住嘴，或者拿手掩着他的嘴巴。他吻着她的小手，一边把她在膝上颠簸，一边唱着那支老山歌：

俏姑娘要什么？

是不是要一个丑老公？

她噗哧一声笑了，拈弄着父亲下巴底下的鬓脚，接唱下去：

与其丑，还是美，

夫人，就请您做媒。

她打定主意要自己挑选。她知道她有钱，或者是将来有钱的，——父亲用各种口吻跟她说过：她是“极有陪嫁的”。当地有儿子的大户人家已经在奉承她，在她周围安排了许多小手段，张着雪白的网预备捉那条美丽的小银鱼。但那条鱼对他们很可能成为四月里的糖鱼，因为聪明的安多纳德把他们的伎俩都看在眼里，觉得好玩；她很愿意教人捉，可不愿意给人捉住。她小小的头脑里已经挑定了将来的丈夫。

当地的贵族——（通常每地只有一家，自称为外省诸侯的后裔，其实往往只是祖上买了国家的产业，或是在十八世纪当过行政官，或是在拿破仑时代承包军需的），——叫做鲍尼凡，在离城几里以外有座宫堡，尖顶的塔盖着耀眼的石板，周围是大森林，中间还有好几口养鱼的池塘，他们正在向那南家献殷勤。年轻的鲍尼凡对安多纳德很热心。他长得既漂亮，以年龄而论也相当强壮，相当胖。他整天只知道打猎，吃喝，睡觉；会骑马，会跳舞，举止也还文雅，并不比别人更蠢。他不时从古堡到城里来，穿着长靴，跨着马，或者坐着双轮马车，他借口生意上的事去拜访银行家，有时带一篓野味或一大束鲜花送给太太们。他借这种机会来追求耶南小姐。两人一同在花园里散步，他竭力巴结她，一边很愉快的和她谈天，一边拈着自己的须，把踢马刺蹬在阳台的石板上橐橐的响。安多纳德觉得他可爱极了。她的骄傲和她的心都是怪舒服的。童年初恋的岁月是多么温柔，她浸在里面陶醉了。奥里维却讨厌这个乡下绅士，因为他身强力壮，笨重，粗野，笑起来声音那么大，手像钳子一样，老是很轻蔑的把他叫做“小家伙……”，同时又拧他的面颊。他尤其恨——当然是不自觉的——那个陌生人爱他的姊姊……爱这个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任何人的姊姊！……

然而大祸来了。那是几百年来胶着在同一方土地上，吸尽了它的浆汁的老布尔乔亚家庭，早晚都得碰到的。他们消消停停的在那儿打盹，自以为跟负载他们的土地同样不朽的了。但脚下的泥土早已死掉，他们的根须也没有了，禁不起人家一铲子就会倒下来的。那时，大家以为遭了恶运，遭了飞来

西俗于四月一日以制成鱼形的可可糖馈赠儿童。

法国大革命后，教会产业大部分均公开标卖，入于中产阶级之手。

横祸。殊不知要是树身坚固的话，恶运就不成为恶运，或者祸患只像暴风一般的吹过，即使打断几根桠枝，也不至于动摇根本。

银行家耶南是个懦弱，轻信，而有些虚荣的人。他喜欢在眼睛里揉进点儿沙子，一厢情愿的把“实际”跟“表面”混为一谈。他乱花钱，花得很多，但由于世代相传的俭省的习惯和事后的懊悔，挥霍的程度——（他浪费了几方丈的木材而舍不得用一支火柴），——还不致使他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商业方面，他也不知谨慎。朋友向他借钱，他从来不拒绝，而要做他的朋友也挺容易。他甚至没想到要人家写张收据，人欠的账目登记得不清不楚，人家不还，他决不讨。他对什么事都相信别人的善意，正如他认为别人也相信他的善意一样。虽然表面上很有决断，心直口快，其实他胆子很小，从来不敢回绝某些冒失鬼的请求，也不敢对他们有没有偿还的力量表示怀疑。这种作风是由于好心，也由于胆怯。他对谁都不愿意得罪，怕受到侮辱，所以永远让步。为了骗自己，他把这些事做得很热心，仿佛人家拿了他的钱是帮了他的忙。他差不多真的以为是这样了：他的自尊心与乐观的脾气很容易使他相信做的都是好买卖。

这种行事当然不会不博得债务人的好感：乡下人对他好极了，他们知道要他帮忙是永远没有问题的，也就不肯放过机会。但人们——连老实的在内——的感激是像果子一般应当及时采摘的。倘使让它在树上老了，就会霉烂。过了几个月，受过耶南先生好处的人，以为这好处是耶南先生应当给他们的，甚至他们还有一种倾向，认为耶南先生既然肯这样殷勤的帮忙，一定是有利可图。而一般有心人以为在赶集的日子拿一头野兔或一篮鸡子送了银行家，即使不能抵偿债务，至少情分是缴销了。

至此为止，为的不过是些小数目，并且跟耶南打交道的也是一批相当规矩的人：所以还没有什么大害，损失的钱——那是银行家对谁都不提一个字的，——也为数极微。但有一天耶南遇到一个办着大企业的阴谋家，探听到他的资源和随便放款的习惯，情形就不同了。那个架子十足的家伙，挂着荣誉团勋章，自称为朋友中间有两三个部长，一个总主教，一大批参议员，一群文艺界与金融界的知名人物，还认识一家极有势力的报馆；他有一种又威严又亲狎的口吻，对付他看中的人真是再适当没有。他为了证明身分所用的手段，其粗俗浅薄，只要是一个比耶南精明一些的人就会起疑的：他拿出一封阔朋友写给他的信，内容无非是普通的应酬，或是谢他的饭局，或是请他吃饭；因为法国人是从来不舍惜笔墨的，对一个认识了只有一小时的人既不会拒绝握手，也不会谢绝饭局，只要这个人有趣而不开口借钱，——其实便是借钱也行，倘使看见旁人也借给他的话。因此一个聪明人看到邻人有了钱觉得为难而想帮他解决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头羊肯首先跳下水去，引其他的羊一齐下水。耶南先生大概就是第一头跳水的羊。他是那种柔顺的绵羊，天生给人家剪毛的。他被来客的交游广阔，花言巧语，奉承巴结，以及听了他的劝告而赚的第一批钱迷住了。他先用少数的款子去博，成功了；于是他下大注；终于把所有的钱，不但是自己的，并且连存户的都放了下去。他并不告诉他们；他以为胜券在握，想出其不意的教人看看他替大家挣了多少钱。

事业失败了。跟他有往来的一家巴黎商号在信里随便提起一句，说有一桩新的倒闭案，根本没想到耶南就是被害人之一：因为银行家从来没跟谁提过这事。他的轻举妄动简直不可想象，事先竟没有——似乎还故意避免——向消息灵通的人打听一下，把这桩事做得很秘密，一味相信自己的见识，以

为永远不会错的，听了几句渺渺茫茫的情报就满足了。一个人一生常有这种糊涂事，仿佛到了某个时期非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不可；而且还怕有人来救，特意避免一切能够挽回大局的忠告，像发疯般急不及待的往前直冲，好让自己称心如意的沉下去。

耶南奔到车站，不胜仓皇的搭上巴黎的火车。他要去找那个家伙，心里还希望消息不确，或者是夸张的。结果，人没有找到，祸事却证实了。他惊慌万状的回来，把一切都瞒着。外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想拖几个星期，便是拖几天也是好的；又凭着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的脾气，竭力相信还有方法补救，即使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至少能补偿主顾们的。他作种种尝试，其忙乱与笨拙使他把可能成功的机会也糟掉了。借款到处遭了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拿少数仅存的资源所作的投机事业，终于把他断送完了。而从此他的性情也完全改变。他嘴里一字不提，但变得易怒，暴躁，冷酷，忧郁得可怕。当着外人的面，他仍勉强装做快活，可是恶劣的心绪谁都看得很清楚：人家以为他身体不好。和自己人在一块的时候，他可不大会留神了，他们马上觉得他瞒着什么严重的事。他简直变了一个人：忽而冲到一间屋里，在一件家具中乱翻，把纸片摔了一地，大发脾气，因为东西没找到，或是因为别人想帮助他。随后，他在乱东西中间发呆；人家问他找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似乎不再关心妻子儿女了；或者在拥抱他们的时候眼中噙着泪。他吃不下，睡不着了。

耶南太太明明看到这是大祸将临的前夜；但她从来不顾问丈夫的买卖，一点儿都不懂。她问他，他态度粗暴的拒绝了。而她一气之下，也不再多问。但她只是莫名其妙的心惊胆战。

孩子们是想不到危险的。以安多纳德的聪明，不会不像母亲一般有所预感：但她一心要体味初恋的快乐，不愿意去想不安的事；她以为乌云自会消散的，——或者等到无可避免的时候再去看也不迟。

对于苦闷的银行家的心绪最能了解的还是小奥里维。他感到父亲在那里痛苦，便暗地里和他一起痛苦。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一无所能，一无所知。再则，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悲哀的念头。像母亲和姊姊一样，他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祸事也许是不会来的。那些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便像鸵鸟似的把头藏在一块石头后面，以为这样祸患就找不到他们了。

摇动人心的流言开始传播了，说是银行的资本已经专折殆尽。银行家在主顾面前装做泰然自若也没用，猜疑得最厉害的几个要求提取存款了。耶南觉得这一下可完了！他拼命声辩，表示因为人家不信任他而非常气愤，甚至和老主顾们大吵一场，使大家更加疑心。提款的要求纷至沓来。他一筹莫展，绝望之下，简直搅糊涂了。他作了一个短期旅行，带着最后一些钞票到邻近一个温泉浴场去赌博，一刻钟内就输得精光。

他的突然出门愈加使小城里的人着了慌，说他逃了，耶南太太费了多少口舌对付那些愤怒而不安的人，求他们耐着性子，赌咒说她丈夫一定回来的。他们不大相信这话，虽然心里极愿意相信。所以大家一知道他回来都觉得松了口气：许多人还以为自己多操心，以耶南他们的精明，即使出了乱子，也不至于没法弥缝。银行家的态度恰好证实这个印象。如今他看明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显得很疲乏，可是很镇静。下了火车，他在车站大道上跟遇到的几个朋友从从容容的谈天，谈着田里已经有几星期缺乏雨水，葡萄长得挺

好，还提到晚报上所载的倒阁的消息。

到了家里，他对于妻子的慌张和急急告诉他出门后所发生的事，装做全不在意。她努力看他的脸色，想知道他这番出门有没有把那隐忧大患消除；但她逞着傲气不去动问，等他先说。他可绝口不提那桩双方都在痛苦的事，把妻子想跟他接近，逗他吐露衷曲的意念打消了。他只提到天气太热，身体困乏，说是头疼得要命；随后大家坐上桌子吃晚饭。

他说话很少，精神很疲倦，拧着眉头，担着心事，把手指弹着桌布，勉强吃些东西，也觉得受到人家的注意，他呆呆的望着两小孩子和他的妻子：孩子因为大家不说话而很胆怯，太太生了气，沉着脸，可仍旧偷觑着他所有的动作。晚餐快完了，他似乎清醒了些，逗着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谈话，问他们在他出门的时期做了些什么；但他并没听他们的回答，只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对他们视而不见。奥里维觉察到了：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不想再继续下去。安多纳德窘了一阵，又兴奋起来，咕咕呱呱的说个不休，把手放在父亲手上，或是拿肘子触他的手臂，要他留神听她的话。耶南一声不出，一忽儿瞧瞧安多纳德，一忽儿瞧瞧奥里维，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女儿的故事讲到一半，他支持不住了，站起来走向窗子，唯恐人家窥破他的心绪。孩子们折好饭中，也站了起来。耶南太太打发他们到园子里玩去；不一会两人在花园的小径中尖声叫着，互相追逐了，耶南太太望了望背对着她的丈夫，沿着桌子走过去，仿佛找什么东西似的。她突然走近去，一方面感情冲动，一方面怕用人听到，所以嘎着嗓子问：“安东尼，怎么啦？你一定心中有事……是的！你有些事瞒着……可是什么倒楣事儿？还是身体不舒服？”

但耶南仍旧把她支开了，不耐烦的耸耸肩，冷冷的回答：“没事，没事，我告诉你！别跟我烦！”

她愤愤的走开了，气恼之下，暗中对自己说，不管丈夫遇到什么事，再也不操心了。

耶南走到花园里，安多纳德继续在那儿疯疯癫癫，耍弄她的弟弟，硬要他一块儿奔跑。可是奥里维突然说不愿意再玩了，他肘子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离着父亲不远的地方。安多纳德还过来跟他淘气；他却很不高兴的把她推开，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看到没有什么可玩，也就走进屋子弹琴去了。

外面只剩下了耶南和奥里维。

“怎么啦，孩子？”父亲温柔的问，“干么你不愿意再玩了昵？”

“我累了，爸爸。”

“好罢，那末咱们在凳上坐一会罢。”

他们坐下了。时方九月，夜色清明。喇叭花甜蜜的香味，跟花坛的墙脚下淡而腐败的河水味混在一起。浅黄的蛾绕着花打转，嗡嗡的声音像小纺车。对岸的邻人坐在屋前谈话，悠闲的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屋子里，安多纳德弹着歌剧里的调子。那南握着奥里维的手，抽着烟。黑影把父亲的脸慢慢的遮掉了，孩子只看见烟斗里一星星的火光，忽而熄了，忽而燃着了，终于完全熄灭。他们俩都不作声。奥里维问到几颗星的名字。耶南像所有内地的布尔乔亚一样不大懂得自然界的现象，除了几个无人不晓的大星宿外，一个都说不出来；但他假装孩子问的就是那熟悉的几个，便一个一个的说出名字。奥里维并不声辩：他只要听到人家轻轻的说出它们神秘的名字，就觉得有种乐趣。并且他的发问不是为了求知，而是本能的要借此跟父亲接近。他们不说话了。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张着嘴，望着天上的星，迷迷

忽忽的出了神：父亲手上的暖气把他渗透了。突然那只手颤抖起来。奥里维好不奇怪，便用着轻快的困倦的声音说：“噢！爸爸！你的手抖得多厉害！”

耶南把手抽回去了。

过了一会，小脑筋老在胡思乱想的奥里维又说：“你是不是也累了，爸爸？”

“是的，孩子。”

孩子声音很亲切的又道：“别太辛苦啊，爸爸。”

耶南把奥里维的头拉到胸前，紧紧的搂着，低声回答了一句：“可怜的孩子！……”

但奥里维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去了。钟楼上的大钟敲了八

下。他挣脱了父亲，说：“我要看书去了。”每逢星期四：他可以在晚饭以后看书，直看到睡觉的时候：那是他最大的乐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他牺牲一分钟的。

耶南让孩子走了，自己还在黑越越的阳台上来回踱步，随后也进了屋子。

房里，孩子与母亲都围聚在灯下。安多纳德的胸襟上缝一条丝带，嘴里不是说话就是哼唱，使奥里维大不高兴：他面前摆着书，拧着眉头，时子靠在桌上，双手掩着耳朵。耶南太太一边补袜子，一边和老妈子谈话，——她在旁边背着白天的账目，借机会唠唠叨叨的说些闲话；她老是有些好玩的故事讲，那种滑稽的土话救大家听了忍俊不禁，安多纳德还学着玩儿。耶南静静的望着他们。谁也没注意他。他游移不定的站了一会，坐下来拿一册书随手翻了翻。又阖上了，重新站起：他简直没法待在这儿：便点起蜡烛，跟大家说了声再会，走近孩子，感情很冲动的亲吻他们：他们心不在焉的答应了一声，连望也不望他，——安多纳德心在活计上，奥里维心在书本上。奥里维连掩着耳朵的手都没拿下来，一边看书一边不胜厌烦的说了声再会；——他在看书的时候，哪怕家里有人掉在火里也不理会的。——耶南出去了，在隔壁屋里又待了一会。老妈子走了，耶南太太过来把被单放进柜子，只做看不见他。他迟疑了一会，终于走近来，说：

“请你原谅。我刚才对你说话很不客气。”

他心里很想对他说：“可怜的人，我不恨你：但你究竟有什么事呢？把你的痛苦告诉给我听罢。”

可是她眼见有报复的机会，不由得要利用一下：“别跟我烦！你对我多凶！把我看得连个用人都不如。”

她又恶狠狠的，愤愤不平的，把他的罪状说了一大堆。

他有气无力的做了个手势，苦笑一下，走开了。

谁也没听见枪声。只有到了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邻居们才记起半夜里听到静寂的街上拍的一声，好像抽着鞭子。过后，黑夜的平静又立刻罩在城上，把活人和死人一齐包裹了。

过了一二个钟点，耶南太太醒来，发觉丈夫不在身边，心里一急，马上起来把每间房都找遍了，然后下楼走到跟住宅相连的银行办公室去；在那南的公事房中，她发见他坐在椅子上，身子伏在书桌上，鲜血还在一滴一滴的往地板上流。她大叫了一声，把手里的蜡烛掉在地下，晕了过去。家里的仆人们听见了，立刻赶来，把她扶起，忙着救护，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移在一张床上。孩子们的卧室紧闭着。安多纳德睡得像天使一样。奥里维听见一片人声和脚声，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怕惊醒姊姊，便又睡了。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没知道，城里已经在开始传播消息了，那是老妈子哭哭啼啼的出去说的。他们的母亲根本不能用什么思想，连健康都还有问题。家里只剩两个孩子孤零零的陪着死者。在那个刚出事的时期，他们的恐怖比痛苦还厉害。并且人家也不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哭。从早上起，法院就派人来办手续。安多纳德躲在自己的房内，凭着少年人的自私心理，拼命教自己只想着一个念头，唯有那个念头才能帮助她把可怕的，使她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丢在一边：她想着她的男朋友，每个钟点都等着他来。他对她从来没像最近一次那么殷勤的：她认为他一定会赶来安慰她。——可是一个人也不来，连一个字条都没有，丝毫同情的表示都没有。反之，自杀的消息一传出去，银行的存户立刻赶上门来，拿出恶狠狠的面孔对着孤儿寡妇大叫大骂。

几天之内，一切都倒下来了：死了一个亲爱的人，失去了全部的家产，地位，名誉和朋友。简直是总崩溃。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都不存在了。母子三人对于身家清白这一点都看得很重，所以眼看自己无辜而出了件不名誉的事格外痛苦。三人之中被痛苦打击得最厉害的是安多纳德，因为她平时最不知道痛苦。耶南太太和奥里维，不管怎么伤心，对痛苦的滋味并不陌生，既然天生是悲观的，所以他们这一回只是失魂落魄而并不觉得出乎意外。而人一向把死看做一个避难所，尤其是现在：他们俱希望死。当然这种屈服是可悲可痛的，但比起一个乐观、幸福、爱生活的青年人，突然之间陷入绝望的深渊，或是被逼到跟毛骨悚然的死亡照面的时候所感到的悲愤，究竟好多了。

安多纳德一下子发见了社会的丑恶。她的眼睛睁开了，看到了人生；她把父亲，母亲，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奥里维陪着母亲一起痛哭的时候，她却独自躲在一边让痛苦煎熬。她的绝望的小脑筋想着过去，现在，将来：她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了，一无希望，一无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谁。

葬礼非常凄惨，而且丢人。教堂不能接受一个自杀的人的遗体。寡妇孤儿披他们昔日的朋友无情无义的遗弃了。只有两三个跑来临时露了一下脸；而他们那种窘相比根本不来的人更教人难堪，像是赏赐人家一种恩典，他们的沉默大有谴责、鄙薄，与怜悯的意味。家族方面是更要不得：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来些狠毒的责备。银行家的自杀，不但不能干息大众的愤怒，而且被认为跟他的破产差不多一样的罪大恶极。布尔乔亚是不能原谅自杀的人的。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们就认为行同禽兽，谁敢说“最不幸的莫如跟你们一起过活”，他们便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对付。

最懦弱的人也急于指责自杀的人懦弱。一个人捐弃了自己的生命，同时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没法报复，他们尤其气愤。至于可怜的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出此下策，那是他们从来不去想的。他们恨不得要他受千百倍于此的痛苦。如今他既然溜之大吉，他们便回过来谴责他的家属。他们嘴里不说，知道那是不公平的，但做还是照样地做；因为他们非要拿一个人开刀不可。

除了悲泣以外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耶南太太，听到人家攻击她的丈夫，立刻恢复了勇气。此刻她才发觉自己原来多么爱他。这三个前途茫茫的人，一致同意把母亲的馈赠和他们个人的产业完全放弃，拿去尽可能的偿还父亲的债务。而既然没法再待在当地，他们就决意上巴黎去。

动身的情形像逃亡一样。

第一天晚上，——（九月里一个凄凉的黄昏：田野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

里，大路两旁，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矗立着湿透的丛树的躯干，仿佛水中的植物，)——他们一同上墓地去告别。新近翻掘过的墓穴四周，围着狭窄的石栏，三个人一齐跪在上面，悄悄的淌着眼泪：奥里维不住的抽噎：耶南太太无可奈何的擤着鼻涕。她竭力自苦，老想着她跟丈夫最后一面时说的话。——奥里维想着坐在阳台的凳子上跟父亲的谈话。安多纳德想着他们将来的遭遇。各人心里对这个断送了他们，断送了自己的可怜虫。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可是安多纳德想着：“啊！亲爱的爸爸，我们要吃多少苦啊！”

雾慢慢的黯淡下来，潮气把他们浸透了。耶南太太流连不忍去。安多纳德看见奥里维打了个寒噤，便和母亲说：“妈妈，我冷。”

他们站起身来，将要离开的时候，耶南太太又最后一次回过头去，对坟墓说了声：

“可怜的朋友！”

他们在夜色中走出墓园。安多纳德牵着奥里维冰冷的手。

他们回到老屋。这是宿在老巢里的最后一夜了，——他们一向睡在这儿，生活在这儿，他们的祖先也生活在这儿：这些墙壁，这个家，这一小方土地，和家中所有的欢乐与痛苦都是息息相通，分不开的，它们仿佛成为家庭的一分子，成为大家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人们直要死了才会离开它们。

行李已经整好了。他们预备搭明天早上的第一班车，趁街坊上铺子还没开门的时候动身，免得引起人家的注意和恶意的议论。——他们需要彼此挨在一起，可是各人都不由自主的走进各人的卧房，一动不动的站着，也不想摘下帽子脱去外衣，摸着墙壁，家具，和一切即将分别的东西，把脑门贴在玻璃上，希望跟这些疼爱的东西多接触一会，把它们保留在心头。最后各人竭力排遣痛苦的念头，都集中到母亲屋里去——那是阖家团聚的房间，尽里头有深大的床位：从前吃过晚饭没有外客的时候，大家都是侍在这里的。从前！……那他们觉得已经远得很了！——壁炉里生着火，他们团团坐着，一言不发，随后跪在床前做了晚祷，很早就睡了，因为第二天黎明以前就得起身。可是他们都好久的睡不着。

清早四点光景，时时刻刻看着表的耶南太太，点着蜡烛起来了。安多纳德也没怎么睡，听到声音也起身了。只有奥里维睡得很熟。耶南太太心里很难过的望着他，不忍把他叫醒。她提着脚尖走开，吩咐安多纳德：“轻一点：让可怜的孩子在这儿好好的多享受几分钟罢！”

她们穿好衣服，把零星的包袱也收拾妥当。屋子周围依旧静悄悄的：在秋凉的夜里，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格外贪恋他们温暖的睡眠。安多纳德牙齿打战：身子跟心都冰冻了。

外边寒气袭人，大门呀的一声开了。随身带着钥匙的女仆，最后一次来侍候主人。她又矮又胖，气急得很，身子老臃肿得有点不大方便，但以年龄而论还非常硬朗。她脸上围着块布，鼻子通红，眼泪汪汪的出现了，看到太太不等她来就起床了，厨房的炉子也生好了，大为不安。——她一进门，奥里维就醒了。可是他重新闭上眼睛，翻了一个身又睡了。安多纳德过来轻轻的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低声叫道：“奥里维，我的小乖乖，时候到了。”

他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看见姊姊的脸靠近着他的脸凄然微笑，摩着他的额角，嘴里说着：“起来罢！”

他就起来了。

他们悄悄的走出屋子，像贼一样。各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老妈子走在

前面，推着一辆装载衣箱的小车。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除了身上穿的，只带着几件随身衣服。一些可怜的纪念物另外交给慢车运：无非是几册书，几幅肖像，古式的座钟，它的摆动似乎就是他们生命的脉搏……晨风峭厉，城里谁也没起来：护窗关着，街上空荡荡的。他们一声不出，只有老妈子在那里唠叨。耶南太太竭力想把前后二次见到的，使她回想起过去生活的形象，深深的刻在心上。

到了车站，她心里虽然很想买三等票，可是为了面子攸关，依旧买了二等；她受不了在认识她的两三个站员前面露出窘相。

她急急忙忙扑入一间空的车厢，和孩子们躲起来，他们掩在窗帘后面，唯恐看到什么熟人的脸。可是一个人也未出现：他们动身的时候，城里的人都还不曾醒，车厢是空的；只有三四个乡下人，和几条把头伸在车棚上面悲鸣的牛。等了好久，才听到机车长啸一声，车身在朝雾中开始蠕动了。三个流浪者揭开窗帘，把脸贴在窗上，对着小城最后的瞧一眼。莪特式的塔尖在雾中隐约莫辨，山岗上都是干草堆，草地上盖着雪白的霜，冒着水汽：这已经是遥远的，梦中的风景，几乎不是现实的了。等到列车拐了弯，在岔道上走入另一条铁轨，所有的景色完全望不到了，再没被人瞧见的危险时，他们便忍不住了。耶南太太把手帕掩着嘴巴抽噎着。奥里维扑在母亲身上，把头枕着她的膝盖，淌着泪吻她的手。安多纳德坐在车厢那一头，向着窗子悄悄的哭着。每个人的哭有每个人的理由。耶南太太和奥里维只想着丢掉的一切。安多纳德却特别想到以后的遭遇：她埋怨自己不该这样，很愿意教自己浸在往事里……——但她瞻望前途是对的：她比母亲与兄弟把事情看得更准确，不像他们对巴黎存着种种的幻想安多纳德自己也没料到将来的遭遇。他们从来没到过京城。耶南太太有个姊妹在巴黎，丈夫是个有钱的法官；她这番就预备去求她帮助。同时她相信凭着孩子们所受的教育和天分——在这一点上她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估计错了，——不难在巴黎找个体面的职业维持生计。

一到巴黎，印象就很恶劣。在车站上，行李房的拥挤和出口处水泄不通的车马把他们弄得狼狈不堪。天下着雨。找不到一辆车。他们走了很多路，沉重的包裹压得他们手臂酸痛，不得不在街中心停下，大有被车马压死或溅满一身污泥的危险。他们尽管招呼，没有一个车夫答应：后来终于有辆肮脏透顶的破车停了下来。他们把包裹递上去的时候，一卷被褥掉在泥浆里。车夫和扛衣箱的脚夫欺他们人地生疏，敲了一笔双倍的价钱，耶南太太给了车夫一个又坏又贵的旅馆的名字，那是内地客人下榻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祖父在三十年前往过，所以他们不管怎么不舒服还是到这儿来寄宿。他们在这里又被敲了一笔竹杠：人家推说是客满了，教他们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算了他们三个房间的钱。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想省一些，不到食堂去，只叫了一些简单的菜，结果是没吃饱而价钱一样的贵。他们刚到巴黎就大失所望。住旅馆的第一夜，挤在没有空气的房子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忽而热，忽而冷，不能呼吸：走廊里的脚步声，关门声，电铃声，使他们时时刻刻的惊跳，车马和重货车的声响把他们头都胀疼了。他们跑到这可怕的城里来，茫无所措，只是吓坏了。

第二天，耶南太太赶到姊姊家去，姊姊在沃斯门大街上住着一个华丽的公寓。她嘴里不说，心里却巴望人家在他们没解决困难以前请他们住到那边去。但第一次的招待就使她不敢再存什么希望。波依埃—特洛姆夫妇两个对

于这家亲戚的破产大为愤慨。尤其是那个女的，唯恐受到牵连，妨害丈夫的前程：现在这个败落的家庭还要投上门未进一步的拖累他们，她更认为岂有此理了。做法官的丈夫也是一样想法，但他为人相当忠厚，要不是被妻子钉着，也许还乐于帮忙；可是他心里也愿意妻子那么办。波依埃—特洛姆太太用着冷冰冰的态度招待她的姊妹；耶南太太不由得大吃一惊，勉强捺着傲气，明白说出处境的艰难和对波依埃家的希望。他们只做不听见，甚至也不留他们吃晚饭，却是非常客套的约耶南一家在周末去吃饭。而这还不是出之于波依埃太太之口，倒是那法官觉得妻子的态度教人太难堪了，想借此缓和一下：他装做很随和，但显而易见不十分真诚，并且很自私。——可怜那南母子们回到旅馆，对这初次的访问简直不敢交换一下意见。

以后的几天，他们在巴黎奔东奔西，想找个公寓，爬着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累死了。住得那么挤的军营式的屋子，肮脏的楼梯，没有阳光的房间，对于住惯内地大屋子的人格外显得凄惨。他们越来越觉得受压迫。走在街上，进铺子，上饭店，他们老是慌忙失措，受人愚弄。他们似乎有种触手成金的本领，想买的东西都是贵得惊人。他们笨拙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没有一点自卫的力量。

耶南太太尽管对姊妹已经不存奢望，但对那顿被请而还没去吃的饭，仍旧一厢情愿的抱着许多幻想，他们一边穿扮一边心中乱跳，人家对付他们的态度是把他们当做外客而不是至亲。——并且除了客套以外，主人也并没为这顿饭破费什么。孩子们见到了跟他们年纪相仿的表兄弟姊妹，也不比他们的父母更和气。衣著漂亮而卖弄风情的女孩子，拿出傲慢而有礼的态度，装腔作势，跟他们胡扯一阵，使他们大为狼狈。男孩子因为陪着这些穷亲戚吃饭觉得受罪，尽量装出不高兴的模样。波依埃—特洛姆太太直僵僵的坐在椅子上，仿佛老是在教训姊妹，连让菜的神气也是这样。彼依埃—特洛姆先生说些无聊的话，免得人家提及正事。谈的无非是吃的东西，唯恐牵涉到什么亲切的与危险的题目。耶南太太鼓足勇气，想把话扯上地心中念念不忘的问题：波依埃—特洛姆太太却直截了当的用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把她打断了。她也就没勇气再说了。

饭后，她教女儿弹一会琴，显显本领。小姑娘又窘又不高兴，弹得坏极了。波依埃他们厌烦得要死，只等她弹完。波依埃太太含讥带讽的抿了抿嘴唇，望着自己的女儿；随后，因为音乐老是不完，便跟耶南太太谈些不相干的事。安多纳德完全搅糊涂了，不胜惊骇的发觉自己弹到某一段忽然又回到了头上去；既然没法解决，她便决定不再往下弹，痛快敲了头两个不准确而第三个完全错误的和弦停了下来。波依埃先生喊了声：“好极了！”马上叫人端咖啡来。

波依埃太太说她的女儿跟着比诺学琴。而那位“跟比诺学琴的”小姐接着说：“你弹得很好，我的小乖乖……”然后问安多纳德是在哪儿学的。

大家继续谈天。客厅里的小古董跟主妇们的装束都谈完了。耶南太太再三的想：“是时候了，我应当说呀……”

想到这个，她身子都抽搐了。正当她进足勇气，下了决心的时候，波依埃太太随使用着一种并不想表示歉意的口吻说，他们很抱歉，应当在九点半左右出门：为了一个不能改期的约会……耶南他们气恼之下，立刻起身预备

走了。主人装做挽留的神气。可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铃，仆役通报说是住在下层的邻居来了。波依埃跟妻子递了眼色，急急忙忙和仆人咬了一会耳朵。波依埃含糊其辞的请耶南一家到隔壁屋里去坐。（他不愿意给朋友知道有这门不名誉的亲戚在家。）他们被丢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孩子们对着这种羞辱大为愤慨。安多纳德眼中含着泪说要走了。母亲先还不答应，后来等得太久了，便也下了决心。他们走到穿堂，波依埃得到仆役通知，赶紧出来说几句俗套表示歉意，假装挽留他们，但显而易见巴不得他们快点走。他帮着他们穿大衣，笑容可掬的，忙着握手，低声说些好话，把他们连推带送的打发到门外。——回到旅馆，孩子们气得哭了。安多纳德跺着脚，发誓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里去了。

耶南太太在植物园附近租了一个四层楼上的公寓。卧房临着一个黑洞洞的天井，四面是斑驳的高墙，餐室和客厅——（因为耶南太太一定要有个客厅）——临着一条嘈杂的街，整天有蒸汽街车和往伊佛莱公墓去的柩车走过。衣衫褴褛的意大利人，下流的孩子，游手好闲的在路旁凳子上坐着，或是剧烈的争吵。为了这些喧闹的声音，没法开窗；傍晚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你必得在忙乱而发臭的人堆里挤，穿过一些泥泞而拥塞的街道，走过一家开在邻屋底层的下等酒店，门口站着些高大渴睡的姑娘，黄黄的头发，脸涂得像石膏一般，用着下流的目光盯着行人。

耶南一家仅有的一点儿钱消耗得很快。每天晚上，他们不胜忧急的发觉荷包的漏洞越来越大了。他们想法子撙节，可是不会：节约是种学问，倘使你不是从小习惯的话，就得靠多少年的磨练去学。天生不知俭省的人而勉强求俭省，只是白费时间：只要遇到一个花钱的机会，他们就让步了，心里老是想：“等下次再省罢”，而要是偶然挣了或自以为挣了一些小钱的时候，又马上把这笔盈余花掉，结果是花费的比挣来的超过十倍。

过了几星期，耶南他们的财源都搅光了。耶南太太不得不把剩下的一点儿自尊心丢开，瞒着孩子去向波依埃借钱。她想法跟他在公事房里单独见面，求他在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位置来解决生计之前，借一笔小款子。波依埃是个软心肠的，还相当讲人情，先用延宕的手段推诿了一番，终于让步了。在一时感情冲动而心不由主的情形之下，他居然借给她二百法郎，过后又立刻后悔，——尤其当他不得不告诉太太，而她对于丈夫的懦弱和姊妹的耍手段表示大为气恼的时候。

耶南母女天天在巴黎城中奔走，想谋个位置：耶南太太像内地有钱的布尔乔亚一样有种成见，认为除了所谓“自由职业”——大概是因为这种职业可以令人饿死，所以叫做自由——之外，任何旁的职业对她和她的儿女都有失身分。连家庭教师的位置，她都不愿意让女儿担任。在她心目中，只有公家的差事才不失体面。而要希望奥里维当个教员，先得设法完成他的教育。至于安多纳德，耶南太太很想替她在学校里谋个教职，或是进国立音乐院去得一个钢琴奖。但她所探问的学校有的是教员，资格都比她那个只有初级文凭的女儿强得多；至于音乐，那末得承认安多纳德的天分极其平常，多多少少比她优秀的人都还没法出头呢。他们发见巴黎逼着大大小小的人材为了生活作着可怕的斗争与无益的消耗。

两个孩子垂头丧气，甚至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平庸到极点；他们硬要自己相信这一点，并且向母亲证明。奥里维在内地中学里不费多大气力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角色，到这儿却是被种种磨难搅昏了，把所有的聪明都吓跑了。

人家把他送进一所中学，居然弄到一份助学金。但他初期的成绩恶劣之极，助学金被取消了。他自以为愚蠢无比。同时他又讨厌巴黎，讨厌那些熙熙攘攘的人，讨厌下流的同学，卑鄙的谈话，以及某些同伴向他所作的可耻的建议。他甚至没勇气对他们说出他的轻蔑，仅仅想到他们的堕落，就觉得自己被玷污了。他跟母亲与姊姊每天晚上作着热烈的祈祷，算是唯一的安慰，他们奔波了一天所碰到的失望与委屈，对于这些无邪的心简直是种污辱，彼此连谈都不敢谈起。但是和巴黎潜伏着的无神主义接触之下，奥里维的，信心不知不觉的开始崩溃了，仿佛新刷的石灰一淋着雨就在墙上掉下来。他虽然继续信仰，但在他周围，上帝已经死了。

母亲与姊姊仍旧奔来奔去，一无结果。耶南太太又去看波依埃夫妇。他们为了摆脱她，给她找了两个位置：为耶南太太的是替一位往南方过冬的老太太当伴读；为安多纳德的是到住在乡下的法国西部人家当家庭教师，报酬都还不差。耶南太太可是拒绝了。除了她自己去服侍人家的屈辱以外，她更受不了的是她的女儿也要逼上这条路，并且还得跟她分离。不管他们如何不幸，而且正因为不幸，他们要苦守在一处。——波依埃太太听了这话大不高兴。他说一个人没法生活的时候，不能再挑剔。耶南太太忍不住责备她没心肝。波依埃太太就对于破产和耶南太太欠她的钱说了一大篇难听的话。赶到分手的时候，姊妹俩竟变了死冤家。一切的关系都断绝了。耶南太太一心一意只想把借的款子还清，可是办不到。

劳而无功的奔走还是继续着。耶南太太去访问本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是以前耶南常常帮忙的，结果到处碰到一副忘恩负义和自私自利的面孔。众议员对她的信置之不复，她上门去，仆人又回说不在家。参议员却用着一种教人受不了的怜惜的口吻提到她的处境，说都是“那该死的耶南”一手造成的，同时对他的自杀又说了许多难堪的话。耶南太太替丈夫辩护了几句。参议员回答说，他知道银行家不是欺诈，而是荒唐，说他是饭桶，是个糊涂虫，什么事都白作聪明，不跟任何人商量，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要是他只害了自己倒也罢了：那是他活该！可是，——不说连累别人，——光是把他的妻子儿女害到这步田地，丢下他们让他们自寻生路……那可只有耶南太太能够原谅他了，如果她是一个圣者的话，但他，参议员，他不是个圣者——(s,a,i,n,t,)——只是个健全的人——(s,a,i,n,)——一个健全的，明理的，会思考的人，他可没有丝毫宽恕他的理由，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中自杀简直是混账到极点。唯一可以替耶南辩护的理由，就是这桩事不能完全教他负责。讲到这儿，他向耶南太太道歉，说他对她丈夫的批评未免激烈了一些：而这是因为他和她表示同情的缘故；接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算做布施，——被她拒绝了。

她到一个大机关里去谋个职位，手段可十分笨拙，而且是有头无尾的。她进足了勇气才奔走了一次，回来却垂头丧气，几天之内再没气力动弹；赶到她再去问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在教会方面也没能得到什么帮助，或是因为他们觉得无利可图，或是因为不愿意理睬一个家长从前是出名反对教会而现在身败名裂的家庭。耶南太太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谋到一所修道院里教钢琴的职位，——极乏味而报酬极少的差事。为了多挣一些钱，她又在晚上替文件代办所做些抄写工作。可是人家对她很严。他的书法和疏忽，尽管用

心还是要脱落字句，甚至整行的漏掉，——（她心里想着多少旁的事！）——使她受到很不客气的埋怨。她往往眼睛于涩作痛，四肢酸麻的做到半夜，而抄件还是要被退回来，那时她就失魂落魄的回家，整天的抽抽搭搭，不知道怎么办。她多年以前就有心脏病，经过这些磨难，病更加深了，使她有种种恐怖的预感。她有时很痛苦，透不过气来，仿佛要死过去了。她出门的时候身边老带着字条，写着自己的姓名住址，恐防会倒在路上。要是她死了，那怎么办呢？安多纳德尽量支持她，装出她本来没有的那种镇静的态度；她要母亲保养身体，让她去代替工作。可是耶南太太进着最后一些傲气，无论如何不肯让女儿去受她所受的屈辱。

她尽管做得筋疲力尽，省吃俭用，仍是无济于事：挣的钱不够养活他们，非把留着的一些首饰变卖不可。而最糟的是这笔派了多少用途的钱，在那南太太拿到手的当天就给偷去了。老是糊里糊涂的可怜的妇人，因为第二天是安多纳德的节日，想买件小小的礼物给她，顺路走进便宜百货公司。她把钱袋紧紧抓在手里，唯恐丢掉。为了要仔细看一件东西，她随手把钱袋往柜台上一放；过了一会儿想去拿回来，已经不见了。——这是最后一下的打击。

不多几天以后，八月将尽，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一股热腾腾的水汽重甸甸的罩在城上，——耶南太太把一篇紧急的抄件送往文件代办所回来。因为过了晚饭时间，又想节省三个铜子的车钱而怕孩子们揪心，她赶路太急了些，走得非常疲倦。爬上四层楼，她已经不能开口，不能呼吸了。像这种模样的回家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已经不以为意了。她硬撑着和他们马上吃饭。大家都为了天气太热吃不下东西，勉强吃了些肉，喝了几口淡而无味的水。他们都不出声，一来没心思说话，二来特意让母亲歇一歇，——他们一齐望着窗子。

突然，耶南太太舞动着手，拼命抓着桌子，瞪着孩子，哼了几声，身子往下倒了。安多纳德和奥里维赶上去刚好把她扶住。他们俩发疯般叫着：“妈妈！我的小妈妈！”

可是她不回答。他们一下子没了主意。安多纳德抽搐着，紧紧搂着母亲，拥抱着她，呼唤她。奥里维开着门大喊：“救命！”

看门女人爬上楼来，看到这个情形，便去找了个附近的医生。但医生到的时候，她已经完了。还算耶南太大的运气，死得这么快；可是她最后几秒钟看着自己死去，把孩子们孤零零的丢在苦海里的感触，谁又能知道呢？……

孩子们孤零零的受着惨祸的惊恐，孤零零的哭着，孤零零的料理可怕的后事，看门女人心地很好，帮了他们一点忙；耶南太太教课的修道院方面，只冷冷的说了几句惋惜的话。

母亲刚死的时期，两人简直是绝望到无可形容。但使他们得救的便是这过度的绝望，因为奥里维抽风抽得很厉害，使安多纳德只想着兄弟，把自身的痛苦忘了一部分；而她的深切的友爱也感动了奥里维，不至于因痛苦而有什么危险的冲动。两人拥抱着，坐在亡母的灵床旁边，在守夜灯的微弱的光线之下，奥里维喃喃的说应当死，两人一同死，立刻就死；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窗口。安多纳德也有这种可怕的愿望；但她还是拼命的挣扎，要活下去……

“活着有什么用呢？”

“为了她呀，”安多纳德指着母亲，“她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想想罢……她为我们受了多少罪，我们不能使她再受一桩最苦的苦难：看到我们穷途潦倒的惨死……”她又接着很兴奋的说：“……啊！而且一个人不应该这样畏

缩！我不愿意！我要反抗！我一定要你有一天能够幸福！”

“永远不会的了！”

“会的，你将来会幸福的，我们受的苦难太多了。物极必反，不会老是苦下去的。你能打出一条路来，你能有个家庭，你会幸福：我一定要你这样，我一定要！”

“怎么过活呢？咱们永远不能……”

“一定能够的。怎么办吗？先得撑到你能够谋生的时候。一切都归我负责。你瞧着罢，我一定做到。啊！要是妈妈让我做的话，我早已……”

“你去做些什么呢？我不愿意你干屈辱的事。并且你也不能“怎么不能？……靠自己的工作糊口，只要是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屈辱！你别操心，我求你！你瞧着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你将来会幸福的，咱们都会幸福的，奥里维，母亲也要为了我们而高兴呢……”

跟在母亲灵柩后边的只有两个孩子。他们一致同意不去通知被依埃：这一份人家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对母亲多么狠心，连她的死也是他们促成的。看门女人问他们可有别的亲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一个也没有。”

在空荡荡的墓穴前面，他们手牵着手祷告。他们在绝望中逞着傲气，宁愿孤独而不愿意看到那些无情而虚伪的亲戚。——两人走回家，一路上跟他们挤来挤去的都是一般对于他们的丧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而只有语言相同的群众。安多纳德让奥里维挽着手臂。

他们在同一所屋子里换了最高层的一个极小的公寓。——只有两间顶楼底下的卧室，一间给他们作餐室用的极小的穿堂，和一间像壁橱般大的厨房。换一个区域，他们或许能找到比较好一些的住所，但在这儿他们觉得仍旧跟亡母在一起。看门女人对他们很表同情：可是不久她也管着自己的事，谁也不理会他们了。屋子里没有一个房客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住在旁边的是谁。

修道院居然答应安多纳德接替她母亲教琴。她还想找些别的教课的事。她唯一的念头是教养弟弟，直到他进高等师范为止。这计划是她独自决定的，她研究高师的课程，到处打听，也征求奥里维的意见，——可是他毫无意见，她已经为他选择好了。一朝进了高师，他一生不用再愁生活，前途有望了。所以非要他达到这一步不可，无论如何都得活到那个时候。那不过是五六个辛苦的年头：一定能撑到的，这个意念给了安多纳德很大的勇气，使她整个身心都振作起来。她明白看到摆在她前面的是孤独艰苦的生活，唯有靠着“超拔兄弟”的热情才能捱受的。她打定主意倘若自己得不到幸福，至少要使兄弟幸福！……这个还没足十八岁的轻佻而温柔的姑娘，被她那英勇的决心改变了：她心中藏着一股献身的热诚和奋斗的傲气，不但谁都没想到，连她自己也没料到。女子在这个烦闷的年龄，有如万物骚动的初春，爱的力量充塞着整个身心，像一条潜藏的溪水在泥土下面流着，把它包裹，浸润，永远和它在一起纠缠；同时爱情也能化为种种形式，它只想献身给别人，给人家做养料：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行了，它的无邪与深刻的肉感准备随时蜕化为牺牲。爱情使安多纳德作了友爱的俘虏。

她的弟弟因为没有这样的热情，精神上就没有这种依傍。并且那是人家献身于他而非他献身于人，——这当然更方便更甜蜜，只要你是爱那个为你牺牲的人的。可是相反，他眼看姊姊为了他而筋疲力尽，心里非常难过。她

回答说：“啊！好孩子！……难道你不看见我就靠这个生活吗？要没有你给我的辛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很明白这个。处在安多纳德的地位，他也会把这种甘心情愿的劳苦看得很重的；但人家为了自己而受罪，他的傲气与心灵就大为痛苦了。并且，一个像他这样懦弱的人，要负起别人强迫他担负的责任。非成功不可的责任，——既然姊姊把自己的一生在他身上孤注一掷，——真是多么沉重啊！想到这点，他就受不了，他非但不加倍的鼓起勇气，反而有时弄得垂头丧气。可是她逼着他无论如何要挣扎，要工作，要生存：部是他没有姊妹的督促决计办不到的。他大有甘心战败的倾向——也许还有自杀的倾向，——要不是姊姊硬要他奋发有为，追求幸福的话，或许他早已完了。他因为自己的天性受了抑制而很苦闷；但这抑制就是他的救星。他也在经历一个转变的年龄：在此可怕的时期，成千累万的青年都因为一时糊涂，被两三年的疯狂把一生断送了。倘若他有胡思乱想的时间，恐怕早走上了不是灰心，便是放荡的路：他每逢反躬自省的时候，病态的幻想，对生活，对巴黎，对那些挤在一块儿腐化的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厌恶，就来占据他的心灵。可是一看到姊姊，恶梦就醒了；既然她为了他而活着，他也就活下去了，他将未也就会幸福了，虽然自己并不求幸福……

这样，他们的生活就靠一股热烈的信仰，而这信仰又是靠苦行，宗教，和高尚的志愿促成的。两个孩子所有的生命力都倾向着独一无二的目标，就是奥里维的成功。任何工作任何屈辱，安多纳德都能忍受：她当着家庭教师，差不多被人看作仆役，像老妈子一样的带学生去散步，在街上闲荡几小时，名目是教他们学德文。这些精神的痛苦与肉体的疲劳，使她的傲气和对兄弟的友爱都得到一种安慰。

她筋疲力尽的回家，还得照管奥里维。他白天在中学里寄一顿中饭，到傍晚才回来。她在煤气灶上或酒精灯上预备晚饭。奥里维从来不觉得肚子饿，对什么都没胃口，尤其是肉类；只能强迫他吃一点，或是想法替他做些心爱的菜；而可怜的安多纳德又不是个高明的厨娘！她花尽了气力，结果只听到兄弟说她的烹调不堪入口。一般笨拙的青年主妇，因为不善烹饪常常使生活中受到影响，连睡觉都睡不好，——直要对着炉灶不声不响的失望了多少次，才能懂得一些做菜的诀窍。

吃过晚饭，她把少数的碗盏洗完了，——（他要帮她，她可不许，）——便像慈母一样的监督兄弟的功课。她教他背书，查看他的卷子，甚至也帮他准备，可老是留着神。不让这多疑的家伙生气。他们坐在一张独一无二的桌子，吃饭与写字两用的桌子旁边：他做他的功课，她不是缝东西，便是抄写文件，等他睡了，再替他整理衣服或做自己的活儿。

虽然生计这样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所能积蓄起来的一些钱先去偿还母亲欠波依埃家的债。那并非因为波依埃他们是怎么凶恶的债主：他们已经无声无臭，再也不想到那笔他们认为丢定了的钱了，并且能够花这个代价摆脱了拖累人的亲戚，他们也很高兴，可是两个孩子的傲气与孝心，觉得母亲对他们瞧不起的人有所负欠是很难过的。他们尽量的节省：在娱乐上，衣著上，食物上，省下钱来，想积成二百法郎，——那对他们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安多纳德想由她一个人来熬苦。但兄弟一朝看出了她的用意，无论如何要跟她采取一致行动。他们为了这件事含辛茹苦，赶到每天能积下几个铜子，两人就很快活了。

节衣缩食，一个钱一个钱的省着，三年之中居然积满了那个数目。那真是他们极大的喜悦……一天晚上，安多纳德跑到波依埃家去。他们对她很不客气，以为她又要来干求了，便先下手为强，冷冷的责备她不通消息，连母亲的死讯也不报告，直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才来。她打断了他们的话，说她并没意思打搅他们，只是来偿还以前的债务的；说罢她把两张钞票放在桌上，要求给她一张收据。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假装不愿意收那笔钱，对她突然之间亲热起来，很像一个债主看见几年以前的债务人，把他早已置之脑后的欠款给送了来。他们探问姊弟两个住在哪儿，怎么过活的。她不回答这些问题，只催着要收据，说有事在身，不能多留：然后她冷冷的行了礼，走了。波依埃夫妇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忘恩负义不由得气坏了。

这桩心事放下了，安多纳德依旧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但如今是为奥里维了。唯恐他知道，她瞒得更紧。她舍不得穿著，有时甚至于饿着肚子省下钱来，花在兄弟的装饰上，娱乐上，使他的生活有些调剂，能不时到音乐会去或歌剧院去，——那是奥里维最大的快乐。他很不愿意自个儿去，但她自会想出种种不去的借口来减轻他的不安，她推说身子累了，不想出去，或竟说不喜欢去。他明明知道这都是为了爱他而扯的谎！可是小孩子的自私心理占了上风，便独自上戏院去了，一到那儿却又难过起来；他一边看戏，一边老在心里嘀咕：乐趣都给破坏了。有一个星期日，她打发他上夏德莱戏院去听音乐，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告诉姊姊说走到圣·米希桥就没有再走的勇气：他对音乐会已经不感兴趣；不跟她一块儿享受，他太痛苦了。安多纳德听了非常安慰，虽然兄弟为她而牺牲了星期日的消遣使她很遗憾。但奥里维并不后悔：他回到家中看见姊姊脸上快乐的光彩，那是她掩饰不了的，就觉得比听到世界上最美的音乐还要愉快。那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在窗子旁边，他拿着书，她拿着活计，但一个并不看书，一个也并不做活，只谈着些对他们毫不相干的废话，这样甜蜜的星期日，他们还从来不曾有过；姊弟俩决定以后再不为了音乐会而分离了：要他们独自享乐是决计办不到的。

她暗中省下的钱居然能够替奥里维租一架钢琴，使他喜出望外；而且以租赁的方式，过了若干年月，那架琴可以完全归他们所有。这样她又平空添了一个沉重的担子。到期应付的款子对她简直是个恶梦；为了张罗这笔钱，她把身子都磨坏了。但这桩傻事为他们添了不知多少幸福。

在这个艰苦的生涯中，音乐好比他们的天堂。他们沉浸在里头，把世界上其余的一切都给忘了。但那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音乐是现代许多强烈的溶解剂的一种。那种像暖室般催眠的气氛，或是像秋天般刺激神经的情调，往往使感官过于兴奋而意志消沉。但对于像安多纳德那样操劳过度而没有一点乐趣的人，音乐的确能使她松动一下。毫无休息的忙了一个星期，音乐会可以说是唯一的安慰。两人就靠着怀念过去的音乐会与企望下次的音乐会过活，靠着那超乎时间，远离巴黎的两三个钟点过活。他们冒着雨雪风寒，在场外紧紧的偎倚着，心中还怕买不到座位，等了许多时间才挤入戏院，坐上又窄又黑的位置，在喧哗嘈杂的人海中迷失了。他们窒息着，被人紧挤着，又热又不舒服，难受到极点；——可是他们多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了觉得贝多芬与华葛耐伟大的心灵中所奔泻的光、力、爱，也在自己心中奔泻而快乐，为了看到兄弟或姊姊那张困倦与早经忧患而变得苍白的脸突然闪出点光辉而快乐。安多纳德四肢无力，软瘫了，好像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一样，她蹲在甜美温暖的窝里悄悄的哭了。奥里维握

着她的手。谁也没注意他们。但在阴暗的大厅里，躲在音乐的慈爱的翅膀底下的，受伤的心灵何止他们两个呢。

安多纳德还有宗教支持。她很诚心，每天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祷告，每星期日去望弥撒。她遭了横祸，却始终相信基督的爱，相信他跟你一起受苦，将来有一天会安慰你。可是她精神上和死者的关系比和神明的关系更加密切，她受到磨难的时候总想到他们。但她理性很强，独往独来，跟旁的旧教徒不相往还；他们对她也不大好，认为她有邪气，差不多是自由思想者，或正在往这条路上去；因为依着纯粹法国女孩子的性格，她决不肯放弃她自由的判断：她的信仰是为了爱，而非为了像下贱的牲畜一般服从。

奥里维可不再信仰了。从初到巴黎的几个月起，他的信心就慢慢的开始瓦解，终于完全崩溃。他因之大为痛苦，因为只有强者或俗物才能没有信仰，而他既不够强，也不够俗，所以经过好几次剧烈的苦闷。他的心依旧保持着神秘的气息；虽没有了信仰，跟他的思想最接近的究竟还是姊姊的思想。他们俩都生活在宗教气氛里。分离了整整一天之后，晚上回到家里，狭小的寓所对他们无异大海中的港埠，安全的托庇所，尽管又冷又寒酸，可是纯洁的。在这儿，他们觉得跟巴黎的腐败气息完全隔离了……

他们不大谈到自己所做的事：一个人筋疲力尽的回来，再没心思把好不容易挨过的一天重新温一遍。他们本能的想忘掉白天的情形。尤其在刚回家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吃着晚饭，尽量避免彼此问询，只用眼睛来打招呼，有时一顿饭吃完了也没交换一句话。奥里维对着饭菜发呆，像小时候一样。安多纳德便温柔的摩着他的手，微笑着说：“喂，拿出点勇气来！”

他就笑了笑，赶紧吃饭。整个晚餐的时间，谁都不想开口。他们极需要静默。直要休息够了，被对方体贴入微的爱渗透了，把白天所受的污辱淡忘了，他们话才多一些。

然后奥里维开始弹琴。安多纳德早已戒掉这个习惯，让他独自享受：因为那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他也尽量的借此陶醉。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近于女性的气质，生来是为爱人家而不是为创造事业的性格，很能够和他弹的音乐在精神上打成一片，把细腻的次数都很忠实很热烈的表现出来，——至少在他软弱的手臂和短促的呼吸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因为像《德利斯当》或贝多芬后期的朔拿大那样的作品，他没有气力对付。所以他更喜欢弹莫扎尔德和葛吕克的音乐，而那也是她最喜爱的。

有时她也唱歌，都是极简单的古老的调子。她的女中音嗓子，好像蒙着一层什么，调门低而微弱。她非常胆小，绝对不敢在别人面前唱，便是对奥里维也不免喉咙梗塞。她最喜欢贝多芬用苏格兰歌辞谱成的一个曲子，叫做《忠实的琼尼》，极幽静而骨子里又极温柔的作品……就像她的为人。奥里维每次听了都禁不住要流泪。

她更喜欢听兄弟弹琴。她要把杂务赶紧做完，一方面开着厨房门，想听到奥里维的琴声；但不管她怎么小心，他老是抱怨她安放碗盏的声响，于是她把门关上，等到收拾完了，才来坐在一张矮凳上，并不靠近钢琴，——他弹琴的时候有人靠近就会受不了，——而是在壁炉前面，像一头小猫那样蹲着，背对着琴，眼睛瞅着壁炉内金黄的火舌在炭团上静静的吞吐，想着过去的种种，出神了。敲了九点，她得鼓着勇气提醒奥里维时间已到。要使他从幻想之中醒过来，要使她自己脱离缥缈的梦境，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奥里维晚上还有功课，并且又不宜于睡得太迟。他并不立刻听从，音乐完了以后，

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工作。他的思想在别处飘浮，往往九点半过了还没有走出云雾。安多纳德坐在桌子对面做着活儿。明明知道他一事不做，可不敢多瞧他，免得露出监督的神气使他不耐烦。

他正在经历青春的转变时期，——幸福的时期，——喜欢过着懒洋洋的日子。额角长得很清秀：眼睛像女孩子的，放荡，天真，周围时常有个黑圈；一张阔大的嘴已，嘴唇有点虚肿，挂着一副讥讽的，含糊的，心不在焉的，顽皮的笑容，过于浓密的头发直掉到眼前，在脑后的差不多像发髻一样，还有一簇挺倔强的在那里高耸着，——一条宽松的领带挂在脖子，——（姊姊可是每天早上替他扣得好好的）；——上衣的钮扣是留不住的，虽然姊姊忙着替他缝上去，衬衣不用袖套，一双大手，腕部的骨头突得很出。他露出一副狡猾的，瞌睡的，爱舒服的神气，楞头傻脑的老半天望着天空，眼睛骨碌碌的把安多纳德屋里的东西一样样的瞧过来，——书桌是放在她屋里的，——瞧着小铁床和挂在床高头的象牙十字架，——瞧着父亲母亲的肖像，——瞧着一张旧照片，上面是故乡的钟楼与小河。等到眼睛转到姊姊身上，看她不声不响做着活儿，脸色那么苍白，他突然觉得她非常可怜而对自己非常恼恨，认为不应该闲荡，便振作精神，赶紧做他的功课，想找补那个损失的时间。

逢到放假的日子，他就看书。姊弟两人各看各的。虽然他们这样相爱，还是不能高声的一同念一本书。那会使他们觉得亵渎的。他们以为一册美妙的书是一桩秘密，只应当在静寂的心头细细的体会。遇到特别美的地方，他们就递给对方，指着那一节说：“你念罢！”

于是，一个念着的时候，另外一个已经念过的就睁着明亮的眼睛。瞧对方脸上的表情，跟他一同吟味。

他们往往对着书本不念：只顾把肘子撑在桌上谈天。越是夜深，他们越需要互相倾吐，而且心里的话也更容易说出来。奥里维抑郁不欢，老是需要把痛苦倾倒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减轻一些自己的痛苦。他没有自信。安多纳德得给他勇气，帮助他对他自己斗争，而那是永无穷尽的，一天都免不了斗争。奥里维说些悲苦的泄气话，说过以后觉得轻松了，可设想到这些话会不会压在姊姊心上。等到发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消磨了她的勇气，把他的疑虑给了她。安多纳德面上绝对不露出来，天生是勇敢而快活的性格，她仍旧装做很高兴，其实她的快乐早已没有了。她有时困倦之极，受不了自我牺牲的生活。她排斥这种思想，也不愿意加以分析，但免不了受到影响。唯一的依傍是祈祷，除非在心灵枯竭的时候连祈祷都不可能，——这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她又烦躁又惶愧，只能不声不响的等待上帝的恩宠。这些苦闷，奥里维是从来没想到的。安多纳德往往借端躲开，或是关在自己屋里，等烦闷过去以后再出现，出现的时候她抱着隐痛，堆着笑容，比以前更温柔了，仿佛为了刚才的痛苦而不好意思。

他们的卧室是相连的。两张床靠在同一堵墙上：他们可以隔着墙低声谈话。睡不着的时候，两人便轻轻的敲着壁，问：“你睡熟没有？我睡不着啊。”

姊弟之间只隔着这么薄薄的一堵壁，仿佛是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朋友。但由于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贞节观念，——两间屋子的门在夜里总是关严的，除非奥里维病了，而那也是常有的事。

他虚弱的身体并没好转，反而愈来愈坏，老是不舒服：不是喉头，便是胸部，不是头部，就是心脏；极轻微的感冒在他也能变成支气管炎；他害过

猩红热，差点儿死掉；平时他也有种种重病的奇特的征象，幸而没发作；肺部与心部常有几处作痛。有一天医生说很有心囊炎或肺炎的可能，随后他们去请教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又证实了那个疑惧。结果却太平无事。他的病其实是在神经方面，会变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病象；慌张了几天，事情居然过去了，但把安多纳德折磨得太厉害了。为之忧急，她多少夜睡不着觉，常常起来到兄弟房门口去听他的呼吸，心惊胆战，以为他要死了，是的，她知道他必死无疑了：于是她浑身颤抖的跳起来，合着手，紧紧的握着，抽搐着，堵着嘴巴，不让自己叫出来：“噢，天啊！天啊！别把他带走啊！不，不，——你不能这样做！——我求你，求你！……噢！好妈妈！救救我啊！救救他，救他一命呀！……”

她全身都紧张了。

“啊！已经做了这么些，他快要成功，快要幸福的时候，难道要半路上倒下来吗？不，不，那是不行的，那太残忍了……”

奥里维紧跟着又使她担心别的事。

他像她一样老实，但意志薄弱，思想太自由，太复杂，对于明知道不正当的事，不免有些心摇意乱，抱着怀疑而宽容的态度，讲且他抵抗不了肉欲的诱惑。安多纳德那么纯洁，一向不知道兄弟的心理变化。有一天她突然发觉了。

奥里维以为她不在家。往常她那时是在外边教课的：这一天正要出门的时候，按到了学生的请假信，她心里很快慰，虽然微薄的收入工少了几个法郎。她疲乏已极。躺在床上，觉得能于心无愧的休息一无很高兴。奥里维从学校回来，带着一个同学坐在隔壁屋里谈天。他们的话，句句都可以听到，他们以为没有旁人，便一点没有顾忌。安多纳德听看兄弟快乐的声音，自个儿微微笑着。过了一会，她忽然沉下脸来，身上的血都停止了。他们非常下流的说着脏话，似乎说得津津有味。她听见奥里维，她的小奥里维笑着，她也听见她认为无邪的嘴里说出许多淫猥的话，把她气得身子都凉了，心里的痛苦简直设法形容。他们娓娓不倦的谈了好久，而她也禁不住要听着。临了，他们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安多纳德一个人。于是她哭了，觉得心中有些东西死了，理想中的兄弟的形象，——她的小乖乖的形象，——给污辱了：那为她真是致命的痛苦。但两人晚上相见的时候，她一字不提。他看出她哭过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懂姊姊为什么对他改变态度。她直过了相当的时间才恢复常态。

但他给姊姊最痛苦的打击是他有一回终夜不归。她整夜的等着。那不但她纯洁的道德丑了伤害，而且她心灵最神秘最隐密的地方也深感痛苦——那儿颇有些可怕的情绪活动，但她特意蒙上一层幕，不让自己看到。

在奥里维方面，他主要是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他早上回来打算只要姊姊有一言半语的埋怨，就老实不客气顶回去。他提着脚尖溜进屋子，怕把她惊醒。但她早已站在那儿等着，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而易见是哭过了。她非但不责备他，反而不声不响的照料他的事，端整早点，预备他吃了上学。他看她一言不发，只是非常丧气，所有的举止态度就等于一场责备：那时他可支持不住了，扑在她膝下，把头藏在她的裙子里。姊弟俩一齐哭了。他万分羞愧，对着外边所过的一夜深表厌恶，觉得自己堕落了。他想开口，她却用手掩着他的嘴巴，他便吻着她的手。两人什么话都没说，彼此心里已经很了解。奥里维发誓要成为姊妹所希望的人物。可是安多纳德不能把心头的创

伤忘得那么快，她像个大病初愈的人，还得相当时日才能复原。他们的关系有点儿不大自然。她的友爱始终很热烈，但是在兄弟心中看到了一些完全陌生而为她害怕的成分。

奥里维的变化所以使她格外惊骇，因为同时她还受着某些男人追逐。她傍晚回家，尤其是晚饭以后不得不去领取或送回抄件的时候，常常给人钉着，听到粗野的游辞，使她痛苦得难以忍受。只要能带着兄弟同走，她说以强迫他散步为名把他带着；可是他不大愿意。而她也不敢坚持，不愿意妨碍他的工作。她的童贞的，古板的脾气，和这些风俗格格不入。夜晚的巴黎对她好比一个森林，有许多妖形怪状的野兽侵袭她，一想到要走出自己的家，她心里就发颤。可是非出去不可。她不知道怎么对付，老是发急。而一转念间想到她的小奥里维也将要——或者已经——

跟那些男人一样迫着女人的时候，她回到家里简直没勇气伸出手来跟他招呼。她对于他有这种反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她长得并不怎么美，却很有点儿迷人的力量，能够吸引人家，虽然她绝对没有什么勾引人的动作。衣服极朴素，差不多老戴着孝，个于不甚高大，很窈窕，表情很细腻，不大出声，只悄悄的在人堆里穿过，唯恐引人注目，但那双困倦而温柔的眼睛，那张小小的、模样那么清秀的嘴巴，自有一种深邃的韵味，惹人注意。有时她发觉自己讨人喜欢，不禁有些惶愧，——可是心里也很高兴……一颗能感到别人好意的、平静的心中，不自觉的会有多少可爱而贞节的风韵，谁能指点出来呢？那只在一些笨拙的动作，羞怯的躲躲闪闪的目光上有所表现，而这些又是多么好玩多么动人。惶乱的表情更增加了他的魅力。人家的欲念被她挑动了：既然她是一个清寒的没人保护的女孩子，别人也就毫无顾忌的对她明说了。

她有对到一般有钱的犹太人集会的拿端夫妇家去走动，那是她在教书的一个人家——拿端的朋友——认识的，他虽然那么孤僻，也不免去参加了两三次夜会。亚尔弗莱·拿端先生是巴黎的一个名教授，了不起的学者，同时又是个交际家，极有学问，也极其浮华，这种古怪的混合的人品在犹太社会中是常见的。而真实的好意与浮华的作风也在拿端太太心中占着相等的地位。夫妇俩都对安多纳德表示亲热的、真诚的、但有些间歇他的好感。——安多纳德在犹太人中倒比在旧教徒中得到更多的同情。固然他们缺点很多，但有一个狼大的长处，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富于生命力，富于人性；只要是有人性有生机的：他们无不关切。即使他们缺乏真正的热烈的同情，也永远有种好奇心，使他们肯探访一般比较有价值的心灵蹊径思想，不管那心灵和思想跟他们的如何不同。一般的说，他们并不怎么出力去帮助别人，因为同时感到兴趣的事太多了，而且尽管自称为洒脱，其实他们对世俗的虚荣比谁都更留恋。但他们至少做了些事，而那在麻木不仁的现代社会里已经很了不起了。她们在社会上是行动的酵母，生命的原动力。——安多纳德在旧教徒中受尽了冷淡以后，看到拿端家对他的关切，不管怎么浮泛，也很感动。拿端太太约略看到了安多纳德笃于友爱的生活，对于她的仪表与操守的可爱都很赏识，她自命要做她的保护人。她没有儿女，但很喜欢年轻人，常常招待他们，再三约安多纳德上地家去，要她放弃那种孤独生活，我点儿消遣，她不难猜到安多纳德的孤僻一部分是由于境况不好，便有心拿些美丽的衣饰送给她，被高傲的安多纳德谢绝了，但这些恳切的保护人自有方法强迫她接受些小小的礼物。投合那无邪的女性的虚荣心。安多纳德又感激又惶愧，每隔

许多时候，勉强去参加一次拿端太太家的夜会，因为年轻，她终于也觉得愉快。

但在那个来往的人很杂而年轻人很多的场所，拿端太太所提拔的贫寒而美丽的女孩子，立刻成为两三个油滑少年的目标，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得手。他们想利用她的羞怯来进攻，甚至彼此拿她赌东道。

终于她收到几封匿名信，一更准确的说是造了一个高贵的假名的信——先是热烈的情书，措辞迫切，把约会都定下了，接着又很快的来了几封更放肆的信威吓她，随后又来了信口谩骂与侮辱的信，赤裸裸的描写她身体上的某些部分，说出下流淫猥的话，写信的人想利用安多纳德的天真，恐吓她倘使不去赴约就要教她当众出丑。安多纳德因为招惹了这些是非，痛苦得哭了；而她身心清白的骄傲也大大的受了伤害，她不知道怎么摆脱，同时又不愿意告诉兄弟，免得他伤心而把事情搅得更严重。

但她也没有朋友可以商量。向警察署告发吧，她又不愿意，怕事情张扬出去。然而无论如何得把它结束，她觉得光是不理不睬并不能保卫自己，那个坏蛋一定还要纠缠不清，不发见危险决不会罢休。

随后又来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限她第二天到卢森堡美术馆去相会。她去了。——绞尽脑汁想过之后，她相信这个磨难她的男人一定是在拿端太太家遇见的。有一封信里隐隐约约提到的事就是在那边发生的。于是她要求拿端太太帮她一次忙，坐着车陪她到美术馆，请拿端太太在车上等着。到时，她进去了。在指定的图画前面，那坏蛋得意洋洋的走过来，装得非常殷勤的跟她谈话。她不声不响的直瞪着他。他把一套话说完了，又挺着脸问她为什么这样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她回答说：

“我在看一个没骨头的人怎样欺侮女人。”

对方听了这话毫不在意，反而装做亲狎的神气，她又说：

“你拿当众出丑的话威吓我。好吧，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你怎么样？”

她气得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很高，表示她预备教人注意，旁边的人已经在瞧他们了。他觉得什么都吓不倒她，便放低了声音。她最后一次又叫了声：

“哼，你这个没骨头的男人！”

说完了，她掉过身子就走。

他不愿意露出认输的神气，便跟着她走出美术馆。她竟自走向等着的车子，突然打开车门。背后那个男子劈面撞见了拿端太太，拿端太太马上叫着他的姓氏招呼他，他一时手足无措，赶紧溜了。

安多纳德没有办法，只得把事情讲给这位女朋友听。但她只讲了个大概，因为她极不愿意把伤害她的贞节的痛苦告诉一个外人。拿端太太埋怨她没有早通知她。安多纳德要求她对谁都别提。事情就至此为止；拿端太太也用不着对那个坏蛋下逐客令，因为从此他没有敢再露面。

差不多同时，安多纳德另外有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伤心事。

有个很规矩的男子，年纪四十上下，在远东当领事，回国来过几个月的假期，在拿端家遇到安多纳德，爱上了她。那次的会见是拿端太太瞒着安多纳德预先安排好的，因为她一厢情愿要替这位年轻朋友做媒。他是犹太人，长得并不好看；头有点儿秃了，背有点儿驼了；可是眼睛非常柔和，态度很亲切。因为自己也受过痛苦而很能够同情别人。安多纳德已经没有当年才子

佳人的梦，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把人生想做在美妙的日子和情人散散步那么回事了，如今她认为生活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每天都得来过一次，永远不能休息一下，要不然，你年复一年，一寸一尺的苦苦挣来的，就可能在一刹那间前功尽弃。她觉得倘使能够在一个朋友的怀抱里躺一会，跟他共尝甘苦，由他来守望而让自己闭一会眼睛，一定是非常甜美的。她知道这都是梦想，可还没有勇气完全丢开这个梦。她心里很明白，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在她那个社会里是毫无希望的。法国老派的布尔乔亚在婚姻上看重金钱是世界闻名的。这种贪心，便是犹太人也有所不及。

犹太人中有钱的青年娶一个贫寒的姑娘，或有钱的少女热烈的追求一个聪明的男子，都不算什么希罕的事。但在内地信奉旧教的法国布尔乔亚中间，所谓婚姻无非是追求金钱。而那些可怜虫又于些什么呢？他们只有些平凡的需要：只知道吃喝，打呵欠，睡觉，——节省。安多纳德认识这般人，那是从小见惯的。她戴了富贵的眼镜见过他们，也戴了贫穷的眼镜见过他们，已经对她们不存什么幻想了。所以那位男的向她求婚使她有点喜出望外，她先是并不爱他，后来却是慢慢的对他有种感激的心和深刻的温情。倘不是要跟他到远地方去，把弟弟丢下的话，她早就应允的了。但在那种条件之下，她拒绝了。那朋友虽然懂得她的拒绝是由于极高尚的理由，心里仍旧不能原谅她：他知道爱人有那些德性是极可贵的，但爱情的自私要爱人把这些德性也为自己牺牲。他便不再见她，动身之后也不再和她通信，音讯杳然的过了五六个月，——忽然有一天寄给她一张喜柬，原来他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了。

那对安多纳德是桩极大的伤心事。在多少悲苦之外再受一次悲苦，她唯有把自己的悲苦献给上帝；她硬要相信，因为忘了自己唯一的使命是献身给兄弟，所以应当受此惩罚。从此她就更一心一意的照顾兄弟。

她完全退出了社会，不再上拿端家去。自从她谢绝了那桩婚事以后，他们就对她很冷淡：他们也不承认她的理由，拿端太太断定这桩婚姻一定成功，将来也一定很圆满，此刻因安多纳德的缘故而一切都成泡影，未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认为安多纳德的顾虑当然是极有义气，但感伤色彩太浓了，所以她马上下再关心这位小朋友。她只知道帮助人家，不问人家同意不同意：这种心理上的需要此刻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对象，让她能暂时发泄那关切与照拂人的感情。

奥里维完全不知道姊姊心中那页痛苦的罗曼史。他是个多情的，轻浮的少年，成天在幻想中过活。虽然他精神很活泼可爱，心也和安多纳德的一样温柔，但你要在什么事情上依靠他是没有把握的。他可以为了矛盾，消沉，闲荡，或是单相思而浪费几个月的精力他常常想着一些俊俏的脸蛋，在什么交际场中见过一面而完全没注意到他的风骚的姑娘。他也能为了了一段文字，一首诗，一阕音乐而出神，几个月的浸在里头，把正课都荒废了。非要有人时时刻刻的监督他不可，而且还得留神，不能使他发觉而着恼。他发起脾气来一向很可怕，会极度的紧张，精神上失掉平衡，浑身发抖，好似可能害肺病的人所常有的现象。医生并不把这种危险瞒着安多纳德。这株本来就很软弱的植物，从内地移植到巴黎之后，极需要清新的空气与美好的阳光。那可是安多纳德不能供给的。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在假期中离开巴黎。至于假期以外的时间，两人有工作在身，到了星期日都已经困倦不堪，除掉赴音乐会，再没心思出门了。

可是在夏天，有些星期日，安多纳德仍旧打起精神把奥里维拉到郊外的

森林中去散步。但林中全是一对对粗声大气的男女，音乐咖啡馆的歌曲，油腻的纸张：这当然不是使精神休息而净化的清幽的境界。傍晚回家的时候，又得坐着闷人的，低矮的。狭窄的，黑洞洞的郊区火车，满是笑声，歌声，粗野的谈话，难闻的气息，和烟草的味道。安多纳德与奥里维都是没有平民气质的，回到家中只觉得厌恶，丧气。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以后别再作这种散步；而安多纳德在某个时期内也没有这勇气了。但过了一晌，她还是要去，以为对于兄弟的健康是必需的，虽然她自己比奥里维更讨厌这种散步。每次新的尝试都不比上一次的更愉快；奥里维便狠狠的向她抱怨。结果两人只能关在闷塞的城里。对着牢狱式的院子想望田野。

中学的最后一年到了。学期终了便是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安多纳德已经累到极点。她预测兄弟一定能考上。中学里大家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投考生之一；所有的教员都称赞他的功课和聪明，唯一的缺点是思想没有纪律，不能按照计划做事。可是压在奥里维肩上的责任使他心慌意乱，考期近了，应付考试的能力越来越低了。一方面是极度的疲乏，一方面是怕考不上，而且胆小得近乎病态：这种种早就使他像瘫痪了一样。想到要当着大众站在许多考试委员前面，他就不由得浑身发抖。他永远受着胆小的累，轮到在教室里开口就脸红耳赤，喉咙都塞住了，最初只能在人家唤到他名字的时候答应一声。倘使无意中问他什么话，他倒还容易回答；要是预先知道要受到考问，他简直会吓昏的：一刻不停在那里胡思乱想的脑子，把将要临到的情形连细节都想象到了；而且越等得久，他越是被恐怖纠缠不清。他差不多没有一次考试不是至少考过两次的：因为考试以前的几夜，在梦中已经考过几次，把他的精力消耗完了，再也无法应付真正的考试。

然而他还到不了那个使他在夜里流冷汗的可怕的口试。笔试的时候，一个关于哲学的题目，在平时他是能发挥的，不料那天六个钟点之内竟写不上两页。最初几小时他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点儿思想都没有，仿佛给一座漆黑的墙堵塞了。到最后一小时，那堵墙溶解了，墙缝里居然透出几道光来。他这才写了很美的几行，可是篇幅不够教人把他评定等第。安多纳德看他那样狼狈，料他没希望了，于是也跟他一样的垂头丧气，只是面上不露出来。并且她便是到了绝望的局面，也还能抱着无穷的希望。

奥里维落选了。

他懊丧到了极点。安多纳德勉强笑着，仿佛事情并不严重；但她的嘴唇在发抖。她安慰弟弟，说那是不运气，容易补救的，下年一定能考取，名次还可以高一些。她可没有说，为了她，他这一年是应该考上的，她身心交困，恐怕不能再撑一年了。但她非撑不可。要是她在奥里维没考取以前就死了，他可能永远没勇气独自奋斗下去，结果不免给人生吞掉。

因此她把自己的疲乏藏起来，反而加倍的努力。她流着血汗让他在暑假中有些娱乐，希望开学以后他精神好一些，更能够发愤用功。可是到开学的时候，她小小的积蓄用完了，同时又丢了几处薪水最高的教职。

还要苦苦的撑一年！……两个孩子为了这最后的一关把自己搅得筋疲力尽。第一先得生活，找一些别的差事。拿端他们介绍安多纳德上德国去教书。这是她最不愿意接受的，可是眼前没有别的机会，又不能久待。六年以来姊弟俩从来没分离过一天；她简直没法想象，不看见他不听见他以后她怎么能

生活。奥里维想到这点也不免心惊肉跳；但他什么话都不敢说：这桩苦难是他造成的；要是他考取了，安多纳德决不至于到这个田地；所以他没有反对的权利，也没有资格提出他个人的悲戚作为问题：一切只能由她一个人决定。

分离以前的最后几天，而人不声不响的熬着痛苦，仿佛有一个快要死了；痛苦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们便躲起来。安多纳德想在奥里维的眼神中征求意见。要是他对她说：“别走啊！”她就可以下走，虽然是应当走。直到最后一刻，坐在把他们送上车站去的马车里，她还准备打消原意，她觉得没有勇气执行她的计划。只要他一句话，一句话！……可是他不说出来。他跟她一样的全身发僵。——她要他答应每天写信给她，什么都不能隐瞒，只要有点儿不安的事，就立刻叫她回来。

她走了。一方面，奥里维走进中学宿舍连心都凉了，——如今他变了寄宿生，——一方面安多纳德在火车里痛苦万分。他们俩夜里睁着眼睛，觉得每过一分钟就离得远一点，不由得彼此低声呼唤。

安多纳德想到将要投身进去的社会非常害怕。六年以来，她大大的改变了。从前她是多么大胆，什么都吓不倒的，现在却养成了静默与孤独的习惯，反而以脱离孤独生活为苦事。幸福的岁月过去了，嘻嘻哈哈的，快活的，多嘴的安多纳德也跟着消灭了。忧患使她变得孤僻。大概因为跟奥里维住在一起。所以她也感染到他羞怯的性情。除了对兄弟，她很不容易开口。什么都使她害怕，便是去拜访人也要心慌。一想到要去住在陌生人家，跟他们谈话，老是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她更急坏了。可怜的小姑娘并不比她的兄弟更喜欢教书：她很尽职，但并不相信自己的工作对人有什么好处可以自慰。她生来是为爱人而不是教育人的。可是谁也不在乎她的爱。

德国那个新的差事，比无论什么地方都更用不着她的爱。她在葛罗纳蓬家教孩子们读法文，主人绝对不关切她。他们又傲慢又亲狎，又冷淡又爱管闲事，因为出了相当高的薪水，便以为给了她恩惠，对她尽可以为所欲为，把她看做一个比较高级的仆人，不让她有半点自由。她甚至没有私人的卧室：只睡在一间跟孩子们的卧室相连的小屋子内，夜里房门都是不能关的。她从来没有清静的时间。虽然那是每个人应有的神圣的权利，他们可不承认。她的快乐只有在精神上跟兄弟在一起，和他谈话，只要有片刻的自由，她就尽量利用。但人家还要和她争这片刻的时间。她才提笔，就有人在她房内打转，问她写什么。她看信脑时候，人家又问她信上写些什么。他们用一种亲狎与嘲笑的神气，打听“小弟弟”的情形。于是她只得躲起来。她有时需要用怎样的手段，躲在怎样的屋角里去偷偷的看奥里维的信，真是说出来也教人脸红。倘若有封信随便丢在房内，毫无疑问是会被人偷看了的，既然除了衣箱之外没有一件可以关锁的东西，她就不得不把所有不愿意给人看到的纸张都带在身上：人家老是在搜索她的东西和她的内心，竭力想发掘她思想的秘密。并非葛罗纳蓬一家关切这些事，而是认为既然出钱雇了她，她这个人就是属于他们的了。其实他们并无恶意：刺探旁人的私事在他们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之间决不会因这些事生气的。

安多纳德可最难容忍这种间谍式的，无耻的勾当，使她一天不能有一小时逃过他们不知趣的目光。她用一种带点高做的矜持的态度对付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教他们不大高兴。当然，他们自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好奇

心作辩护，批评安多纳德不应该躲避他们。对一个住在他们家里，成为家庭的一分子，负责教育他们儿女的姑娘，他们觉得应该认识她的私生活：这是他们的责任！——（多少主妇对于仆人就是这种说法，她们的所谓责任，并非在于使仆役少吃一些苦少受一些难堪，而是在于禁止他们作任何娱乐。）——所以他们认为，安多纳德的不肯接受监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一个清白的女孩子是什么都不用隐藏的。

因此安多纳德时时刻刻受着磨折，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这样她就比平时更冷淡更深藏了。

弟弟每天都给她写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她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信，——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竭力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悲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姊姊的难解难分，如今和她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她。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姊姊，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盯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田地。像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她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姊姊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它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她离得多远！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两天两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间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噢，上帝！要是她病倒的话！她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她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她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她，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讨厌的中学生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她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她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她，听到她：他把什么都告诉给她听：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她叫做我的忠实的，勇敢的，至爱的好小姊姊”。那是真正的情书。

这些信使安多纳德沉浸在温情里头，唯有在读信的时间她才觉得有点空气可以呼吸。信要不在早上预期的时间收到，她就苦恼得什么似的。有两三次，葛罗纳蓬他们为了大意，或是——谁知道？——为了恶意的耍弄，直到晚上，有一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信交给她，那时她竟急得发烧了。——元旦那天，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想了同样的主意：花了很多钱彼此发了一通长电，在两方面同时送到。奥里维继续在功课方面与思想方面征求安多纳德的意见；安多纳德替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

其实她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勇气，住在这陌生地方闷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关切她，除了一个才来不久而和她同样住不惯的教员的太太。那位好心的女人母性很强，看到两个各处一方而相爱的孩子那么痛苦，非常同情——因为她向安多纳德探听到了一部分历史，——但她那样的粗声大气，那样的平庸，缺少机智，不识时务，把安多纳德贵族式的小灵魂吓得格外深藏了。因为对谁都不能吐露，她便把所有的烦恼都闷在肚里：而那是

很重的担负。有时她自以为要倒下来了；但她咬咬嘴唇，重新向前。她的健康受了影响，瘦了许多。弟弟的信越来越消沉。有一次特别颓丧的时候，他竟写道：“你回来罢，回来罢！……”

可是信刚发出，他就觉得惭愧，又写了一封，声明前信作废，要求安多纳德别把那句话放在心上。他甚至装做很快乐，不需要姊姊。倘若给人看出他没有她便不能过活，他容易生气的住情也是受不了的。

这一点可瞒不过安多纳德；她看透他的思想，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几乎真的要动身了，连行车时刻都到站上去问过了。随后，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儿挣的钱就是付奥里维的膳宿费的，两个人能撑多久就得撑多久。她没勇气打什么主意了：早上她很勇敢，但越到夜晚，精神越低落，只想逃了。她想念家乡，——想着那个对她多么残酷、可是埋着她过去所有的遗迹的家乡，——也想着弟弟的语言，为她用来表示心中的爱的语那时恰好有个法国剧团路过那个德国小城。难得上戏院的安多纳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渴想听一听法文，到法国去躲一下。其余的事，我们以前叙述过了。戏院已经客满。她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到她失望的神气，邀她到他的包厢中去：她糊里糊涂的接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的露面引起了小城里许多闲话，立刻传到葛罗纳蓬家里，而他们的存心是只要对这个法国少女有一点儿不利的猜疑就预备接受的，再加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种情形，他们被克利斯朵夫惹得气恼之极，便毫不客气的把安多纳德辞退了。

这颗贞洁而容易害羞的心灵，整个儿给手足之爱占据了，没有给任何卑污的思想沾染过，一朝懂得了人家指控她的罪名，简直羞愤欲死。但她并不恨克利斯朵夫，知道他跟她一样的无辜，虽然使她受累，用意是很好的：所以她很感激。她对于他的身世一无所知，只晓得他是个受到剧烈攻击的音乐家。她尽管不懂人情世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忧患而变得非常敏锐，看出那个陪她看戏的同伴举动粗鲁，有点疯癫，可是性情和她一样戆直，并且慷慨豪侠，她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安慰。别人说克利斯朵夫的坏话，绝对不影响她的信心。自己是个被欺侮的，她认为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和她一样受着人们恶意的攻击，而且时期更长久。既然她惯于想着别人而忘掉自己，所以一想到克利斯朵夫也在受罪，她自身的悲苦倒反解淡了些。可是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和他再见或通信。清高与狷介的性情不许她那么做。她以为他决不会知道连累她的事，而且以她的好心，还希望他永远不知道。

她走了。火车开出一小时以后，她碰巧又跟从外埠回来的克利斯朵夫在中途相遇。

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能说些什么呢，除非是一些极平淡的话？而这种话，反而要亵渎彼此的同情与神秘的共鸣，那是除了心心相印以外别无根据的，说不出的感情。在这最后一刹那，两个毫不相知的人互相望着，看到了平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从来没窥到的内心的隐秘。说话，亲吻，偎抱，都可以淡忘，但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烟云的世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安多纳德把它永远保存在心灵深处，——使她凄凉的心里能有一道朦胧的光明，像地狱里的微光。

她又跟奥里维团聚了。而她回来也正是时候了。他刚病着。这个神经质的骚动的孩子，老是怕在姊姊不在眼前的时候害病，——此刻真的病倒了，反而不肯写信告诉姊姊，免得她担忧。他只是在心里叫她，好像求一桩奇迹似的求着她。

奇迹出现的时候，他睡在中学的病房里发烧，胡思乱想。一见之下，他并不叫喊。他有过多少次的幻象，看见她进来……他在床上坐起，张着嘴，哆嗦着，以为又是一个幻象。赶到她挨着他在床上坐下，把他搂着，他倒在她怀中，嘴唇上感觉到娇嫩的面颊，手里感觉到那双在夜车里冰得冰冷的手，终于知道的确是妹妹，是他的小姊姊回来了，他就哭了出来。他只会哭，跟小时候一样是个“小傻瓜”。他把她紧紧搂着，唯恐她跑掉了。他们俩改变得多厉害！脸色多难看！……可是没关系，他们俩已经团聚：病房，学校，阴沉的天色，都变得光明了。两人彼此抓住了，不肯再松手了。她什么话还没说，他先要她发誓不再出门。没有问题，她决不会再走；离别真是太痛苦了；母亲说得对，无论什么总比分离好。便是穷，便是死，都不能忍受，只要大家在一起。

他们赶紧租了一个公寓。他们很想再住从前的那个，不管它多么丑；可是已经租出了。新的公寓也靠着一个院子，从墙高头可以望见一株小皂角树：他们立刻爱上了，把它当做田野里的一个朋友，也像他们一样给关在城市里。奥里维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而他的所谓健康，在一般强壮的人还是近于病的。——安多纳德在德国过的那些苦闷的日子，至少挣了一笔钱；她翻译的一册德文书被出版家接受了，更加多了些收入。钱的烦恼暂时没有了，一切都可以挺顺利，只要奥里维在学期终了能够考上。——可是考不上又怎么办呢？

一朝住在一块儿，恢复了过去那种甜蜜的生活，他们一心一意想着考试的事了。两人尽量的不提也是没用：无论如何避免不了。那个执着的念头到处跟着他们，便是在消遣的时候也是的：在音乐会里，它会在一曲中间突然浮现，夜里醒来，它又会像窟窿一般的张开嘴来吞噬他们，奥里维一方面竭力想解除姊姊的重负，报答她为他而牺牲了青春的恩德，一方面又怕落第以后无法避免的兵役：——那时考取高等学校的青年还可以免除兵役。他对于军营里——不管他看得对不对——肉体与精神方面的男风，心理方面的堕落，感到说不出的厌恶。他性格中所有贵族的与贞洁的气质都受不了兵役的义务，差不多宁可死的。保卫国家的大道理，时下已经成为普遍的信仰，人们很可以用这个名义来取笑、甚至指责奥里维的心理；可是只有瞎子才会否认那种心理！兼爱为名、粗俗其实的共同生活，强迫一般性情孤独的人所受痛苦，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

试期到了。奥里维差点儿不能进场：他非常的不舒服，对于不论考取与否都得经历的那种心惊胆战的境界害怕到极点，几乎希望自己真的病倒了。笔试的成绩还不差。但等待笔试榜揭晓的期间真是不好受。经过了大革命的国家实际是世界上最守旧的：根据它年代悠久的习惯，试期定在七月里一年之中最热的几天，仿佛故意要跟可怜的青年们为难。要他们在褥暑熏蒸的天气预备考试；而节目的繁重，恐怕没有一个典试委员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喧哗扰攘的七月十四（那是教并不快活而需要清静的人受罪的狂欢节）的

下一天，人们才彼阅作文卷子。维奥里

的公寓附近，广场上摆着赶集的杂耍摊，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只听见汽枪劈劈拍拍打靶的声音，让人骑着打转的木马呜呜的叫着，洋琴叮叮冬冬的响着。热闹了八天之后，总统为了讨好民众，又特准延长半星期，那对他当然是没关系的：他又听不见！但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被吵得头昏脑胀，不得不紧闭窗户，关在房内，掩着耳朵，竭力想逃避整天从窗隙里钻进来的声音，结果它们仍旧像刀予一般直钻到头里，使他们痛苦得浑身抽搐。

笔试及格以后，差不多立刻就是口试。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不要去旁听。她等在门外，比他哆晾得更厉害。他从来不跟她说考得满意，不是把他在口试中回答的话使她发急，就是把没有回答的话使她揪心。

最后揭晓的日子到了。录取新生的榜是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走廊里的。安多纳德不肯让奥里维一个人去。出门的时候，他们暗暗的想：等会儿回来，事情已经分晓了，那时他们或许还要回过头来惋惜这个时间，因为这时虽然提心吊胆，可至少还存着希望。远远的望见了巴黎大学，他们都觉得腿软了。连那么勇敢的安多纳德也不禁对兄弟说：“哎，别走得这么快呀……”

奥里维瞧了瞧勉强堆着笑容的姊姊，回答道：“咱们在这张凳上坐一会儿好不好？”

他简直不想走到目的地了。但过了一忽，她握了握他的手：“没关系，弟弟，走罢。”

他们一时找不到那张榜，看了好几张都没有耶南的姓名。终于看到的时候，他们又弄不明白了，直看了好几遍，不敢相信。临了，知道那的确是真的，是他耶南被录取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两人立刻往家中奔去：她抓着他的胳膊，握着他的手腕，他靠在她身上：他们几乎连奔带跑的，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了，穿过大街险些儿被车马压死，彼此叫着：

“我的弟弟！……我的姊姊！……”

他们急急忙忙爬上楼梯。一进到屋里，两人马上投入彼此的怀抱。安多纳德牵着奥里维的手，把他带到父母的遗像前面，那是靠近卧床，在屋子的一角，对他们像圣殿一般的处所。她和他一齐跪下，悄悄的哭了。

安多纳德叫了一顿精美的夜饭。可是他们肚子不饿，一口都吃不下。晚上，奥里维一忽儿坐在姊姊膝下，一忽儿坐在姊姊膝上，像小孩子一样的要人怜爱。他们不大说话，累到极点，连快乐的气力都没有了。九点不到，他们就睡了，睡得像死人一样。

第二天，安多纳德头痛欲裂，但心上去掉了这么一个重担 奥里维也觉得破天荒第一遭能够呼吸了。他得救了，她把他救了，她完成了她的使命，而他也未辜负姊姊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可以让自己贪懒一下。到中午他们还躺在床上，谈着话，房门打开着，可以在一面镜子里瞧见彼此的快乐而累得有些虚肿的脸；他们笑着，送着飞吻，一忽儿又朦胧入睡，瞧着对方睡着的模样，大家都懒洋洋的瘫倒了，除了吐几个温柔的单字以外简直没气力说话。

安多纳德从来没停止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她一向瞒着兄弟，不说出她预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欣喜。录取的第二天，她宣布他们要到瑞士去住一个月，作为辛苦了几年的酬报。现在奥里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出了学校又有职业的保障，他们可以放肆一下，动用那笔积蓄了。奥里维一听这消息马上快活得叫起来。安多纳德可是更快活，——因兄弟的

快活而快活，——因为可以看到她相思多年的田野而快活。

旅行的准备成为一桩大事，同时也成为无穷的乐事。他们动身的时候已是八月中了。他们不惯于旅行：头天晚上，奥里维就睡不着觉；火车上的那一夜，他也不能阖眼，他整天担心，怕错失火车。他们俩都急急忙忙，在站上给人家挤来挤去，踏进了一向二等车厢，连枕着手臂睡觉的地位都没有：——睡眠是号称民主的法国路局不给平民旅客享受的特权之一，为的让有钱的旅客能够独享这个权利而格外得意。——奥里维一刻都没闭上眼：他还不敢肯定有没有误搭火车，一路留神所有的站名。安多纳德半睡半醒，时时刻刻惊醒过来；车厢的震动使她的头摇晃不定。奥里维借着从车顶上照下来的黯淡的灯光瞅着她，看她脸色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眶陷了下去，嘴巴很疲倦的张着；皮色黄黄的，腮帮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显着皱纹，深深的刻着居丧与失望的日子的痕迹：她神气又老又病。——她时确是太累了！她心里很想把行期延缓几天，可又不愿意使兄弟扫兴，竭力教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病，只是疲劳过度，一到乡下就会复原的。啊！她多在怕在路上病倒！……她觉得他瞧着她，便勉强振作精神，睁开眼来，——睁开这双多年轻，多清澈，多明净的眼睛，但常常不由自主的要被苦闷的浊流障蔽一会，好似一堆云在湖上飘过，他又温柔又不安的低声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很好。她只要听到一个表示爱的字就振作了。

在陶尔与邦太里哀之间，红光带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田野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高高兴兴的太阳——像他们一样从巴黎的街道、尘埃堆积的房屋、油腻的烟雾中间逃出来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襟，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氛包裹着。路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梢里瞥见的一汛清水，在远处飘浮的蓝色的岗峦。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伊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这种种都显得那么新鲜，引起安多纳德姊弟的注意。他们好似两株枯萎的树，饮着天上的甘露愉快极了。

然后是清晨，到了应当换车的瑞士关卡。平坦的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大家因为一夜没睡，觉得有点儿恶心，清晨潮湿的空气又使人微微颤抖。四下里静悄悄的，天色清明，周围那些草原的气息冲进你的嘴巴，沾着你的舌头，沿着你的喉咙，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你胸中。露天摆着一张桌子，大家站在那儿喝一杯提神的热咖啡，麝着带酪的牛乳，还有一股野花野草的香味。

他们搭上瑞士的火车，看了车上不同的设备高兴得像儿童一样。可是安多纳德累极了！她对于这种时时刻刻的不舒服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看到了这些多美多有趣的东西而并不怎么高兴呢？和兄弟作一次美妙的旅行，不用再为将来的生活操心。只顾欣赏她心爱的自然界：不是她多少年来梦想的吗？现在她是怎么回事呢？她埋怨自己，勉强教自己欣赏一切，看着兄弟天真的快乐强作欢容……

他们在登城停下，预备第二天换车到山里去。可是在旅馆里，安多纳德晚上忽然发了高度的寒热，又是呕吐，又是头疼。奥里维慌了，心神不定的挨了一夜，天明就去请医生：——又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支出，对他们微薄的资源大有影响。——医生认为暂时并不怎么严重，不过是极度的劳顿，身体太亏了一点。继续上路是不可能了。医生要安多纳德整天躺在床上，并且说他们也许要在登城多待一些日子。他们虽然难过，幸而事情没有意料中的严

重，也就很安慰了。可是老远的跑来，关在简陋的旅馆里，卧房给太阳晒得像暖室一般，毕竟是够痛苦的。安多纳德劝兄弟出去散散步。他在旅馆外边走了一程，看见阿尔河的绿波，远远的天边又有白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动，快活极了；但这快乐，他一个人没法消受，便匆匆回到姊姊房中，非常感动的把见到的风景告诉她；她奇怪他回来这么早，劝他再出去，他却像以前从夏德莱音乐会回来的时候一样的说：

“不，不，那太美了；我一个人看了心里会难受的……”

这种心绪是一向有的：他们知道，不跟对方在一起自己就不是个完全的人。但听到对方把这意思说出来总是怪舒服的。这句渴求的话给安多纳德的影响比什么药都灵验。她微微笑着，又喜悦，又困倦。——很舒畅的睡了一夜，她决意清早就走，不去通知医生，免得他劝阻。清新的空气和一同玩赏美景的快乐，居然使他们不致为了这个卤莽的行动再付代价。两人平安无事的到了目的地；那是山中的一个山村，在史比哀兹附近，临着登纳湖。

他们在一家小旅馆里待了三四星期。安多纳德没有再发烧；可是身体始终不硬朗。她只觉得脑袋沉甸甸的支持不住，时时刻刻的不舒服。奥里维常常问到她的健康，只希望她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可是他对着美丽的景色陶醉了，自然而然的把不愉快的思想撩在一边，所以听到他说身体很好，就很愿意信以为真，——虽然明知道事实并不如此。另一方面，她对于兄弟的快乐，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对于休息，深深的感到快慰。经过了多少艰苦的年头而终于能休息一下，不是最愉快的事吗？

奥里维想把她拉着一同去散步，她心里也很高兴和他一块儿去，可是好几次，她勇敢的走了二十分钟，不得不停下，气透不过来了，心要停止跳动了。于是他只能自个儿向前，——虽然是并不辛苦的攀援，她已经忐忑不安，直要他回来了才放心。或者两人出去随便溜溜：她抓着他的胳膊，迈着细步，谈着话，他尤其多嘴，一边笑，一边讲他将来的计划，说着傻话。走在半山腰，临着山谷，他们遥望白云倒映在静止不动的湖里，三三两两的小艇在那里飘浮，仿佛永在池塘上的小虫；他们呼吸着温和的空气，听着远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牛羊颈上的铃声，带着干草与树脂的香味。两人一同梦想着过去，将来，和他们觉得所有的梦里头最渺茫而最迷人的现在。有时，安多纳德不由自主的感染了兄弟那种小孩子般的兴致：跟他追着玩儿，扑在草里打滚。有一天他居然看到她像从前一样的笑了，他们小时候那种女孩子的憨笑，无忧无虑的，像泉水般透明的，他多年没听见过的笑声。

但更多的时候，奥里维忍不住要去作长途的远足。过后他心里难受，埋怨自己不曾充分利用时间和姊姊作亲密的谈话。便是在旅馆里，他也往往把她一个人丢下。同寓有一群青年男女，奥里维先是不去交际，可是慢慢的受着他们吸引，终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他素来缺少朋友，除掉姊姊之外，只认得一般中学里鄙俗的同学和他们的情妇，使他厌恶。一旦处在年纪相仿，又有教养，又可爱，又快活的青年男女中间，他觉得非常痛快。虽然性情孤僻，他也有天真的好奇心，有一颗多情的，贞洁而又肉感的心，看着女性眼里那朵小小的火焰着迷。而他本人尽管那么羞怯，也很能讨人喜欢。因为需要爱人家，被人爱，他无意中就有了一种青春的妩媚，自然而然有些亲切的说话，举动，和体贴的表现，唯其笨拙才显得格外动人。他天生的富于同情心。虽是孤独生活养成了他讥讽的精神，容易看到人们的鄙俗与缺陷而觉得厌恶，——但跟那些人当面碰到了，他只看见他们的眼睛，从眼睛里看出

一个有一天会死的生灵，像他一样只有一次生命，而也厌他一样不久就要丧失生命的。于是他不由自主的对它感到一种温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难为它。不管心里怎么样，他总觉得非跟对方和和气气不可。他是懦弱的，所以天生是讨一般人喜欢的；他们对于所有的缺陷，甚至所有的美德，都能原谅，——只除了一件：就是为一切德性之本的力。

安多纳德可不加入这个青年人的集团。她的体力，她的疲乏，表面上没有原因的精神的颓丧，使她瘫下去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操心与劳苦，她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姊弟的角色颠倒了：如今她觉得跟社会，跟一切，都离得很远了！……她不能再回到社会里去：所有那些谈话，那些喧闹，那些欢笑，大家所关切的那些小事，都使她厌烦，疲倦，甚至于气恼，她恨自己这种心情，很想学着别的姑娘们的样，对她们所关切的也关切，对她们所笑的也笑……可是办不到了！她的心给揪紧了，仿佛已经死了。晚上她守在屋里，往往连灯也不点，在暗中坐着，奥里维却在楼下客厅里，搅他那些已经习惯的谈情说爱的玩艺儿。安多纳德直要听见他上楼，听见他和女友们笑着，絮聒着，在她们的房门口恋恋不舍的，一遍又一遍的说着再会的时候，她才会从迷惘的境界中醒来；那时，她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微微笑着，起来捻开了电灯。兄弟的笑声使她精神振作了。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自然界萎谢了：在十月的云雾之下，颜色慢慢的褪了；高峰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罩了浓雾。

游客动身了，先是一个一个的，随后是成群结队的。而看见朋友们走，——即使是不相干的，——又是多么凄凉；尤其是眼看恬静而甘美的夏天，那些在人生中好比水草般的时光消失的时候，令人格外伤悲。姊弟俩在一个阴沉的秋日，沿着山。往树林里作最后一次的散步。他们不出一声，黯然神往的幻想着，瑟索的偎倚着，裹着衣领翻起的大氅，互相紧握着手指。潮湿的树林缄默无声，仿佛在悄悄的哭。林木深处，一头孤单的鸟温和的怯生生的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来了。轻绡似的雾里，远远传来羊群的铃声，呜呜咽咽的，好像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

他们回到巴黎，都很伤感。安多纳德的身体始终没复原。

那时得置备奥里维带到学校去的被服了。安多纳德为此花掉了最后一笔积蓄，甚至还偷偷的卖去几件首饰。那有什么关系呢？将来他不是会还她的吗？——何况他现在进了学校，她自己用不着花什么钱了！……她不让自己想到他走了以后的情形：一边缝着被服，一边把她对兄弟的热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工作里头；同时她也预感到，这或许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分别以前的几天，他们形影不离，唯恐虚度了一分一秒。最后一天晚上，他们睡得很迟，对着炉火，安多纳德坐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安乐椅里，奥里维坐在她膝旁一张矮凳上，拿出他素来被宠惯的大孩子模样，惹人怜爱。对于将要开始的新生活，他觉得有些担心，也有些好奇。安多纳德想到他们的亲密从此完了，骇然自问将来怎么办。他似乎有心加强她的苦闷似的，这最后一晚的一举一动都比平时更温柔：他天真的撒娇，像一个快要出门的人把自己的优点与可爱的地方统统拿了出来。他坐在钢琴前面，久久不已的弹着她在莫扎尔德与葛吕克的作品中最喜爱的篇章，——那种缠绵悱恻，惆怅而高远的意境，正是他们过去的生涯的缩影。

分别的时间到了，安多纳德把奥里维送到校门口。她回到家中，又孤独了。但这一回和以前上德国去的情形不同，那次的离别与相会是可由她作

主的，只要她觉得支持不住就可以回来。这一回是她在家而他走了，那是长久的离别，终身的离别。可是她那么富于母性，初期只念念不忘的想着弟弟而没想到自己，想着他刚开始过着那么不同的新生活，受着老同学的欺侮，还有那些琐碎的烦恼，虽是无足轻重，但一个独居僻处而惯于为所爱的人担忧的人，特别会加以夸大。这种操心至少使她暂时忘了自身的寂寞。她已经想着明天上会客室去探望兄弟的那个半小时了。临时她早到了一刻钟。他对她很亲热，但一心一意的关切着他所见的新东西，觉得非常有趣。以后的几天，她始终抱着关切与温柔的心去看他，可是两人对这半小时会晤的反应，显而易见的不同起来。为她，那简直是她整个生命。他当然很温柔的爱着安多纳德，却不能只想着她。有两三次，他到会客室来迟了一些。有一天她问他在学校里可厌烦，他竟回答说不。这些小事都像小刀一般扎着安多纳德的心。——她埋怨自己这种态度，认为自私：她明明知道，倘使他少不了她，或是她少不了他，她在人生中没有旁的目标的话，不但是荒唐，简直是不好的，违反自然的。是的，这一切她都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相干？十年来她把整个的生命给了弟弟，到了今日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丧失了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她便一无所有了。

她拿出勇气来想做些事，看看书，弄弄音乐，读些心爱的文章……天哪！没有了他，莎士比亚，贝多芬，显得多空虚！……——是的，那当然很美……可是他不在眼前了！倘使一个人不能用所爱者的眼睛去看，美丽的东西有什么意思？美，甚至于欢乐，有什么意思，倘使不能在别一颗心中去体味它们的话？

要是身体硬朗一些，她可能重新缔造她的生活，另外找一个目的。但她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到了用不着咬紧牙关撑持到底的时候，意志涣散了……她倒下来了。在她身上酝酿了多年而一向被她的毅力压在那儿的疾病，从此抬头了。

孤零零的呆在家里，她不胜悲昔的消磨着她的黄昏，没有气力把熄灭的炉火重新燃起，也没有气力上床睡觉，直坐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沉思遐想，打着寒颤。她温着过去的生活，跟死了的人与破灭的幻象老是分不开，她那么沉痛的想着没有爱情的，虚度了的青春。那是一种暧昧的，自己不承认的痛苦……一个孩子在街上笑，一忽儿又在下一层楼上摇摇晃晃的学步，小脚一步步都踩在她心上！……有些疑虑，有些邪念，盘踞在她的心头，这个自私的，享乐的都市的气息，把她病弱的灵魂感染了。她压制着自己的遗憾，觉得自己的欲念可耻，不懂这些苦恼从何而来，以为是下劣的本能作祟。可怜的小奥弗丽受着神秘的烦闷磨蚀，非常厌恶的觉得从她的心灵隐蔽的地方冒起一股犷野的，乱人心意的气息。她不能再工作，大部分的教职都辞掉了。她这个惯于早起的人有时竟睡到中午：起身与睡觉都没意义了；同时很少饮食，甚至于不饮不食。只有兄弟放假的日子，——星期四的下午和星期日一天——她才勉强装得跟从前一样。

他什么都没觉察，因为对新生活太感兴趣了，无心再观察姊姊。他正到了青年的某一个时期，对人不容易倾心相与，对于从前感动过而将来还要为之骚动的事非常冷淡。成年人对自然和人生，往往比二十岁的青年有更新鲜的印象，更天真的体验。所以有人说年轻人的心并不年轻，感觉也并不锐敏。那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冷淡并非因为感觉迟钝，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热情，野心，欲念和某些执着的念头淹没了。赶到肉体衰老之后，对人生无所期待

的时候，无拘无束的感情才恢复它们的地位，而像小孩子一样的眼泪也会重新流出来。奥里维心中想着无数的小事情，尤其是一种荒唐的单相思缠着他，——（那是他永远有的，）——使他对旁的事一概视若无睹，或者淡然置之。安多纳德不知道他的心理变化，只看见他跟自己日渐疏远。那也不完全是奥里维的错。有时他回家来，想到要看见她、跟她谈话而很高兴，可是一进门会立刻变得冷冰冰的。姊姊那种多操心的感情，一把死抓的狂热，过分的殷勤，过分的关切，使他苦闷得马上放弃了吐露衷曲的意思。甚至以为安多纳德失了常态，她往常用来对付他的知情识趣的态度完全没有了，但他并不加以深思，对她的问话，只直截了当的回答一个是或否。她愈想逗他说话，他愈沉默，或竟用一句粗暴的话得罪她。于是她也很难堪的缄默了。一天过去了，虚度了。——他才跨出家门踏上回校的路，就后悔自己的行动。夜里他想到使姊姊难过，不由得自怨自艾；有时一到学校就写一封热烈的信给她，——但第二天早上重新念了一遍，又把它撕掉了。安多纳德一点不知道这等情形，只以为他不爱她了。

她还有——即使不能说是最后一次的快乐，——至少是青年的感情最后一次的激动，使她的心又苏醒过来，使爱的力量与对幸福的希望又无可奈何的奋发了一下。并且那也是荒唐的，和她安静的性格相反的。要不是在心烦意乱，大病前期的兴奋过度与迷懵的状态中，她决不会有这种情形。

她和兄弟在夏德莱戏院听音乐。他因为在一份小杂志上担任音乐批评，可以比当年坐着好一些的位置，但周围的群众倒反可厌。他们靠近台边，坐在两只弹簧凳上。那天有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出场演奏。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德国音乐家。但他一出台，她心里的血马上沸腾起来。虽然她困倦的眼睛不能清清楚楚的看见他，可是已经认出了她在德国受难时代的朋友。她从来没跟兄弟提过，便是她自己也不大想起：那时以后，她全部的思想都给生活问题占据了。并且她是个极有理性的法国女子，不愿意承认那种没有来由而又没有前途的感情。她心中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藏着许多自己羞于见到的情愫；她明知有这些东西存在，可是不敢正视，因为对于不受理智监督的那个生命感到说不出的恐怖。

等到心情稍定的时候，她借着弟弟的手眼镜瞧了瞧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站在指挥台上的侧影，认出他那副暴烈与孤僻的神气。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旧衣服。——安多纳德一声不出，浑身冰冷，眼看克利斯朵夫在这个可叹的音乐会里受着群众的侮辱。大家原来就不欢迎德国艺术家，此刻又觉得他的音乐非常沉闷。在一阕似乎太长的交响乐之后，他又出场弹几个钢琴曲子；群众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显然表示不大愿意再见他。他开始演奏了，好不厌烦的群众无可奈何的听着，最高一层的楼厅上有两个听众高声说着很不客气的话，使场子里的人听了直乐。不料克利斯朵夫突然停下来，拿出像野孩子一样傲慢不逊的态度，用一只手弹着《玛尔勃罗上战场去》的调子，站起来对群众说：“这才配你们的胃口！”

群众对于音乐家的用意先还不大明白，迟疑了一会，然后闹哄起来，有的嘘着，有的嚷着：“道歉呀！非道歉不可！”人们气得满面通红，紧张得不得了，自以为真的愤慨了，那也许是事实；但更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很高兴

法国戏院在每排固定座位的两端，备有弹簧凳（不用时可以翻起），作为临时加座之用。

参看卷五：《节场》。——原注

趁此机会放肆一下，大闹一阵，好似上了两小时课以后的中学生一样。

安多纳德没有气力动弹，似乎吓坏了，手指抽搐，把一只手套捻来捻去。从交响乐的最初几个音符起，她已经料到可能出事，觉得群众潜伏的恶意慢慢的在扩大，也看透克利斯朵夫的心情，断定他等不到完场就要发作的。她等着，越来越苦闷，恨不得去阻止他；但事情发生的经过简直和预料的一模一样，因此她受的打击跟受着宿命的打击没有分别，仿佛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她眼睛盯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愤愤然瞪着呵斥他的群众，一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碰上了。克利斯朵夫的眼睛也许在一刹那间把她认出了，可是在当时狂乱的情绪中，他的头脑并没认出来，——他早已把她忘了，——接着他在大众的嘘斥声中不见了。

她想叫喊，想说话，可是像做着恶梦一般设法开口。等到看见勇敢的小兄弟，并没发觉她情绪激动而也在身旁分担着她的悲痛与愤慨，她才松了一口气。奥里维极有音乐天分，也有他自己的口味，决不受人拘束，只要爱好一件东西，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爱的。听了克利斯朵夫的交响乐开头的几拍子，他就感觉到有些伟大的，生平从未遇到过的气息。他很热烈的，声音很低的自言自语：“啊，多美啊！多美！……”

姊姊听了，不知不觉的靠着他的身子，心里非常感激。交响乐奏完以后，他狂热的鼓掌，对群众的冷淡与讥讽表示抗议。等到全场骚乱的时候，他更气坏了：这胆怯的孩子居然站起身来，嚷着说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他责问那些嘘斥的人，竟想跑过去跟他们打架。他的声音给场中的喧闹淹没了，人家用粗话骂他，说他混蛋。安多纳德眼见反抗是白费的，便抓住他的手臂，说：“住嘴，住嘴！”

他无可奈何的坐下，继续咆哮道：“丢人，丢人！这些该死的家伙！”

她一声不出，难受极了；他以为她对音乐无动于衷，便对他说：“安多纳德，难道你，你不觉得这个美吗？”

她点点头表示感觉到的。她始终楞在那里，打不起精神来。但乐队准备奏另外一个曲子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恨恨的凑着兄弟的耳朵说：“走吧，我不愿意再看这些人了！”

他们匆匆忙忙走了。在街上，手挽着手，奥里维兴奋的说着话，安多纳德一声不出。

以后的几天，她独自坐在卧室里被某一种感情搅得迷迷忽忽，虽然她避免正视那感情，但它老是跟着她的思想纠缠不清，像血在太阳穴中剧烈的跳动一样，使她非常难受。

过了一晌，奥里维拿来一册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刚在一家书铺里发见的。她随便翻开，看到有个曲子上面题着一句德文：“献给那个受我连累的女子”，下面还写着年月日。

她很记得那个日子。——心里一慌，她看不下去了，便放下集子，要奥里维弹给她听，自己却走进卧房，关上了门。奥里维对这种新的音乐只觉得满心欢喜，马上弹了，没注意到姊姊的激动。安多纳德坐在隔壁，竭力压着心跳。突然她到衣柜里找出她的小账簿，查她离开德国的日期和那神秘的日子。其实她早已知道了，一查之下，果然那是和克利斯朵夫一同看戏的晚上。于是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红着脸，合着手放在胸部，听着那心爱的音乐，感激到极点……啊！为什么她的头疼得这样厉害呢？

因为姊姊不出来，奥里维弹完了一曲便走进房里，发见她躺着。他问她

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是累了，接着就起来陪他。他们谈着，但她对于他的问话并不立刻回答，好似从迷惘中突然惊醒过来。她笑了笑，红着脸，抱歉的说头疼得厉害，人有点糊涂了。奥里维走了。她要他把集子留下，然后自个儿坐到深夜，在钢琴前面看着乐谱，并不弹，只随便捺几个音，轻轻的，唯恐使邻居讨厌。多半的时候她也不看谱，只是胡思乱想，对于那个怜悯她而凭着神秘的直觉与慈悲窥到她心灵的人，抱着满腔的感激与温情。她没法固定自己的思想，只觉得又快乐又悲哀，——

悲哀……啊！她的头疼得多厉害！

她整夜做着甜美丽困人的梦，万分惆怅。白天，为了振作精神，她想出去溜溜。虽然她头痛还很剧烈，可是硬要自己有个目的，便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些东西。她根本没想着她所做的是，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但自己不承认。赶到她筋疲力尽，凄他欲绝的走出来，忽然瞧见克利斯朵夫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他也同时瞧见了她。她马上不假思索的向他伸出手去。这一回克利斯朵夫也停住脚步，认出了她。他已经走下人行道迎着安多纳德来了；安多纳德也迎着他走过去了。可是势如潮涌的群众把她推着挤着，像根草似的，街车的一匹马滑跌在泥泞的街上，在克利斯朵夫前面形成了一条堤岸，来往的车辆被阻塞了，成了个难解难分的局面。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的还想穿过来：不料夹在车马中间进退不得。他好容易走到看见安多纳德的地方，她已经不见了：她竭力想抵抗人潮而抵抗不住，也就灰了心，不再挣扎，觉得有股宿命的力量阻止她跟克利斯朵夫相会：而既然是命中注定的，又有什么办法？所以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不再想回头走去。她忽然怕羞了；她敢对他说什么呢，作何举动呢？他心目中又要把她看作怎么样呢？想到这些，她便溜回家了。

回到了家，她的心方始定下来。一进屋子，她在黑影里坐在桌子前面，连脱下帽子和手套的勇气都没有。她因为不能跟他说话而苦恼，同时心里又感到一道光明；黑影没有了，身上的病也没有了，只翻来覆去想刚才的情形，又想到要是在另外一个情形之下又怎么样。她看见自己向克利斯朵夫伸手，看见克利斯朵夫认出了她而显得高兴的样子，于是她笑了，脸红了。她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里，对他又伸着手臂。那简直是不由自主的：她觉得自己要消灭了，本能的想抓住一个在身旁走过而非常慈悲的望着她的坚强的生命。她抱着一腔的温情与悲苦，在半夜里向他叫道：“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她浑身滚热的起来点上灯火，拿着纸笔，给克利斯朵夫写了封信。要不是给疾病困住了，这个羞怯而高傲的少女永远不会想到写信给他的。她不知道写些什么，那时已经不能自主了。她叫他，跟他说她爱他……写到半中间，不觉骇然停下，想重新再写：可是热情已经退下去了，头里空荡荡的，像火一般的发烧，千辛万苦也不容易找到辞句；她完全给疲倦压倒了，又觉得很难为情……这些能有什么用呢？这明明是骗自己，她不会把信寄出去的……而且即使愿意寄也不可能。她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住址……可怜的克利斯朵夫！纵使他知道这些，对她存着一片好心，他又能帮什么忙？……太晚了！一切都是白费的了。一头窒息的鸟拚命拍着翅膀，作着最后的努力。她只有认命了……

她在桌子前面呆坐了好久，没法从麻痹状态中挣扎出来。等到她费尽气力，很勇敢的站起身子，已经过了半夜。她随手把信稿夹在架上一册书里，既没勇气把它藏起去，也没勇气把它撕掉。随后她睡了，打着寒颤，身子滚

热。谜底揭晓了：她觉得神的意志完成了。

于是她心里只有一片和平恬静的境界。

星期日早上，奥里维从学校回来，发见安多纳德躺在床上，神志有点昏迷。医生来了，断为急性肺病。

最后几天，安多纳德明白了自己的病情，早先使她害怕的精神骚动，如今被她把原因找出来了。可怜的姑娘老是为了近来的心绪暗中羞愧，一发觉那是疾病所致而不必由她负责，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她还有精神料理一些事，烧掉某些文件，写了一封信给拿端太太，恳求她在她……后的最初几星期，——（她不敢写下“死”这个字）——照顾她的弟弟。

医生毫无办法，病势太凶险，她的体力又被多年的劳苦磨坏了。

安多纳德非常镇静。自从她得悉自己不起之后，反而解脱了。她把过去所受的磨难一桩一桩的想起来，眼看自己大功告成，亲爱的奥里维得救了：她觉得说不出的快乐。她想道：“这是我的成绩。”

但她又责备自己的骄傲：“单靠我一个人是做不了的。那是上帝帮我的。”

于是她感谢上帝允许她活到今天，使她能够完成使命。她这时候离开世界固然非常悲伤，可是不敢抱怨：那等于忘了上帝的恩德了，因为他可能早几年召她去去的。而要是她早死一年，情形又会变得怎么样呢？——想到这儿，她叹了口气，也就存着感激的心隐忍了。

她虽然呼吸艰难，可并不叫苦，——除非在昏昏沉沉睡着的当口，有时会像小孩子一般哼几声。这时她看人看事都用了乐天知命的心情。而一看到奥里维尤其欢喜不尽。她不开口，只动了动嘴唇叫他，要他把头靠在她枕上：然后四目相对，她默默的，长久的瞧着他。临了，她抬起身子，把他的头紧紧捧在手里，喊着：

“啊！奥里维！……奥里维！……”

她拿下脖子上的圣牌，挂在兄弟颈上。她把奥里维付托给她的忏悔师，医生，付托给所有的人。旁人都觉得她从此是托生在兄弟身上了，逃到他的生命里去了，仿佛他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有时，热情与信仰的神秘的激动使她陶醉了，忘了肉体的苦楚。悲哀一变而为欢乐，——神明的欢乐，——在她的嘴上，在她的眼睛里发出光辉。她再三说着：“我很快乐……”

她神志渐渐昏迷。最后一次清醒的时间，她扯动着嘴唇，念念有辞。奥里维走到床头俯在她身上。她还认得他，对他有气无力的笑着，嘴唇还在那儿哆嗦，眼眶里含着热泪。人家听不见她想说的话……可是奥里维像抓住一缕呼吸似的听到了几句歌辞，那是他们俩多喜欢的，她为他常唱的一支老歌：

我将再来，我的亲爱的人儿，我将再来……

接着她又昏迷了……她离开了世界。

平时她不知不觉的感动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对她非常同情。便是在同一座房子里，她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房客也是这样。奥里维受到许多完全陌生的人的慰问。安多纳德的葬礼没有像她母亲的那样寂寞。奥里维的朋友，同学，她教过书的家庭，以及她不声不响见过的，彼此都不知道身世的，可是知道她的义气而佩服她的人，甚至也有些可怜的人，在她家做散工的女人，街坊上的小商人，都来送她到墓地。她去世的当天，奥里维就被拿端太太强邀了去，他已经痛苦得没有主意了。

他一生中的确只有这个时期才能担当这样一件祸事，——只有这个时间他才不至于整个儿被失望压倒，他才开始过一种新生活，处在一个集团中间，不由自主的受着大家推动。学校方面的作业与操心，求知的热诚，大大小小的考试，为了生活的奋斗，使他不能在精神上孤独起来躲在一边。为了这一点他大为痛苦：但幸亏如此他才得救。早一年或迟几年，他就完了。

然而他竭尽可能的躲在一边追念姊姊。他很伤心不能把他们共同生活的故居保留起来：他没有这笔钱。他希望那些似乎关切他的人能懂得他不能保存她的东西的悲哀。可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借了一点钱，再凑上替人家补习他的学费，租了一个顶楼，把所能留下的姊姊的家具堆起来：她的床，她的桌子，她的靠椅。他把那个房间作为一个纪念她的圣地，逢到精神颓丧的日子，便去躲在那儿。他的同学以为他有什么外遇。其实他在这里呆上几小时，想着她，手捧着脑袋：他只有她一张小小的照片，还是他们俩小时候一同拍的。他对着照片说着，哭着……她到哪儿去了呢？啊，只要她在世界上，哪怕在天涯地角，哪怕在什么到不了的地方，——他都要用着何等的热诚，何等快乐的心去寻访她，不管是怎么辛苦，也不管要跋涉几百年，只消每走一步能近她一步！……是的，即使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能够遇到她……可是毫无办法。他多孤独！现在没有了她的爱，没有了她的指导与安慰，他对付人生的手段是多么笨拙多么幼稚！……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终身都要为之苦恼的欢乐……

对于一般懦弱而温柔的灵魂，最不幸的莫如尝到了一次最大的幸福。

在人生的初期就丧失了一个心爱的人固然悲痛，但还不及以后生机衰退的时候那么残酷。奥里维正在青年时间：虽然天性悲观，遭遇不幸，究竟是需要生活的。似乎安多纳德临死之际把一部分的灵魂移交给兄弟了，他相信是这样。他虽不像姊姊那样有信仰，却也隐隐然相信姊妹并没完全死，而是像她所说的托生在他的心上。布勒塔尼一带有种信仰，说夭折的青年并不死：他们继续在生前居住的地方飘浮，直到应享的天年终了的时候。——这样，安多纳德仿佛继续在奥里维身旁长大。

他把她的纸张重新看了一遍。不幸她差不多把什么都烧了。而且她不是一个喜欢记录内心生活的人。揭露自己的思想，在她是会脸红的。她只有一本小日记簿，记着一些别人没法懂得的事，——不加说明的写了些日子：纪念她一生或悲或喜的琐碎事儿，那是她用不着写下细节就能全部想起来的。所有这些日子几乎都跟奥里维的生活有关。她也保存着他写给她们的信，一封不缺。——不幸他没有那么细心：她写给他的差不多全部给丢了，他要那些信干什么呢？他以为姊姊是永远在身边的。温情的泉源是涓涓不绝的，永远可以浸润他的嘴唇与心，他当初毫无远见的浪费了他所得到的爱，现在却恨不得把它一点一滴的储藏起来……他随便翻着安多纳德的一册诗集，忽然看到一张破纸上有几个铅笔字：“奥里维，亲爱的奥里维！……”他看了差点儿晕倒。他嚎陶大哭，拚命吻着那张不可见的，在坟墓中和他说话的嘴巴。——从那天起，他把她所有的书都打开来，一页一页的找她有没有留下别的心腹话。他发见了她写给克利斯朵夫的信稿，才知道藏在她心里的略具雏形的罗曼史，他第一次窥见他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她的感情生活，把她骚乱不宁的最后几天，被兄弟遗弃而向着不相识的朋友伸手乞援的心情，完全体验到了。她从来没和他说过见过克利斯朵夫。他从信稿上才发觉他们以前

在德国碰过面，克利斯朵夫曾经对姊姊很好，详细情形当然无法知道，只知道安多纳德至死没表白的感情是在那时发动的。

奥里维早已为了克利斯朵夫的音乐而喜欢克利斯朵夫，这一下对他更是说不出的爱好。她是爱过他的，奥里维觉得自己爱克利斯朵夫其实还是爱的她。他想尽方法去接近他，可不容易找到他的踪迹。克利斯朵夫经过了那次失败，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不见了；他退出了社会，谁也不注意他。过了几个月，奥里维偶然在街上遇见克利斯朵夫，正是大病初愈以后，毫无血色，形容憔悴。但他没勇气上前招呼，只远远的跟着，直到他住的地方。他想写信给他，又下不了决心。写什么好呢？奥里维不是单独一个人，精神上还有安多纳德和他在一起，她的爱情，她的贞洁的观念，都把他感染了；一想到姊姊爱过克利斯朵夫，他就脸红，仿佛自己就是安多纳德。另一方面，他的确想和他谈谈她的事。——可是不成。她的秘密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

他设法要跟克利斯朵夫见面。凡是他认为克利斯朵夫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他热烈的希望跟他亲近。可是一见面，他又躲起来，唯恐被他发现了。

最后，他们共同参与一个朋友家的夜会，克利斯朵夫终于留神到他了。奥里维远远的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望着他。那天晚上，安多纳德一定是和奥里维在一起：因为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眼中看见了她；而且也的确是这个突然浮现的形象使克利斯朵夫穿过客厅，向陌生的年轻的使者走过去，去接受那幸福的死者的又凄凉又温柔的敬意。

卷七·户内

卷七初版序

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决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少多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之外。这一点，在克利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像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克利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既然《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需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需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我很耐性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利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利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岗，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趑趄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末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

苏格拉底建造屋舍，人谓为太小，苏格拉底答言，“只要它能容纳真正的朋友就行了。”

特别是第九卷《燃烧的荆棘》中关于阿娜的部分。——原注

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罗曼·罗兰
一九〇九年一月

第一部

户内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倚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睫，而终于筋疲力尽，为敌所乘了！得一知己，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像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整个儿交给朋友支配。等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儿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他跟我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永久在我心头。我把他占有了，他把我占有了。我的朋友是爱我的。

“爱”把我们两人的灵魂交融为一了。

参加了罗孙家的夜会以后，克利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奥里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夏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飘浮。

奥里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上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尽里头，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壁上都给涂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开门来，看见是克利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的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恶的院子。克利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诱惑，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

他爬到了奥里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利斯朵夫把它使劲拉了一下，铃声响处，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里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的素雅整齐的穿扮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利斯朵夫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教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里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回复过来。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慌慌张张的嘟囔着：

“怎么，你，你到这儿来！……”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一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便对奥里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里维往前推着，走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近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利斯朵夫看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

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是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着一些翡冷翠派的古画的照片。

“噢，你这是来……来看我吗？”奥里维真情洋溢的说。

“噢，我非来不可啊。”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

奥里维紧跟着又说：“对，你说得不错。可并非是不想去。”

“那未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你可别见笑。我就怕你不怎么愿意见我。”

“我，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

奥里维又说：“昨天我真蠢。我生怕你讨厌。我的胆小简直是一种病，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罢。你们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不大出声的，便是为了胆小而不出声的，也教人高兴。”

克利斯朵夫笑了，很得意自己的俏皮。

“那未你是为了我的静默而来看我的了？”

“是的，为了你的静默，为了你那种静默的优点。静默也有好多种……我可喜欢你这一种，话不是说完了吗？”

“你仅仅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发生好感？”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用不着多费时间，只要看到一张喜欢的脸，我马上会决定，马上会去找他，而且非找到不可。”

“你这样的追求朋友从来不会看错吗？”

“那是常有的事。”

“也许你这一回又看错了。”

“咱们慢慢瞧吧。”

“噢！那我就糟了。你会教我心都凉了的，只要一想到你在观察我，我就慌得手足无措了。”

克利斯朵夫又好奇又亲热的，瞧着那张容易冲动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感情映在他的脸上好比云彩映在水里。

“多神经质的孩子！简直像女人一样。”克利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的碰了碰他的膝盖。

“得了罢，你以为我全副武装的来对付你吗？我最恨人家拿朋友做心理学实验。我所要求的是：两个人都应当无拘无束，开诚布公，没有不必要的害羞而永远把话闷在胸中，也不必怕自己前后矛盾，——今天喜欢的，明天尽可以不喜欢。这不是更有丈夫气，更光明磊落吗？”

奥里维肃然望着他，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是更有丈夫气。你是强者，我可不是的。”

“我敢断定你也是强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我现在正是要来帮助你成为强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此刻我可以更坦白的补上一句，——（但并不担保以后的事，）——我喜欢你。”

奥里维从脸上红起直红到耳朵，窘得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都没有能回答。

克利斯朵夫把屋子扫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了吗？”

“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

“嘿！简直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在这里过活的？”

“慢慢也就惯了。”

“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

克利斯朵夫解开背心，拚命的呼吸。

奥里维走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

“你住在城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克拉夫脱先生。我可决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来了就害怕。我坐在床上，仿佛要死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瞧着床上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里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

“那末离开这儿呀，”他说。“干么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奥里维耸耸肩膀，满不在乎的回答：“噢！这儿那儿，反正都是一样！……”

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得发抖。

“这种屋子！”克利斯朵夫继续说。“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宁可睡在桥底下的。”

“最初我也觉得痛苦，跟你一样厌恶这种环境。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散步，只要走过肮脏的贫民区域，心里就作恶，有时还有些不敢说出来的可笑的恐怖。我想：要是此刻发生地震，我就得死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而这是我最怕的。那时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甘心情愿住在这等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太挑剔，可是心里是永远厌恶的，只能竭力不去想它。上楼的时候，我把眼睛，耳朵，鼻子，所有的感官都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绝。并且，你瞧，从那个屋顶望出去，有一株皂角树。我坐在这边屋角里，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只瞧见那株树：傍晚风吹树动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远在巴黎之外了，这些齿形的树叶籁获摇曳，有时比森林中的风涛声还更幽美动听呢。”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我知道你老是在出神；可是你不用你的幻想来创造一些别的生命，而仅仅用来对付生活的烦恼，不是浪费了吗？”

“大多数人的运命就是这样。你自己难道没有为了愤怒与斗争而浪费精力吗？”

“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生来是为斗争的。瞧瞧我的胳膊跟手罢。跟人家搏斗是表示我健康。你哪，你可没有多大气力，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凄然瞧着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身子弱得很，一向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总得生活罗。”

“你靠什么过活的？”

“教书。”

“教什么？”

“什么都教。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我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奥里维笑着说。

“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讲堂上说到十分钟以上呢？”

“每星期我有十二个钟头呢。”

“那末你是教他们做坏事了？”

“为什么？”

“因为要人家知道什么叫做善，是用不着多费口舌的。”

“那末是不说为妙了？”

“对啦，不说为妙。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个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那些迂腐的家伙！他们好比手脚残废的人想要教我怎么走路。”

“那不是对你说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的人多着呢！”

“那末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手脚并用的去爬吧，让他们自己去学走吧。但手脚并用也罢，不并用也罢，第一要他们会走。”

他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不到四步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了一会，说道，“弹些曲子给我听听。”

奥里维吓了一跳：“要我弹？多古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很好的音乐家。来，来，弹罢。”

“在你面前弹吗？噢！那会教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利斯朵夫听得笑了，奥里维自己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能算一个理由吗？”

奥里维始终推辞：“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弹呢？”

“等会告诉你，你先弹罢。”

“弹什么呢？”

“随你。”

奥里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的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的朋友，他迟疑了半日，方始弹一曲莫扎尔德的B小调Adagio，他先是手指发抖，连捺键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一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尔德的话，可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的心灵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漏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尔德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利斯朵夫发见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现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抑捺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里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声音，放下了手，说道：“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利斯朵夫弯下身子，把中断的乐句弹完了，说：“现在我可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他两只手，把他瞧了好一会：“真怪！……我

好像见过你的……好像已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

奥里维嘴唇发抖，差点儿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没说。

克利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然后悄悄的笑了笑，走了。

他心花怒放的走下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的把他们的腮帮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他可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拣着阴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轻一阵。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悉悉索索的声响。克利斯朵夫懒洋洋的，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忽，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十二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荡了两小时，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糟掉了。他笑着，打着唢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作了一支轮唱曲。便是凄凉的旋律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的洗衣作，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烫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开着胸襟，跟往常一样很放肆的瞅了他一眼：破题儿第一遭，克利斯朵夫竟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都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两三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用。他嘻嘻哈哈的骂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堆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着：“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

他只敢悄悄的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爱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噢，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的身心去爱人家，一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

他不敢往下再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

他拿起一张纸，静静的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

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利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而要损失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里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利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儿钱是满不在乎的。他以为奥里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出去，过了两小时又回来，把从哀区脱那儿预支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洋洋的摆在桌上。奥里维红着脸不肯收。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着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里维拦住了。克利斯朵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里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里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利斯朵夫的快乐，说克利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感动。克利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像十五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多的一样，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文，德文，甚至也用音乐来作种种双关语。

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那斯区，靠近唐番广场，在一幢

旧屋子的六层楼上，他们找到一个三间正屋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页都是高墙的挺小的园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园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摆动；成群的乌在歌唱；天刚亮就能听到山鸟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复

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像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决计想不到住在巴黎。

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作这个提议的克利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的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的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的想不要得罪爱人，想教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摹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摹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

克利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里维：友谊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里维。奥里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远不及克利斯朵夫，不知克利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利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姊姊的遗物，或是跟她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利斯朵夫被爱情磨炼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里维问起他的家属；只知道奥里维所有的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儿高傲的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朋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怯得连对奥里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像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长条长毛大狗。

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床上。克利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的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儿发炎，嘱咐克利斯朵夫用碘摩擦病人的背。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的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

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的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戴着的。”

克利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

“安多纳德？”他问。

“是的，她是我的姊姊。”

克利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姊姊？……”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她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

奥里维凄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她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

“啊！”克利斯朵夫很激动的说。“她可是到过德国的？”

奥里维点点头。

克利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末我是认识她的啊！”

“我知道，”奥里维回答。

他勾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利斯朵夫再三说着。

他们俩一齐哭了。

克利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将被褥盖住肩头，像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

“好啦，好啦，”克利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

（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

“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又道，“既然早知道了，干么不对我说呢？”

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

“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随后，在静悄悄的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向握着他的手的克利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她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利斯朵夫已经知道了。

从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她；两人都是以她的思想为思想的。她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

奥里维时常唤起她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轶事，让她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像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利斯朵夫默默无言的听着，整个儿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的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够吸收。

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她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像安多纳德一样的殷勤，细心，作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教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的到安多纳德墓上去供些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见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利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的提到这问题，克利斯朵夫却粗声大气的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

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利斯朵夫的母亲，把克利斯朵夫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对克利斯朵夫怎样的敬爱与钦佩。鲁意莎很笨拙很谦卑的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她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像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

像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的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的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儿新发见。

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其不同又如是其相同，所以相爱。

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大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需讨论他不大感到兴趣的问题：——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教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画。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

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沸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骇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蹂躏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脸色发白，浑身打颤，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的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利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里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利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利斯朵夫那样盲目的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利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使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它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的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她的死亡之赐，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苏慰的光明之赐，好像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

这种智慧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里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里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阔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观照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奄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的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决不执着自己的生命，可是更热烈的执着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倚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他生来是跟克利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高贵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作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脱拉费沃之于达·文琪，加伐里哀之于弥盖朗琪罗；翁白尔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哀尔·梵·琪尔特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累姆勃朗特。他们并役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

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

他们互相充实。奥里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利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利斯朵夫的熏陶，奥里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利斯朵夫生气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里维。可是克利斯朵夫得之于奥里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例，尽管有所给与，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利斯朵夫吸收了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的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性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它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

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富源，那是至此为止各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渗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

克利斯朵夫不能了解奥里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利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葛看做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里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葛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狷介的人。克利斯朵夫拚命跟奥里维辩，说他和他的姊姊不完全是法国人。

“可怜的朋友，”奥里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的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

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利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般政客的兴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着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你要是不认识那般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的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作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伏朋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

巴黎公寓的房租层次愈低愈贵，愈高愈便宜，故平民多住在二三层楼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巴黎房屋普通都只有五六层。

伏朋（1633-1707）为法国平民出身的元帅与军事工程家，以防御战著称。晚年发表宣言，主张贵族应与平民平等纳税，以此失欢于路易十四。

息？有没有对柏斯格心中的深渊探着身予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获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炼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睬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的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室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虫蛆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教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作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揽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作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作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的把自己的思想藏起去……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克利斯朵夫发见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分，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

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特莱弗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儿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阿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夹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乐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喇叭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做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像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的作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夹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见在那些潜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忧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片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偏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先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〇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裴辽士一个人担当，可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旭兹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渗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请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枪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柏斯格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帮言“无穷小”的天地。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力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對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做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战争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利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进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有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格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格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服尔德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分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像维琪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

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像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直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弗洛贝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伦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像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写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睬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片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

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企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

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

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着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的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拼命扭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睬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份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疾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言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几百年来在这块大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坡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我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柏斯格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西纳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

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德利斯当，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华葛耐的《德利斯当》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宠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其量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唢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骑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跟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像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屈服；他不出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

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借的穷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特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像七年中间 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搅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齐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甸甸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平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忍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记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

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褶，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上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限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

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国人还是比国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轻重；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蓝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梵桑·特·保尔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像。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

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别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有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犹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地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葛吕克，莫扎尔德，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生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平的，相当的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

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气，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像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与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阿叙利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住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一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

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良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戳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片片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当和玛达伽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耳的笛，或是为了交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渗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

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见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头叫《伊索伯》，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伯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伯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伯》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伯》杂志的骄傲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元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的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爱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

伯》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險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末，非身强力壮的人决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身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所作用的。

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作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做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清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

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的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大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末他们决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限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般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的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齐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么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教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二千年来被它消化的

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罢！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设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淫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性子罢！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搅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的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痹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你不能绝望。它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德性，那么一股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便是那些蚕食它破坏它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一般贪得无厌的政客也会受它诱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权，也感觉列国运的伟大；这国运把他们从小我中超脱出来，拿火把交给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的传递过去，而他们也跟着前人从事于消灭黑暗的神圣的斗争。民族的精神拖着他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的信心是永远不去动摇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验，倒反使我感到，我们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是值得骄傲的。我绝对不愿意我的法兰西瑟瑟缩缩的关在一间病房里，不敢吹到外界的风，我不愿意病病歪歪的苟延残喘。一个人长大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倘使要停止长大，还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尽管扑到我们的思想中来罢！我决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

“可怜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说，“在它没退下去的期间，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兰西从尼罗河中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呢？奋斗不是更好吗？除掉你早已认为命中注定的失败以外，又没别的危险。”

“不，我所冒的危险远过于失败。我可能丧失精神上的平静：那对我是比胜利更重要的。我不愿意恨。哪怕对我的敌人，我也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热情汹涌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爱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用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和自甘灭亡的退让没有什么差别；他像安班陶克尔老人一样，觉得胸中有一支颂歌在那里颂赞恨，颂赞与恨相连的爱，——垦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种的，内容丰富的爱。他不能赞同奥里维那种安安静静的宿命观；并且他不大敢相信一个绝对不自

卫的民族能够久存，所以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用一分钟的爱情能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绩，同样，克利斯朵夫之于法国，八天内足不出户的跟奥里维亲密根聚的结果，比他用着一年的光阴，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与政治的沙龙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觉得茫无所措的那个普遍的混乱中，朋友的心灵对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岛，代表理智与精神恬静的境界。奥里维内心的和平所以格外动人，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精神上的倚傍，——因为他生活的境况是艰苦的，——（他穷，他孤独，他的国家又是这样的颓废，）——因为他身体衰弱，近乎病态，非常的神经质。可见他清明的心境并非由于意志坚强——（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从他的生命与种族的深处来的。在奥里维周围许多别的人身上，克利斯朵夫也窥见一道遥远的微光，体验到“万里无波的大海的沉静”；他自己素来是骚乱不宁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强烈的天性勉强得到一个平衡，现在这种隐藏的和谐，当然使他不胜艳羡了。

看到了法国的内情，他把过去对法国民族性所抱的观念全部推翻了。摆在他眼前的不复是那个快乐的，随和的，无愁无虑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心灵，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静的悲观气息，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灵智的热情；——他们都是不可动摇的灵魂，只能加以毁灭而不能加以改变的。当然这仅仅限于法国的优秀阶级；但克利斯朵夫不懂它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从哪儿来的。奥里维回答：

“从失败中得来的。是你们，克利斯朵夫，把我们重新锻炼了。唉，那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是怎样的凄惨。我们丧师辱国，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兰西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都操在一个不了解它。恨它、随时可以把它碎为齑粉的、强暴的征服者手里。可是我们就得为这些命运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国的孩子，生在蒙丧的家庭里，罩着战败的黑影，受着沮丧的思想熏陶；人家教养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们雪耻报仇，而那个报仇也许是玉石俱焚的，也许是完全空的：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早已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一类的发见，使儿童的心灵不是从此堕落就是从此长成。许多人都自暴自弃了：他们想：既然如此，何必奋斗？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没用。还是享乐罢。——但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住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你决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得到这个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可是这样是好的，应得要这样……”

噢！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用你的枪尖把各个民族的被压制的心开发出来罢！

……”

克利斯朵夫默然握着奥里维的手。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说，“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

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作的事。

“别难过，”奥里维笑着说。“德国不由自主的给我们的益处，远过于害处。是你们把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燃烧起来的，是你们把我们对于科学与信仰的热爱激动起来的，是你们促成了法国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创造力。使他单凭一个人的发明，就把五十亿的战争赔款给挣来了，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绘画、音乐再生的；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全靠你们的力量。我们为了爱信仰甚于爱幸福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酬报：因为我们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经感觉到那精神的力量，我们对于这种力，甚至对于胜利，都不再怀疑了。你瞧，克利斯朵夫，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跟德国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却相信那是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军团就会把欧罗巴大队武装的人民冲倒！”

弱不禁风的奥里维眼中闪着信仰的光，克利斯朵夫望着他说：

“可怜的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噢！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奥里维又说了一遍。“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第二部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的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的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像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的辞退了教职。因为姊姊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的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需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需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教一个像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作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的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像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式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僻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姊姊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遇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齐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的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慈悲，只有那种聪明像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

你得时时刻刻的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般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倚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膝的趋奉某个著名仙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仆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的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的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的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的在街上溜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下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限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篇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其妙。他挺天真的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倚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勃罗格耐，——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不同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像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拚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劳白斯比哀，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

奥里维表示异议。他对于《旧约》有种天生的反感。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童年偷偷的翻着一部插图本的圣经的时代，那是人家从来不看，也不许儿童看的东西。其实禁止也是多余的。奥里维看不多时，马上又恼又丧气的把它阖上了，直到读了《伊里阿特》，《奥特赛》，和《天方夜谭》那一类的书，才把看圣经的时候那种不愉快的印象抹掉。

“《伊里阿特》中的神，”奥里维说，“是一般长得很美，极有神通而缺点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我或是爱他们，或是不爱他们；即使我不爱，也喜欢这种人；我有点儿偏疼他们。我像巴脱洛格尔一样，愿意亲吻阿希尔的受伤的脚。但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自大狂的老犹太人，狂怒的疯子，时时刻刻都在咒骂，威吓，像发疯的狼一般怒噪，在云端里发狂。我不懂得他，不喜欢他，他的无穷的诅咒使我头痛，他的残暴使我惊骇：

对摩押的默示……

巴脱洛格尔与阿希尔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交情极密，皆参与脱洛阿之役。

对大马色的默示.....

对巴比伦的默示.....

对埃及的默示.....

对海旁旷野的默示.....

对异象谷的默示.....

“那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一身兼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在自己监狱的庭院里把花和石子宣布死刑。这部杀气腾腾的书充满着顽强的恨意，令人气都喘不过来.....——毁灭的叫喊.....笼罩着摩勃地方的叫喊；到处可以听到他的怒吼.....——他不时在尸横遍野，妇孺惨毙的屠杀中休息一会；于是他笑了，好像姚苏哀 军队中的老兵在围城之后坐在饭桌前面的狂笑：

万军之主耶和華给部下供张盛宴，让他们吃着肥肉，喝着陈酒。.....主的剑上满着鲜血，涂着羊腰的油脂.....

“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上帝还用欺骗手段派先知去蒙蔽人类的眼睛，造成他使他们受苦的理由；

——去，把这个种族的心变硬，塞住他的耳目，不让他了解，不让他改变主张，不让他恢复健康。

——那末主啊，到何时为止呢？

——到屋无居民，土地荒芜的时候.....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残暴的人！.....

“当然，我不至于那么愚蠢，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跟形式分离；倘使我对这个犹太上帝有时会低徊赞叹，也只像我对老虎低徊赞叹一样。莎士比亚专会制造妖魔鬼怪，也制造不出这样一个代表恨、代表神圣而有德的恨的角色。这部书真可怕。一切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恨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疯狂特别危险，因为它那残忍的骄傲还自命力能够澄清世界。英国使我发抖，因为它几百年来就浸淫着请教徒思想。幸而它和我隔着一个海峡。一个民族只要还在把圣经作养料，我就不相信他是完全开化的。”

“那末你应当怕我罗，”克利斯朵夫说：“我就是醉心于这种思想的。那等于猛狮的骨髓，强健的心的食粮。《福音书》要没有《旧约》做它的解毒剂，便是一盘淡而无味的，不卫生的菜；要生存的民族必须拿圣经做骨干。我们应当奋斗，应当恨。”

“我就恨这个恨。”奥里维说。

“恐怕你连这种恨意都没有吧！”

“不错，我连这点儿恨的气力都没有。我不能不看到敌人的理由。我常常念着画家夏邓的话：要柔和！要柔和！”

“好一匹绵羊！”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想做绵羊也没用。我要使你跳过壕沟，我要拚命拖着你向前。”

果然他把奥里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目的是为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

以上均为《旧约·以赛亚书》各章的摘要。

姚苏哀为希伯莱首领之一。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见《以赛亚书》第六章。

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利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利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利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里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利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权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机巧替克利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利斯朵夫感到兴趣。倘使要他为了自己去干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

两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利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里维印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卖掉。奥里维怂恿克利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利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的拿亨特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豪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心酸的回家。

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叫做泰台·莫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识见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极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力量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里维的朋友都是和奥里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莫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

奥里维要把莫克介绍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里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利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莫克，就皱了皱眉头。莫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像一般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的粗硬的 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像一个腓尼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利斯朵夫感动了。尤其莫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最高兴帮别人的忙：人家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事情给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里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利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多耽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觉察克利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把大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莫克的好心非常感激。

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以消极的或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作坏事，含讥带讽的容忍，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莫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

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教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以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

克利斯朵夫对于莫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莫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爱的抓着他的手说：

“啊！多可惜！……你生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

奥里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利斯朵夫的话圆过来。

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的回答：

“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克利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里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莫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像很纯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于，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搅得很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的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而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的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莫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净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的把这三件事看作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对克利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

尽管莫克游戏人生，非常洒脱，他仍旧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有时他精神上觉得一片虚无，半夜里突然呻吟着惊醒过来。好像在水里要抓住救命圈似的，他到处找一些借口让自己能够有所行动。

一个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是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塞米族的无穷的烦闷，和我们亚里安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烦闷虽然也很痛苦，但至少有些确切的原因，原因消灭，烦闷也可以跟着消灭，而这原因大多是欲望不能满足。但在某些犹太人，往往连生机都被一种致命的毒素侵蚀了。他们没有欲望，没有兴趣，没有野心，没有爱，没有快乐。这些跟祖国的传统脱节的东方人，千百年来把精力消耗净尽，竭力想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而达不到；他们始终没有失掉的——并非保持原状而是过分夸张了的，——只有思想，只有无穷的分析，使他们对什么都不觉得愉快，对一切行动都没有勇气。最有气魄的人也只是造出些角色来给自己扮演，而并不为自己打算。他们之中有些很聪明很严肃的人，往往对现实生活不关痛痒，一切都逢场作戏：——他们虽不承认有这个意思，但游戏人生的确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个演员，可是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像多半的人为了自私，而是为了别人。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利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莫

克从来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利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作些好事，混过日子。

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居然使哀区脱决心刊印克利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哀区脱心里很器重克利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到莫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哀区脱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

有一回奥里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莫克竟会想到向法列克斯·韦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莫克和韦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好感。他们俩性格太不同了，莫克这种骚动的、神秘的、激烈的性情，粗鲁的举止，或许会引起平静的、爱嘲弄的、举动文雅而思想保守的韦尔的讥讽。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也有共同点：对行动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兴趣，只靠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支持着。但两人都不愿意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彼此并无接触。所以那天韦尔对莫克相当冷淡：莫克想把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韦尔的兴趣，韦尔却含讥带讽的表示怀疑。莫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情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居然使韦尔动心了。他觉察到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

他的确挑动了对方的心。这个摆脱一切，没有朋友的老人，原来是把友谊看作神圣的。他一生最大的感情是对一个夭折的朋友的友谊。那是他内心的至宝，每次想起总觉得很安慰。他创立了一些事业，纪念这位朋友，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他。莫克说的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互的友情使他大为感动。他的历史跟他们的颇有相像的地方。他所丧失的朋友当初对他是个长兄，是个青年时代的伴侣，他崇拜的指导者。一般年轻的犹太人，有的是智慧与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极感痛苦，想复兴他们的民族，再由他们的民族来复兴世界，他们鞠躬尽瘁的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像火把一般在世界上照耀了几小时：韦尔的亡友便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的火焰曾经使年轻的韦尔精神奋发。他在世的时候，韦尔始终跟着他在信仰的光轮中往前走着，——相信科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未来的幸福。从朋友去世以后，懦弱而爱发牢骚的韦尔就让自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直掉到《传道书》那样的沙土里，那种气息是每个聪明的犹太人都有的，而且是随时预备把他们的聪明吞掉的。但他从来没忘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过的光明的日子，把差不多已经隐灭的光彩始终保存在心里。他对谁都没提过这位朋友，连对他所爱的妻子在内：那是一件神圣的事。而这个被大家认为冷酷而毫无风趣的老人，到了暮年还在心里反复念着一个印度古代婆罗门高僧的又温婉又辛酸的句子。

“世界上受过毒害的树，还能产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两个果子：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友谊。”

韦尔从此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的向莫克要了一部奥里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

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得正是时候了。

克利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低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或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捺着性子去向韦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韦尔笑做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的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

那天克利斯朵夫访问了韦尔，又感激又气恼的回到顶楼上，发见莫克又来给奥里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吕西安·雷维-葛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的把克利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

克利斯朵夫等莫克走了以后和奥里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得变成犹太人吧？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奥里维说，“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和活生生的事。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幸，这个过去为犹太人是不会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

“别提艺术，”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呢。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的。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克利斯朵夫带着取笑的口气说。“我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照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教大家认识的话（倘若没有他们，那是很可能的），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和我们同教的人会来帮助我们吗？旧教教会让它最优秀的子孙灭亡，绝对不救一下。凡是心灵深处真有宗教热忱的人，为上帝献身的人，如果胆敢不守旧教的规条，不承认罗马的威权，那末一般自称为的旧教徒不但立刻把他们视同陌路。抑且视同仇敌，不出一声的让他们落在共同的敌人手里。一颗自由的心灵，不管怎么伟大，倘使单有基督徒的精神而不肯服从，那么纵使他代表信仰中最纯洁最神圣的部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摒弃他，幸灾乐祸的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蹂躏，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般弟兄们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种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想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恨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

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州的话，欧州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像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我们只有起而自卫，教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决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骚动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教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像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搅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片，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气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像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其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

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欺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像野猪一般往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像史克里勃和加波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偏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像《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翡冷翠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疫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像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么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搅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像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样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

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

鲍加岂沃所作名著《十日谈》，假定是一小群人（七个年轻妇女与三个男人）在一三四八年黑死疫最猖獗的时候，避于翡冷翠城外一别庄上所讲的故事。

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像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像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邻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朗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利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里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过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里维跟他一样的睡不着。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他需要听克利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利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呢！这样他们才能睡着。

“啊！”奥里维叹道，“互相了解是多么困难！”

“难道非永远互相了解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说。“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

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补救的这些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里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利斯朵夫每逢奥里维的节日，总得作一个曲子题赠给他，送点儿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里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的为克利斯朵夫抄写总谱。

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奥里维也认识克利斯朵夫从前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利斯朵夫当初没有在她那边遇到他，因为那时奥里维遭了姊姊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邀他去：她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她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赶到她知道他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狷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利斯朵夫说想再到她家里去，克利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去罢，孩子，要是你觉很好玩的话。”

克利斯朵夫自己可决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来往。并非他厌恶女性：那才差得远呢。对于一般劳动的青年妇女，每天清早睁着倦眼，急匆匆的，老是迟到的往工场或办公室奔去的女工，职员，公务员，他都抱有好感。他觉得女人只有在活动的时候，争取自己的面包和过

着独立生活的时候，才有意思。他甚至觉得，唯有这样，女性的风韵，动作的轻盈，感官的灵敏，她的生命与意志的完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他瞧不起有闲的享乐的女子，认为那等于吃饱了东西的野兽，一方面在那里消化食物，一方面感到无聊，作着些不健全的梦。奥里维却是相反，他最喜欢女人“无所事事”的悠闲，喜欢她们花一般的娇艳，以为只要长得美，能够在周围散布香味，就算她们不白活了。他的观点是艺术家的观点，克利斯朵夫的观点却更富于人间性。克利斯朵夫和高兰德相反：越是深尝人世的痛苦的人，他越喜欢，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一股友爱的同情作联系。

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她要详细打听一下。克利斯朵夫那么傲慢的把她淡忘了使她有点儿气愤，虽然不想报复，——那是不值得的，——却很乐意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艺儿。凭她那种迷人的本领，她毫不费力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着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利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的历史原原本本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而都归咎于自己的误会，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高兰德立刻拿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的安排一下，为的使故事更动听，也为了把克利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她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一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接叶的传布开去，把奥里维形容做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侮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利斯朵夫自己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她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利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她追问消息的原委；她说是吕西安·雷维一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

这一下对克利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暴躁，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近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漏给吕西安·雷维一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片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

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里，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像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会闲话，果然他听见他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推，在锁孔中轻轻的他招呼了一声，他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的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的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的爱着奥里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是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要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的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他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自己听了就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敌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代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故意的。奥里维看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其妙。他怯生生的试探克利斯朵夫对他有什么

不满意。克利斯朵夫却粗暴的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着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整日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利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怒必需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一葛了，依着他平素那种偏在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像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吕西安的一篇关于《斐但里奥》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的提到贝多芬，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这出歌剧的可笑的地方，甚至音乐方面的某些错误，克利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对于世所公认的大师们从来不盲目的崇拜。但他也并不自命为永远没有矛盾，像法国人那样始终合于逻辑。世界上有一般人很愿意挑自己所喜欢的人的错，可不答应别人那么做：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一个大艺术家：尽管尖刻，究竟是因为对艺术抱着热烈的信仰，爱护大师的光荣，不能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吕西安的那一套却是想迎合群众的卑鄙心理，挖苦一个大人物来逗大家发笑：这两种批评当然是大不同的。何况克利斯朵夫虽然思想那么洒脱，还暗中认为有一种音乐是绝对不能触犯：那不只是音乐而是更胜于音乐的音乐，是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灵的音乐，给你安慰，给你勇气，给你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作品便属于这一类；它现在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要义愤填胸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都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拚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

碰巧当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和那个人劈面遇到了。

为避免跟奥里维单独在一起，克利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忽儿，他正聚精会神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的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节没弹完就马上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顿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儿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利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的问（因为她不敢断定作品是否真的完了）：“您不弹下去了吗，克拉夫脱先生？”

“我弹完了，”他冷冷的回答。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的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利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利斯朵夫不胜厌烦的弯了弯身子，胡乱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痴骏的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利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利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儿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斗他一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抑捺不住，——吕西安正

在对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般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克利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着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华葛耐和路易王的交情。

“住嘴！”克利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

大家愕然回过头来。吕西安跟克利斯朵夫未照了面，脸色有点儿发白：

“你这话是對我说的吗？”

“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接着又跳起来，说：

“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坏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窗里摔出去！”

他迎着他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了一阵。克利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的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的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的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的颤动着，眼睛一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过来站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着向门口走去。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其妙的数着它发亮的钮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嗯，朋友，怎么啦？”罗孙说。“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不是疯了吗？”

“嘿！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的了！”克利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往门外走去。

大家很小心的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托着一个盘送过来，盘里放着吕西安·雷维一葛的名片。他糊里糊涂的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的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检出三四张折皱的肮脏的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名片往盘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下。

于是他走了。

奥里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利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一家酒店里认识的，虽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利斯朵夫可拒绝了；因为决斗要第二天才举行，他当时又埋头工作起来。

当然他的工作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做着恶梦，听见一个模糊而固执的念头在耳朵里嗡嗡的响着……“讨厌，真讨厌！……什么事讨厌呢？——明天那场决斗罗……嘿，那不过是闹春玩儿的！……谁也打不着谁的……可也说不定……那末以后呢？……对啦，以后呢？那个畜生手指一擦就能结果我的性命……太笑话了！……明天，两天之内，我可能躺在这发臭的泥土底下……也罢！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难道怕他不成？——可是，我明明觉得胸中

此系指德国巴维利阿王路易二世。

德国大学有“私人教授”一职，资格必须有博士学位，其薪给不由公家支付而由学生直接负担。瑞士是否亦有此制度，不详。

有我自己的天地，在那里慢慢的长大，如今为了一桩无聊事儿把这天地断送，不是太胡闹吗？……这些现代的斗争，说是让敌我双方机会平等，真是见鬼！好一个平等，一个混蛋的性命，跟我的性命有同样的价值！干么不用拳头或棍子来打一架呢？那倒还好玩。可是这冷冰冰的枪真不是味儿！……他对这一套当然是老手，我可从来没拿过什么手枪……他们说得不错：我应当去学一学……他想打死我吗？哼，我才要打死他呢。”

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教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的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的不在乎，意志又那样的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像孩子一般的听话，硬要制眼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的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的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教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的不出声了，却舍不得走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的跟他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的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辞的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的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一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的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的劝阻他，他为了摆脱起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那既不理睬克利斯朵夫，也不理睬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淫狠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都鲁士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像西班牙贵族一样的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作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的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的。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衣衫的

男人，热得头昏脑张，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那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说道：

“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又说：“时间还来得及：过后我可以上几尔赛去。”

他们听见古那为了场地的租金跟店里的主妇争得很凶。于里安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几位骑自行车的游客身旁走过的时候，大惊小怪的对女人裸露的大腿叫好，招来一大阵粗野的咒骂，于里安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他们。巴德轻轻的说：“法国人都是无耻东西。兄弟，我祝贺你胜利。”

他拿酒杯和克利斯朵夫的碰了一下。克利斯朵夫却在那里胡思乱想：断片的乐句在脑海中飞过，好似一片和谐的虫声。他简直想睡觉了。

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压出沙沙的声音，克利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上照例堆着笑容，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

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穿扮非常讲究，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勃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匣，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剃得精光，苍白而带黄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爱麦虞限医生，很细腻的标准塞米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给他们医治。

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的行着礼。克利斯朵夫对他们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兴的看到自己的证人对吕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爱麦虞限，古那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的走拢来。摩埃冷冷的有礼的接待他们，爱麦虞限照例嘻嘻哈哈的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人所有的常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动都没动，——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

吕西安若无其事的等主持决斗的勃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教一个敌人伤在自己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臭的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着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额角，一双眼睛恶狠狠的盯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勃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

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手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像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那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堆着那永久的笑容向

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往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气力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利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嘲笑跟埋怨，径自大踏步往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的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往树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扑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过了一会，莫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起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利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咕哝着走回头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片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脚朝天，像一头小牛似的那儿打滚。克利斯朵夫很快活的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他说，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逼窿，像筛子一样；他又强迫莫克跳着玩儿，重重的拍着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

奥里维一点都没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利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克利斯朵夫决斗的事。他一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差点儿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

“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奥里维惊骇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的把一支法国的老歌谣改了几个字代替回答。莫克也为了两个朋友的快乐而高兴极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谣是：

“我的乖乖，这教你提防……

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
那吹牛拍马的犹太人，
那无聊的朋友，
那亲押的敌人，
还有那泄气的酒，

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释了；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的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丰富，充实：而这种丰满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

奥里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某个程度以后，必然要流干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泉源枯竭。克利斯朵夫觉得这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作反证，认为它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道：

“法国音乐吗？……它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

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

于是他举出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

“你们翻来覆去的搬弄一些跟你们不适合的体裁，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摹仿的艺术——富于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倒反不再制作芭蕾舞乐……——你们是一个诙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歌剧，或是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勃莱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霍斯托佛·夏邦蒂哀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渗透个性的天赋。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比方说，我能够替那静坐在下面花园中紫了香旁边的姑娘写照）……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史当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华米，联欢大会，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华格耐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的，在兼带合唱的大交响乐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运命，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教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末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个别的音乐……可是第一，倘若你们是音乐家，你们先得制作纯粹音乐，无所为而为的音乐，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温暖，使人呼吸，使人主活。你们得创造太阳！……你们的雨下得够了。你们的音乐使我伤风感冒。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们的灯点起来罢……你们抱怨意大利的脏东西把你们的戏院给包围了，把你们的民众给征服了，把你们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民众被你们昏暗的艺术，神经衰弱的和声，繁琐沉闷的对位，搅得厌倦透了。他自然要扑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们只要求生命！你们为什么要灭绝生命呢？你们的特皮西是一个大艺术家，但对你们是不卫生的。他促成你们的麻痹。你们需要人家用力把你们撼醒。”

“难道你要教我们走上史脱洛斯的路吗？”

“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史脱洛斯的《莎乐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可怜的老祖父和高脱弗烈特舅舅，他们讲起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温柔的口吻！唉！一个人有了神朋般的力量而用在这等地方！……那是一颗烈焰飞腾的流星！一个伊索尔脱，犹太的卖淫妇。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残杀，强奸，乱伦这一类狂热的欲望，在德国颓废的心灵深处咆哮……而你们却是在温柔乡中自杀……

华米为法国玛纳州中的一个市镇，一七九二年法人在此击败普鲁士人。

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各州代表齐集巴黎，纪念攻下巴斯蒂狱之第一周年，谓之联欢大会。

报理查·史脱洛斯歌剧中的莎乐美。

前者是野兽，后者是俘虏·人在哪里呢？.....你们的特皮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史洛脱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味。后者可厌。一个有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有如湍浊的急流.....而在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曼依贝，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臭气.....《莎乐美》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它是《伊索尔脱》的女儿.....可是《莎乐美》又会产生些什么呢？”

“是的，”奥里维说，“我很想走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教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堕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青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从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克利斯朵夫说。“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田地呢。你以为我会退止吗，我？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罢，斗争万岁！扩大我们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统统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的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心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像潮水一般的奔泻，克利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它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局处花园中的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楼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车，刮磨砖石，敲钉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的点头。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里维看了大为诧异。他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兴致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做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往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像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末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像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

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凭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象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来没存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的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像痼疾一般牢不可拔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的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末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末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的提防……”

“这话我听说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了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葛吕克的粗笨，华葛耐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葛吕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葛吕

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睬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睬我们一样。这般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我国的，那个不是我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慕——或拉西纳——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尔德，葛吕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优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末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葛吕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他亲爱的老苏兹：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苏兹，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的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契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的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

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的受辱，伽利莱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间中，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彷徨无主。有的人拼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飘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波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那末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似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像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的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的热烈的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的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残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的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的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

裴德罗为法国近代大化学家，政治家。

鲍尼法斯八世为十三世纪时教皇，以反对法国国王向教会征税而受辱。

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

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的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种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未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者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的，又公平又中肯的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

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

——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文，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的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的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的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便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的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的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呕！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她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末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的交换一言半言。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教住在低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

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偶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偶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一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楞了一楞，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齐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的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扬扬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的搅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功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的奏着罕顿的 *Andante*，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于是他娓娓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的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

加农（Canon）为法国近代的大炮，同时亦是一音乐术语，是一种轮唱曲。此处用谐音作双关语。

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比氏征服秘鲁，高氏征服墨西哥。

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的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上里，他时而追逐上人，时而彼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搅着些可笑的玩艺，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

“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搅着文学。当步兵的搅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唇角有颗小瘤；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往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人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像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糊糊的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的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的工作，安静的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像面包，像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平，旧屋的和平，笑盈盈的心灵的和平……

按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像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则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夷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末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不把她自己解放出来呢？像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

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予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主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像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

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的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的。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补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像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特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的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大不理睬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特莱弗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的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嫉妒吗？那末你比那个少较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罢！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像我一样的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像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末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蒂，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辟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撬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像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的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

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妻孥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傲慢不逊的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

“噢！这般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小响的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末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楞，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伯》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像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像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般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

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匹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末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贫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这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克罗在家里。韦尔像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烜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丹列兹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谐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往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起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

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的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往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的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少校回答。“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品而互相厮杀。但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艺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

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末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特莱弗斯党吗？”

“特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的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末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吗？”

“跟那般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就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末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欧洲已经实行过了。”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魄力的敌人携手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

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么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蠢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是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乱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中那段《降B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佑法兰西》等等，一齐放在一阕合唱交响乐里，——（你听：就像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罢！”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特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臭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你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争辩得很激烈。赛丽娜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的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

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乐》。

夏邦蒂哀与勃吕诺均法国近代音乐家。

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的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楞了一楞：“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来往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未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股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和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

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拼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像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辮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自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贫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楞，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糊糊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的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的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的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一天晚上，她呆在黑魑魑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的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像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的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搅那位伤心的太太。”

另外一个便放轻了脚步，低着声音说话。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可忍不住了：她开出门去，拼命抓着她们拥抱。她们害了怕，有一个甚至哭了。她只得把她们放下。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嘎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而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见屋子里乱哄哄的，好像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害了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凄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依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的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见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

笨拙的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子，跟她说些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的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的摇摆。孩子慢慢的静下来，呜呜咽咽的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的替她解鞋带。天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刺刺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见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一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

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他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 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需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

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治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部有些报纸素来自命力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关，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成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用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平的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平，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平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不去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迫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么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那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

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亚尔萨斯—洛兰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亚尔萨斯—洛兰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教统治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亚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亚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亚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利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

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未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齐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么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卷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见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治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说，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涉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着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病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现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长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传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成长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蒂高纳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像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的守着缄默。

安蒂高纳为希腊神话中的孝女，所引名言见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利的悲剧。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科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的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

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半官式的文告像晴雨表似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窠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利斯朵夫气呼呼的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里维。他们好不痛快的呼了几口气。奥里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儿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说：

“哦，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笑嘻嘻的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像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

“你应该满意了吧？”

“干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作牺牲品吗？……得了罢！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

“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它以这种代价来团结。”

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足勇气，嘎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利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

“克利斯朵夫，你竟会……”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的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末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可怕，”奥里维说。“我也爱我的国家，像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它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它的铁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罪大恶极，它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他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不能拿血来溅污它们。我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末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是要征服真理。”

“要征服，”克利斯朵夫说，“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像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

你不应当在你的脑子里去找，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罢。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下由我们作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往后退了。”

“不错，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到了一个民族只想往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着智慧。危险啊！死神来了。”

“所有的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

“丢开你的世纪罢！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那般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缈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

“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利斯朵夫，一个人不能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

“应当在现在常住。”

“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们伟大才成其为伟大。”

“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

“我更愿意成为活的克利斯朵夫。”

奥里维不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他叹了口气，说：“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

克利斯朵夫温柔的握着他的手：

“亲爱的奥里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可是原谅我，我不能爱你甚于爱生命，甚于爱人类的太阳。我最恨黑夜，而你们虚伪的进步就在勾引我往黑暗中去。在你们一切隐忍舍弃的说舌底下，都藏着同样的深渊。唯有行动是活的，即使那行动是杀我的时候也是活的。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可以挑：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便是黑夜。虽然黄昏以前的幻梦特别有种凄凉的韵味，我可不要这种替死亡作前奏的和平。至于无穷无极的空间，它的静寂是使我害怕的。让咱们在火上添些新柴罢！愈多愈好！连我也丢进去罢，要是必需的话……我不愿意火焰熄灭。倘使它熄灭了，我们就完了，世界上一切都完了。”

“你这种口吻我是熟悉的，”奥里维说，“那是从过去的野蛮时代来的。”

他在书架上抽出一部古印度诗人的集子。念道：

“你起来罢！坚决的去战斗。不问苦乐，不问得失，不计成败，尽你的力量战斗……”

克利斯朵夫从他手里抢过书来，接着念下去：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强迫我行动，也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我的；可是我决不抛弃行动。要是我不孜孜矻矻的干着，让人家照着我的榜样做，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倘若我的行动停止一分钟，我就要使世界陷入混沌，我要变成生命的刽子手。”

“生命，”奥里维再三说着，“生命，什么叫做生命？”

“一场悲剧，”克利斯朵夫回答。“往前冲罢！”

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都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道，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更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拼命的把东西往嘴里塞。

克利斯朵夫用着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了他的影响。为了需要把忧郁的思想廓清一下，他们根据拉勃莱的作品合作一部史诗。健康的唯物色彩非常浓厚，那是精神受了压迫以后必然的现象。除了伽尔刚多阿，巴奴越，修士约翰，这几个知名的角色以外，奥里维受着克利斯朵夫的感应，又添了一个新人物，——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被人窃盗山无所谓；——妻子被人亲吻，田地被人劫掠也无所谓；——不辞劳苦的种着他的田，——被逼去打仗，受尽千辛万苦也无所谓；他一边看着主子们剥削，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他料到他们会倒楣，在眼梢里瞅着，已经不声不响的扯着他的大嘴在那里笑了。果然有一天，伽尔刚多阿和修士约翰当了十字军，遭了难，忍耐真心的可惜他们，又很决活的安慰自己，把淹得半死的巴奴越救起来，说道：“我知道你还要耍弄我；可是我少不了你；你能替我解闷，教我发笑。”

根据这篇诗歌，克利斯朵夫写成几支分幕的，附带合唱的交响曲！其中有悲壮而可笑的战争，有狂欢的节会，有滑稽的歌唱，有耶纳甘派的牧歌，有儿童一般粗豪的欢乐，有海上的狂风暴雨，有音响的岛屿和钟声；最后是一阕田园交响乐，充满着草原的气息：■策，笛子，民歌，唱出一派轻快喜悦的调子。——两位朋友非常愉快的工作着。清瘦苍白的奥里维洗了一个健身浴。欢乐的巨潮在他们的顶楼中卷过……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同时也用朋友的心灵的创作！便是情侣的拥抱也不会比这两颗友爱的灵魂的结合更甜蜜更热烈。两心相契的程度使他们常常同时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克利斯朵夫写着一幕音乐，奥里维立刻想出了歌辞。他带着奥里维向前迈进。他的精神笼罩了朋友，使朋友也产生了果实。

除了创造的快乐，又加上战胜的快乐，袁区脱决心把《大卫》付印了，一出版立刻在外国引起很大的回响。袁区脱有个华葛耐党的朋友住在英国，是有名的乐队指挥，对克利斯朵夫这件作品非常热心，拿它在好几个音乐会里演出，极受欢迎；凭着这一点，同时靠着名指挥的力量，《大卫》在德国也被演奏了。那指挥又跟克利斯朵夫通信，问他要别的作品，说愿意帮忙；他也竭力替克利斯朵夫作宣传。以前被喝倒彩的《依斐日尼》，在德国被人重新发见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才。克利斯朵夫传奇式的生涯使人家对他格外好奇。《法兰克福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别的报纸也跟着来了。于是法国也有人发觉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大音乐家，《拉勃莱史诗》还没完工，巴黎某音乐会的会长就向克利斯朵夫要求这件作品；而古耶，因为预感到克利斯朵夫快要享盛名了，便用着神秘的口吻提到他所发现的天才朋友。他写了篇文章把美妙的《大卫》恭维一阵，完全忘了他上年提到这作品的时候用的是两句侮辱的话。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想起这一点，巴黎多多少少的人过去都揶揄华葛耐和法朗克，现在又捧着他们去打击新兴的艺术家，然后等新兴艺术家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后再捧他们。

这次的成功出于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胜利的，可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对于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耸耸肩膀，就希望人家别跟他烦。要是人们在上一年的他写作《大卫》的时候恭维他，他可能接受；

但现在心情已经不同，他又多爬了几级。他很想和那些对他提起旧作的人说：

“别拿这个脏东西来跟我烦！我讨厌它，也讨厌你们。”

接着，他用一种因为被人打扰而有点儿生气的心绪，重新埋头做他的新工作。但他暗里毕竟感到一种快意。荣名的最初几道光辉是很柔和的。打胜仗是愉快的，增进健康的。那好比窗子打开了，初春的气息渗透了屋子。——克利斯朵夫虽然瞧不起自己的旧作，尤其是《依斐日尼》，但看到这件可怜的作品从前给他招来多少羞辱，而如今受着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与戏院的欢迎，究竟也出了一口气。他收到一封特莱斯登那边的信，说人家很愿意排演他的乐剧，在下一季中上演……

这个消息使他在多少年的忧患以后终于窥见了比较恬静的远景和胜利。但他当天又收到另外一封信。

那天下午，他一边洗脸一边隔着房间和奥里维高高兴兴的说话，门房从门底下塞进一封信来。他一看是母亲的笔迹：他正预备写信给她，因为能告诉她一些好消息而很快慰……他拆开信来，只有几句话……啊，她的字怎么抖得这样厉害呀？……

“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还想见你一面。我拥抱你。妈妈。”

克利斯朵夫哭了。奥里维吃了一惊，立刻跑来。克利斯朵夫说不上话，只指着桌上的信。他继续哭着，也不听奥里维看完了信以后对他的安慰。然后他奔到床前，拿起外衣急匆匆穿了，领带也不戴，——（手指在发抖）——往外便走，奥里维追到楼梯上把他拦着，问他想怎么办。搭下班车吗？在黄昏以前就没有车。与其在站上等还不如在家等。必不可少的路费有了没有呢？——他们俩搜遍了各人的衣袋，统共也不过三十法郎左右。时方九月，哀区脱，亚诺夫妇，所有的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地方可以借。克利斯朵夫焦急的说他可以徒步走一程。奥里维要他等一小时，让他去张罗旅费。克利斯朵夫一筹莫展，只得由他摆布。奥里维破天荒第一遭进了当铺；他是素来宁愿挨饿而不肯把纪念物当掉一件的，但这次是为了克利斯朵夫，而且事情那么紧急。他便当了他的表，可是当来的钱和预算的还相差太远，便回家拿了几部书卖给旧书摊。当然他为之很难过，但此刻无暇想到，心中只记挂着克利斯朵夫的悲伤。回到家里，他发见克利斯朵夫神色惨沮的坐在原来的地位，奥里维张罗来的钱，再加上三十法郎，已经绰绰有余了，克利斯朵夫心乱如麻，根本没追究钱的来源，更没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朋友还有没有钱过日子。奥里维也和他一样；他把所有的款子交给了克利斯朵夫，还得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朋友，把他送上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才和他分手。

夜里，克利斯朵夫睁大着眼睛，望着前面，想道：“我还赶得上吗？”

他知道，要母亲写信叫他回去，她一定是急不及待的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要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加快一些速度。他埋怨自己不应该离开母亲，同时又觉得这种责备是空的：事势推移，他也作不了主。

车轮与车厢单调的震动，使他慢慢的平静下来，精神被控制了，有如从音乐中掀起的浪潮被强烈的节奏阻遏住了。他把自己的过去，从遥远的童年幻梦起，全部浏览了一遍。爱情，希望，幻灭，丧事，还有那令人狂喜的力，受苦，享受，创造的醉意，竭力要把握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的豪兴，——这是他灵魂的灵魂，潜在上帝。如今隔了相当的距离，一切都显得明白了。他的欲望的骚动，思想的混乱，他的过失，他的错误，他的顽强的战斗，都像逆

流和旋涡，被大潮带着冲向它永远不变的目标。他懂得了多年磨炼的深刻的意义：每次考验的时候必有一道栅栏被逐渐高涨的河流冲倒；它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流到另一个更宽广的山谷，把它注满了；视线变得更辽阔，空气变得更流畅。在法国的高地与德国的平原中间，河流找到了出路，冲到草原上，剥蚀着高岗下面的低地，把两国的水源都吸收了，汇集了。它在两国中间流着，不是为了把它们分野，而是为了把它们结合：两个民族在它身上融和了。克利斯朵夫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命运是像功脉一般把两岸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两岸敌对的民族中去。——在最阴惨的时间，他面前反出现一个恬静的境界和突如其来的和平……然后那些幻象消失了，眼前只有老母那张痛苦而温柔的脸。

他到本乡的时候，东方才发白。他得留神不给人家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没撤销。可是站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大家还睡着，屋子都役开门，街上荒荒凉凉的：那是灰暗的时间，夜色已尽，日光未至，睡眠最甜，而梦境都染上曙色的时间。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打开铺子的百叶窗，嘴里唱着一支老歌，克利斯朵夫差点儿透不过气来。噢，故乡！亲爱的故乡！……他真想扑下去亲吻泥土，听着那个使他心都溶化的平凡的歌，他觉得远离乡土的时候多么苦恼，而自己又多么爱它……他凝神屏气的走着，一看到家，不得不用手掩着嘴巴，不让自己叫起来。留在这儿的被他遗弃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喘了口气，连奔带跑的直到门前。门半开着。他推进去。一个人都没有……旧扶梯在脚下格格作响。他走上二楼。屋子好像没人住的，母亲的房门关着。

克利斯朵夫心忐忑的跳着，抓着门钮，没有气力推开……

鲁意莎孤零零的躺着，觉得自己快完了。其余两个儿子都下在这儿：经商的洛陶夫在汉堡成了家；恩斯德上美洲去了，杳无音讯。谁也不关切她，只有一个邻居的女人每天来看她两次。问她可需要什么，待上一会，就回家去干自己的事；——她来的时间没有准儿，往往来的很晚。鲁意莎觉得人家忘记她是挺自然的，跟自己闹病一样的自然，而且她苦惯了，涵养功夫好到极点。她心脏不好，常常会闭过气去，自以为要死了：她睁着眼睛，双手抽搐，满头大汗。她并不抱怨，以为是应当如此的。她已经准备好了，临终圣体也受过了。只有一件事情使她挂心：就是怕上帝不许她进天堂。其余的一切，她都能够耐着性子忍受。

在小房间的黑洞洞的一角，她在床高头的壁上和枕头四周，把所有心爱的人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三个孩子的、丈夫的，（她对他始终保持着初期的爱情，）老祖父的，还有哥哥高脱弗烈特的。凡是待她好的人，——不管那好心是怎样的不足道，——她都念念不忘。她把克利斯朵夫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相用针扣在褥单上，靠近着她的脸，又拿他最近几封信放在枕头底下。她最爱秩序和清洁，现在看到屋子里没有整理得顶好，就觉得不大好过。外边各种细小的声音，对她等于是报告时刻。那她听了多少年了！整整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中消磨的……她想着心爱的克利斯朵夫，多么希望他此时此刻能到这儿来，挨在她身边！可是他要来的话也算了。没有问题，她一定能在天上见到他。现在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了。她迷迷忽忽的老是在回忆中过日子……

她在莱茵河边上的老屋内……家里在过节……正是夏季一个大好的晴天。窗子开着：太阳照在明晃晃的路上。鸟儿唱着歌。曼希沃跟祖父坐在门前抽烟，一边谈天一边挺高兴的笑着。鲁意莎看不见他们，但是很快活，因

为这一天丈夫在家，祖父脾气很好。她在楼下做饭：一顿丰盛的午饭。她非常留神的照顾着；有一样大家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一块栗子蛋糕；一想到孩子会快活的叫起来，她心里就很舒服……啊，孩子，他在哪儿呢？在楼上：她听见他在弹琴，她不懂他弹的东西，但听到那琤琤琮琮的声音，知道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她就很快活了。天气多好！大路上有辆车子传来轻快的铃声……啊！天哪！我的烤肉呢！但愿不要在她眼望窗外的时节给烤焦了！她唯恐她多么喜欢而又多么害怕的祖父不乐意，埋怨她……还好，托上帝的福，没有出事。瞧，什么都预备好了，饭桌也摆好了。她招呼曼希沃跟祖父。他们很愉快的答应了，可是孩子呢？……他不弹琴了。琴声已经停了一忽儿，她役留意……——“克利斯朵夫！”……他在干什么呢？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老是想不到下来吃饭的，又得给父亲骂了。她急急忙忙的上楼：——“克利斯朵夫！”……没有回音。她打开他屋子的门。没有人。屋子里空空的；钢琴也盖上了……鲁意莎不由得一阵心痛，他怎么的？窗子开着。天哪！

他不会掉下去吧！……鲁意莎吓坏了，赶紧从窗口往下瞧……——“克利斯朵夫！”……哪儿都找不到他。各个房间都走遍了。祖父在楼下对她嚷着：“你来罢，别急，他自个儿会来的。”她可不愿意下楼；她知道他在这儿，一定是躲着玩儿，跟她捣乱。啊！可恶的孩子！……是的，毫无疑问的，楼板在那里格格的响；他躲在门后呢。可是钥匙不在门上。去拿钥匙吧！她在一张放着各式钥匙的抽屉内急急忙忙的找。这一个，这一个，……哦，不是的！——对啦，是这个！……可是插不进锁孔。鲁意莎的手拚命的发抖。她急得很，要赶紧呀。为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赶紧。要不然她就等不及了。她听见克利斯朵夫在门后呼吸……啊！这钥匙！终于开了。她高兴得叫起来。是他呀。他扑上她的脖子啊！可恶的孩子，好孩子，亲孩子！……她睁开眼来。他果然在这里。在她面前。他已经对她望了一些时候，望着这张大改变了的，又瘦又有些虚肿的脸，那种无言的痛苦，给她听天由命的笑容衬托的格外凄惨；周围又是那么冷静，那么孤独……他看了心都痛了……她见了，并不惊奇，只微微笑着。那笑容是没法形容的。他扑上她的脖子，把她拥抱了，她也拥抱他，大颗的眼泪从腮帮上直淌下来，轻轻的说了声：“等一等”……他看见刀子气喘得厉害。两人一动不动。她不住的流着泪，摩着他的头。他一边哭一边亲她的手，把被单遮着脸。等到安静了一点，她想说话，可是说不上来，用的字都有是错的，他很不容易懂得。那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见了面，始终那么相爱：那就行了——他很气查问为什么人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她替那个照顾她的女人解释道：“她不能老待在这里：她有她自己的工作。”

然后用着一种微弱，断续的，连字母都念不周全的声音，很急促的嘱咐一些关于她坟墓的事。她要克利斯朵夫向其余两把她忘了的儿子转达她为母的遗爱。她也提到奥里维，——他对克利斯朵夫那种深厚的友情，她是知道的。她要克利斯朵夫告诉他，说她祝福他，——但她马上改正了，用了两个更谦卑的字眼，说她对他表示敬爱……说到这儿她又气急了。他扶着她在床上坐起来，满脸淌着汗。她勉强笑着，心里想现在握到了儿子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要求了。

克利斯朵夫突然觉得母亲的手在他手里抽搐起来。鲁意莎张着嘴，不胜怜爱的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

当天晚上，奥里维赶到了。他不能让克利斯朵夫在这个悲痛的时间孤独

无助，那种滋味他是经验过的。同时他也担心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他要跟他在一起，保护他，可是没有旅费。送了克利斯朵夫回去，他决意卖掉几件老家传下来的首饰。那时当铺已经关门，而他又想搭明天第一班车走，便预备去找街坊上一个卖旧货的想办法，不料一出门就在楼梯上遇见了莫克。莫克知道了这些事，立刻表示奥里维没有去找他使他非常难过，他硬要奥里维接受他的钱。但他还是介介于怀，因为奥里维为了筹措克利斯朵夫的川资，当掉了表，卖掉了书，而没有向他开口。他那么热心的要帮助他们，甚至向奥里维提议陪他一同上克利斯朵夫那边去。奥里维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了。

奥里维的来到使克利斯朵夫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持。他陪着长眠的母亲，失魂落魄的过了一天。帮忙的女工来做了几件零碎事儿又走了，没有再来。整天死气沉沉的，仿佛时间停顿了。克利斯朵夫跟床上的遗骸一样的一动不动，眼睛老盯着她。他不哭，不想，也变了个死人了。——奥里维的来到，等于完成了一件友谊的奇迹，使他的眼泪和生命一齐回复了。

勇敢啊！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他们拥抱了很久。然后两人坐在鲁意莎旁边低声谈话……夜里……克利斯朵夫靠着床脚，随便提到些童年往事，说来说去老是牵涉到妈妈的形象，他静默了几分钟，又往下说。最后他疲倦之极，手捧着脸，完全不出声了。奥里维近前一看，原来他睡熟了。于是他独自守夜。不久他脑门靠着床架子，也给睡眠带走了。鲁意莎温柔的笑，好像守护着两个孩子觉得很快乐。

天刚亮，他们就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克利斯朵夫去开门。一个邻居的木匠来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已经被人告发，如果他不愿意被捕，应当马上就走，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逃，定要把母亲送入了坟墓才离开。可是奥里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答应一切后事都由他代办；他硬逼着克利斯朵夫走出屋子，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还送他上车站。克利斯朵夫执意要在动身之前去看看莱茵河。他是在河边长大的，他的灵魂像海洋中的贝壳一样始终保存着河水响亮的回声。虽是在城中露面很危险，但他打定了主意，不顾一切。两人沿着下临莱茵的巉岩走去，看它浩浩荡荡，在低矮的河岸中间向北流去。雾霭迷濛，一座大铁桥的两个穹窿浸在灰色的水里，好比硕大无朋的车轮。远远的，隔着草原，薄雾中隐隐约约有几条船沿着曲折的河道上驶。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景致出神了。奥里维抓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车站。克利斯朵夫像害了梦游病似的完全听人摆布。奥里维把他安顿在升火待发的车厢里，约定下一天在法国境内第一个车站上相会，免得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回巴黎。

火车开了，奥里维回到屋里，门口已经有两个宪兵等着。他们把奥里维当做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也不急于分辩，好让克利斯朵夫逃得远一些。而且警察当局发觉了错误的时候并不着慌，也不急于去追逃掉的人：奥里维疑心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克利斯朵夫走掉的。

奥里维为了鲁意莎的葬事，直耽到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洛陶夫，当天才来参加丧礼。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的送过殡，马上搭车走了，对奥里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后事的话。奥里维在当地又耽留了一些时候。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小克利斯朵夫，小克利斯朵夫所爱的人，使他受苦的人，——还有那亲爱的安多纳德。所有这些在此生存过的人，现在完全消灭了的

克拉夫脱一家，还留下些什么？……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

那天下午，奥里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利斯朵夫相会了。那是林木幽密，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孤独，便在静悄悄的森林中走去，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岗上一片空旷的地方。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有所看守树林的人的屋子，顶上盖着红瓦，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汽包裹着。雾气在柏树枝间缭绕。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返盖了，把颜色减淡了。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脚声，没有人声。秋天的样树都变了金黄色，几点雨水淅淅沥沥的打在树上。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停下脚步，呆住了。各人都想着自己的丧事。奥里维默默的对自己说着：

“啊，安多纳德，你在哪儿？”

克利斯朵夫却想着：“现在她不在世界上了，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

但各人听见各人的死者安慰他们：

“亲爱的，别哭我们了。别想我们了。你想着他罢……”

他们彼此瞧了一眼，马上忘了自己的痛苦，而只感觉得朋友的痛苦。他们握着手，心中只有一片凄凉恬静的境界。没有一点风，雾气慢慢的散了，显出了青天。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它把我们抱在怀里，堆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

“休息罢。一切都很好……”

克利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两天以来，他整个儿在回忆中，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单调而孤独的岁月，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想念那些把她丢下的儿子……可怜的老妇，残废，勇敢，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生就温和的脾气，恬然自得的忍受着一切，没有一点儿自私……克利斯朵夫也想起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这时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在骚动的巴黎，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克利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对于自私的争战，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掀风作浪的野心家，深深的感到厌倦。他所爱的却是成千累万的淳朴的心灵——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的燃烧着，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代表慈悲，信仰，牺牲。

“是的，我认得你们，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我早先像浪子一般离开了你们，跟着大路上的那些影子走了。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请你们把我留下罢。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噢！母亲，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如今是你生活在我身上了。还有你们，高脱弗烈特，苏兹，萨皮纳，安多纳德，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你们是我的财富。咱们一同上路罢。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凭着你们联合的力量，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树上缓缓的滴着雨水，一道阳光从树枝间溜进来。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像欢送蔷薇的异香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

“噢！和平，你是神圣的音乐，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苦，乐，生，死，敌对的民族与友爱的民族，一齐交融在你身上……噢！我爱你，我要抓

住你，我一定能抓住你…… ”

黑夜降临了。克利斯朵夫从幻梦中醒来，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他对他笑笑，把他拥抱了。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悄悄的重新上道，克利斯朵夫在前面替奥里维开路。

孤零零的，不声不响，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

卷八·女朋友们

女朋友们

虽然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点声望，两位朋友的境况并没好转。每隔一个时候，总有些艰苦的日子使他们不得不束紧裤带。有了钱，他们便拼命吃一个饱，补偿过去的饥饿。但日子久了，这种饮食的习惯究竟是伤身体的。

此刻他们又逢着穷困的时期。克利斯朵夫熬着夜替哀区脱做完了一件乏味的改谱工作，到天亮才上床；他纳头便睡，以便找补那损失的时间。奥里维清早就出门，到巴黎城的那一头去教课。八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来打铃了，平时他按铃不应就把信塞在门下。这天早上他却继续敲门。克利斯朵夫倦眼惺忪，叽叽咕咕的去开门，完全没注意门房微笑着，唠唠叨叨跟他讲起报上的一篇文章，他拿了信，连瞧也不瞧一眼，把门一推，没关严就上了床，一下子又睡着了。

过了一小时，他又被屋子里的脚声惊醒了：他看见床前有个陌生人对他很郑重的行礼，大禁大为诧异。原来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大门开着，便老实不客气走了进来，克利斯朵夫愤愤的从床上跳起，嚷道：“你来干什么？”

他抓起枕头往客人扔过去，客人赶紧退了一步，说明来意，自称为《民族报》的记者，为了《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特意来访问克拉夫脱先生。

“什么文章？”

“你先生没看到吗？”记者说着，便自告奋勇把那篇文字的内容告诉他。

克利斯朵夫重新躺下，要不是瞌睡得迷迷糊糊的话，他早就把来人赶出去了，但他觉得让来人说话究竟没有把他驱逐来得费力。他便钻入被窝，闭上眼睛，装做睡觉。他很可能弄假成真的睡去。可是来客非常固执，提高着嗓子，开始念文章了。听了最初几行，克利斯朵夫就竖起耳朵，人家把克拉夫脱先生说做当代第一个音乐天才。克利斯朵夫把假装睡觉的事忘了，大惊小怪的咒了一声，在床上坐起，说道：“他们疯了。难道他们着了魔吗？”

记者趁此机会停止了朗诵，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一大串问话，克利斯朵夫都不假思索的回答了。他捡起那篇文章，好不惊奇的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真恼了。他命令他们出去；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面貌迅速的记载下来以前，决不肯照办，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衣服也没穿好，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直送出门外，赶紧上了锁。

然而这一天他是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梳洗还没完毕，又有人敲门了，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克利斯朵夫开出门来，发见又是个陌生人，他决意直截了当的把他打发走，不料来人立刻分辨说，他就是今天报上那篇文字的作者。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有什么办法拒绝呢？克利斯朵夫懊恼之下，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奇怪这种声名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头上，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察党的杰作？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报馆：大名鼎鼎的阿塞纳·伽玛希等在那里要见他，汽车已经在楼下了。克利斯朵夫推却了一番；但对于人家好意的邀

请，他是天真的，却不过情面的，终于不由自主的听人摆布了。

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的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之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像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页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病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的发觉居然有人听他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的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的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留量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么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齐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见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决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

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月下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那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德漠克拉西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德漠克拉西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白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的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的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

“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末你去念一遍罢。”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喝！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搅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你“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教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

“狗东西！他们竟要教人把我当作自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都是行家，为本行增光的。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那可受不了……

“我要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的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的佩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胆怯鬼。”

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克利斯朵夫可并不。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的说过好些话。当时他无拘无束的，对人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戒心：他觉得他们多诚恳，对他多好！这倒是真的，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嘻嘻哈哈的俏皮话，老筵式的胃口，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宏量，使伽玛希觉得很对劲，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结实，粗野，血色挺好，最瞧不起身体娇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所以很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当场向克利斯朵夫提议，把他的《伽尔刚多阿》编成歌剧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艺术的顶点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狱》或九阙交响乐搬上舞台。——克利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哈哈大笑：好容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据伽玛希说，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这个提议使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就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玛希，听了很高兴。克利斯朵夫喝多了酒，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此刻经奥里维一问，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直打寒噤。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现在没有了酒意，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好像已经发生了：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被人登在攻讦阴私的报纸上，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

事实果然和克利斯朵夫预料的一模一样。他所泄漏的私事被发表了，更正的信可没有登出来。伽玛希只教人传话，说他知道克利斯朵夫心胸宽大，这种有良心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但伽玛希把他有良心的作风守着秘密，而硬派作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却继续传播开去，先在巴黎的报上，继而在德国的报上，引起尖刻的批评，出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于祖国发表这样有失身分的言论，简直动了公愤。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声明他对于德

《浮士德入地狱》为裴辽士名作。九阙交响乐系指贝多芬的全部交响乐。

参看卷五：《节场》。——原注

国政府是爱护的，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的自由。——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

“越来越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奥里维回答。“你瞧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罢。有的说他是雅各宾党，有的说他是教会派，有的说他是平民派，有的说他是保玉党。”

“嘿，贝多芬真会把他们一齐踢出去呢！”

“那末你也如法炮制就是了。”

克利斯朵夫心里很想这样做。可是他却不过那些对他亲热的人的情面。奥里维总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因为不断有人来访问；而克利斯朵夫尽管答应小心行事，结果还是有一句说一句，把脑子里想到的统统说出来。有些女记者自称为他的朋友，逗他说出他的恋爱经验。也有些来利用他毁谤这一个或那一个。奥里维回家的时候，常常发觉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

“你又胡闹了是不是？”他问。

“是啊。”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的回答。

“你这个脾气竟没法改吗？”

“我真该教人关起来才好……可是，我向你赌咒，这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是这么一套……”

“不，不，我决不再犯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洋洋的告诉奥里维：“又来了一个。被我撵走了。”

“别过火，对付他们得非常小心。这畜生凶得很……你一抵抗，他就攻击你……他们要报复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找到把柄的。”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把手捧着脑门。

“怎么办呢？”

“我关门的时候对他说……”

“说什么？”

“说了一句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要不是德皇的，就是皇族的……”

“该死！明天一定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

克利斯朵夫急得直打哆嗦，但他明天看到的，是关于他的屋子的描写，——其实那记者连脚也没踏进去，——另外是完全杜撰的一段对话。

消息一路传开去一路改头换面。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法国报上叙述克利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六弦琴谱，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六弦琴沿街卖唱。

他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那寸差得远呢！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他们的尊严，决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所以他们都拿他开玩笑。古那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了去而很气，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他亲昵的提起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的时期，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他说，没

有问题，克利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但是——（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是朋友）——修养不够，缺少特色，骄傲得不像话；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实在是害了他，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头脑、有服力、有学问、好意而严正的导师，——（这是古耶的自画像）。一般音乐家勉强笑着，表示极瞧不起一个有报纸撑腰的艺术家：他们装做讨厌逢迎吹拍，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有些是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是对他假装怜悯。又有些是回过头来恨奥里维——（那都是奥里维的同文）。——他们素来恨他的强硬，恨他不和他们亲近。其实他这种态度是爱好孤独的成分多，厌恶他们的成分少。某几个人还隐隐约约的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间有利可图。又有几个替克利斯朵夫抱不平，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老是做梦一般的，精力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使他迷路。他们说这种办法简直把克利斯朵夫的前途给断送了：他虽没有天才，但若用功的话还能有点儿成就，现在被人家的巧言令色冲昏了头脑，岂不可怜！难道人们不能让他无声无臭的耐性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谁给他面包呢？”

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的回答说：“这个吗，不过是小节。人是应当受苦的。”

当然，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回答说：“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尔德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尔德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写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伽尔刚多阿》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寄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裸体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咕嘟着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现在也轮到我了，告诉你！我也要去玩玩了！”

“你去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是克利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并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在那些夜会里，他照旧厌烦，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但他回家故意卖弄狡狴，对奥里维说着相反的话。他到处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去两回；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用着骇人的满

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教奥里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克利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声名，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声音，色彩，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的调色板充实一次。一个音乐家的营养决不能以音乐为限。一句说话的抑扬顿挫，一个动作的节奏，一个和谐的笑容，都可以比一个同业的交响乐给你更多的音乐感应。不幸沙龙里那些面貌那些心灵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同样枯索，同样单调。各人有各人固定的姿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微笑，那种刻意研求的妩媚，和一支巴黎曲调同样是印板式的。而男人比女人更无聊。萎靡的风气使一般刚强的人物化为泡沫，特出的个性很快的软化了，消灭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艺术家中已死的与将死的人太多了：某个青年音乐家朝气蓬勃，天分极高，结果竟被荣名压倒，只想呼吸那种毒害他的谄媚逢迎的空气，只想享乐，只想睡觉。他二十年后的模样，只要看那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知道：有钱，有名，一身兼了所有的学士院的会员，登峰造极，似乎用不着再怕什么敷衍什么，而他却对所有的人低头，怕舆论，怕政府，怕报纸，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并且也不再思想，不再存在，只像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般在人前展览。

而在从前曾经伟大或是可能伟大的那些艺术家和有识之上后面，一定有个女人在腐蚀他们。她们都是危险的，不管是蠢的或是不蠢的，爱她们的或只爱自己的；最好的女子其实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目光浅陋的感情更容易毁掉艺术家，她们一心要驯服天才，把他压低，把他删除，剪削，搽脂抹粉，直要这天才能够配合她们的感觉，虚荣，平凡，并且配合她们来往的人的平凡才甘心。

克利斯朵夫虽是在这个社会里不过走马看花，但看到的已经足以使他感到危险。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不止一个，克利斯朵夫对于低颦浅笑的勾引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要不是他有见识，要不是看到周围那些可怕的榜样，他可能逃不过的。但他并不想替那般看守呆子的美女扩充她们的羊群。倘若她们不是紧紧的钉着他，他所冒的危险倒反更大。大家一朝相信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天才的时候，照例要来摧残他的。这般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把它摘下插在瓶里，——看到一头鸟就想把它关在笼里，一看见一个自由人就想把他变成奴隶。

克利斯朵夫迷惑了一会儿，马上振作起来，把他们一古脑儿丢开了。

运命老是耍弄人的。它会让一般粗心大意的人漏网，但决不放过那些提防的，谨慎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投入巴黎罗网的倒并非克利斯朵夫而是奥里维。

他的朋友的成功使他沾到好处：克利斯朵夫声名的光彩也射到他身上。他此刻比较出名了，不是为了他六年未所写的文章，而是为了他发见克利斯朵夫，所以克利斯朵夫被邀请的时候也有他的分；他陪着克利斯朵夫去，存着暗中监督的意思。但大概他大专心于这件任务了，来不及再顾到自己。爱神在旁边经过，把他带走了。

那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少女：清瘦，妩媚；细致的卷发，像波浪般围着她的狭窄而神情开朗的额角，淡淡的眉毛，沉重的眼皮，碧蓝的眼睛，玲珑的鼻子，微微翕动的鼻孔，有点凹陷的太阳穴，表示任性的下巴，清秀而肉感的嘴，嘴角向上，很有风韵的笑容仿佛是纯洁的田野之神的笑容。她的脖子

长得又长又细，身材细小而苗条，年轻的脸显得很快活，也有点若有所思的神气，笼罩着初春的恼人的迷。——她叫做雅葛丽纳·朗依哀。

她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家庭是信旧教的，有钱，高尚，头脑很开通。父亲是个聪明的工程师，心思灵巧，做事能干，胸襟宽广，能够接受新思想。他靠了工作，靠了政治关系，靠了他的婚姻，挣了一笔财产。太太是金融界里一个十足巴黎化的漂亮女人，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爱情的结合。也可以说是金钱的结合，——在这般人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结合，金钱是保留了，爱情可是完了。但遗留下一些残余的光辉，因为双方当年都是很热烈的，可是他们并不过分的自命为忠实。各于各的事，各寻各的快乐，彼此照旧很投机，像两个自私自利的好伙计一样，一方面觉得问心无愧，一方面也很谨慎。

女儿是他们中间的桥梁，同时是暗中争夺的对象：因为他们都非常疼她。各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面目，自己的缺陷，——那是各人特别喜欢而被儿童的妩媚加以理想化了的：双方都费尽心机想把女儿抓在自己手里。这个情形自然瞒不过孩子；并且儿童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把自己当作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她尽量利用机会，刺激父母，使他们比赛谁更爱她。任何使性的行为，倘使一个表示反对，她有把握得到另外一个的赞许：而早先那个反对的因为自己被疏远而气恼，会进一步答应更多的条件。这样她就受着过分的溺爱，幸亏她天性中没有什么坏的成分。——当然她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很自私，但因她太受宠大有钱了，从来没遇到阻碍，所以她的自私更带点病态的意味。

朗依哀夫妇虽然疼女儿疼到极点，可决不为她牺牲一些他们个人的方便。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儿。因此她并不缺少幻想的时间。由于早熟，由于人们当着她的面说的不加检点的话——（他们并不为地而有所顾忌），——她六岁的财候就对拿在手里玩的小娃娃讲着恋爱的故事，其中的人物是丈夫，妻子，情人。不用说，她这是没有邪念的。等到有天她顺模到说话后面有着感情的影子，她的故事就不拿小娃娃做对象而给自己保留起来了。她天真无邪，可是欲魔已经在远远的叫吼，仿佛在地平线那一边的、看不见的远钟，有时风中传来几阵声音。不知从哪儿来的，只觉得自己被它包裹了，脸红了，又害怕又快活的喘不过气来。但你对这种情形完全莫名其妙，随后声音没有了，像来时一样的突兀。什么都听不见了。仅仅有些嗡嗡声，隐隐约约的回音，在碧蓝的天空融化。你只知道应当上那边去，在山的那一面，越快越好：幸福就是在那个地方。啊！要到了那儿才好呢！……

没到达以前，她对于那边的情形想入非非的作着种种猜测。以这个女孩子的头脑而论，要猜到那未来的境界简直是桩大事。她有位年龄相仿的女朋友，西蒙纳·亚当，常常跟她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各人拿出十二岁上的聪明与经验，听到的谈话和偷看的书作参考。两个小姑娘提着足尖，抓着石头，想从旧墙上瞻望自己的前途，但她们白费气力，以为从墙缝中窥到了什么，其实是一无所见。她们天真烂漫，便是淘气也不无诗意，同时也有巴黎人喜欢嘲弄的脾气，她们说了野话而完全没觉得，并且拿小事看做天一样大。可以在家到处搜索而无人敢阻止的雅葛丽纳，把父亲的书都翻遍了。幸而她的无邪与纯洁的本能，使她没有受什么坏影响：只要一幕稍稍露骨的景象，一句稍微放肆的话，她就不胜厌恶，立刻把书扔掉了，她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有如一头小猫在脏水洼里跳出来，居然没沾到泥浆。

小说并不怎么吸引她：那太明确太枯索了。使她心儿颤动而怀着希望的，

却是诗人的——当然是谈爱情的诗人的——作品。这等诗人的气质和女孩子的很接近。他们看不见事实，只从欲望或悔恨的三棱镜中想象事实；他们的神气就像她一样伏在旧墙的隙缝中眺望。但他们知道的事多得很，凡是应该知道的都知道，而且他们用着非常甜蜜与神秘的字眼把它们包裹着，你得小心翼翼的揭开来才能找到……找到……啊！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可是永远在就要找到的关头……

两个好奇的孩子一点都不厌倦。她们彼此轻轻的念着阿尔弗莱·特·纓塞和苏利·普吕东的诗句，打着寒噤，以为那就是邪恶的深渊。她们把诗抄下来，互相推敲某些段落的隐藏的意义，而有时根本没有什么隐藏的意义。这些十三岁的小妇人，无邪的，荒唐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可半嘻笑半正经的讨论着爱情与肉欲；她们在课室内当着和善可欺的教负的面，——一个挺柔和挺有礼貌的老头儿，——在吸墨纸上涂些有天被他抄到而为之错愕的诗句：

让我，噢！让我紧紧的搂抱你，
在你的亲吻里喝着狂乱的爱情
一点一滴的，长久的！……

她们进的学校是富家子女上学的学校，教员都是教育界里的名流。在这儿，她们的感情可有了发泄的机会。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钟情于她们的教授。只要他们年轻，长得不太难看，就可使她们神魂颠倒。她们把功课做得挺好，为的要讨她们的偶像喜欢。作文卷子的分数差了一些，她们就得哭一场；被老师赞美几句，她们脸上便红一阵白一阵，还要对他丢几个感激而卖俏的眼风。要是给叫到一边去指点什么或夸奖一番，那简直快乐得像登天一样了。并且要她们喜爱，也无须怎么了不起的人才。教师在体操课上把雅葛丽纳抱到秋千架上的时候，她会浑身发热。此外又有多么剧烈的竞争！多少嫉妒的心理！一个又一个的眼风向老师丢过去，多么谦卑，多么迷人，想把他从一个骄横的情敌手里抢过来！他在教室里一开口，钢笔与铅笔就像飞一般的忙起来。她们并不求理解，主要是不能听漏一个字。她们一边写，一边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注意偶像的脸色和举动，雅葛丽纳和西蒙纳彼此轻轻的商量：“你想他用一条蓝点子的领带好看不好看？”后来她们又拿些彩色画，荒诞不经的诗句，风花雪月的插图，作为理想人物的根据，——恋着优伶，演奏家，过去的或现存的作家，一忽儿是摩南一舒里，一忽儿是萨曼，一忽儿是特皮西。想到在音乐会中，沙龙里，街道上，和一些陌生的青年交换的眼风，她们脑筋里马上会组织起一些爱情故事。总之，心里永远需要爱，需要有个爱的借口。雅葛丽纳和西蒙纳彼此无话不谈；这就证明她们并不真有多少感情；并且这也是使自己永远没有深刻的感情的好办法。可是这等心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她们自己虽然觉得好笑，暗中却在加意培植。两人互相刺激，西蒙纳颇有许多想入非非的念头，但实际是谨慎的。真诚而热烈的雅葛丽纳倒更容易把荒唐的计划实地去做。她不知有多少次差点儿闹出大笑话来……这是少年人常有的情形：有时候，这般可怜的受惊的小动物——（我们都经历过这阶段），——不是差一点自杀，就是差一点投入随便碰到的一个人的怀里，可是徼天之幸，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至此为止。雅葛丽纳起了十多封情书的稿子，想寄给那些仅仅见过一面的人；结果都没寄出，除了一封

非常热烈的不署名的信，给一个其丑无比的，俗不可耐的，自私的，无情的，头脑狭窄的批评家，她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看到有二三行富于感情的表现，就对他倾心了。她也迷着一个住在近边的名演员；每次走过他的屋子心里总想：“要不要进去呢？”

有一回她竟大着胆子走到他住的那层楼上，一到那儿，她却立刻逃了。她能和他说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并不爱他。她也明明知道，这种疯癫一半是有意哄骗自己，另外一半是需要爱，那是永远少不了的，又甜美又愚蠢的需要。既然雅葛丽纳很聪明，这些她都明白。可是她并不因此而疯癫。一个心中明白的疯子抵得两个。

她常常出去交际。许多青年都为她着迷，到处有人巴结她，而爱她的也不止一个。她一个都不爱，却和所有的男人调情。她并不把自己可能给人家的痛苦放在心上。一个美貌的少女是把爱情当作一种残忍的游戏的。她认为人家爱她是挺自然的，可是她只对自己所爱的人负责；她真心的相信：谁爱上她就够幸福了。这也难怪，因为她虽然整天想着爱情，其实对爱情一无所知。大家以为在暖室里长大的上流社会的少女，总比乡下女子早熟；实际正是相反。看到的书，听到的话，使她念念不忘于爱情，而在她游手好闲的生活中，这念念不忘的心情竟变成了一种嗜好；她有时把一个剧本念熟了，所有的字句都能背了，结果对内容反而毫无感觉，在爱情方面像艺术方面一样，我们不应该去念别人说的话，而应该说出自己的感觉，要是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急于说话，可能永远说不出东西来。

因此，雅葛丽纳像多数的女孩子一样，靠着别人的感情的残灰余烬过生活，那些灰烬虽然替她维持着骚动的心情，使她双手发热，喉咙干涩，眼睛作痛，可是也使她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她自以为认识它们。她并不缺少意志。她尽量的看书，听人家的谈话，东鳞西爪的得了不少知识，甚至也努力省察自己的心。她比周围的人高明，因为她更真。

有一个女子给了她很好的影响，可惜时间太短。那是她父亲的一个不出嫁的姊妹，叫做玛德·朗依哀，年纪在四十至五十之间，长得五官端正，可是表情忧郁：谈不到什么美；她永远穿着黑衣服，举动大方而有点局促，很少说话而声音极低，要没有那双灰色眼睛的清明的目光，和哀怨的嘴角上那个慈祥的笑容，人家简直不会注意到她。

她只在某些没有外客的日子才在朗依哀家露面。朗依哀对她很敬重，心里却有点厌烦。朗依哀太太对丈夫老实表示对她的访问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为了礼数关系，每星期留她在家吃一顿饭，表面上也不露出敷衍的意味。朗依哀谈着自己的事，那是他永远感到兴趣的。朗依哀太太想着别的事，照例笑盈盈的，回答的话常常莫名其妙。彼此相处得很好，礼貌非常周到。并且当知趣的姑母出人意外的提早告退的时候，也颇有些亲热的表示，有些日子，朗依哀太太想到一些特别愉快的往事，她的迷人的微笑便越发显得光彩奕奕，玛德姑母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兄弟家中很有些教她受不了或心里难过的事。但她绝对不露声色：表示出来有什么用呢？她爱她的兄弟，对他的聪明与成就很得意；跟老家里其余的人一样，她认为当初的牺牲和长子现在的成就比较之下，并不算付了过高的代价。但她至少对他保持着批评精神。和他一样聪明，精神上比他更坚实更刚强，——（法国很多女人都比男人高明，）——她把他看得很明白；他征求她意见的时候，她会老老实实说出来，可是朗依哀久已不来请教她了！他认为最好是不要知道那些意见，或者是——（因

为他和她一样明白)——闭上眼睛。她为了高傲,远远的躲在一边。谁也不关切她的内心生活。大家觉得还是不知道更方便,她过着独身生活,难得出门,只有根少的几个并不十分亲密的朋友。她不难利用兄弟的交际和自己的才能,但她并不利用。她在巴黎有名的杂志上写过两三篇关于历史和文学的文章,那种朴素,确切,特殊的风格曾经受到注意。她可是至此为止。和一般关切她而她也乐于认识的优秀人士,她很可能交些有意思的朋友。但他们尽管表示亲近,她只是不理,有时她在戏院定了座,预备去看她心爱的作品上演,结果竟没有去:而在能够作一次她所喜欢的旅行的时候,临了还是留在家。她的性格是禁欲主义和神经衰弱的奇怪的混合物。但神经衰弱绝对没有损害到她思想的淳朴。她的生命是受伤了,精神却并没有。唯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一个旧创,在她心上留下了痕迹。而更深刻更暧昧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是命运的烙印,是已经在那里摧残她的潜伏的痼疾。——然而朗依哀一家只看见她那双有时使他们难堪的雪亮的眼睛。

雅葛丽纳在无愁无虑的快乐的时候,——这是她幼年的正常状态——根本不大注意到姑母。但她到了一个年纪,身心都骚动起来,使她在莫名其妙的神魂颠倒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久,但觉得自己要死去一般的时间,尝到了悲苦、厌恶、恐怖、郁闷的滋味,——像个孩子淹在水里而不敢喊救命的时候,那她在身旁就只看见玛德姑母对她伸着手了。啊!其余的人和她离得多远!父母都像外人似的,面上亲切而实际自私,又是那样自满,哪有心思来理会一个十四岁的小娃娃的悲伤!但姑母是懂得的,并且和她表示同情。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非常纯朴的笑笑,隔着饭桌对雅葛丽纳挺和善的瞧一眼。雅葛丽纳觉得姑母了解她,便躲在她身旁。玛德不声不响,只拿手摩着雅葛丽纳的头。

于是她信赖姑母了,心中一不好过就去访问这位好朋友。不论什么时候去,她有把握可以遇到同样宽容的眼睛,把它们恬静灌注一部分到她心里。她并不和姑母提起她幻想的罗曼史,那她要觉得害羞的,她也感到那绝对不是真的。但她说出她渺渺茫茫的,深刻的,更实在的苦闷。

“姑妈,”她有时叹了口气说,“我多么愿意幸福啊!”

“可怜的孩子!”姑妈微微笑了笑。

雅葛丽纳把头枕在她膝上,吻着那抚摩她的手:“我将来能幸福吗?姑妈,告诉我,我将来能幸福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一半要靠你……一个人愿意幸福的时候一定会幸福的。”

雅葛丽纳表示不信。

“那末你幸福吗?你?”

玛德凄凉的笑笑:“幸福的。”

“可是真的?你可真是幸福的?”

“难道你不信吗?”

“信是信的。可是……”雅葛丽纳停住了。

“怎么办呢?”

“我要幸福,可不是像你那种方式的。”

“可怜的孩子!我也希望如此,”玛德说。

“真的,”雅葛丽纳坚决的摇摇头,继续说,“像你那样,我先就受不了。”

“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受得了。可是有许多办不到的事，人生会教你办得到。”

雅葛丽纳听了不大放心，回答说：“噢！我可不愿意学这一套，我要的幸福一定得合我自己心意的那种。”

“可是人家问你究竟要怎么样的幸福，你就答不出了。”

“我很知道我要什么。”

她要的事多得很。可是要她举出来，她只找到一件，翻来覆去像复唱的歌辞一样：

“第一，我要人家爱我。”

玛德不出一声，做看针线。过了一会，她说：“倘使你不爱人家，单是人家爱你有什么用？”

雅葛丽纳楞了一楞，回答：“可是，姑妈，我说的当然是限于我所爱的人！其余的都不算的。”

“要是你一无所爱又怎么办呢？”

“你这话好怪！一个人总是有所爱的。”

玛德摇摇头，表示怀疑。“一个人并不能真爱，只是心里要爱。爱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德，最大的恩德，你得求他赐给你。”

“倘使人家不爱我呢？”

“人家不爱你，你也得这样。你会因之更幸福。”

雅葛丽纳拉长着脸，装出气恼的模样：“我可不愿意，我对这个一点不感兴趣。”

玛德很亲热的笑了，望着雅葛丽纳叹了口气，随后又做她的活儿。

“可怜的孩子！”她又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老说可怜的孩子？”雅葛丽纳不放心的问。“我不愿意做个可怜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幸福呢！”

“就因为此我才说：可怜的孩子！”

雅葛丽纳有些恼了。但不久也就过去了。姑母笑得那么尽兴，使她沉不下脸来。她一边假装生气一边拥抱她。其实，一个人在这个年龄上听到自己将来——在很远的将来——会有点儿悲哀的事，反而是得意的。从远处看，人生的不幸还很有诗意呢；一个人最怕庸庸碌碌的生活。

雅葛丽纳完全没觉察姑母的脸色越来越惨白，只注意到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以为那是她喜欢待在家里的怪脾气，雅葛丽纳还常常因之取笑她。有一两次她去探望的时候，碰到医生出门。她就问姑母：“你病了吗？”

姑母回答：“只是一点儿小病。”

可是她连每星期上朗依哀家吃一顿饭都不去了。雅葛丽纳气忿忿的去质问她。

“好孩子，”玛德很温和的说，“我累了。”

雅葛丽纳不相信，以为是推托。

“哼，每星期上我们家来两小时就累了吗？你不喜欢我。你只喜欢呆在你那个火炉旁边。”

她回家得意洋洋的把这些刻薄话讲出来，不料立刻被父亲训了几句：

“别跟姑妈去烦！你难道不知道她病得很凶吗？”

雅葛丽纳听着脸都白了；她声音颤抖的追问姑母害了什么病。人家不肯告诉她。最后她才知道是肠癌，据说姑母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

雅葛丽纳心里害怕了好几天，等到见了姑母才宽慰一些。玛德还算运气，并不太痛苦。她依旧保持着安详的笑容，在透明的脸上映出内心的光彩。雅葛丽纳私下想：

“大概不是吧，他们弄错了，要不然她怎么能这样安静呢？”

.....

她又絮絮叨叨的讲那些心腹话，玛德听了比从前更关切了。可是谈话中间，姑母有时会走出屋子，一点不露出痛苦的神色：她等剧烈的疼痛过去了，脸色正常了，才回进来。她绝口不提自己的病，竭力掩饰；也许她不能多想它；她明明知道受着病魔侵蚀，觉得毛骨悚然，不愿意把思想转到这方面去；她所有的努力是在于保持这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恬静。可是病势出人意料的急转直下。不久她除了雅葛丽纳以外不再接见任何人。后来雅葛丽纳探望的时间也不得不缩短。后来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姑母躺在几星期来没离开过的床上，跟小朋友告别：说了许多温柔与安慰的话。然后她关起门来等死。

雅葛丽纳有几个月功夫非常痛苦，姑母死的时候，她正经历着精神上最苦闷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之下能支持她的原来只有姑母一个人。此刻她可孤独到极点。她很需要一种信仰做倚傍。从表面上看，这种倚傍似乎不会缺少的：她从小就奉行宗教仪式：她的母亲也是的。但问题就在这儿：母亲是奉行仪式的，玛德姑母却并不：怎么能不把她们做比较呢？大人们视若无睹的谎言逃不过儿童的眼睛，他们很清楚的看到许多弱点与矛盾。雅葛丽纳发觉母亲跟一般自称信仰宗教的人照旧怕死，仿佛没有信仰一样。真的，靠宗教是不够的.....此外，还有些个人的经验，反抗，厌恶，一个笨拙的忏悔师伤害她的说话.....都使她怀疑宗教。她继续上教堂去，可是并无信仰，只像拜客一样，表示自己有教养。她觉得宗教像世界一样空虚。唯一的救星是对于死者的回忆，她把她完全裹在身上了。她悔恨当初不该逞着青年人自私的脾气而忽视姑母，如今是叫也叫不应了。她把她的面目理想化：而玛德留下的深刻的韬晦的生活榜样，使她讨厌社会上那种不严肃不真实的生活。她眼中只看见它的虚伪；而那些可爱的诱惑，在别的时间会使她觉得好玩的，此刻却使她深恶痛绝。她患着神经过敏症。无论什么都会教她痛苦，她的意识一点儿不受蒙蔽。凡是一向因为漠不关心而没注意到的事，她现在统统看到了。其中有一件竟把她伤害入骨。

有天下午，她在母亲的客室里。朗依哀太太正在见客，——一个时髦画家，装腔作势的小白脸，是她们家的熟客，但并非十女知己的朋友。雅葛丽纳觉得自己在场使母亲跟客人都方便，因为她愈加留着不去了。朗依哀太太有点儿不耐烦，轻微的偏头痛使她昏昏沉沉，再不然被今日的太太们像糖果一般咬着的头痛九搅糊涂了，不大留神自己的话，她无意之间把客人叫做“我的心肝.....”

她立刻发觉了。他也和她一样的不动声色。两人继续用客气的口吻谈下去。正在一旁沏茶的雅葛丽纳心中一震，差点儿把一只杯子滑在地下。她感觉到他们在背后交换着会心的微笑。她转过身来，果然看到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一下子就给遮掩过去了。——这个发见把她吓坏了。雅葛丽纳从小过着放任的生活，不但常常听到这一类的玩艺儿，她自己也会嘻嘻哈哈的提起的，可是这一回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看见她的母亲.....她的母亲，那事情可不同了！以她惯于夸大的性情，她从这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至此为止，她对什么都不猜疑的。从今以后，她对一切都猜疑了。她想着母

亲过去的行为，推详某些小节。没有问题，轻佻的朗依哀太太犯嫌疑的地方太多了，但雅葛丽纳还要加些上去。她很想接近父亲；他跟她一向比较密切，而他的聪明也对她很有吸引力。她愿意多爱一些父亲，对他表示同情。可是朗依哀似乎不需要人家为他抱怨；于是这神经过敏的少女又起了疑心，比对母亲的猜疑更可怕，就是说父亲是什么都明白的，但认为假作痴聋更方便；只要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别的事他都不放在心上。

于是雅葛丽纳觉得没希望了。她不敢鄙薄他们。她爱他们。可是她在这儿过不下去了。西蒙纳的友谊对她并没帮助，她很严厉的批判她从前的伴侣的弱点，对自己也不随便放过，看到自身的丑恶与平庸大为痛苦，只无可奈何的回想着纯洁的姑妈。但这些回忆也慢慢的消失了；时间的洪流把它们淹没了，把它们的痕迹洗掉了。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要完的，她将来要跟别人一样的掉在污泥里……噢！无论如何都得跳出这个世界！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就在这个又狂乱又孤独、又厌世又热烈的时期，抱着神秘的等待的心情、向着一个无名的救主伸手乞援的时候，雅葛丽纳遇到了奥里维。

朗依哀太太和大家一样邀请了那个冬天走红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来了，照例不想讨人喜欢，朗依哀太太可仍旧觉得他可爱：——只要在当令的时候，他拿出无论什么态度都可以；人家总觉得他可爱的；这往往是几个月的事，雅葛丽纳并不觉得他怎么了不起，克利斯朵夫受到某些人的恭维先就使她不信任。何况他粗鲁的举动，高声的说话，快活的心情，都教她看不上眼。以她那时的心境，生活的兴致显得是鄙俗的；她所追求的是凄凉的，半明半暗的境界，自以为喜欢这个境界。克利斯朵夫身上的光太强了。但他谈话之间提起了奥里维：他需要把他的朋友跟他一切愉快的遭遇连在一起。他把奥里维说得那么有意思，使雅葛丽纳以为看到了一个合乎理想的人物。她要母亲把奥里维也邀请了。奥里维并不马上接受：而在他姗姗来迟的那个时期之内，克利斯朵夫和雅葛丽纳更能从从容容的描成一个幻想的奥里维的肖像，而等到他决意应邀而来的时候，真正的面目跟那幻想的图画也不会不像了。

他来了，可很少说话，也不需要说话。他的聪明的眼睛，他的笑容，他的文雅的举止，浑身上下那种光辉四射的恬静，自然把雅葛丽纳迷住了。再加有克利斯朵夫在旁边做对照，更烘托出奥里维的妙处。但她脸上全无表示，因为怕正在心中萌动的感情；她继续跟克利斯朵夫谈话，谈的都是奥里维的事。克利斯朵夫能够谈到他的朋友，得意极了，根本没注意雅葛丽纳听得津津有味。他也提到自己，而她虽然毫无兴趣，也殷勤的听着，随后又不着痕迹的把话题扯上跟奥里维有关的故事。

雅葛丽纳的风情对于一个不自警戒的人是很危险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已经给她迷住了：他喜欢常常到她家里去，开始注意自己的装束；他熟识的那种感情又笑咪咪的混入他所有的幻想中来了。奥里维从最初几天起也入了迷，以为对方冷淡他，暗中很难过。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把自己和雅葛丽纳的谈话告诉他听，更增加他的痛苦。奥里维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讨雅葛丽纳喜欢。虽然因为跟克利斯朵夫一起生活，他看事比较乐观了些，但仍旧没有自信；他把自己看得太清楚了，不相信会得到人家的爱。——其实，倘若一个人的被爱要靠他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靠那个奇妙与宽容的爱情，那末够得上被爱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一天晚上，他受着朗依哀家的邀请，但觉得再去看那个冷淡的雅葛丽纳太难堪了，便推说疲倦，教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去。蒙在鼓里的克利斯朵夫挺快活地去了。以他天真的自私心理，他只想和雅葛丽纳单独相对的快乐。可是他得意的时间并不久。一听到奥里维不来的消息，雅葛丽纳马上扮起一副懊丧的，气恼的，烦闷的，失望的脸；她再也不想讨人喜欢了，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只随便回答几句。他甚至非常难堪的看见她掩着嘴，不耐烦的打了个呵欠。她真想哭出来。突然之间她走出客厅，不再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不胜狼狈的回去，一路上推敲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居然看到了一点儿真相。回到家里，奥里维等着他，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气问他晚会的情形。克利斯朵夫把那桩不如意事讲给他听。他一边讲着一边看到奥里维脸色渐渐开朗起来。

“你不是累了吗？”他问。“干么不睡呢？”

“噢，我觉得好多了，”奥里维回答，“我不累了。”

“对啦，”克利斯朵夫很俏皮的说，“你今晚不去，的确使你精神恢复不少。”

他亲切的，狡狴的望了望奥里维，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到了那儿，他笑了，轻轻的，可是笑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

“坏东西！”他心里想。“她居然拿我开玩笑！而他也在要我。想不到他们俩有这一手！”

从此他把自己对雅葛丽纳的念头一齐丢开，而像孵着小鸡的母鸡一样去孵育两个小情人的罗曼史，表面上只做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也不代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向对方揭破，只在暗中帮助他们。

他一本正经的以为自己的责任应当把雅葛丽纳的性格研究一番，以便决定奥里维跟她在一起是否能幸福。因为笨拙，他就向雅葛丽纳提出许多古怪的问话使她气恼，有的是关于趣味方面的，有的是道德方面的……

“岂有此理！他这样问长问短是什么意思？”雅葛丽纳愤愤的转过背去想。

奥里维看见雅葛丽纳不再关切克利斯朵夫，高兴极了。而克利斯朵夫看见奥里维高兴也高兴极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快乐表现得比奥里维更露骨。雅葛丽纳看了莫名其妙，她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在他们的爱情中看得比她还清楚，所以只觉得他讨厌之极，不懂奥里维怎么能为一个这样粗俗的朋友入迷。克利斯朵夫猜到这点，有心捉弄她，惹她生气。随后他推说事忙，谢绝了朗依哀家的邀请，让雅葛丽纳和奥里维单独相处。

可是他对于前途还是很担忧，自以为对这桩酝酿中的婚事有很大的责任，心里很烦恼，因为他把雅葛丽纳看得相当准确，担心着许多事：第一是她的有钱，其次是她的教育，她的环境，尤其是她的弱点。他想起从前的女朋友高兰德。没有问题，雅葛丽纳为人更真，更坦白，更热情，对于勇敢的生活很有点向往之情，也有英勇壮烈的志愿。

“但单是有志愿还不够，”克利斯朵夫想道，“还得有魄力。”

他想把危险通知奥里维。但一看见奥里维从雅葛丽纳那边回来，眼中闪着快乐的光彩，他就没勇气开口了，心里想：“两个孩子很快活。别扰乱他们的幸福罢。”

对奥里维的友爱慢慢的使他感染到奥里维的信心。他终于相信雅葛丽纳的确是像奥里维所看到的，也是像她自己所愿意看到的那种人物。她意志多

么坚强！她爱奥里维，就是爱他不同于她和她的社会的地方。她爱他，因为他清贫，因为他在道德观念上不肯让步，因为他在社会上不善于应付。她爱奥里维爱得那么纯洁那么彻底，恨不得自己和他一样穷……有时还恨不得要自己变得丑，因为这样她可以更加肯定奥里维的爱她是为了她本身，为了她的一腔热爱，那是他渴望的……啊！有些日子，他在眼前的时节，她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她勉强嘲笑自己的激动，故意装做关心别的事，不去瞧他，用讥讽的口吻说话。可是她突然停下来，躲到卧室里去，关上门，下了窗帘，坐在那儿，两个膝盖紧挤着，交叉着手臂抱着胸部，压制自己的心跳，她凝神屏气的呆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惊散了那幸福的境界。她一声不出的把爱情紧紧抱着。

现在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只关切奥里维的成功，像母亲一样的照顾他，留心他的修饰，对他的衣著发表意见，替他打领带。奥里维很耐性的由他摆布，宁可到了楼梯上拆开领带重新打过。他心里好笑，但对这种亲切的表示非常感动。爱情使他胆怯，不敢信任自己了，所以他很愿意请教克利斯朵夫，把会面的经过告诉给他听。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的激动，有时会在夜里几小时的搜索枯肠，替朋友的恋爱设计策。

在巴黎近郊，亚当岛森林近旁的一个小地方，在朗依哀家别庄的大花园里，奥里维和雅葛丽纳有了一次确定终身的谈话。

克利斯朵夫陪着朋友一同在那里；但他在屋子里发见了一架风琴，便弹着琴，让两个人双双的散步去了。——其实他们不希望他这样。他们怕单独相对。雅葛丽纳不声不响，有点儿敌意。上次见面的时候，奥里维已经发觉她态度突然变得冷淡，目光显得残酷，甚至有敌对的意味。他看了心都凉了。他不敢盘问怕从爱人嘴里听到什么残忍的话，那天看到克利斯朵夫一离开，他心就发抖，觉得唯有克利斯朵夫在场才能使他不至于受到意料中的打击。

雅葛丽纳爱奥里维的心并没有稍减，她只有更爱他。就因为此，她对他有点儿故意。她从前当作游戏而那么渴望的爱情，此刻来了，在她面前了，但她看到它在脚下变了个窟窿，便吓得往后倒退。她弄不明白了，心里想：“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她望着奥里维，用着那种使他痛苦的目光，又想：“这男人是谁呀？”她不知道。

“我为什么爱他呢？”

她不知道。

“我爱不爱他呢？”

她不知道……不知道；但她知道她是被抓住了，被爱情抓住了，她自己将要完全消灭在爱情中间，她的意志，她的独立，她的自私，她对于未来的梦想，一切都要在这个怪物身上消灭。于是她气愤愤的跳起来，有些时候简直根奥里维了。

他们直走到花园尽处，到了有一行大树和草坪隔离着的菜园里，迈着细步在小径上走：两旁种满了红醋栗树，挂着许多红的深色的果实，还有一畦畦清香扑鼻的杨梅。时方六月，阵雨之后气候很凉爽。天空灰灰的，只有半明半暗的光，低低的云大块大块的随着风沉重的移动。但这阵来自远方的风一丝都吹不到地上来：连一张树叶都不动。无限凄凉的气息笼罩着一切，笼罩着他们的心。而在花园那一头，从那望不见的别庄的半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风琴声，奏着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的《降E短调赋格曲》。他们俩

紧挨着坐在井栏上，脸色惨白，一声不出。奥里维看见雅葛丽纳脸上淌着眼泪。

“你怎么哭啦？”他嘴唇抖动着，轻轻的问了一声。

而他的眼泪也淌了出来。

他拿着她的手。她把头靠在奥里维肩上。她不想再抗拒了，她给打败了；这才松了口气！……两人轻轻的哭着，听着音乐，沉重的云无声无息的在头上移动，仿佛就在树巅上掠过。他们想着自己过去的痛苦，——也许还想着将来的痛苦。在一个人的命运周围酝酿的哀愁，有时会由音乐突然透露出来……

过了一会，雅葛丽纳擦擦眼睛，望着奥里维。突然之间他们拥抱了。噢！无可形容的幸福！神圣的幸福！这样的甘美，这样的深邃，甚至令人感到痛苦了！……

雅葛丽纳问：“你的姊姊像你吗？”

奥里维吃了一惊：“你为什么提起她？难道你认识她吗？”

“克利斯朵夫讲给我听的……你曾经非常痛苦，可不是？”

奥里维点点头，感动得答不上话来。

“我从前也很痛苦的，”她说。

于是她讲起她的亡友，亲爱的玛德姑母，很心酸的说她曾经哭得死去活来。

“你会帮助我的，是不是？”她用着哀求的口吻说。“帮助我生活，做个好人，把可怜的姑妈做榜样！你喜欢我的姑妈吗，你？”

“她们俩我们都爱，正如她们俩也会彼此相爱。”

“可惜她们不在这儿了。”

“她们在这儿呀！”

两人紧紧抱着，连彼此的心跳都感觉到，忽然来了阵细雨，使雅葛丽纳直打寒噤。

“我们进去罢，”她说。

树荫底下差不多已经黑了，奥里维吻着雅葛丽纳潮润的头发；她向他仰起头来，他的嘴唇第一次感觉到那动了爱情的嘴唇，那种少女的灼热而有点龟裂的嘴唇，他们差点儿晕过去了。

快到屋子的时候，他们又停下来。

“以前我们多孤独啊！”他说。

他已经把克利斯朵夫给忘了。

可是他们立刻想起他。琴声已经没有了。他们走进屋子。克利斯朵夫把肘子靠在风琴上，双手捧着脑袋，也想着许多过去的事。他听见开门才从幻梦中惊醒过来，对他们和颜悦色，堆着一副庄严而温柔的笑容。他看到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经过的情形，便握着他们的手，说道：“坐下吧，让我弹些东西给你们听。”

他们坐下了，他在琴上把胸中所有的感情，对他们俩所有的爱，一齐倾诉了出来。弹完之后，三个人都一声不响。随后他站起身子瞧着他们。他的神气多么和善，比他们老成多了，坚强多了：她这才破题儿第一遭体会到克利斯朵夫的心。他把他们俩都搂在怀里，对雅葛丽纳说：“你很爱他是不是？你们都非常相爱吧？”

两人都觉得对他感激不尽。可是克利斯朵夫马上转变话题，高声笑着，

走向窗子，跳到花园里去了。

以后的几天，他劝奥里维向雅葛丽纳的父母求婚。奥里维不敢，怕遭到意料中的拒绝。克利斯朵夫同时也逼他去找个差事。假定两老答应了，奥里维在不能谋生的情形之下，就不能接受雅葛丽纳的财产。奥里维跟他一般想法，可不同意他对于跟有钱的女子结婚所抱的过分警戒而近乎可笑的态度，克利斯朵夫始终认为财富是毒害心灵的。他最喜欢引用一个哲人对一个为灵魂得救问题操心的富家妇说的话：

“怎么，太太，您有了百万家私，还想有一颗不朽的灵魂？”

“你得提防女人，”他半正经半取笑的和奥里维说，“提防女人，特别是有钱的女人！女人爱艺术，也许是真的；但她把艺术家压得透不过气来。有钱的女人可是把艺术跟艺术家都伤害了。财富是一种病。女人比男人更受不住。所有的富人都是不正常的……你笑吗？你笑我吗？哼！难道一个富翁会懂得什么叫做人生？难道他跟艰苦的现实有什么接触？他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吗？闻到过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面包的味道吗？感觉到自己胼手胝足去垦植的土地的气息吗？他懂得什么众生万物？连看都看不见呢！……我小时候有几次给人家带着坐了大公爵的马车出去玩。车子走过我每根草都熟悉的草原，穿过我独自奔驰而心爱的树林。可是那时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所有那些可爱的景致，都变得像带我游览的那些糊涂虫一样的僵死，一样的不自然。那批昏庸老朽的人好比幕一般把草原跟我的心隔断了：不但如此，只要脚下踏着木板，头上盖着车顶，就可以使我和天地绝缘。要能感到大地是我的母亲，必须把我的脚踩入它的肚子里，好似一个初见光明的新生儿一样。财富斩断大地跟人类的连系，斩断所有大地之子相互间的连系。这样，你怎么还能成为个艺术家？艺术家是大地的声音。一个有钱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如果能够，那末在这样水土不宜的环境中，他必须有胜过别人千倍的天才。而且即使成功了，他也免不了是一颗暖室里培养出来的果子，连伟大的歌德也没用：跟他的心灵配搭的是萎缩的四肢，他缺少那些被财富斩断的主要器官。你既没有歌德的气魄，势必被财富吞掉，尤其被一个有钱的妻子吞掉，这一点在歌德至少是避免了的。单身的男人还可以抗拒灾难。他有一股天生的强悍之气，有些坚韧的本能把他跟土地连在一块儿。但女人是容易中毒的，还要把毒素传给别人。她喜欢闻财富的那股加着香料的臭气。她有了钱财而还能保持心灵的健康简直是奇迹，好似一个百万富翁有天才一样……而且我不喜欢妖魔，凡是财产超过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一个妖魔，——一个侵蚀他人的癌。”

奥里维笑道：“可是，我总不成因为雅葛丽纳不穷而不爱她，也不能硬要她为了爱我而变得穷。”

“你要是救不了她，至少得救你自己！而这还是救她的最好方法。你得保持纯洁。你得工作。”

奥里维无须克利斯朵夫告诉他这些顾虑。他比他更敏感。并非他把克利斯朵夫对财富的诅咒当真，他自己也是有钱人家出身，绝对不鄙薄财产，而且认为财产和雅葛丽纳俊俏的脸蛋非常适配。但他受不了人家猜疑他的爱情是为了图利，所以要求重进教育界。目前所能希望的只有一所内地中学里一个很普通的职位。这便是他所能献给雅葛丽纳的，可怜的新婚礼物。他很不好意思的和她谈起此事。雅葛丽纳先是不能接受他的理由：以为这种过分的要强是克利斯朵夫影响他的，她认为可笑的，一个人真有爱情的时候，和所

爱的人同甘共苦不是挺自然的吗？拒绝爱人乐于贡献给他的优惠，不是矫情吗？……可是临了，她仍赞同了奥里维的计划，因为这计划中间颇有些苦涩与不愉快的成分，她才下了决心，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满足她牺牲的热情。姑母的死惹动了她对环境的反抗，爱情更把她刺激得兴奋起来。凡是自己天性中跟神秘的热情不相容的成分，她一概加以否定；她仿佛引满了一张弓要把自己的生命向一种理想射去，而所谓理想便是极纯洁、极艰苦，同时又有幸福的光辉的生活……将来的阻碍，清苦的境况，为她都变成了欢乐。那才是多美妙的境界！……

朗依哀太太一心只管着自己，没功夫留意周围的事。最近她只想着健康问题，整天忙着她那些莫须有的病，一会儿试试这个医生，一会儿试试那个医生：每个新医生都是救星，过了十五无可又得换一个。她几个月的不待在家里，住着费用浩大的疗养院，不胜虔诚的作种种可笑的治疗，把女儿和丈夫统统给忘了。

比较关心家庭的朗依哀先生开始猜到女儿的计划了。那是他为父的嫉妒心理提醒他的。他对雅葛丽纳素来有着迷一般的温情，为许多父亲对女儿都感觉到而不肯承认的；那是一种神秘的，肉感的，几乎是神圣的好奇心，使一个想在自己的化身、是自己的骨肉而是个女人的人身上再生。在这等幽密的心情中间，有些影子与暗淡的闪光，还是不知道的好。至此为止，他觉得女儿使青年们风魔很好玩：他喜欢她这样：卖弄风情，想入非非，可是头脑清楚——像他自己。但他看到事情弄假成真就不放心了。他开始在雅葛丽纳前面取笑奥里维，后来又用一种相当尖刻的口吻批评他。雅葛丽纳先是笑笑，说：“别说他这么多坏话，爸爸，你以后要发窘的，倘使我嫁了他。”

朗依哀先生高声嚷起来，把她当做疯子。这才是使她完全成为疯子的好方法！他说她永远不能嫁给奥里维。她说非嫁他不可。幕揭开了。他发见她已经不把他放在心上。做父亲的自私心不禁大为气愤。他赌咒说再不让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上门。雅葛丽纳听了气坏了。有天早上，奥里维开出门来，看见她像一阵狂风似的卷进屋子，脸色发白，非常坚决的对他说：“你把我带走罢！爸爸妈妈不答应。我却非要不可。我不回去了。”

奥里维又是惊骇又是感动，并不想和她从长计议。幸而克利斯朵夫在家。平常他是最没理性的，那天倒反劝他们讲理性了。他说他们这样会闹出丑事来，以后更痛苦了。雅葛丽纳怒不可遏的咬着嘴唇，回答说：“以后我们自杀就完了。”

这句话非但没有把奥里维吓倒，反而使他打定了主意。克利斯朵夫好容易教两个疯子姑且耐着性子；他说在用到这最后一著之前，总得试过其他的方法：雅葛丽纳先回家，由他去看朗依哀先生作说客。

古怪的说客！他才说了几句，朗依哀先生差点儿撵他出门，然后他又觉得事情可笑。来客的严肃，诚实，深信不疑的态度，慢慢的使听的人动容了；然而朗依哀始终表示不动心，继续说些讥讽的话。克利斯朵夫只做不听见：可是逢到对方来一下特别尖锐的冷箭，他也停下来，不声不响的迟疑一会，随后又往下说。到了一个时候，他把拳头往桌上敲了一下，说道：

“请你相信我一句话：我这次的拜访对我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真得竭力压制自己才能不来挑剔你某些措辞；可是我认为我有权利对你说话，所以我就说了。请你像我一样的客观一些，把我的活考虑考虑。”

朗依哀先生听着：一听见自杀的计划，他耸耸肩膀，装做一笑置之；但

心里的确震动了。以他的聪明，决不致把这种威吓当做玩笑看：他知道应该顾到痴情女子的疯狂。从前他有个情妇，平素嘻嘻哈哈的，脾气挺好，他认为决不会实行她的大话的，居然当着他的面把自己打了一枪，当场并不就死，那一幕他现在文觉得如在目前了……对付那些疯疯癫癫的女孩子简直毫无把握。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阵心酸……“她自己要吗？那末好吧，傻孩子活该倒楣！……”当然，他可能用点手段，假作应允，把日子拖一拖，再慢慢的使雅葛丽纳疏远奥里维。可是这样非得花一番他不愿意或不能花的心血。何况他也是个软心人；因为他曾经恶狠狠的对雅葛丽纳说过一声“不！”现在就大为不忍而愿意说一声“好！”了。归根结蒂，世界上的事谁说得准呢？或许孩子的看法是对的。主要是两人相爱。朗依哀先生也并非不知道奥里维是个正人君子，也许还有才气……因此他同意了。

结婚前一天，两个朋友厮守了半夜没睡觉。他们对于一个可爱的过去的最后几个钟点，都想好好的领略一番。可是眼前这个时间已经是过去了。好似那些凄凉的离别，在车子开行以前大家执意要留在月台上，彼此瞧着，说者话，但心早已不在这儿；朋友已经远会了……克利斯朵夫一句话说到半中间，发觉奥里维心猿意马的眼神，便停下来，笑了笑，说：“你已经不在这儿了！”

奥里维不胜惶恐的道歉，因为自己在最后一段亲密的时间这样分心，觉得很难过。但克利斯朵夫握着他的手，说：“算了罢，别勉强。我很快活。你做你的梦罢，孩子。”

他们偎依着站在窗口，望着黑暗中的花园。过了一会，克利斯朵夫对奥里维说：

“你想逃开我吗？你以为可以躲掉我了？你想着你的雅葛丽纳。可是我会追上来的。我也想着她。”

“好朋友，”奥里维回答，“我何尝不想你！即使……”说到这儿他停住了。

克利斯朵夫笑着把他的话接下去：“……即使要想着我是多么不容易！……”

参加婚礼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穿扮得很体面，可以说很漂亮了。他们不用宗教仪式：奥里维是因为对宗教冷淡，雅葛丽纳是因为存着反抗的心，两人都不愿意要。克利斯朵夫写了一个交响乐体裁的曲子准备在区公所演奏；但到最后一刻，他明白了公证结婚是怎么回事，便把音乐放弃了，认为那是可笑的，表示一个人既没有信仰，也没有自由思想。一个真正的旧教徒好容易变成了自由思想者，并非要把一个公务人员变成教士。在上帝与自由良心之间，绝无理由把国家拉来代替宗教。国家只管登记，不管结合。

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结婚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幸而没有把音乐放到典礼中去。区长俗不可耐的恭维着新夫妇，恭维着新娘的有钱的家庭和那些挂着勋章的证婚人。奥里维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雅葛丽纳可完全不听，偷偷的向冷眼觑着她的西蒙纳吐舌头，她曾经跟她赌东道，说结婚“决不会使她紧张”，她现在快要赢这个东道了：她简直不大想到结婚的就是自己，即使想到也觉得好玩。其余的人都是为了来宾而装腔作势，来宾也都拿着手眼镜瞧他们。朗依哀先生只管在人前卖弄；虽然对女儿的感情那么真，他当时最注意的还是宾客，心里想有没有漏发什么请帖。唯有克利斯朵夫很激动：他仿佛一身兼了父母、结婚当事人和区长这许多角色。他目不转睛的

盯着奥里维，奥里维可并不瞧他。

晚上，新人动身上意大利，克利斯朵夫和朗依哀先生送他们到车站，看见新夫妇很快乐，毫无遗憾，也不隐瞒他们巴不得快点走掉的心绪，奥里维像一个少年人，雅葛丽纳像一个小姑娘……这一类离别使人非常惆怅。父亲眼看着女儿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从此跟他越离越远。但他们只感到一股解放的醉意。什么束缚都没有了，什么阻碍都没有了，他们自以为到了人生的顶点，万事齐备，用不着再怕什么，可以死而无憾了……过后，他们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拐过了山峰，又是遥遥前途摆在那里；而且很少人能到达第二个阶段……

火车在黑夜里把他们带走了。克利斯朵夫和朗依哀一同回去，俏皮的说了句：

“咱们现在都是鳏夫了！”

朗依哀先生笑了，他们道了再会，各自走上回家的路。两人都很难过。但那是一种又悲伤又甜美的感觉。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卧室里想道：“现在在我生命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得到了幸福了。”

奥里维的屋子里一切都保持原状。两位朋友约定：在奥里维没回来搬家之前，他的家具和纪念物照旧存在克利斯朵夫那边。所以他还是在眼前。克利斯朵夫大瞧着安多纳德的照相，拿来放在自己桌上，对它说道：

“朋友，你快活吗？”

他常常——稍微太密了些——写信给奥里维。回信很少，内容也是心不在焉的，朋友在精神上渐渐跟他疏远了。他很失望，但硬要自己相信这是应当如此的；他并不为他们友谊的前途操心。

孤独并不使他难受，以他的口味而论，他觉得还不够孤独呢。《大日报》的撑腰已经使他感到厌恶。阿赛纳·伽玛希有个脾气，以为由他费了心血吹捧出来的名流应当归他所有，而他们的光荣理当和他的光荣打成一片，好似路易十四在宝座周围摆着莫利哀、勒·勃仑和吕里一样。克利斯朵夫觉得在艺术上便是德皇也不见得比他《大日报》的老板更可厌。因为这个新闻记者对艺术既不比皇帝更懂，成见倒不比他少；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他绝对不容许存在，说是恶劣的，危险的：他为了公众的福利要把它们消灭。最丑恶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这般畸形发展的，不学无术的市侩，自以为用了金钱和报纸，不但能控制政治，还能控制思想：凡是听他们指挥的人，就赏赐一个窠，一条链子，一些肉饼；拒绝他们的，他们就放出成千成百的走狗去咬！——克利斯朵夫可不是受人呵斥的家伙。他认为一头蠢驴胆敢告诉他在音乐方面什么是应该作的，什么是不应该作的，未免太不成话：

他言语之间表示艺术需要比政治更多的准备。他直截了当的拒绝把一部无聊的脚本谱成音乐，不管那作者是报馆高级职员之一而为老板特别介绍的。这一件事就使他和伽玛希的交情开始冷淡了。

但克利斯朵夫反而因之高兴。他才从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露出头来，已经急于要回到默默无声的生活中去了。他觉得“这种声势赫赫的名气，会使自己在人群中迷失”。关切他的人太多了。他玩味着歌德的话：

“一个作家凭着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大众就设法不让他产生第二部有价值的作品……一个深自韬晦的有才气的人，也会不由自主的卷入纷纭扰攘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可以从作家身上沾点儿光。”

于是他关上大门，守在家里，只接近几个老朋友。他又去探望近来比较

疏远了的亚诺夫妇。亚诺太太白天一部分的时间总是孤独的，很有余暇想到别人的悲伤。她想到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走后所感到的空虚，便压着胆怯的心情请他吃晚饭。她很愿意不时来照顾一下他的家务，可是她没有胆子；这也许更好：因为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喜欢人家顾问他的事。但他上亚诺家吃饭，黄昏时也常到他们家去坐一会。

他发见这对夫妇老是那样亲密，维持着同样温柔而悒郁的气氛，比从前更灰色了。亚诺精神上经过一个颓丧的时期，教书生涯把他磨得很苦，——累人的劳作，一天又一天的永远没有变化，仿佛一个轮子老在一个地方打转，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向前。虽然很有耐性，这好人也不免垂头丧气。他为了某些不公平的事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忠诚毫无用处。亚诺太太说些温婉的话鼓励他：她似乎永远那么和平恬静，可是人慢慢的憔悴了。克利斯朵夫当着她的面祝贺亚诺有这样一位贤德的夫人。

“是的，”亚诺说，“她真好：无论遇到什么事总是很安定。这是她的运气，也是我的运气，要是她对我们的生活觉得痛苦的话，我会一蹶不振的。”

亚诺太太红着脸不出声。接着她用着平稳的语调扯上别的事去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往照例对他们很有好处；而在他那方面，也乐于到这些好人旁边来让自己的心温暖一下。

那时来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更准确的说，是克利斯朵夫去找来的；因为她虽然愿意认识他，可决不会自动去看他。那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音乐家，得国立音乐院的钢琴头奖的，名叫赛西尔·弗洛梨。矮个子，相当的胖，眉毛很浓，美丽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又小又粗的鼻子下端往上翘着，带些红色，像鸭嘴；厚嘴唇，表示人很笃实，温柔，下巴肥肥的，很结实，很有个性，脑门长得并不高，可是很宽；浓密的头发挽成个大鲁挂在脖子上；粗大的胳膊，钢琴家的手，又长又大，指尖是方的，大拇指跟别的手指离得很远。她浑身上下都元气充足，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对她很孝顺。母亲也是个好心的女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但因为常常听人谈到，便也谈着音乐，知道一切音乐界的潮流。赛西尔过着平凡的生活，整天教课，有时也举行些没人注意的音乐会。平日她回家很迟，或是步行，或是坐街车，筋疲力尽，可是兴致不坏，回来还打起精神练琴，缝帽子，话很多，爱笑，爱莫名其妙的哼哼唱唱。

人生并没宠她。她懂得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儿享受是多么宝贵，也很能体会一些小小的快乐，体会她的境况或艺术方面的些少进步。只要她本月比上月多挣五法郎，或者把弹了几星期的一段晓邦终于弹好，她就欢喜不尽。她自修的功课并不过度，恰好配合她的能力，像适当的健身运动一般使她身心痛快。弹琴，唱歌，教课，这些正常而有规则的活动使她一方面觉得日子没有虚度，一方面能过着小康的生活，有点平平稳稳的成就。她胃口很好，吃得下，睡得着，从来不闹病，她为人正真，合理，谦虚，精神很平衡，一无烦恼：因为她只管现在，不问已往也不问将来。既然身体好，生活安定，不会有什么风浪，她就差不多永远是快乐的。她高兴练琴，也高兴管家务，也高兴一事不做。她生活不是一天天过的，——（她很经济，做事有预算，）——而是一分钟一分钟过的。她心中毫无高远的理想；即使有，也是见请她所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布尔乔亚理想，就是说心安理得的爱好她所做的事。星期日她上教堂去；但宗教情绪在她的生活中毫无地位。她佩服那些狂热的人，像克利斯朵夫一般有一种信仰或天才的，但她并不羡慕：有了他们的烦闷和

他们的天才，又怎么办呢？

那末她怎么能体会到大作家的音乐的？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知道的确体会到。她高出别的演奏家的地方，是在于她身心的健康与平衡。这颗自己并无热情而生命力很强的灵魂，为陌生人的热情倒是一块特别富饶的园地。她并不因之受到骚乱。侵蚀过艺术家的可怕的热情，她能尽量传达出它的气势而自己不受它的毒害，她只感到那些作品的力量和弹完以后的痛快的疲劳。那时她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安详的笑着，觉得心满意足了。

克利斯朵夫有一晚听到她的表演，大为称赏。他在会后向她握手道贺。她非常感激：那晚听众很少，而且她素来不大有人捧的。她既没巧妙的手段去加入什么音乐集团，也没那种本领招致一般捧角的人跟在她后面，即不用过分的技巧来标新立异，也不用想入非非的方式去表演名作引人注目，同时她也不自命为罢哈或贝多芬的专家，更不对她所奏的东西标榜什么理论，只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感觉到的弹出来，——因此谁也不注意她，批评家们也不知道她：因为没人告诉他们说她弹得好；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好坏。

克利斯朵夫以后常常看到赛西尔。这个身子结实而精神安定的女子对他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她人很刚强，淡于名利。他因为人家不知道她而很气愤，提议要教《大日报》的朋友们提到她。她虽很乐意有人称赞，却求他切勿为她钻谋。她不愿意奋斗。花许多气力，惹人妒忌；她只求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人家不提起她倒是更好。她决不忘才，对于别的演奏家的技巧，她第一个会惊叹佩服。既无野心，亦无欲望，她太懒了，没有这个劲。要是当前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需要她关心，她便一事不做：连胡思乱想都没有；夜里躺在床上，不是马上睡着，就是一无所思。多少在这个年纪上没嫁人的女子，念念不忘的想着婚姻，唯恐做老处女，她却没有任何烦恼。人家问她喜欢不喜欢有一个好丈夫，她回答说：

“咄，抱这种野心干么？为什么不梦想五万法郎的进款呢？做人应当知足，应当安分守己。人家要是给你，那末更好！要不然就算了。一个人不能因为没有蛋糕吃就觉得上白面包不够味。尤其在你吃过了长久的硬面包之后！”

“并且，”母亲接着说，“心还有许多人不是每天都有得吃呢！”

赛西尔自有她不相信男人的理由。几年前故世的父亲是个懦弱而懒惰的人，使妻儿子女吃了不少苦。她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兄弟，不知在混些什么，每过一些时候出现一下，向家里要钱，大家怕他，觉得他丢人，唯恐有朝一日会听到他出什么乱子；可是大家疼他。克利斯朵夫看见过他一次。他正在赛西尔家，忽然有人打铃，母亲跑去开门了。然后他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谈话，不时高声的嚷几下。赛西尔似乎慌了，也出去了，让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待在那里。隔壁继续在争吵，陌生人慢慢的有了威吓的口气，克利斯朵夫以为应当出去干涉，便开门出去，但他只看到一个身于有点畸形的年轻人的背影，就给赛西尔赶来拦住了，求他回进屋子。她也跟着一同进来；大家不声不响的坐着。来人在隔壁又嚷了几分钟，走了，把大门使劲碰了一下。于是赛西尔叹了口气，对克利斯朵夫说：“是的……是我的兄弟。”

克利斯朵夫明白了。“啊！”他说，“我知道……我，我也有一个……”

赛西尔握着他的手，又亲切又同情的说：“你也有么？”

“是的……那都是教家里的人发笑的宝贝。”

赛西尔笑了：他们的谈话换了题目。真的，这种使家人发笑的宝贝，对

她不是味儿，而结婚的念头也不会打动她的心：男人都没意思，还是过独立生活好。母亲看到女儿这样，只有叹气，她可不愿意丧失自由，平时唯一的梦想是将来能有一天，——天知道什么时候！——住到乡下去。但她不愿意费心去想象那种生活的细节，觉得想一桩这样渺茫的事太没意思，还不如睡觉，——或是做她的工作……

在未能实现她的梦想之前，她夏天在巴黎近郊租一所小屋子，跟母亲两人住着。那是坐二十分钟火车就可以到的。屋子和孤零零的车站离得相当远，在一大片荒地中间；赛西尔往往夜里很晚才回去，可是并不害怕，不相信有什么危险。她虽然有支手枪，但常常忘在家里，而且也不大会用。

克利斯朵夫去探望她的时候，常常要她弹琴。她对于音乐作品的深切的领悟使他看了很高兴，尤其是当他帛一言半语把表情指点她的时候。他发觉她嗓子很好，那是她自己没想到的。他劝她训练，教她唱德国的老歌谣或是他自己的作品；她唱得很感兴趣，技巧也有进步，使他们俩都很惊奇。她天分极高。音乐的光芒像奇迹似的照在这个毫无艺术情操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女子身上。夜莺——（他这样称呼她）——偶尔也提到音乐，但老是用实际的观点，从来不及于感情方面；她似乎只关心歌唱与钢琴的技巧。她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而不弄音乐的话，就谈论俗事：不是家务，便是烹饪或者日常生活。平时一分钟都不耐烦和一个布尔乔亚女人谈这些题目的克利斯朵夫，和夜莺倒谈得津津有味。

他们这样的在一块儿消磨夜晚，彼此真诚的相爱，用一种恬静的，几乎是冷淡的感情。有天晚上他来吃晚饭，比平时耽久了些，突然下了一场阵雨，等到他想上车站去赶最后一班火车的时候，外面正是大风大雨；她和他说道：“算了罢！明儿早上走罢。”

他在小客厅里睡着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床。客厅和赛西尔的卧室之间只有一重薄薄的板壁，门也关不严的。他在床上听到另一张床格格的响，也听到赛西尔平静的呼吸。过了五分钟，她已经睡熟了，他也跟着入梦，没有一点骚乱的念头惊扰他们。

同时，他又得到一批陌生朋友，被他的作品招引来的。他们住的地方大半离开巴黎很远，或是幽居独处，从未不会遇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人的名气即使是鄙俗的，也有一桩好处，就是使上千上万的好人能够认识艺术家，而这一点，要没有报上那些荒谬的宣传就办不到。克利斯朵夫和其中几个发生了关系。有的是孤独的青年，生活非常艰苦，一心一意的追求着一个自己并无把握的理想：他们尽量吸收着克利斯朵夫友爱的精神。也有的是些内地的无名小卒，读了他的歌以后写信给他，像老苏兹一样，觉得和他声气相通。也有的是清苦的艺术家的，——其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没法成功，并且也没法表白自己：他们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克利斯朵夫表现了出来，快活极了。而最可爱的也许是信上不署名的人：因为这样他们说话可以更自由，很天真的把信心寄托在这个支持他们的长兄身上。克利斯朵夫多么愿意爱这些可爱的灵魂，但他永远不能认识他们。因之大为惆怅。他吻着那些陌生人的信，好似写信的人吻着克利斯朵夫的歌一样：各人都在心里想：“亲爱的纸张，你们给了我多少恩惠！”

这样，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他周围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仿佛是一个天才的家属，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同时也给他营养。这集团慢慢的扩大：终于形成一颗以他为中心的集体灵魂，——好像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无形

的星球在太空中运行，把它友爱的歌声跟一切星球之间的和声交致力一。

正当克利斯朵夫和他那些精神上的朋友有了神秘的联系的时候，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自，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是只有内行了解的艰深复杂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在最孤独的时间，也靠着他在艺术中表白的宗教信仰和其余的人结合为一。亨特和莫扎尔德的写作，由于事势所迫，也是为了一批群众而不是只为他们自己。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而这是大有裨益的。人类应当用这种话提醒天才：

“你的艺术中间哪些是为我的？要是没有，那末我不需要你！”

这种强制使艺术家第一个得到好处。当然，只表白自己的大艺术家也有。但最伟大的总是那些心儿为全人类跳动的艺术家。谁要面对面的见到活的上帝，就得爱人类；在自己荒漠的思想中是找不到上帝的。

然而当代的艺人谈不到这种爱。他们只为了一批虚荣的，混乱的，脱离社会生活的少数人士写作，——这等少数人士绝对不愿意分享别人的热情，或竟加以玩弄。为了不要和别人一样，他们宁可和人生割绝。这种人还是死了的好。我们可是要走向活人堆里去的。我们要喝着大地的甘乳，吸收人类最圣洁的部分，汲取他们爱家庭爱土地的感情，在最自由的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拉斐尔，在那些圣母像中讴歌母性的光荣。今日谁能为我们在音乐上作一幅《圣母坐像》呢？谁能为我们作出人生各个阶段的音乐呢？你们一无所有，你们法国一无所有。你们想拿些歌曲给民众的时候，不得不剽窃德国往日的名作。在你们的艺术中，从底层到峰顶，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或者重新做起……

克利斯朵夫和此刻卜居在外省的奥里维通信，想靠书信来继续他们从前产量丰富的合作。他要他搜集优美的诗歌，和日常的思想行动有密切关系、像德国的老歌谣那样的，例如圣书或印度诗歌中的片段，宗教的或伦理的颂歌，自然界的小景，关于爱情的或天伦的感情，清晨，黄昏与黑夜的诗歌，适合一般淳朴而健全的心灵的东西。每支歌只消四句或六句就行，表情要极朴素，用不着发挥得如何高深，用不着精炼的和声，你们那些冒充风雅的人的卖弄本领对我是没用的。希望你爱我的生命，帮助我爱自己的生命！替我写些《法兰西的祈祷》罢。咱们应当找些明白晓畅的曲调。所谓艺术的语言，我们应当避之唯恐不及，那是像今日多少音乐家的作品一样，变了一个阶级专用的术语。应当有勇气以人的立场而非以艺术家的立场说话。瞧瞧前人的作品罢。十八世纪末期的古典艺术，就是从大众的音乐语言中来的。如葛吕克，如一般创造交响乐的作者，初期歌谣的作家，他们的乐句和罢哈与拉慕的精炼高深的句予比较起来，有时会显得平淡庸俗。但就是这种本地风光的背景造成了伟大的古典作者的韵味与通俗性。它们是从最简单的音乐形式，从歌谣里来的；这些日常生活里的小小的花朵，深深的印在莫扎尔德或韦勃的童年的心上。——你们不妨效法他们，写作一些为大众的歌曲。以后你们再创作交响乐。越级有什么用？金字塔不是从顶上造起的。你们现在的交响乐只是一些没有躯干的头颅。噢，美丽的思想，你们得有一个身体哪！必须有几代耐性的音乐家和群众亲近。一个民族的音乐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

拉斐尔所作圣母像多至不胜枚举，《圣母坐像》为其中之一，现藏意大利翡冷翠毕蒂博物馆。

起来的。

克利斯朵夫不但把他的原则应用于音乐，并且还鼓励奥里维在文学方面实行：

“现在的作家，”他说，“努力描写一些绝无仅有的人物，或是在健全的大众以外，只有在不正常的人群中才有的典型。既然他们自愿站在人生的门外，那末你用不着管他们，你自己向着有人类的地方去罢。对普通的人就得表现普通的生活：它比海洋还要深，还要广。我们之中最渺小的人也包藏着无穷的世界。无穷是每个人都有的，只要他甘于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不论是情人，是明友，是以生儿育女的痛苦换取光荣的妇女，是默默无闻的牺牲自己的人。无穷是生命的洪流，从这个人流到那个人，从那个人流到这个人……你写这些简单的人的简单的生活罢，写这些单调的岁月的平静的史诗罢，一切都那么相同又那么相异，从开天辟地起，一切都是同一母亲的子女。你写得越朴素越好。切勿学现代艺术家的榜样，枉费心力去寻求微妙的境界。你是向大众说话，得运用大众的语言。字眼无所谓雅俗，只有把你的意思说得准确不准确。不论你做什么，得把自己整个儿放在里头：保持你的思想，保持你的感觉。文学应当跟从你心灵的节奏。所谓风格是一个人的灵魂。”

奥里维赞成克利斯朵夫的意见；但他用着怀疑的口气说：

“一部这样的作品可能是美的：但它永远到不了那些能够读这等作品的人眼里。批评界在半路上就把它压下去了。”

“你老是这套法国小布尔乔亚的说法！”克利斯朵夫回答。“你担心批评界对你的作品作何感想！……告诉你，那些批评家只知道记录成功或失败。你只要成功就行了！……我完全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你也得不把他们放在心上……”

但奥里维不放在心上的东西正多着呢！他可以不需要艺术，不需要克利斯朵夫。那时他只想着雅葛丽纳。

他们只知道有爱情，不知有其他；这种自私的心理在他们周围造成一片空虚，毫无远见的把将来的退路都给断绝了。

在初婚的醉意中，两颗交融的生命专心一意的只想彼此吸收……肉体与心灵的每个部分都在互相接触，玩味，想彼此参透。仅仅是他们两人就构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宇宙，一片混沌的爱，一切交融的成分简直不知道彼此有什么区别，只管很贪馋的你吞我，我吞你。对方身上的一切都使他们销魂荡魄，而所谓对方其实还是自己。世界对他们有什么相干？有如古代的两性人在和谐美妙的梦里酣睡一般，他们对世界闭着眼睛，整个的世界都在他们身上。

噢，白天，噢，黑夜，你们织成了同一片梦境，你们这些像美丽的白云般飞逝的时间，在眩晕的眼中只现出一道光明的轨迹，——还有令人感到春倦的温暖的气息，肉体的暖意，爱情的沉醉，贞节的淫乱，疯狂的搂抱，叹息与欢笑，喜极而位的眼泪，——噢，微尘般的幸福，你还留下些什么呢？……我们的心简直想不起你了：因为你在的时候，时间是不存在的。

岁月如流，老是同样的日子……甜蜜的黎明……两个紧紧搂抱的肉体从睡眠的深渊中同时浮起来；笑盈盈的，呼吸交融，一同睁开眼来，又相见了，又亲吻了……平坦清明之气使身体上的热度退了下去……无穷的岁月只有酣

畅迷惘的感觉，其中还有黑夜的甜美在嗡嗡作响……夏日的午昼，在田野里，在草茵上，在萧萧的白杨底下出神……幽美的黄昏，双双挽着手在明朗的天空下回向爱情的床席。风吹着丛树的叶子，明净如水的天上，像鹅毛般浮着一轮银色的月。一颗星掉下来，殒灭了，——使你心中一震……——一个世界无声无息的吹掉了。路上，在他们旁边，难得闪过一些默默无声的影于。城里的钟声报告明天的佳节。他们停了一会，她紧紧靠着他，默然无语……啊！但愿生命就像这时候一样，一动不动的……她叹了口气说：

“我为什么这样爱你呢？……”

在意大利旅行了几星期之后，他们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城里安顿下来，奥里维在那儿有个中学教员的位置。他们差不多谢绝宾客，对什么都不关心。等到不得出去拜客的时候，他们毫无顾忌的对人很冷淡，使有些人不快，使有些人微笑。所有的闲言闲语只在他们身上滑过，毫无作用。他们跟一般新婚夫妇一样的傲慢，神气仿佛说：

“哼，你们，你们才不知道呢……”

在雅葛丽纳那张俊俏而有点气恼的脸上，在奥里维的快乐的，心不在焉的眼中，显然透露出这样的意思：

“你们多讨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清静呢？”

哪怕在众人面前，他们也是我行我素。人们常常会发见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眉目传情。他们用不着彼此瞻望就能看到对方；两人微微笑着，知道彼此同时想着同样的念头。等到从应酬场中出来，他们简直快活得直叫直嚷，做出种种痴儿女的狂态，仿佛只有八岁。他们说着傻话，互相用古怪的名字称呼。她把奥里维叫做奥里佛，奥里丸，奥里芳，法南，玛术，……竭力装做小女孩子的模样。她要同时成为他的一切，又是母亲，又是姊妹，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情妇。

她不但以分享他的快乐为满足，还要实行自己从前许的愿，分担他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游戏。初期，她又好玩又热心的干着，因为工作在她这样的女人是件新鲜的玩艺儿，所以对最枯索的事也感到兴趣：图书馆里的抄写，翻译无味的书，都变了她生活计划中的一部分。她理想的生活不就是纯洁，严肃，全部贡献给共同的、高尚的思想与劳作的吗？只要有爱情的光辉照着，一切都很好：因为她只想着他，而不是想着她所作的事。最奇怪的是，凡是她这样作出来的一切都作得很好。她的头脑，对于那些在一生中别的时间决不能胜任的抽象的读物，都能毫不费力的应付；爱情使她整个人脱离了俗世；她自己可不觉得，好比一个梦游病者在屋顶上走着，非常的安闲，什么都看不见，只管做着她的严肃而快乐的梦……

过了一晌，她开始看到屋顶了，可并不惊慌，只盘问自己在屋顶上干什么，便回进了屋子。工作使她厌烦了。她以为它影响了爱情。那当然是因为她的爱情已经不及从前热烈。但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他们俩一刻都不能分离，竟自闭门谢客，所有的应酬都不去了。他们讨厌别人对他们的感情，讨厌自己的工作，讨厌一切打扰他们爱情的事。和克利斯朵夫的通信也减少了。雅葛丽纳不喜欢他：他仿佛是个情敌，代表奥里维过去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是完全没有她的分的。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的生活中越占地位，她本能的越想抢掉那个地位。她并不存心，只暗中使奥里维跟他的朋友疏远；她取笑克利斯朵夫的态度，面貌，写信的体裁，艺术方面的计划；她这么做并没有恶意，也不弄手段：那是忠厚的天性使她避免了的。奥里维听了她的批评觉

得好玩，也不觉得有何居心；他自以为爱克利斯朵夫的心始终不灭，但此刻所爱的只限于克利斯朵夫那个人了：而这是在友谊中没有多大作用的；他没发觉自己渐渐的不了解他，不再关切他的思想，不再关切使他们从前心心相印的英勇的理想主义。对于一颗年轻的心，爱情这股味道真是太浓了：和它比较之下，什么信仰都会显得没有意思。爱人的肉体，以及在这个神圣的肉体上面体会到的灵魂，代替了所有的学问，所有的信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看着别人热爱的理想，看着自己从前热爱过的理想，只觉得可怜可笑，关于轰轰烈烈的生活和艰苦的努力，他只看到一刹那的鲜花，以为是千古不朽的东西……爱情把奥里维吞掉了。最初他的幸福还有力量用妩媚的诗歌来表现自己。后来连这个也显得空虚而侵占了爱情的时间了！而雅葛丽纳也像他一样，除了爱情以外，把一切生活的意义都竭力摧毁，殊不知大树一倒，藤萝般的爱情也就失去了倚傍。这样，他们俩就在爱情中互相毁灭。

可怜一个人对于幸福太容易上瘾了！等到自私的幸福变了人生唯一的目标之后，不久人生就变得没有目标。幸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麻醉品，少不了。然而老是抓住幸福究竟是不可能的……宇宙之间的节奏不知有多少种，幸福只是其中的一个节拍而已；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

他们尝到了安乐的烦闷，需要刺激的感觉越来越不知厌足。甜蜜的光阴减低了速度，变得软弱无力，像没有水分的花一般黯然失色了。天空老是那么蓝，可已经没有清晨那种轻快的空气。一切静止；大地缄默。他们孤独了，正如他们所愿望的那样。——可是他们不胜悲伤。

一种说不出的空虚的情绪，一种并非没有魅力的渺茫的烦恼出现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模模糊糊的感到不安。他们多愁善感，近乎病态；神经在静寂中紧张起来，一遇到最轻微的意外的击触，就会像树叶般发抖。雅葛丽纳无端端的流着眼泪；虽然她以为是爱极而泣，其实并不是的，结婚以前的几年，她那么紧张，热烈，苦恼，一朝达到了而且超过了目的，她的生命力就突然停止活动，而一切新的行动——或许连一切过去的行动在内——也忽然显得毫无意义：这种情形使她莫名其妙的感到困惑与消沉。她自己不肯承认，以为是神经疲倦所致，便勉强笑着；但她的笑和她的哭同样带着不安的意味。她鼓足勇气想再去干以前的工作。不料她马上不胜厌恶的扔下了，甚至还弄不明白以前怎么会对这样无聊的事感到兴趣的。她又勉强出去交际，也同样没结果：习惯已深，她再也受不了平庸的人物与无聊的谈话；这些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她却只觉得鄙俗不堪，便守着丈夫孤独下去，同时还拿这些不幸的尝试硬教自己相信：人生除了幸福以外竟是一无足取。有一晌她果然比什么时候都更沉溺于爱情了。但那纯粹是意志的力量。

不像她那么狂热但更温柔的奥里维，比较不容易受这些烦闷侵扰，他本人只觉得偶然有点儿说不出的颤抖。并且他的爱情在某种程度内也受着日常事务——他不喜欢的职业——的限制而不至于完全消耗。但他既然非常敏感，爱人心中所有的动静都会在他心中引起反应，那末雅葛丽纳暗地里的困惑当然要传染给他了。

一个天气美好的下午，他们在野外溜达。出门以前，两人都觉得这次的散步一定是很愉快的。周围的一切都有笑意。不料才走了几步，一种阴沉的，令人困倦的忧郁忽然涌上心头。他们没法谈话，可勉强谈着：每个字都使他们感到空虚。散步完了，他们像木偶似的一无所见，一无所感，非常悲伤的

回家。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屋子里只显得空虚，黑暗，寒冷。为了避免看到对方，他们并不马上点灯。雅葛丽纳走进卧室，帽子跟大衣都不脱，径自默默的靠窗坐下。奥里维在隔壁靠着书桌站着。两间屋子中间的门打开在那里；彼此离得很近，连呼吸都能听到。两人在半明半暗中悄悄的哭了，哭得很伤心。他们掩着嘴，不让自己出声。最后奥里维沉痛的叫了声：“雅葛丽纳……”

雅葛丽纳咽着眼泪回答：“怎么办呢？”

“你不来吗？”

“我来了。”

她脱了大衣，洗了脸。他点起灯来。过了几分钟，她进来了。两人不敢相视，知道彼此都哭过了。他们不能互相安慰：因为各人都明白是为的什么。

终于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俩不能把胸中的苦闷再隐藏下去。因为大家不愿意承认其中的原因，便想法另外找一个原因，那当然是不难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枯索的内地生活造成的。这一下他们宽慰了。朗依哀先生知道女儿对于刻苦的生活厌倦了，并不怎么惊奇。他托了政界的朋友把女婿调到巴黎来。

一听到好消息，雅葛丽纳快活得跳起来，觉得过去的幸福又回来了。一朝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可厌的地方倒反显得亲切可爱：这儿留着他们多少爱情的纪念！最后几天，他们尽量去搜寻那些遗迹，心里又惆怅又感动。恬静的原野是看见他们幸福过来的。他们听见心中有人声音喁喁的说：

“你留下的东西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将来的遭遇吗？”

动身前夜，雅葛丽纳哭了。奥里维问她为什么。她不愿意回答。他们拿起一张纸写道：——（平时他们怕自己说话的音调引起误会，常常用这个办法。）——

“亲爱的小奥里维……”

“亲爱的小雅葛丽纳……”

“我为了要离开而很难过。”

“离开哪儿呢？”

“离开我们相爱的地方。”

“上哪儿去呢？”

“到我们要更老的地方去。”

“到我们偕老的地方去。”

“可是不会再这样的相爱了。”

“只有更爱。”

“谁知道？”

“我知道。”

“我非要更相爱不可。”

于是他们在纸尾画着两个圆圈，表示两个拥抱。随后她抹着眼泪，笑了，把他穿扮得像亨利三世的爱人一般，头上戴着她的便帽，身上披着高领的白坎肩，使奥里维的头活像一颗杨梅。

在巴黎，他们又遇到了亲朋故旧，觉得这些人都跟离开的时候不同了。一听到奥里维来到的消息，克利斯朵夫马上高兴非凡的赶来，奥里维也同样的高兴。可是一见之下，他们都意想不到的发窘。两人都想提起精神来，只是没用。奥里维很亲热，但多少有点改变了，克利斯朵夫很清楚的感觉到。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龛入了

一些女人的灵魂。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身上到处发见这种痕迹：

眼睛有些不可捉摸的光彩，嘴唇有些从前没有的褶皱，声音与思想也有些新的抑扬顿挫。奥里维自己没觉得，倒反奇怪克利斯朵夫和从前大不同了。当然他不至于以为是克利斯朵夫改变，承认是自己改变；在他看来，这是跟着年龄来的正常的演变。他还诧异克利斯朵夫没有先前的进步，责备他始终保持着那些思想，那是他以前非常重视而现在认为幼稚与老朽的。因为奥里维的心给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和这个外来的灵魂格格不入。这种感觉在雅葛丽纳也参加谈话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之间隔着一重冷言冷语的幕。可是大家都竭力掩藏心中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继续到他家里去。雅葛丽纳无邪的向他放几下冷箭，他不以为意。但他回去以后很难过。

到巴黎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为雅葛丽纳是相当快乐的时期，所以为奥里维也是的。她先是忙于布置新居。他们在巴西区一条老街上找了一所可爱的小公寓，窗外有一方小花园。家具与糊壁纸的选择足足花了她几个星期。雅葛丽纳拿出全副精神，甚至把热情都放了上去，仿佛她永久的幸福就靠几口旧橱的颜色与形状似的，然后她对于父亲，母亲，朋友，作了一番新的认识。因为她在沉醉于爱情的那一年把他们完全忘了，这一下倒是真正的新发见；尤其因为，像她的灵魂渗入了奥里维的灵魂一样，奥里维的灵魂也渗入了她的灵魂，所以她对旧时的熟人未免用新的眼光来看。她觉得这些人比从前有意思得多。最初，相形之下，奥里维还不如何逊色。把他和亲朋故旧放在一起，双方都相得益彰。他的沉潜韬晦，半明半暗的诗意，使雅葛丽纳在那些只求享乐、炫耀、讨人喜欢的浮华人物身上发见更多的魅力；另一方面，他们可爱而危险的缺点，——因为她是这个社会出身，所以认识得格外清楚，——使她更赏识丈夫的忠诚可靠的心。她喜欢作这些比较，而且喜欢老是比较下去，以便证明她的选择着实不错。——但比较到后来，她有时竟不明白为什么作了这个选择了。幸而这种时间并不长久。甚至她因之感到内疚，而事后对奥里维也比任何时期都更温柔。然后她重新再来。等到她这一套成了习惯，便不觉得有趣了；比较的结果，慢慢的使两种相反的人物不像从前那样相得益彰，而开始冲突起来。她私下想，奥里维倘使有一些她此刻在那些巴黎朋友身上所赏识的优点，甚至于缺点，岂不是更好？她嘴上绝对不跟奥里维提：但奥里维感觉到她用苛刻的目光打量他，心里觉得又不安又屈辱。

虽然如此，他对雅葛丽纳还没失去爱情给他的优势：青年夫妇的温柔与勤勉的生活还可继续得相当长久，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把他们的境况改变，把那勉强维持在那里的平衡破坏的话。

我们这才觉得财神是最大的敌人……

朗依哀太太的一个姊妹故去了。她是一个有钱的实业家的寡妇，无儿无女，全部的财产都转移到朗依哀家里。雅葛丽纳的财富增加了一倍以上。遗产来的时候，奥里维记起了克利斯朵夫那番关于财富的话，便说：“没有这笔财产，我们也过得很好，也许钱多了反而有害处。”

雅葛丽纳取笑他：“傻子！这也会有害吗？何况我们可以不改变生活。”

表面上生活固然照旧。因为照旧，以致过了一些时候，雅葛丽纳抱怨钱不够了，那显然是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事实上，收入多了三倍，还是全部花光，也不知花在哪里的。他们简直不懂以前是怎么过活的了。钱像水一般的流出去，被无数新添出来而马上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用度吞掉。雅葛丽纳

结识了一批有名的裁缝，把从小熟识的上门做活的女裁缝辞退了。从前戴的是不费多少材料就能做得很美的四个铜子的小帽子，穿的是并不十全十美，但反映着自己的妩媚，有些自己气息的衣衫：这些日子现在都完了。周围所有的东西原来都有种温暖亲切的情调，现在一天天的减退。她身上的诗意消失了，变得庸俗了。

他们换了一个公寓。从前费了多少心血，多么高兴布置起来的屋子，显得狭窄难看了。那些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的，朴素的小房间，窗外摇曳着清瘦的树影的景致，现在不需要了；他们另外租了个宽大的，舒服的，屋子分配得很好的，可是他们不喜欢而且没法喜欢的，烦闷得要死的公寓，熟悉的旧东西代之以陌生的家具与糊壁的花绸。往事在这儿是毫无地位的。最初几年共同生活的印象从脑海里给扫出去了……对于夫妇，最不幸的是他们和过去的爱情的连系一朝被斩断。因为接着初期的温情必有一个精神沮丧的时期，那时一个人只有靠过去的回忆才能撑持。用钱的方便使雅葛丽纳在巴黎，在旅途上——（现在他们时常旅行了），——接近了一般有钱而无用的人物，和他们交往的结果，使她瞧不起其余的人，瞧不起劳作的人。以她奇妙的接受能力，她立刻和那些贫弱而腐败的心灵同化。要她抵抗是办不到的。一想到人家能够——而且应该——在尽了日常生活的责任之后，在平凡的环境中得到幸福，她立刻表示气恼，认为那是“布尔乔亚的下贱”。她甚至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了解了。

奥里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改变了。他辞掉了教职，再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只是写作；生活的平衡因之也有了变动。至此为止，他因为不能完全献身于艺术而痛苦。如今他可以完全献身于艺术的时候，却缥缥缈缈的像在云雾中一样。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它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作它的倚傍，没有日常任务给它刺激，不需要争取它的面包，那末艺术就会丧失它最精锐的力量和现实性，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像一批最伟大的艺术家表现的）——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奥里维尝到了有闲的滋味，老想着“一切皆空”的念头，什么也不来压迫他了：他丢下了笔，游手好闲，迷了方向。他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和那些耐着性子，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失去了接触。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觉得不大自在，可也并不讨厌。他以懦弱、可爱、好奇的性格，欣然玩味着这个并非没有风趣、可是动摇不定的社会；他不觉得自己已经受着它的熏陶：他的信念不像从前那么坚定了。

可是他的转变不及雅葛丽纳的迅速。女人有种可怕的特长，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往往使爱他的人吃惊。但为一个不受意志控制而生命力倒很强的人，朝三暮四的变化是挺自然的。那种人好比一道流水。爱他的人要不被它带走，就得自己是长江大河而把它带走。两者之中不论你挑哪一种，总之得改变。这的确是危险的考验：你只有向爱情屈服过以后才真正认识爱情。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中，生活的和谐非常脆弱，往往只要两个爱人之中有一个有些极轻微的转变，就会把一切都毁掉。页遇到财产或环境突然有大变化的时候，情形更危险。必须是极坚强的人或是极洒脱的人才抗拒得了。

雅葛丽纳和奥里维既不坚强，亦不洒脱。他们看见彼此都换了一副模样，熟悉的面貌变得陌生了。在发见这种可悲的情形的时候，他们为了怕动摇爱情而互相躲藏：因为两人始终是相爱的。奥里维可以借正常的工作来逃避，

工作对他有镇静的作用。雅葛丽纳却是无所隐遁。她一事不做，老是赖在床上，或是长时间的梳妆，几小时的坐着，衣衫穿了一半，一动不动的在那里出神；同时有种说不出的悲哀一点一滴的积聚起来，像一层冰冷的雾。她固执的想着爱情，没法把念头转向别处……爱情！它作着自我牺牲的时候才是人生最了不得的实物。倘使它仅仅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末它是最无聊的，最欺人的东西……而雅葛丽纳除了追求幸福以外，不能想象人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在意志坚强的时间，她勉强去关切旁人，关切旁人的苦难：可是办不到。旁人的痛苦使她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厌恶；她的神经使她不能看到痛苦的景象，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为了向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她曾经有两三次做了几件好事，结果并不高明。

“你瞧，”她对克利斯朵夫说，“一个人心里想行善，结果反作了恶。还是不做为妙。我的确没有这种缘分。”

克利斯朵夫望着她，想到他偶尔碰到的某个女朋友，明明是自私的，轻佻的，不道德的，不能有真正的温情的，但她一看见人家受苦，不论是不相干的或不相识的，马上会有一种母性的同情。哪怕是最脏的看护工作也吓不倒她：甚至最需要她作克制功夫的照顾，她反而感到特别的乐趣。她自己不以为意：似乎她心里有股模糊的理想的力量，在这儿发泄了出来；她的灵魂在生活中别的场合明明是麻痹的，到了这种难得的时间却振作起来了，减少一些旁人的痛苦使她心里非常舒服，那时的快乐差不多是过分的。——这个本性自私的女子所表现的仁慈不能说是德，本性善良的雅葛丽纳所表现的自私不能说是恶；那对两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可是另外那个人更健康。

雅葛丽纳绝对不能想到痛苦二字。她宁愿死而不愿受肉体上的痛楚，宁愿死而不愿丧失快乐的来源：美貌或青春。要是她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不能全部都有，——（因为她对幸福抱着绝对的，荒谬的，宗教般的信仰，）——要是别人有了比她更多的幸福，她就认为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幸福不但是信仰，并且也是德性。在她心目中，苦难简直是种残疾，她整个生活慢慢的都照着这个原则安排。她处女时代为了羞怯，把自己真正的性格用理想主义包裹着，现在这性格显出来了。并且为了反抗过去的理想主义，她对一切都换了一副清楚而大胆的目光。无论什么人或事，必需配合社会的舆论与生活的方便才会受到她重视。她的心情跟母亲到了同样的境界：她也按期上教堂去，不关痛痒的奉行宗教仪式，她不再操心真诚不真诚的问题：有的是其他更实际的烦恼；想到自己小时候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抗，她只觉得可怜可笑。——可是她今日注重实际的思想不比她昨日的理想主义更实在，两者都是自己强求的。她不是神明，不是野兽，只是一个烦恼的可怜的女人。

她烦恼，烦恼……因为烦恼的原因既非奥里维不爱她，也非她不爱奥里维，所以她更烦恼。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封锁了，闭塞了，没有前途了；她渴望一种时时刻刻变换的新的幸福，——其实像她这样的不懂得享受幸福，便根本不配有这种儿童式的梦想。她跟多少别的女人，多少有闲的夫妇一样，具备了一切幸福的条件而始终在那里烦恼。他们都有钱，有着美丽的孩子，很好的身体，人也聪明，能够欣赏美妙的东西，倘使要活动，要行善，要充实自己的与别人的生活，条件都齐备，而他们整天的抱怨，不是说他们不相爱，就是说他们爱着另一个人或不爱另一个人，——永远只关切自己，关切他们的感情关系或性欲关系，关切他们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关切他们矛盾的自私自利，老是争辩，争辩，争辩，扮着爱情的喜剧，痛苦的喜剧，结果

竟信以为真……对于这等人，真该告诉他们：

“你们太无聊了。一个人有了多少幸福的条件还要怨天尤人，简直是荒唐！”

同时也应该有人把他们的财产，健康，和一切他们不配有的神奇的天赋，统统剥夺！把这些自己不能解脱的，对自己的自由害怕的奴隶，重新戴上艰难的枷锁和真正的痛苦的枷锁！倘若他们非辛辛苦苦争取自己的面包不可，他们一定会很快活的吃下去的。而一朝看到了痛苦的真面目，他们也不敢再拿痛苦来玩可厌的把戏了……

可是归根结蒂，他们的确痛苦着。他们俩是病人，怎么不教人可怜呢？——雅葛丽纳的疏远奥里维，和奥里维的没有羁魔雅葛丽纳，同样是无辜的。她完全保持着天性。她不知道结婚是对天性的挑战，早该料到天性会起来反抗，百自己应当预备勇敢的应战的。她只发觉自己把事情看错了，不胜恼恨。失意之下，她迁怒于她从前所爱的一切，仇视她从前所信仰的奥里维的信仰。一个聪明的女子，比男人更能够在一刹那间凭着直觉体会到那些有关永恒的问题，但要她楔而不舍的抓住就不容易了。抱着这种思想的男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灌溉它的。女子却拿这种思想来做自己的养料，她吸收它，绝对不创造它。她的精神与感情不能自给自足，永远需要新的养料。没有信仰没有爱的时候，她就从事于破坏，——除非她激天之幸，能够有那最高的德性：恬静。

从前，雅葛丽纳热烈的相信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结合，根信共同奋斗、共同受苦、共同建造便是幸福。但这个信心，只存在受到爱情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她才相信；太阳慢慢的落下去，她的信心就像一座阴沉的荒山矗立在空虚的天上；雅葛丽纳觉得没有气力继续她的行程了：爬到了山巅又有什么用呢？山的那一边又有些什么呢？简直是个大骗局！雅葛丽纳再也弄不明白，奥里维怎么会继续受这些侵蚀生命的幻想欺骗；她以为他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生气。她在他的空气中感到窒息，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使她为了自卫而开始攻击了。她还爱着奥里维，但她要把他的信仰破坏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信仰是她的敌人；讥讽与肉欲都被她用作武器；她把自己的欲望和琐碎的心事像藤萝一般的缠绕他，希望把他做成自己的影予……而所谓“她自己”，不但不知道要些什么，连自己是怎么回事的人都弄不清！她觉得奥里维没有成名对她是种屈辱，可不问他的不成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她终于相信，归根结蒂，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才具，是靠名气决定的。奥里维感觉到妻子对他这样的怀疑，不禁大为丧气。可是他竭力挣扎。像他那样挣扎的人，过去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挣扎大半是毫无效果的。在这个势力不均的斗争中间，被女子自私的本能利用来对抗男人灵智的自私的，是男人的软弱，失意，和世故人情，——世故人情便是一个遮掩人生磨蚀和男人的懦弱的名辞。雅葛丽纳与奥里维至少比一般的战士高明多了。因为奥里维永远不会欺骗自己的理想，不像普通的男人听任懒惰、虚荣、混乱的爱情驱使，甘心否定自己的灵魂。而且倘若他做到了这一步，雅葛丽纳也要瞧不起他。然而她在那种盲目的情形之下，竭力要毁灭奥里维的力量，不知这力量便是她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的保障，她还凭着本能把支持这股力量的友谊也加以破坏。

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利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雅葛丽纳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的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

的。有时他愤慨之下，说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里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利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葛丽纳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她痛苦。克利斯朵夫看到奥里维的苦衷，便自动引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里维有何帮助，反而会妨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里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利斯朵夫所作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

克利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活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他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里维，硬教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他在奥里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方法可以自慰，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的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里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工作已不够填补空虚：因为克利斯朵夫在工作中间惯于靠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利斯朵夫就像一个失去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

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为他是够不够的。

她们两人似乎也猜到克利斯朵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她破题儿第一道来看他，神色有点骚动。克利斯朵夫不加注意，以为她是胆怯。她一声不出的坐下。克利斯朵夫为了免得她发窘，便带她参观屋子；既然到处有奥里维的纪念物，两人就不知不觉的提到奥里维。克利斯朵夫很高兴的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问：“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

他以为她是来安慰他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见面犹不见面。”

她红着脸，说：“噢！我那句话并没刺探你们的意思。”

他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着她的手：“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的痛苦……是的，我们不见面了。”

“他也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克利斯朵夫觉得不大好意思。

“人生多可悲啊！”亚诺太太过了一忽儿又说。

克利斯朵夫抬起头来：“不，人生并不可悲。它不过有些可悲的时间。”

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着一种哀伤的口吻又道：“大家相互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

“已经相爱过就行了。”

她又说：“你为他作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

“我并没牺牲，”克利斯朵夫愤愤的回答。“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作他应当作的事。要是不那么作，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字简直荒谬极了！”不知是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优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

你那牺牲才算有价值……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末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还是去你的罢！你不配生活。”

亚诺太太听着克利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她站起来说：“再见了”。

这时他才想起她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的话告诉他，便说：“噢！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罢，好不好？”

“不坐了……谢谢你……”说完她走了。

他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见面。她既没给他消息，他也不上她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他很喜欢她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而且她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是有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

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疏阔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

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期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暴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认为法国人的戏剧语言也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剧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焉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焉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

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利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剧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要不是把戏子们的恶习做你剧中人物的粉本，那末你的戏上演的时候绝没成功的希望。”从狄特洛写了这段文字以来，情形并没如何改变。喜剧演员成为艺术的模型，只要一个戏子成了名，他立刻可以有他的戏院，有他的剧作家，——他们会像殷勤的裁缝一般照他的身材定制剧本。

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做法朗梭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近一二年来大家都为她入迷了。她也有她的剧本供应者，但她并不只演为她特写的剧本，从易卜生到萨杜，邓南遮到小仲马，萧·伯讷到亨利·巴太依，在她相当混杂的戏码内都可以找到，有时，她也在古典诗剧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露脸。可是在这等场合，她比较不自在，不论演什么，她总表现她自己，永远只表现她自己，这是她的短处，也是她的长处。她本人没受到群众注意的时候，她的演技并不受欢迎。但一朝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她无论演什么就都显得出神入化，事实是一看到她，你的确会忘掉那些贫弱的作品；经过她的生命点缀之下，那些作品都显得美了。克利斯朵夫觉得比她所演的作品更动人的，倒是这个由一颗陌生的灵魂塑成的、女性的肉体之谜。

她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她的细腻的，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

脸蛋，清瘦，年轻，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她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她的心灵。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像猫眼。她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的迷迷惘惘，半睡半醒，可是睁着眼睛，窥伺着，永远提防着，常常会突然之间发性子，流露出她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看起来那么高，身体也没看起来那么瘦，她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著和头发的式样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她骨子里还有非常强悍的性格。

她年纪大概不到三十岁。克利斯朵夫在伽玛希那边听见人家谈到她，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她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她没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的报复。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搭火车到墨屯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她似乎非常骚动，痛苦；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她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她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的盯着她，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她不耐烦了，把他狠狠的瞪了一眼；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她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那时他才想到是自己把她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

过了几天，他在同一路线上预备搭车回巴黎，占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凳子。她又出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想站起来走开，她却说了声：“你坐下罢。”

那时没有旁人在场，他对于那天使她更换车厢的事表示歉意，他说要是早想到自己使她发窘，他一定会下车的。她冷冷的笑着回答：“不错，那天你一刻不停的老瞪着我，讨厌透了。”

“对不起，”他说。“我自己也压制不住……你那天好似很痛苦。”

“那又怎么办呢？”

“我那是不由自主的。倘若看见一个人淹在河里，你不是会伸手救他吗？”

“我吗，我才不呢，我要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让他早点儿完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点儿嘻笑怒骂，又有点儿牢骚的口吻。因为他愕然望着，她便笑了。

火车到了。除了最后一辆，列车都已经客满，她上去了。车 守催着他们，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重演上次的故事，想另找一间车厢，她可是说：“上来罢。”

他上去以后，她又补了一句：“今天我无所谓了。”

他们谈着话，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的跟她解释，说一个人不该对旁人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家都可以得益……

“安慰对我不生作用……”她说。

克利斯朵夫坚持着，她就傲慢的笑了笑，回答说：“不错，安慰人家的角色当然对扮演的人是有利的。”

他想了一会，才明白对方是怀疑他别有用心，不禁愤愤的站起来，打

欧洲各国行驶千年地或郊外的区间火车，往往都是八人一室的车厢，直接 有门上下，与其他车厢完全隔绝，并无长廊通连，故更换车厢必须下车。

开车门，不管火车开动，就想往下跳，她好不容易把他挡住了，他怒气冲冲的关上了门，重新坐下，那时火车刚进地道。

“你睡，”她说，“跳下去不是要送命吗？”

“我不管。”

他不愿意再和她说话。

“人真是太蠢了，”他说。“大家互相折磨，又把自己折磨；人家想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倒反猜疑。可恶透了！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

她一边笑一边抚慰她，把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亲热的和他谈着，喊出他的名字。

“怎么，你认得我吗？”他说。

“怎么不认识？你，你也是一个红人哪。我刚才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的。算了罢，别生气了，好！咱们讲和罢！”

他们握了握手，友好的谈着话，她说：“可是那也不是我的错。我跟一般人接触的经验太多了，不得不提防。”

“他们也常常欺骗我，”克利斯朵夫说。“我却老是相信他们。”

“我看出你是这样的，你大概是个天生的傻瓜。”

他笑了：“是的，甜酸苦辣我一生尝过不少了；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害处。我的胃很强，饱也没关系，饿也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也能吞下那些来攻击我的可怜虫，我反而身体更好，”

“那是你运气，你哪，你是个男人。”

“而你，你是个女人。”

“那又算不了什么。”

“那是很有意思的，做个女人！”

她听着笑了。“哼！”她说，“可是人家怎么对付女人的？”

“得自卫啊。”

“那末所谓善心也维持不久的了。”

“那是因为一个人还不够慈悲。”

“或许是吧，可是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多，大多了一个人的心会干枯的。”
他正想对她表示同情，忽然记起了她刚才的态度……

“你又要说安慰人家的人是别有用心了……”

“不，”她说，“我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你心地好，非常真诚。我很感激。可是请你什么话都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谢谢你的好意。”

他们到了巴黎，分手了，双方既没留下地址，也没说什么请去谈谈的话。过了一二个月，她跑来敲克利斯朵夫的门。

“我来找你，想跟你谈谈。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不时在想起你。”她说着坐下了。“只要一忽儿功夫，不会打扰你很久的。”

他开始和她谈话。她说：“请等一会，好不好？”

他们不出声了。过了一下她笑着说：“刚才我支持不住了。现在可好些了。”

他想问她。

“不，”她说，“别提我这个！”

她向四下里瞧了一眼，把各种东西看过了，估量了一下，忽然瞧见鲁意莎的照片。

“这是你的妈妈吗？”

“是的。”

她把照片拿在手里，非常同情的瞧着。“多好的老太太：”她说。“你运气不错！”

“可惜她已经故世了。”

“那没关系，反正你是有过这样一个母亲的。”

“那末你呢？”

她拧了拧眉头，把话扯开了。她不愿意人家问起她的事。

“跟我谈谈你的事罢。告诉我……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生活方面的事……”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不用管，你讲罢……”

他不愿意讲，可是不由自主的回答了她的问话：因为她问得非常巧妙。而他所叙述的正是使他悲伤的事，他的友谊的故事，跟他分离了的奥里维。她听着，带着又同情又嘲弄的笑意……突然她问：“什么时候了？啊！天！我来了两个钟点了！对不起……啊！此刻我心情安定多了……”

接着她又说：“我希望能再来……不是常常……而是有时候……这对我有些好处。可是我不愿意使你厌烦，浪费你的时间……只要偶尔谈几分钟就行了……”

“我可以到你那边去，”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要你上我家去。我更喜欢在你这儿谈……”

可是她许多时候没有来。

有天晚上，他无意中知道她病得很重，已经停演了几星期。便不管她从前拦阻的话，径自跑去看她。人家回答说她不见客口但里头知道了他的名字，又把他从楼梯上叫回去。她躺在床上，病好些了，她害了肺炎，模样有了相当的改变，但始终保持着那副嘲弄的神气和锐利的目光。她见到克利斯朵夫，心里真的很高兴，要他坐在床边，用着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谈到自己，说她差点儿死去。他听着脸色变了。她却取笑他，他埋怨她不早通知他。

“通知你要你来吗？那才不呢！”

“我相信你连想也没想到我。”

“那就是你的运气了，”她又俏皮又悲哀的笑着说。“我病中从来设想到你。只是今天刚想到。得了罢，你别难过。我闹病的时候谁都不想的。我只要求人家一件事，就是让我清静。我把鼻子朝着墙等着，愿意孤零零的死掉。”

“自个儿痛苦究竟是不好受的。”

“我惯了。我受过多少年的磨折，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现在已经成了习惯，而且这样倒更好。你倒了楣，谁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屋子里闹些声音，给你一些不识趣的关切，虚情假意的叹息一阵……我宁可一个人请清静静的死。”

“你倒很能够隐忍！”

“隐忍？我简直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咬紧牙关，恨那个使我痛苦的病。”

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来看她，关切她。她说戏院里的同事都是些好人，——是些糊涂蛋，——对她很殷勤，很好，虽然是浮表的。

“倒是我，告诉你，倒是我不愿意见他们，我是一个不容易相交的人。”

“我可不怕，”他说。

她带着可怜他的神气望着他：“你！你也会说这种话吗？”

“对不起，对不起……天哪！我竟变了巴黎人！……惭愧惭愧……我敢打赌，我说的话简直想都没想过……”

他把脸蒙在被单里。她不由得大声笑了起来，在他头上轻轻的拍了一下：“啊！这话可不是巴黎人说的了！还好！我又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了。好，把头抬起来。别哭湿了我的被单。”

“那末你原谅我了？”

“当然。甭提啦。”

她又和他谈了一会，问他做些什么，随后她累了，厌烦了，就把他打发走。

她约他下星期再来。到期正要出门，他忽然接到她的电报，教他别去：她正逢着心情恶劣的日子。——后来，过了一天，她又通知他去了。她差不多已经痊愈，靠窗躺着。那是初春时节，天上照着晴朗的太阳，树木抽着嫩芽。他从来没看见她这样亲这样温和。她说前天连一个人都不能见：便是克利斯朵夫也要跟别人一样受她厌恶。

“那末今天呢？”

“今天，我觉得自己年轻，新鲜，对周围一切年轻和新鲜的人一比如你，——都有好感。”

“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不新鲜了。”

“你到死都是的。”

他们谈着他在别后所做的事，谈着她不久又要去登台的戏院，说到这儿，她告诉他对于戏剧的意见，她厌恶它，又舍不得它。

她不愿意他再上她家里来，答应以后继续去探望他，可是怕打搅他，他把比较不会妨害他工作的时间告诉她，约定一种暗号，教她用某种方式敲门，他随着自己的心绪而决定开或不开她绝对不滥用这种约会，可是有一次她去赴一个夜会担任诗歌朗诵，忽而临时不得劲了，半路上打电话去辞掉，转车到克利斯朵夫寓所来。她愿意只想跟他招呼一下就走的。可是那晚上她居然把一生的历史统统说了出来。

悲惨的童年：她从来没知道谁是她的父亲。母亲在法国北部某城的近郊，开着一所声名狼藉的小客店：许多赶车的跑来喝酒，跟女店主睡觉，同时还虐待她。其中有一个跟她结了婚，因为她有几个钱；他常常酗酒，打老婆。法朗梭阿士有一个姊姊在小客店里当侍女，做牛做马的辛苦到极点，还被继父当她母亲的面好占了，结果是害肺病死的。法朗梭阿士从小挨着拳头：看尽了下流无耻的事，她皮肤苍白，性子暴躁，沉默寡言，童年的心中火气十足，野性很厉害。她眼看母亲和姊姊饮位吞声，受尽了痛苦，耻辱，终于死掉。她可是意志倔强，不肯屈服，她是个反抗的女人：受到某些羞辱的时候，神经发作起来，会把打她的人乱抓乱咬。有一回她想自杀，结果没成功：刚开始上吊已经不愿意死了，生怕真会吊死；等到她气透不过来的时候，便赶紧用抽搐的手指解开绳子，一心一意只想活了。既然不能借死亡来逃避，——（克利斯朵夫听到这里不禁悲哀的笑笑）想到自己的同样的经验，）——她就发誓要出人头地，要自由，要有钱，把一切压迫她的人都打倒在脚下。有一晚她在小房间里听见那男的在隔壁咒骂，被他殴打的母亲叫着嚷着，被他凌辱的姊姊哭着，她便暗暗发下这个愿。她觉得自己多可怜，发了这个愿，心里才松动些。她咬紧牙齿想道：“我要把你们一齐打死。”

在这个黯淡的童年只有一线光明：

有一天，一个和她常在小沟边上玩儿的孩子，因为父亲是戏院里的门房，便带她冒着禁令去看了一次排戏。他们在黑暗里躲在戏池的尽里头，舞台上神秘的景致，在黑暗中愈加显得光华灿烂，那些人说的美妙而不可解的话，女演员那副王后一般的神气，——她的确在一出浪漫派的杂剧中串演王后，——把她看呆了，她紧张得浑身冰冷，心跳得很厉害……“对啦，对啦，要做个这样的人才好呢！……噢！要是办得到的话……”——等到排演完了，她无论如何要看一看晚上的公演，她假装跟着同伴一起出去，却又偷偷的溜回来躲在戏院里，伏在凳子底下，在灰尘中捱了三小时，戏院快要开场，观众已经来了，她正想从躲的地方钻出来，不料被人当场捉住，大受羞辱，结果是被押送回家，又挨了一顿打。那一晚要不是已经知道她将来能够对这些恶徒报复的话，她一定会自杀的了。

她打定了主意，投到一般演员们寄宿的剧场旅馆去当侍女。她字也没识多少，写也不大会写，一本书也没看过，也没有一本中可看，但她愿意学习，发愤用功，在客人房中偷了书，拿来在月夜或是黎明的时候读，免得耗费灯烛。因为演员们生活毫无规律，她这种偷窃的行为很久没有被发觉：至多是失主发一阵脾气了事。并且她把书看过了也还给他们：——可不是完璧：因为她把喜欢的几页撕了下来。书拿回去总是塞在床底下或是家具底下，让失主发见的时候以为从来没出过房间。她常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演员们念台词，随后她自个儿在走廊里轻轻的学着他们的声调，做着手势。人家撞见了，便拿她取笑一阵，羞辱一阵。她只得气愤愤的不作声。——这种方式的教育可以长久继续下去，要不是她有一次偷了一个演员的脚本的话。失主大发雷霆，因为除了她，谁也没进过他的卧室，就咬定是她偷的，她拼命抵赖：演员说要教人搜查，她便吓坏了，立刻扑在地下招认了，同时也招认了别的窃案和撕掉的书页，他大骂了一顿，但他的心地不像外表那样凶。他追究她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一听到她说要做一个女戏子，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又仔细问她：她把记得烂熟的脚本背了好几页，他非常奇怪，问道：“喂，你说，要不要我教你？”

她快活极了，吻着他的手。

“啊！”她打断了话和克利斯朵夫说，“那时我心里多喜欢他啊！”

不料那家伙立刻补上一句：“可是，孩子，你知道，什么都要付代价的……”
“那时她还是处女，人家对她的袭击，她一向是拿出蛮劲来躲过的。这种野人似的贞操，对不洁的行为，对没有爱情的性欲的厌恶，是从小就有的，是家里那些悲惨的景象感应她的；她至今还保持这性格；——可是，唉：她受到多么残酷的惩罚！……命运弄人，竟然到这个地步！……”

“那末你答应他了？”克利斯朵夫问。

“啊！那时倘若能跳出他的魔掌，我连跳在火里都愿意！可是他威吓说要把我当贼一样送去法办。我无路可走，——这样我就投进了艺术——投进了人生。”

“那该死的混蛋！”克利斯朵夫嚷着。

“是的，我当然恨他。但从此以后，我见得多了，他还不算是顶坏的呢。至少他对我没失信，把他所知道的——（也并不多！）

——一套本领教给我。他介绍我进了剧团。我先得侍候大家，替每个人当差，串戏也只串跑龙套。后来，有一晚，扮侍从的女角儿病了，人家临时

把我补上去。从此我就当上了这个角儿。大家认为我要不得，滑稽可笑。那时我长得很丑。我始终是丑的，直到有一天人家忽然认为我是超特的，理想的女人……嘿！那些混蛋！——我的演技被认为一点不照规矩，荒唐胡闹。看客不赏识我。同伴们取笑我。但人家始终把我留着，因为我究竟还有点用处，而且薪水很低。不但薪水很低，还得给人代价。每学一点东西，每次的升级，都要用肉体去报酬。同伴，经理，戏子掮客，戏子拍客的朋友……”

她不出声了，脸色发白，咬着牙齿，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但你可以咂摸到她心中流着血泪。一刹那间，她又看到了当年那些耻辱，和支持她的那股非战胜不可的强热的意志；每经历一次新的污辱，她的意志就锻炼得更加坚强。她很希望死；但就在这些屈辱中间倒下去是太可怕了。要是在以前自杀倒还罢了。要不然等胜利以后也行。可是在已经堕入泥犁而还毫无取偿的时候死掉，未免……

她半天不作声。克利斯朵夫气愤之极，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恨不得把磨难这女子、污辱这女子的那些男人一齐打死。然后他不胜怜悯的望着她，站在她面前，捧着她的头，扶着她的前额，亲热的抱着，叫了声：“可怜的孩子！”

她挣扎了一下。他说：“别怕。我很喜欢你。”

于是眼泪在法朗梭阿士惨白的脸上淌下来了。他跪在旁边，吻着她美丽的细长的手，把两颗泪珠掉在上面。

随后他重新坐下。她也定了定神，很安静的继续讲她的身世。

终于有个作家把她捧了出来。他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发见有魔性，有天才，认为她是一个“戏剧的典型，代表时代的新女性”。自然，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他也把她占有了。而她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也让他占有了，不但毫无爱情，甚至还有跟爱相反的情绪。可是他造成了她的名气，她也造成了他的名气。

“现在，”克利斯朵夫说，“人家对你可没办法了：轮到你来随心所欲的支配他们了。”

“你以为是这样吗？”她辛酸的回答。

于是她又讲起另外一件被命运播弄的事。——她对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坏蛋发生了热情：他是个文人，拿她最痛苦的秘密作了写文章的材料，然后把她丢了。

“我瞧不起他，把他看做跟我脚底下的泥巴一样。可是我爱他，只要他叫一声，我就会跑去向这个该死的家伙低头，想到这点，我气坏了。可是有什么办法？我的心永远不爱我的理智所喜欢的对象。感情和理性，两者必有一个受委屈。我有一颗心。我也有一个肉体。它们叫着，嚷着，都要求满足。我又没有制服它们的武器，我没有信仰，我是自由的……哼，自由！老做着我的心和肉体的奴隶，它们要这个要那个，往往都是我不愿意要的。它们使我屈服，我只觉得惭愧。可是怎么办呢？……”

她停了一会，呆呆的用钳子拨着火灰，然后又说：“我看到书上说做戏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事实上，我所见到的那一批，的确是虚荣的大孩子，除了些争面子的小问题，什么思想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和我，究竟谁才是真正戏子，我相信决不是我。总之我替他们付了代价。”

她打住了话头，时间已经到了夜里三点，她站起身子想走。克利斯朵夫劝她等天亮再回去，姑且在床上躺一躺。她却宁可坐在熄灭的壁炉旁边，继

续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谈话。

“你明天会累的。”

“我惯了。可是你呢……明儿有事吗？”

“我是闲人。要十一点才替一个学生上课呢……并且我身子很棒。”

“那就更需要睡觉了。”

“是的，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无论什么痛苦都抗抵不了瞌睡。有时我恨透了。糟掉了多少光阴！……偶尔熬上一夜，对睡眠报复报复，我倒是挺高兴的。”

他们继续轻轻的谈着，中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克利斯朵夫睡着了。法朗梭阿士看着笑笑，扶着他的头不让他倒下来……她胡思乱想，靠窗坐着，望着漆黑的园子，园子不久也亮起来了。七点左右，她轻轻唤醒了克利斯朵夫，和他道别。

在同一个月里，她又来了一回，恰好克利斯朵夫不在家，门关着。以后克利斯朵夫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她，让她能随时进去。果然，好几次克利斯朵夫都出去了，她在桌上留下一小束紫罗兰，或是在纸上写几个字，涂几笔速写，漫画，——表示她来过了。

一天晚上，她从戏院出来，到克利斯朵夫家谈天。她发现他在工作，两人谈了几句，就发觉彼此都没有上回那样的兴致，她想走；可是太晚了。并非克利斯朵夫阻止她。而是她自己的意志不允许她再走。于是他们留着，都动了欲念。

他们便互相占有了。

这一夜以后，有好几个星期不见她的踪迹，他久已麻木的欲火被她在那一夜挑了起来，竟少不了她了。她不准他到她家里；他便上戏院去，躲在最后几行的位置上，心里又是爱，又是冲动，浑身打战。她演戏的时候所发泄的悲壮热烈的情绪，使他跟她一样的筋疲力尽。他终于写信给她：

“朋友，你恨我吗？要是我使你不快，还得请你原谅。”

一看到这种谦卑的话，她立刻跑来扑在他怀里，说：

“大家简简单单的做个好朋友倒是更好。但既然不可能，也用不着勉强挣扎了。咱们听其自然罢！”

他们过着共同生活，可是并不住在一起，各人保持各人的自由，法朗梭阿士不可能和克利斯朵夫过有规律的同居生活，她的地位也不容许。只能由她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来，或是白天，或是黑夜，和他消磨几个钟点，但每天都回家去过夜。

在戏院停演的暑假中，他们在巴黎郊外，靠叶弗那边租了一所屋子。虽然不免有些凄凉忧郁的时间，他们的确过了些快乐的日子，心心相印和刻苦用功的日子。他们有一间精美的光线很好的卧室，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眼底尽是碧绿的田垄。夜里，他们在床上可以从窗内望见奇奇怪怪的云影，在阴沉黯淡的天空驰骋。他们互相抱着，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着蟋蟀的欢唱，听着雷雨的声音：泥土的呼吸，——金银树，仙人掌，蔓藤，割下的干草的气味，——透到屋子里来，透入他们的身体。黑夜那么寂静。两人睡得那么甜。万籁俱寂。远处儿声狗吠，几声鸡鸣。晨光透露了。在灰暗寒冷的晓色中，远钟传来早祷的声音，使身体躺在温暖的床上打着寒嘴，彼此靠得更紧了。群鸟在爬墙的蔓藤上醒来，喊喊喳喳的聒噪。克利斯朵夫睁开眼睛，屏着气，抱着一腔柔情看着身旁这个朋友的可爱的脸，看着她在爱情激动过后

的惨白的颜色……

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预一分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利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法朗梭阿士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她觉得自己比他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她很抱憾一点不懂他所弹的东西：她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间，才觉得有一股旷野的情绪把她控制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她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她和她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窟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主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朴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像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面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末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像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法朗梭阿士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法朗梭阿士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法朗梭阿士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欺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哑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间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像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法朗梭阿士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瞥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像儿童那样夸大，也不像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的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筐的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像某些病人，津津有味的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法朗梭阿士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像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

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修倍尔脱就渗入他浪漫底克的感伤性，舒芒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雨果·伏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赤裸裸的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亨特尔的作品，——亨特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平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像亨特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词，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华葛耐曾经想在巴哀珂肮的山岗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岗上的已非伽里里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了。

克利斯朵夫对于自己应当做的工作看得很清楚；但他缺少一个诗人，只能靠自己，以音乐为限。而音乐，虽然大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要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声音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克利斯朵夫计划写一组以日常生活为根据的交响乐。他假想一阕《家庭交响乐》，可不是理查·史脱洛斯式的，并不把家庭生活用一幅电影式的图画来表现，并不用一些传统的字母，以音乐的辞藻依着作者的意志来表现各种人物。那是对位学者的迂腐而幼稚的玩艺！……他不预备描写人物或动作，而是要说出每个人都熟悉的，都能在自己心中觅得回声的情感。第一章，表现一对青年夫妇严肃而天真的幸福，温柔的感情，和对于前途的信心。第二章是哭一个亡儿的挽歌。克利斯朵夫表现痛苦的时候竭力避免写实；没有什么个人的面貌，只有一片无边的苦难，——你的，我的，一切人的苦难，也许就是谁都逃不了的命运。因死亡而沮丧的心灵，痛苦的挣扎着，慢慢的振作起来，把它的苦难作为奉献给神明的牺牲，紧接第二章的乐曲，表现心灵继续前进，——是一支意志坚强的《赋格曲》，遒劲的线条与固执的节奏终于把整个人感染了，把他在斗争与血泪中拖着向前，唱着威武的进行曲，抱着百折不回的信仰。最后一章是描写人生的幕景：第一章开始时的那些主题重新出现，——依然有着动人的信心和温柔的情绪，——可是更成熟了：它们受过了磨炼，在痛苦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戴着光明的冠冕，向天空唱着颂歌，对无穷的生命表示虔敬与热爱。

克利斯朵夫也在古书中寻找简单的，有人情味的题目，能够诉之于大众的心灵的。他选择了两个：约瑟与尼奥贝。但克利斯朵夫在这儿遇到了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难题。和法朗梭阿士的谈话使他又想起从前和高丽纳商量

按耶稣少年时代曾在迦里里传道，劝说渔夫：“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法利赛人原为犹太民族中的一种，令移用为伪君子的同义词。

德国现代音乐家理查·史脱洛斯作有《家庭交响乐》。

过的计划，一种介乎吟咏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乐刷，——以自由的语言与自由的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那是今日没有一个艺术家想到的，也是被浸淫于华葛耐传统的，墨守旧法的批评家非笑的艺术。但这的确是崭新的事业，因为要点并不在追随贝多芬，韦勃，舒芒，皮才之后，虽然他们在杂剧方面都很有造就，也并不在把某种朗诵配合某种音乐，竭力用颤音为粗俗的群众制造粗俗的效果；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体裁，使歌唱的声音和近于这些声音的乐器结合起来，把音乐的幻想与嗟叹的回声靡和在优美和谐的诗句中间。这样的形式只能适用于某些有限的题材，适用于心灵的某些特殊的时间，适用于亲切的默省的境界：唯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诗的韵味。没有一种艺术比这个更含蓄更贵族化了。所以在艺术家们自命不凡而实际全是鄙俗的暴发户时代，这种艺术很少发展的机会。

或许克利斯朵夫也不比别人更适合于这种艺术：他的长处，他的平民式的力，就是极大的障碍。他只能想象到这种艺术，同时靠了法朗梭阿土的助力，作出一些略具雏型的样品。

他用这种方法把圣经上的文字谱成音乐，差不多是逐字逐译，——例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重新相聚的那个不朽的故事，约瑟试过了多少方法以后，才那么感动的，那么轻轻的，说出几句使老年的托尔斯泰为之下泪的话：

“我忍不住了……告诉你们，我是约瑟；父亲还活着吗？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失掉了的兄弟，……我是约瑟……”

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满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暴躁，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利斯朵夫素来敬重法朗梭阿土。而可能很残酷的法朗梭阿土，对于一片好心待她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她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还想着她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她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利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

克利斯朵夫看见她默不作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她为什么不快乐。现在她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艺术家了吗？……

“是的，”她说，“可怜我不像那般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这等人一朝爬到相当的地位，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啊！天！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对它多么热望：它在我眼里显得多光明！我远远的膜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剧院，

参阅卷四：《反抗》。——原注。

《旧约》载：约瑟为雅各之子，希伯莱的族长；幼年为兄弟卖往埃及，卒为埃及行政长官，终回希伯莱与父亲兄弟团聚。

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看花的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个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他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复，正如修倍尔脱与裴辽士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教人把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矫饰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

“大人物是用不到我们的，”克利斯朵夫说。“我们应该想到别人。”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二个赞成我的……这就得啦，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淳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有人会领情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蛋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

“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

“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山的高度固然是看清楚了，可是你和它离得更远了……而且谁能说这些的确是最伟大的呢？凡是默默无闻的古人，你认得吗？”

“管它！”克利斯朵夫说。“即使连一个人也感觉不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可还是我。我有我的音乐，我爱它，我相信它；它比一切都更真。”

“在你的艺术里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扮演人家要我扮演的东西，一演再演，演到你心头作恶。美国有些演员把《李泼》或《劳白·玛敢》上演到一万次，一辈子倒有二十五年搬弄着一个无聊的角色。我们在法国虽还没到这个做牛马的地步，可是也走上这条路了。可怜的戏剧！群众所能容忍的天才只是极小量的，修正剪裁过的，洒着时行的香水的……一个‘时髦的天才’！不教你作呕吗？……浪费的精力不知有多少！你瞧人家怎样对付摩南的？他一辈子有什么东西可演？只有两三个人物是值得久存的：一个奥狄泼，一个卜里安克德。其余尽是无聊的

《李泼》为一喜歌剧，故事见华盛顿·欧文短篇名著《李波大梦》。《劳白·玛敢》为十九世纪风行一时的喜剧，剧中人劳白·玛敢为荒淫无耻的小人典型。

东西！可是你想想罢，他可能创造出多伟大了不起的角色！……在法国以外，情形也不见得更好，人家把杜斯 怎样安排的？她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消耗的？为了多少无聊的角儿！”

“你真正的任务，是强迫社会接受强有力的艺术品。”

“白费心血，而且不值得。只要这些强有力的作品一上舞台，就会失去诗意，变成谎言。群众的气息把它摧残了。窒息臭秽的城里的群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野外，什么叫做大自然，什么叫做健全的诗意；它需要一种像我们的脸一样褪色的诗。——啊！而且……而且……即使会成功的话，也不能充实生命，不能充实我的生命……”

“你还想着他。”

“想谁？”

“那个坏蛋喽。”

“是的。”

“如果你跟那家伙在一起，如果他爱你，你也得承认你决不会快乐，你还是会自寻烦恼的。”

“不错……唉！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过去的生活需要我奋斗的地方太多了，我受的磨折太厉害了，再也恢复不了平静的心境，我心里老是烦恼，骚动……”

“那是你没受过磨折以前早有的。”

“也许是吧……不错，我小时候就有烦恼。”

“那末你究竟要些什么呢？”

“我怎么说得清？我要的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我知道这种境界，”克利斯朵夫说。“我少年时代也是这样的。”

“可是你已经成人了。我却永远是少年，根本是个不完全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

“那对我是不可能了。我已经越出界限。生活逼着我，糟蹋我，把我变成残废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又健康又美丽的女子，不至于像那些糊里糊涂的人一样。”

“你还是能够啊。我看你现在多好！”

“告诉我，你把我看做怎么样的人？”

他假定她是在自然与和谐的情形之下发展起来的，非常快乐，爱着人家，也受到人家的爱。她听着心里很舒服，可是过后又说：“现在不可能了。”

“那末你应当像老亨特尔双目失明的时候那样对自己说：

他又在琴上弹给她听。她把他拥抱了，拥抱她亲爱的疯癫的乐天主义者。他给她安慰，她可给他苦恼，至少是怕受使他苦恼。她常常像发病一样的受到绝望的侵袭，又没法瞒着他；爱情使她变得软弱了。夜里，两人躺在床上，她悄悄的熬着痛苦的时候，他猜到了，要求这个似近而实远的朋友把压着她的重担分一些给他；于是她忍不住了，扑在他怀里，一边哭着一边说出心里的话；克利斯朵夫整夜的安慰她，很有耐性，一点都不生气。可是日子一久，这种无穷尽的烦恼势必要打击他。法朗梭阿士唯恐他传染到自己的骚乱。她太爱他了，决不能让他为了自己受苦。有人情她到美国去登台；她答应了，

借此强迫自己动身。她和他分手，使他心里非常屈辱。而她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可叹两个人竟不能使彼此幸福！

“可怜的朋友，”她又悲哀又温柔的笑着说。“咱们真不高明！将来我们永远没有这样美妙的机会，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友谊的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咱们太蠢了！……”

他们互相望着，垂头丧气，难过到极点，为了免得哭而笑着，拥抱着，分别了，眼中含着泪。他们从来没像分别的时候那么相爱。

她动身以后，他又回到他的老伙伴——艺术中去……噢！群星密布，天上是一片和平！……

隔不多时，克利斯朵夫接到雅葛丽纳的一封信。她写信给他，这还不过是第三次；信中的语气和她以往的大不相同。她表示因为不再见到他而非常遗憾，很亲热的要他去，倘若他不愿意使两位爱他的朋友伤心的话。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但并不奇怪。他早就料到，雅葛丽纳对待他的不公平的态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他喜欢念着老祖父的一句取笑的话：“女人早晚必有些心地善良的时间，只要你耐性等待。”

因此他就回到奥里维那边去，他们见到他表示非常快慰。雅葛丽纳特别殷勤，把她素来刻薄的口吻也藏起来了，绝口不说足以伤害克利斯朵夫的话，她关切他的工作，很有见识的谈到一些严肃的问题，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改变了。其实她的改变仅仅是为讨他喜欢。雅葛丽纳听人提起克利斯朵夫和时髦女戏子的恋爱，——那是已经传遍巴黎的新闻，——不禁对克利斯朵夫有了好奇心，另眼相看了。她这一回久别重逢之下，觉得他果然比从前可爱得多，连他的缺点也不无兢力。她发现克利斯朵夫有天才，应当教他爱上自己才好。

青年夫妇的生活情况并没好转；甚至更坏。雅葛丽纳烦闷得要死……女人是多么孤独啊！除了孩子以外，什么都牵不住她；而孩子也不足以永远牵住她：因为倘若她不但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十足地道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灵魂而对生活苛求的话，她就天生的需要做许多事情，而那是没有人帮忙，不能单独完成的！……男人可没有这样孤独，哪怕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不到女人那个地步。他心里的自言自语就足够点缀他的沙漠；而倘若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孤独的话，他就更加能适应，因为他更不注意孤独，而老是自言自语了。他想不到自己若无其事的在沙漠中自个儿说话，使身边的女人觉得她的静默更残酷，她的沙漠更可怕，因为对于她，一切的语言都已经死了，爱情也不能使它再生了。他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不像女人一样把整个生活孤注一掷的放在爱情上面，他还关切着旁的事……但谁去关切女人们的生活和无穷的欲望呢？这些亿兆的生灵，怀着一股热烈的力量，自从有人类起，四千年来老是毫无结果的燃烧着，把自己奉献给两个偶像：爱情与母性，——而母性这个崇高的骗局，对千千万万的女人还断而不与，对另一部分的女子不过是充实了她们几年的生命……

雅葛丽纳在失望中煎熬。她有时感到的恐怖，好比有把刀直刺她的心窝。她想：

“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要生在世界上呢？”

这样她就悲痛到极点。

“天哪！我要死了！天哪！我要死了！”

这个念头常常在夜里跟她缠绕不休。她梦见自己说着：“今年是一八八九年。”

“不，”有人回答她，“是一九〇九年。”

她想到实际的年龄比自己想象的大了二十岁，非常难过。

“生命快完了，我还没有生活过！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搅的？”

她梦见自己变了四个小姑娘，住在同一间房里，分床睡着。四个都是同样的身材，同样的脸，一个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三个都染了时疫死了。第四个在镜子里照着，突然害怕起来；她看到自己的鼻子瘦下去了，脸拉长了……她也要死了，一切都完了……

“……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搅的？……”

她流着泪醒来：恶梦并不因白天的来到而消失，白天就是恶梦。她把她的生命怎么搅的？谁把它糟蹋了的？……她开始恨奥里维了，拿他当做无邪的共谋犯——（无邪也不相干，反正是害了人！）——当做压迫她的盲目的规律的共谋犯。事后她后悔，因为她心是好的；但她太痛苦了；而那个压迫她生命的人物虽则也在痛苦，她仍禁不住要使他更痛苦，作为报复。过后她更难过，厌恶自己；她觉得如果没法救出自己，那她还要增加人家的痛苦。而这救出自己的方法，她就在周围摸索寻找，好比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不管什么都要抓住；她试着去关切一些事情，一件作品，一个人物，好让她拿来变做自己的事，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人物。她勉强再去做些文化工作，学外国语，写一篇论文，一个短篇，从事于绘画，作曲……可是没用：她第一天就灰心了。觉得太难了。而且“书啊，艺术品啊，算什么呢？我还不知道是否爱它们，不知道它们究竟存在不存在……”——有些日子，她非常兴奋的和奥里维有说有笑，似乎对他所说的很热心，她想法教自己麻醉……只是徒然：突然之间兴致没有了，心凉了，她只得躲起来，没有眼泪，没有喘息，只是垂头丧气。——她侵蚀奥里维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成功。他变得怀疑，倾向于浮华了。但她并不满意，觉得他和自己一样软弱。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她在巴黎各处交际场中厮混。谁也没想到，她那含讥带讽而精神老是紧张的笑容下面，藏着悲痛欲绝的苦闷。她找一个能够爱她，支持她，不让她掉入深渊的人……可是找不到。她无可奈何的呼吁，毫无回响。只有一片静默。

她绝对不爱克利斯朵夫，她受不了他粗鲁的举止，令人难堪的爽直，尤其是他的淡漠无情。她绝对不爱他；但她感到他至少是强者，——是死亡上面的一块岩石。她想依附这块岩石，依附这个身在水中而头在水外的人，要不然就把他拖下水去……

而且，单使丈夫跟他的朋友分离还嫌不够，她得把那些朋友从他手里抢过来。最老实的女子有时也有一种本能逼她们尽量的，甚至于过分的施展她们的威力。这样滥用威力的结果，她们的弱点才显出力量。倘若是一个自私的，傲慢的女人，那末她会觉得窃取丈夫的朋友的友谊有种不可告人的乐趣。事情挺容易：只要丢几个眼风就够了。不管那男的老实不老实，他难得不上钩的；朋友尽管知己，尽管能够避免行动，但思想上总是已经欺骗了他的朋友。那朋友要是发觉的话，双方的交谊就完了：彼此都用另一副眼光相看了。——玩这种危险手段的女子，往往至此为止，不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她把两个友谊破裂的男人一齐抓在手里，任意摆布。

克利斯朵夫注意到雅葛丽纳的亲热，毫不惊奇。他一朝对一个人抱着好感的时候，自有一种天真的倾向，认为人家一定也会毫无作用的爱他。所以

看着雅葛丽纳那么殷勤，他也表示一样的殷勤，觉得她非常可爱，跟她玩得很痛快。结果他对她观感太好了，差不多要认为奥里维的不能幸福是由于奥里维自己的笨拙。

他陪着他们坐汽车去作几天短期旅行。朗依哀家在蒲高涅乡下有一所老屋子，仅仅为了它是老家的纪念物而保存着，平时不大去住的：克利斯朵夫就在那儿作客。屋子孤零零的位于葡萄园与森林中间：内部已经破旧，窗子也关不严：到处有股霉烂的，阴凉的，被太阳晒热的树脂味。和雅葛丽纳一起过了几天之后。克利斯朵夫渐渐的感到一种甜蜜的情绪，可是精神并不骚动，他看着她，听着她，拂触到那美丽的身体，呼吸到她的气息，颇有一种无邪的，可是也带点儿肉感的快乐。奥里维稍微担着心，一声不出。他毫无猜疑的意思，但心里模模糊糊的觉得不安，而又不敢承认。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这样揪心，便故意让他们常常单独在一块。雅葛丽纳看到他的心事，觉得很感动，想和他说：“畏，朋友，别难过罢。我爱的还是你啊。”

可是她并不说：他们三个人听让自己去冒险：克利斯朵夫是一无猜疑，雅葛丽纳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欲望，也就存着弄到哪儿算哪儿的心，唯独奥里维一个人有着先见之明，有着预感，但为了自尊心和爱情，不愿意去想。然而意志缄默的时候，本能就要说话了：心不在这儿的时候，肉体就要自由行动了。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大家觉得夜景美极了，——没有月亮，满天星斗，——都想到园中去溜溜。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出屋子。雅葛丽纳上楼去拿一条围巾，好久不下来。最讨厌女人行动迟缓的克利斯朵夫，进屋去找她。——（近来他不知不觉当了丈夫的角色。）——他听见她在那边来了。但他进去的那间屋子，百叶窗统统关了！什么都瞧不见。

“喂！来罢，老是收拾不完的太太，”克利斯朵夫嘻嘻哈哈的嚷着。“你把镜子照个不停，不怕把镜子照坏吗？”

她不回答，停住了脚步。克利斯朵夫觉得她已经在屋子里，可是站着不动。

“你在哪儿啊？”他问。

她还是不作声。克利斯朵夫也不说话了，只在暗中摸索；突然他感到一阵骚动，心儿乱跳，也停了下来，听见雅葛丽纳的呼吸就在身边。他又走了一步，又停住了。他知道她就在近旁，但他不愿意再向前。静默了几秒钟。突然之间，两只手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着，一张嘴贴在了他的嘴上。他把她紧紧搂着。大家没有一句话，一动也不动。——然后嘴巴离开了，彼此挣脱了。雅葛丽纳走出屋子。克利斯朵夫气吁吁的跟着她，两腿索索的发抖。他靠着墙站了一会，让全身奔腾的血平静下去。终于他追上了他们。雅葛丽纳若无其事的和奥里维说着话。他们走在前面，和他相隔几步。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的跟着。奥里维停下来等他。克利斯朵夫也跟着停下。奥里维亲热的叫他。

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答。奥里维知道朋友的脾气和那种死不开口的僻性，也就不坚持而继续和雅葛丽纳往前走了。克利斯朵夫木头人似的随在后面，隔着十来步，像条狗一样。他们停下，他也停下。他们走，他也走。大家在园中绕了一转，进去了。克利斯朵夫上楼去关在自己房里：不点灯，不睡觉，不思想。到了半夜，他倦极了，把手和脑袋靠在桌上；睡着了。过了一小时，他醒过来，点起蜡烛，性急慌忙的把纸张杂物都收起来，整好了衣箱，倒在

床上直睡到天亮。然后他带着行李下楼，动身了。大家整天等着他。找他，雅葛丽纳面上装做很冷淡，心里又气又恼，用一种侮辱的讥讽的神气：故意检点她的银器。直到第二天晚上。奥里维方始接到克利斯朵夫一封信：

“好朋友，别怪我像疯子一般的走了。我是疯子，你也知道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我。谢谢你亲切的招待。那真是太好了。可是你瞧，我从来不能和别人一起生活。也许我根本不配生活。我只能躲在一边，远远的爱着别人，这样比较妥当。要从近处看人，我会厌恶他们。而这是我不愿意的。我愿意爱别人，爱你们。噢！我多愿意使你们幸福。要是我能够使你们，——使你幸福，我肯牺牲我自己所能有的幸福！……但这是不允许的。一个人只能为别人引路，不能代替他们走路。各人应当救出自己。救你罢！救你们罢！我多爱你！——耶南太太前乞代致意。

克利斯朵夫。”

“耶南太太”抿着嘴唇，念完了信，带着轻蔑的笑容冷冷的说：“那未听他的劝告。救救你自己罢。”

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收回信来，雅葛丽纳却把信纸搓成一团，摔在地下：两颗眼泪在眼眶中涌了上来。奥里维抓着她的手，慌慌张张的问：“你怎么啦？”

“别管我！”她愤愤的叫着。

她出去了，在门口又嚷了一声：“你们这批自私的家伙！”

克利斯朵夫终于把《大日报》方面的保护人变成了仇敌。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克利斯朵夫天生有那种为歌德所称扬的“不知感激”的德性：

“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害了……”

克利斯朵夫认为不能为了人家的援助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放弃自由，那跟降低人格并无分别。他要给人好处，决不自居为希望收利息的债主，而是把好处整个的送人的。他的恩主们的见解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受恩必报是天经地义，所以克利斯朵夫不肯在报馆主办的一个含有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中，替一支荒谬的颂歌写音乐，在他们眼中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们暗示克利斯朵夫说他行为不对。克利斯朵夫置之不理。不久他还很不客气的否认报纸所宣传的他的主张，使那些恩主们愈加恼羞成怒。

于是报纸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他了。人们又搬出一些血口喷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来攻击一切创造者而从来杀不死一个人的，可是对于所有的糊涂蛋，的确百发百中，极有效果。他们指控克利斯朵夫的罪名是剽窃。他们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从一些无名作家的曲子里取出一段来化装一番，证明他偷了别人的灵感，说他想扼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套要是出于一般以狂吠为职业的人，出之于爬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伟大”的下贱的批评家，倒还罢了；可是有才气的人也要互相倾轧，竭力教对方受不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尽够他们安安静静的各做各的工作，而各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才具已经需要拚命的奋斗了。

德国有些嫉妒的艺术家常常把武器供给克利斯朵夫的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发明些武器。这种人在法国也有的是。音乐刊物上的国家主义者——其中不少是外国人，——指出克利斯朵夫出身的种族，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克利斯朵夫的名气已经不小；就因为他走红，连那些毫无成见的人看了也恼了，——其余的更不必说。在音乐会听众里面，此刻有一批上流人物和前进杂志的作家热烈拥护克利斯朵夫，不问他们写什么，总一致叫好，说在他以前简直没有音乐，有几个人解释他的作品，发见其中有哲学意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吃惊。又有几个从中看到一种音乐革命，说是对于传统的攻击，不知克利斯朵夫正敬重传统。他尽管分辩也没用。大家会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的佩服他就等于佩服他们自己。所以报纸上对克利斯朵夫的攻击，使他音乐界的同业非常痛快，因为他们相信那虚构的“谎言”是事实而表示愤慨。其实他们不爱他的音乐也用不着这些理由，自己并无思想可以表现，但照着呆板的方式把思想表现得非常流利的大多数人，一朝看到克利斯朵夫思想丰富，而凭着创造的想象力（表面上不免有点儿杂乱）表现得有些笨拙的时候，当然要恼怒了。一般当书记的家伙，只知道所谓风格便是文社学会里的公式，只消把思想放进去，像烹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他们一再指责克利斯朵夫不会写作。至于他最好的一批朋友，不想了解他的，或是因为老老实实的爱他（因为他使他们幸福）而真能了解他的，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无名的听众。唯一能够替克利斯朵夫作强有力的答复的奥里维，和他分离了，似乎把他忘了。于是克利斯朵夫同时落在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手里；这两种人作着竞争，看谁把他损害得更厉害。他厌恶之余，绝对不加声辩。有一回他在一份大报上读到一个为大众的愚昧与宽纵所造成的艺术界权威，——一个僭越的批评家对他的宣判，他耸耸肩说：

“好罢，你批判我罢，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

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控诉都信以为真。

克利斯朵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个时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哀区脱的，他依次印行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利斯朵夫不利的契约；但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出乎意外的发见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四手的钢琴曲，事先都没通知他。他便跑去见哀区脱，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知道。”

“你竟然敢……竟然敢私自篡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

“什么许可？”哀区脱静静的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不是的，”哀区脱语气很温和的说。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

“你把它们卖掉了。”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罢。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

“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初版每份三十生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三百法郎，作为你卖绝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

“连毁掉它的权利也在内吗？”

哀区脱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拉夫脱先生的案卷给拿

来。”

他静静的把契约条文念给克利斯朵夫听，那是当时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订的：——“哀区脱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权利，由哀区脱独家出版，发行，铸版，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适合任何乐器，或增加歌辞，或更换题目，或……均由哀区脱君自由处理，与任何人无涉……”

“你瞧，”他说，“我还是极客气的呢。”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我得谢谢你。你还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呢。”

他不作声了，狼狈不堪的把手捧着头，再三说：“我把灵魂出卖了。”

“放心罢，”哀区脱带着讥讽的口气，“我决不滥用我的权利。”

“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

“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哀区脱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说。“拿回去罢。”

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三百法郎来还给哀区脱，可是拿不出。哀区脱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气。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

“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哀区脱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品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像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部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贫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

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像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情着偶然的机会有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来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夜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期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当依赖他们，而应当像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抱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像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

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鹤鸪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铺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蒲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二次。

“是洛金吗？”克利斯朵夫问。

他们就此攀谈起来。

“你是儿子吗？”园丁问他。

“她有三个儿子呢，”克利斯朵夫回答。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出息。”

克利斯朵夫的头微微往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

“我要关门了，”园丁说。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转。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停了一会，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了！老于莱，——于莱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利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星都亮起来了……

第二天他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愁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墓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已经走了几步，他忽然改变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的下了几点雨。克利斯朵夫想道：

“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罢！……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

他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市街：情形跟从前大不同了。城门口，在废弃的壕沟的走道上，有个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家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爬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的发见：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狭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等到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洋洋的少妇，好奇的在车中打量他。接着她惊讶的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教车子停下，喊道：“是克拉夫脱先生吗？”

他停住了脚步。

她笑着说：“我是弥娜呀……”

他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像初次遇到她的时候一样的慌乱。和她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往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她介绍说是“法官洪·勃龙罢哈先生”，——她的丈夫。她要克利斯朵夫到她家里去。他想法推辞。但弥娜一味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

她说话又响又急，不等克利斯朵夫问，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统统讲了出来。克利斯朵夫被她的大声叫嚷闹昏了，只听到一半，只管望着她，啊，啊，这便是他的小弥娜！她长得结实，丰满，皮肤挺好，颜色像蔷薇似的，但线条都松了，尤其是那个丰腴的鼻子。姿势，态度，风韵，都和从前一样，唯有身材变了。

她老是说个不停，和克利斯朵夫讲着她过去的历史，她的私事，讲着她爱丈夫和丈夫爱她的方式。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她却非常乐观，没有一点儿批评精神，觉得——（至少在当着别人的时候），——她的城市，她的屋子，她的家庭，都胜过别的城市，别的屋子，别的家庭。她的丈夫面前说丈夫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男子”，在他身上有“一股超人的力量”。而那“最伟大的男人”一边笑着一边拍拍弥娜的腮帮，和克利斯朵夫说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贤慧的太太”。这位法官似乎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事，决不定对他应该表示敬意还是轻蔑，既然一方面他还有旧案未了，另一方面又有大老庇护；结果他决定参用这两种态度。弥娜可老是滔滔不竭的说着，对克利斯朵夫说了一大堆关于自己的事，又转过话题来提到他了，她问他这个那个，内容的亲密恰好像她的自白一样，因为她刚才的叙述就是对他并未提出而由她自己假想出来的问题的答复。她能重新见到克利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她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可是知道他已经成名，觉得自己被他爱过——（而被她拒绝）——是很可以得意的，便在说笑之间提到那件事，也不管措辞的雅俗。她要他在纪念册上签名，紧钉着盘问他巴黎的情形。她对这座城市所表示的好奇心，正好跟她的轻蔑相等。她自称为认识巴黎，去过歌舞剧场，歌剧院，蒙玛德尔，圣·格鲁。据她说来，巴黎女子都是些淫娃荡妇，毫无母性，只希望孩子越少越好，有了也置之不问，把他们丢在家里而自己到戏院与娱乐场所去。她绝对不允许人家表示异议。晚上，她要克利斯朵夫在琴上奏一阕。她觉得妙极了，但心里认为丈夫的琴和克利斯朵夫弹得一样高明。

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见到弥娜的母亲，特·克里赫太太。他暗中老是感激她，因为她以前待他很好。她此刻心地还是那样慈悲，并且比弥娜更自然，但对克利斯朵夫永远带点取笑的态度，那是他从前为之气恼的。她和他当年离开她的时候完全一样，喜欢着同样的东西，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可能有另一种面目。她把以前的克利斯朵夫和今日的克利斯朵夫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小时候的克利斯朵夫。

除了克利斯朵夫，克里赫太太周围的人一个也没改变思想。死气沉沉的小城，眼界的狭窄，使他受不了。那晚上有一部分的时间，主人们都在说他不认识的人的坏话。他们老注意着乡邻的可笑，把凡是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都叫做可笑。这种恶意的的好奇心，永远关切着一些无聊的事，终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难受。他提到自己在外国的生活，但立刻感到他们是没法领会这种法

国文明的。过去他讨厌这种文明，现在回到本国来，倒是他代表这文明而觉得它可贵了，——自由的拉丁精神的第一条规律是了解：不惜把“道德”牺牲了去换取“尽量的了解”。在那些主人身上，尤其在弥娜身上，他重新发见以前伤害过他而他已经忘了的那种骄傲，——从弱点上来的、也是从德性上来的骄傲，——只知道守本分而没有一点慈悲心，以自己的德性来傲视别人：凡是自身没有的缺陷，他们都瞧不起：最重要的是体统，“不合常规”的优越都是要不得的。弥娜心平气和的，俨然的，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批判别人的时候用的老是同样的尺寸。她不愿意费心去了解他们，只知道关切自己。她的自私染了一层模糊的玄学色彩，无论什么都离不开她的自我和自我扩张。或许她心地很好，能够爱别人。但她太爱自己，尤其是太尊重自己。她似乎永远要在她的自我前面加一个“长老”或“敬礼”的字眼。我们可以觉得，要是她最心爱的男人胆敢有一刻儿——（以后他一定会后悔无穷），——对她尊严的自我失敬的话，她就会不爱他，永远的不爱他……嘿！为什么不丢开你这个“自我”。想想“你”呢？……

然而克利斯朵夫并不用严厉的眼光看待她。他平时那么容易气恼，此刻竟非常耐性的听着，不让自己批判她，只把童时的回忆像一道光轮般罩着她，一心一意要在她身上找出小弥娜的影子。她某些姿态的确保存着当年的模样，嗓子有些音色也还能引起动人的回忆。他沉溺着这些，不声不响，也不听她的话，只装做听着的样子，始终对她表示一种温柔的敬意。可是他不大能集中精神：现在这个弥娜的咕咕呱呱的声音使他听不见从前的弥娜。最后他有点腻了，站起身来，心里想着。

“可怜的小弥娜！他们想教我相信你在这里，在这个大声叫嚷，使我厌烦的，美丽肥胖的女人身上。但我明明知道不是。算了罢，弥娜。咱们跟这些人是不相干的。”

他走了，推说明天再来。倘若他说出当晚动身的话，不到开车的时间他们一定不让出门的。在黑夜里才走了几步，他又恢复了没有遇到弥娜以前的那种愉快的印象。不愉快的夜会一下子就给忘了，莱茵的声音把什么都淹没了。他走到河滨，靠近自己出生的屋子。他一看就认得了。护窗关得严严的，里头的人已经睡了。克利斯朵夫在路中停下，觉得要是去敲门的话，那些熟悉的幽灵一定会来开的。他走上屋子四周的草原，到河边从前跟舅舅谈话的地方坐下。以往的日子仿佛都回来了。而那个跟他一起做过美妙的初恋的、心爱的小姑娘，也复活了。少年的温情，甜蜜的眼泪，无穷的希望，都重新温了一遍。他自嘲自讽的笑着对自己说：

“我简直没得到人生的教训。明知故犯……明知故犯，……永远作着同样的梦。”

能够始终如一的爱，始终如一的信仰是多么好！凡是被受过的都是不死的。

“弥娜，和我在一起的——不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弥娜：永远不会老的弥娜！……”

朦胧的月从云端里出来，在河上照出粼粼的银光。克利斯朵夫觉得河面跟他所坐的陆地比以前近多了。他走过去细看了一下。是的，从前在这里，在这株梨树的外边，有一带沙地和一方小小的草坪，他老在上面玩儿的。河流把它们侵蚀了；水已经浸到梨树的根。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悲从中来。然后他向车站走去。那儿也变了一个新兴的市区：——有穷人的住家，有正在建

筑的工场，有工厂的烟突。克利斯朵夫记起下午看到的皂角树林。想道：“那边，河流也在侵蚀……”

在阴影中沉睡的古旧的城市，和城里的一切主人与死者：对他更显得可贵了，因为他觉得它们受着威胁……

敌人已经占有了城垣……

赶快把我们的人救出来罢！死亡窥伺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赶快把正在消失的脸庞塑成永久的铜像罢。我们得从火焰中救出国家的财宝，趁着大火还没把宫殿烧毁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好似一个逃避洪水的人，上了火车走了可是也和那般从城里救出护城神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把那些从乡土里爆起来的爱的火花，过去的神圣的灵魂，一齐揣在怀里带走了。

在某个时期内，雅葛丽纳和奥里维彼此接近了些。雅葛丽纳的父亲故世了。在真正的苦难前面，她才感到别的苦难都是无聊的；而奥里维的温情也把她对他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她觉得倒退了几十年，过着像玛德姑母死后那些凄凉而紧接着爱情的日子。她认为自己对人生太不知足，应当要感谢人生没有把它所给的些少东西收回。现在知道了这些少东西的价值，她就拼命的抓着。医生劝她离开一下巴黎，免得永远想着丧事；她便和奥里维作了一次旅行，到他们初婚那年住的地方走了一转，结果愈加感动了。生命的途程拐了弯，他们不胜惆怅的又看到了先前认为已经消失的爱情，看着它来，也知道它仍旧要消灭，——消灭多少时候呢？也许是永远！——于是两人无可奈何的把爱情死抓着……

“留下来啊，和我们守在一块儿啊！”

但他们明明知道要失掉的……

雅葛丽纳回到巴黎，觉得身上有了一个被爱情燃烧起来的小生命。但爱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渐渐加重起来的担负，并不使她和奥里维靠得更紧。她并不感到意料之中的快乐，只是很不放心的追问自己。从前她苦闷的时候，往往以为生个孩子一定可以救她。现在孩子来了，救星可没有来。这是一株植物，根须深深种在她的肉里：她不胜惊骇的觉得它在生长，喝着她的血。她整天的出神，惘然听着，整个生命都被这个占据她的陌生的生命吸引。那是一种模糊的，柔和的，催眠的，悲痛的，嗡嗡的声音。她忽然惊醒过来，——汗流浹背，打着寒噤，想要反抗了。她掉入了“自然”的网罗，竭力想挣扎。她要生活，要自由，觉得被“自然”欺骗了。随后她又觉得这些思想可耻，觉得自己残忍，不知道自己的心地是不是比别的女子坏，是不是跟她们完全不同。然后她又慢慢平静下去，迷迷糊糊的想着在怀中成熟的“活果”。它将来是怎么样呢？……

一听见它出世以后的第一声叫喊，一看到那可怜而动人的小身体，她整个的心都溶化了，一刹那间尝到了母性的光荣的欢乐，世界上最强烈的欢乐：从痛苦中创造出一个用自己的血肉制成的生物，一个人。策动宇宙的爱的巨浪，把她从头到脚的裹住了，连卷带滚，夹着上天了……噢，上帝！能够创造的女人是跟你平等的，而你还领略不到她那样的欢乐，因为你没有受苦……

随后，浪头落下去了，心又沉到了海底。

奥里维激动得浑身哆嗦，瞧着孩子。他对雅葛丽纳微微笑着，想了解在他们俩和这个可怜的，略具人形的生物之间，有什么神秘的生命的联系。他又温柔又有点儿厌恶的，把嘴唇亲了亲那个黄黄的打皱的小脑袋。雅葛丽纳

望着他，很嫉妒的把他推开了，接过孩子，紧紧的搂在怀里，拚命亲吻。孩子嚷了，她马上放下，掉过头去哭了。奥里维走来拥抱她，替她抹眼泪，她也把他拥抱了，勉强笑着。然后她要求让她休息，把孩子留在身边……唉！可怜！一朝爱情死了，还有什么办法？男人是把自己一大半交给智慧的，只要有过强烈的感情，决不会在脑海中不留一点痕迹，不留一个概念，他可能不再爱，却不能忘了他曾经爱过。一个毫无理由的、整个儿爱人家的女人，一朝毫无理由的整个儿不爱的时候，却是没有办法的。发愿心吗？自骗自吗？但要是她太懦弱而不能发愿心，太真诚而不能骗自己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雅葛丽纳把肘子撑在床上，又温柔又哀怜的望着孩子。他是什么呢？不管他是什么，总不完全是自己。他也是“另外一个”。而这“另外一个”，她已经不爱了。可怜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她对于这个要把她和一个已经死灭的“过去”连在一起的生物感到恼怒，她恼着头瞧他，拥抱他，拥抱他……

现代女子的大不幸，是她们太自由而又不自由。倘使她们更自由一点，就可以想法找点事作依傍，从而得到快感和安全。倘使没有现在这样的自由，她们也会忍受明知不能破坏的夫妇关系而少痛苦些。但最糟的是，有着连系而束缚不了她们，有着责任而强制不了她们。

如果雅葛丽纳相信她是一辈子注定守在这个小家庭里的，那末她可能不觉得家庭这么窄，这么不方便，她会把它安排得更舒服，终于会像开始的时候一样的爱家庭。可是她知道能够走出家庭，便觉得在屋子里窒息了。她可以反抗：结果她竟相信是应该反抗的了。

现代的道德家真是些古怪的动物。他们把整个的生命都做了“观察器官”的牺牲品。他们只想看人生；既不十分了解它，更谈不到有什么愿望。他们把人性认清了，记录下末之后，就以为尽了责任：他们说，“瞧，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并不想改造人性，在他们心目中，仿佛“存在”便是一种德性。因此所有的缺陷都有一种神圣的权利。社会是民主化了。从前不负责任的只有君主，现在是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无赖。都是不负责任的了。这种导师真是了不起！他们殚精竭虑，竭力要教弱者懂得他们软弱到什么程度，懂得那是他们的天性，应当永远这样的。在这个情形之下，弱者除了抱着手臂发呆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凡是不欣赏自己的弱点的人算是上乘的了。但女人老听见人家说她是个有病的孩子，就以疾病与幼稚自傲。人们培植她们的懦弱，帮助她们变得更懦弱。要是有人敢公然宣称，少年时代有个年龄，因为心灵还没得到平衡，所以大有犯罪、自杀、灵肉堕落的危险，而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那末立刻会有罪案发生。便是成人，只要你反复不已的和他说他不能自主的，他就可以不能自主而听任兽性支配。反之，只消告诉女子，说她能够支配她的肉体 and 意志，她就可以做到这一步。可是你们这般懦怯的家伙偏不肯说：因为你们要利用她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而从中取利！……

雅葛丽纳所处的可悲的环境终于使她完全迷路。自从她和奥里维疏远以后，她又回到她少年时代瞧不起的社会中去。在她和她的已嫁的女朋友周围，有一小群有钱的青年男女，都是漂亮的，有闲的，聪明的，意志薄弱的。他们的思想言论都绝对自由，但他们极有风趣，不至于自由到过火的地步，倒反使自由有点儿调剂的作用。他们很乐意引用拉勃莱的箴言：

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这是他们夸口，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大愿望，只是些在丹麦未修院里烦闷的人物。他们乐于宣扬“本能自由”的教义，但这些本能他们在身上差不多已经消灭；他们的放纵只是在头脑里空想一番。他们最高兴让自己在这个文明的浴池中溶化，呼吸那种淡薄的淫乐的空气，——人类的精力，强烈的生命，原始的兽性，信仰，意志，热情，责任，都在那微温的泥洼里化为液体。雅葛丽纳美丽的身体，就浸在这粘液似的思想中间。奥里维没法阻止她。他也传染到当时的流行病，以为自己没权利限制他所爱的人的自由；除非靠着爱情的力量，他什么都不愿意争取。雅葛丽纳可并不对他感到满意，因为她认为自由原来是她的权利。

糟糕的是，她把她的整个心交托给这个两重生活的社会。而她的心是绝对不容许有模棱两可的情形的：一朝有了信仰，就得倾心相与：那个热烈慷慨的灵魂，便是在自私的行为中也是火刺刺的燃烧着她所有的血管，而且在她和奥里维共同生活的期间，她也保持着遇事不稍假借的精神，即使是不道德的事也预备彻彻底底的去干。

她的一般新朋友是太谨慎了，决不会给别人看到自己的真相。如果他们在理论上扬言绝对不受道德与社会的偏见支配，实际上却安排得决不和任何对他们有利的偏见断绝关系；他们利用道德与社会，同时欺骗它们，好比不忠实的仆役盗窃主人。由于游手好闲，也由于习惯，他们之间还互相窃盗。很有些丈夫知道妻子养着情夫。这些妻子也知道丈夫有着外遇。他们各得其便。只要不吵吵嚷嚷的闹起来，就无所谓丑事。这些好夫妻都是像合伙股东——也可以说是共谋犯——一样有默契的。可是雅葛丽纳比较坦白，对什么都一本正经。第一，要真诚。第二，要真诚。第三，还是要真诚，永远要真诚。真诚也是当时所宣扬的德性之一。但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对于健全的人，一切都是健全的；对于腐败的心灵，一切都是腐败的。真诚有时是多么丑恶！一般庸劣的人要洞烛他们的内心简直是一种罪孽。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庸劣而还沾沾自喜。

雅葛丽纳老是在镜中研究自己，看到了最好是永远不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一朝看到了，她就没勇气把眼睛移往别处；她非但不加扑灭，反而看着它们长大，变得硕大无朋，终于把她的眼睛和思想一齐占据了。

孩子并不充实她的生活。她不能自己喂奶，孩子一天天的委顿了。只得雇用乳母。她先是非常悲伤……不久可觉得松了口气。孩子健旺了，长得很强壮，脾气很乖，没有声音，常常睡着，夜里也难得哭喊。乳母是一个并非初次哺育的结实的女子，对婴儿有种本能的，嫉妒的，过分的感情，——她反倒像是真正的母亲。雅葛丽纳要是发表什么意见，乳母也只管依着自己的心思做去；倘若雅葛丽纳争论几句，马上会发觉自己原来一无所知。自从生产以后，她的健康始终没恢复：初期的静脉炎使她精神上大受打击；几星期的躺着不动，她更苦恼了，狂乱的思想翻来覆去的钉着同一个问题：永远是那几句怨叹：“我根本没生活，而现在我的生命已经完了……”因为她神经过敏，自以为永远残废了，又认为孩子是致病的原因，暗中非常恨他。这种心理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少，不过是被遮上一重幕罢了；有这种心理的女子还不敢对自己承认，觉得是可耻的。雅葛丽纳责备自己：自私与母爱在她胸中交战。看到婴儿睡得那么甜蜜，她就软心了；但一忽儿她又好不幸酸

的想道：“他要了我的命。”

同时她对于孩子无知无觉的酣睡有种反感：他的幸福是用她的痛苦换来的。便是她病好了，孩子大了一些之后，她暗地里仍旧怀着这种故意。但因为觉得可耻，便把敌意转移到奥里维身上。她继续拿自己看做病人，老是担忧健康问题，医生们又推波助澜，鼓励她一事不做，——其实一事不做就是她的病根，——使她和婴儿隔离，绝对不能行动，绝对的孤独，几星期的躺着，百无聊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像一只填鸭，——结果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现代的医学治疗真是古怪，它拿另外一种病——自我扩张病——去代替神经衰弱！你们为什么不替他们的自私病施行放血治疗呢？倘若他们的血不太多，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头里的血移一部分到心里去？

病后，雅葛丽纳身体更强壮，更发福，更年轻了，——精神上却是比什么时候都病得厉害。几个月的孤独把她和奥里维思想上最后的联系给斩断了。只要留在他旁边，她还能受到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影响，因为他虽然懦弱，还维持他的信念。她一向想摆脱一个精神上比她更强的人的控制，想反抗那洞烛她的内心而有时使她不得不责备自己的目光，只是徒然。但她一朝偶然跟这个男人分离了，没有他那种明察秋毫的爱压在她心上，她完全获得自由以后，他们之间友善的信心立刻会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怨恨的心理，恨自己曾经倾心相与，恨长时期的受着感情的束缚，这感情自己是早已没有的……在一个你所爱的而你也以为爱你的人心中酝酿的怨恨，简直没法形容。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上一天她还爱着，似乎爱着，自以为爱着。忽然她不爱了，把先前所爱的人在心上丢开了。他突然发现了这一点，觉得莫名其妙，完全没看到她心中长时期的酝酿，从来没猜疑到她暗中日积月累的恨意，也不愿意去体会这种报复与仇恨的原因。那些原因往往是长久以前就潜伏着的，多方面的，捉摸不到的，一有些是埋在床帷之下的，——有些是自尊心受了伤害，心中的秘密被对方窥见了，批判了，——又有些……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有种暗中的伤害，虽然是无心的，可是受到的人永远不能原谅。这等伤害，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她自己也不大清楚：但伤痕已经深深的刻在她的肉体上，而她的肉体就永远忘不了。

要挽回这种可怕的越来越冷淡的感情，必须一个性格和奥里维不同的男人才有办法，——这种人一定是更接近自然，更单纯，同时也更有伸缩性，没有婆婆妈妈的顾虑，本能很强，必要时能采取为他的理性不赞成的行动。奥里维却是没有上阵就打败了，灰心了：太明察的目光使他早已在雅葛丽纳身上辨认出比意志更强的遗传性，——她母亲的心灵；他眼看她像一块石子般掉在她那个种族的深渊里；而他又懦弱又笨拙，所有的努力反而使她往下掉得更快。他强自镇静。她却无意之间有种打算，不让他保持镇静，逼他说出粗暴鄙俗的话，使自己更有理由轻视他。要是他忍不住而发作了，她就瞧不起他。如果他事后羞愧，她就更瞧不起他。如果他耐着性子，不上她的当，——那末她恨他。最糟的是他们一连好几天的不说话。令人窒息、骇怖的沉默，连最温和的人也受不住而要为之发狂的；有时你还感到一种想作恶、叫喊、使别人叫喊的欲望。静默，漆黑一片的静默，爱情会在静默中分解，人会像星球般各走各的，湮没在黑暗中去……他们甚至会到一个阶段，使一切的行为，即使目的是求互相接近，结果都促成他们的分离。双方的生活变得没法忍受了。而一桩偶然事故更加速了事情的演变。

一年以来，赛西尔·弗洛梨时常在那南家走动。奥里维最初在克利斯朵

夫那里碰到她，以后，雅葛丽纳请她到家里去，赛西尔便常常去探望他们，便是克利斯朵夫和他们分手之后也是这样。雅葛丽纳对她很好，虽则自己不大懂音乐，认为赛西尔很平凡，但喜欢她的唱，觉得一看到她，精神上很舒服。奥里维很高兴和她一起弹琴唱歌。久而久之，赛西尔做了他们的朋友。她使人感到心神安定：一踏进那南家的客厅，那双坦白的眼睛，健康的气色，微嫌粗野但令人听了怪舒服的笑声，好比浓雾中透入一道阳光。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的心都为之苏慰了。她每次离开的时候，他们很想对她说：“你再坐坐罢，坐坐罢！我多冷啊！”

雅葛丽纳出门养病的时期，奥里维见到赛西尔的次数更多了；他不能对她瞒着心中的悲伤，便不假思索的尽量诉说，正如一个懦弱而温柔的心灵在苦闷的时候需要发泄一样。赛西尔听了很感动，用些慈爱的话安慰他。她替他们俩惋惜，鼓励奥里维不要灰心。可是或许因为她觉得听了这些心腹后比他更窘，或许因为别的什么理由，她托辞把访问的次数减少了。没有问题，她以为自己的行动对雅葛丽纳不大光明，她没权利知道这些秘密。奥里维认为她的疏远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且那理由也很充分：他埋怨自己不应该向她诉苦。可是疏远的结果，他发觉了赛西尔在他心中的地位。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的思想交给她分担；唯有她才能使他从压迫他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他素来把自己的感情看得雪亮，所以他这一回对赛西尔的感情究竟是哪一种，胸中早已了然。他绝对不和赛西尔说，但禁不住要把自己所感到的写下来。近来他又恢复那危险的习惯，借笔墨来自言自语。在他和雅葛丽纳爱情浓厚的几年中，这种嗜好已经戒掉了，但一朝恢复了只身独处的生活，遗传的癖性又发作了：这是痛苦的发泄，又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艺术家的需要。他描写自己，描写他的痛苦，好似对赛西尔当面说着一样，——而且可以更自由，因为赛西尔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文字。

但不巧这些文字竟落在雅葛丽纳眼里。那天她正觉得自己精神上和奥里维非常接近，那接近的程度是多年未没有的。她整着柜子，翻到他以前给她的情书，感动得哭了。坐在柜子的黑影里，设法再收拾东西，她把过去的历史温了一遍，眼看自己把它毁了，懊悔到极点，同时又想到奥里维的悲伤。关于这一点，她从来不能无动于衷：她可能忘掉奥里维，但想到他为她而痛苦就受不住。她心碎肠断，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和他说：“啊！奥里维，奥里维，咱们怎么搅的？咱们是疯子，疯子！别再自寻烦恼了罢！”

要是他这时候走进屋子的话可多么好！……

不料正在这时候，她发见了奥里维给夜莺的那些信……于是什么都完了。——她是不是以为奥里维真正欺骗了她呢？也许是的。但这一点是不相干的。她认为精神上的欺骗比行为方面的欺骗更要不得。她可以原谅她所爱的人有一个情妇，可不倦宽恕他私下把心给了另外一个女子。当然，她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有的人会这样说。因为一般可怜的人直要到爱情的欺骗成为事实的时候才感到痛苦。……殊不知只要心不变，肉体的堕落是不足道的。要是心变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雅葛丽纳不想把奥里维再争取口来。那已经太晚了！她对他的爱不像以前那么深切了。或者是太爱他了……但这不是嫉妒，而是全部信心的崩溃，而是她对他所有的信仰与希望的破灭。她设想到原来是她瞧不起这信仰与希望的，是她使他灰心的，逼他倾向于这次的爱情的，也没想到这爱情是无邪

的，一个人的爱或不爱究竟是不能自主的。她从来没想到拿自己和克利斯朵夫的调情跟这次的事作比较：她不爱克利斯朵夫，所以那根本不算一回事。在过分冲动的情形之下，她以为奥里维对她扯谎，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了。正当她伸出手去抓握最后一个依傍的时候，竟扑了一个空……一切都完了。

奥里维永远没知道她那一天所感到的痛苦。但他一见她的面，也觉得一切都完了。

从此以后，他们不再交谈，除非当着别人的面。他们互相观察，好比两头被追逐的野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奚莱弥阿·高丹夫 曾经淋漓尽致的描写一对不再相爱而互相监视的夫妇，各人窥探对方的健康，疾病的征象，不是希望对方速死，但似乎希望一件意外的祸事，希望自己比对方身体强壮。有时雅葛丽纳和奥里维就是互相以为有这种思想，其实两人都没有；但仅仅有这种怀疑就够痛苦了：例如雅葛丽纳在夜里胡思乱想而失眠的时候，便想到丈夫比她健旺，正在慢慢的磨她，不久会把她压倒……一个人的幻想与心灵受惊以后，竟会有这样疯狂的念头！——然而他们俩心中最优秀的部分暗地里还是相爱的！……

奥里维被压倒了，不想再奋斗；他站在一边，把控制雅葛丽纳心灵的舵丢下了。没有了把舵的人，她对着她的自由头晕眼花，她需要有个主宰好让她反抗：倘使没有的话，就得自己造一个出来。于是她老是执着一念。至此为止，她虽然痛苦，还从来没有离开奥里维的意思。从那天起，她以为所有的约束都摆脱了。她要趁早爱一个人；因为她年纪轻轻，却已经自以为老了。——她曾经有过那些幻想的，强烈的热情，对于第一个遇到的对象，一张仅仅见过一次的脸，一个名人，或者只是一个姓氏，一朝依恋之后，再也割舍不掉，而且那些热情硬要她相信，她的心再也少不了它所选择的对象：它整个的被他占据了，过去的一切都给一扫而空：她对别人的感情，她的道德观念，她的回忆，她的自我的骄傲，对别人的尊重，统统被这新的对象排挤掉。等到固执的意念没有了养料，烧过了一阵也归于消灭的时候，一个新的性格便从废墟里浮现出来，是个没有慈悲，没有怜悯，没有青春，没有幻象的性格，只想磨蚀生命，好似野草侵犯倾圮的古迹一样。

这一次，固执的念头照例属意于一个玩弄感情的人物。可怜的雅葛丽纳竟爱上了一个风月场中的老手。他是个巴黎作家，既不好看，又不年轻，臃肿笨重，皮色赭红，憔悴不堪，牙齿都坏了，人又狠毒，唯一的价值是当时很走红，唯一的本领是糟蹋了一大批女性。她并非不知道他自私自利：因为他在作品中拿来公然炫耀。他这么做是有作用的：用艺术镶嵌起来的自私好比捕雀的罗网，吸引飞蛾的火焰。在雅葛丽纳周围，上钩的已不止一个：最近她朋友中一个新婚少妇，被他很容易的骗上了，接着又丢掉了。这些女子可并没因之死去活来，只是为了怨恨而闹些笑柄，让别人看了开心。受害最烈的女子，因为太顾虑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关系，只得勉强忍受。她们并不闹得满城风雨，尽管欺骗丈夫和朋友，或是被丈夫和朋友欺骗，事情决不张扬。她们是为了怕舆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女英雄。

但雅葛丽纳是个疯子，她不但说得出，做得到，而且做得到，说得出。她对于自己的疯狂完全不加计算，不顾利害。她有这个可怕的长处，老是要对自己保持坦白，不怕行动的后果。她比她那个社会里的人比较有价值，所

以做出来的事更糟。她要是爱了一个人，起了奸淫的念头，就会毫无顾忌的跳下火坑。

亚诺太太一个人在家，像潘奈洛泼做着那件有名的活计一般，又镇静又兴奋的打着毛线。也像潘奈洛泼一般，她等着她的丈夫。亚诺先生整天在外面。早上和傍晚，他都肩功课。通常他总回来吃午饭，不管两腿怎么酸软：不管中学是在巴黎城的那一头，这并非由于他对妻子的感情，也非由于节省金钱，而是由于习惯。但有些日子，替学生温课的事把他留住了；或者他利用机会，在那一区的图书馆里工作。吕西·亚诺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家里。除了上午八时至十时来帮助她做些粗活的女仆，和杂货商每天来送货以外，没有一个人上门。整幢屋子里，她一个熟人都没有了。克利斯朵夫搬了家。楼下花园里来了新房客。赛丽纳·夏勃朗嫁给了安特莱·哀斯白闲。哀里·哀斯白闲全家远行，有人委托他上西班牙开矿去了。老韦尔的太太死了，韦尔本人差不多从来不住这个巴黎的公寓的。唯有克利斯朵夫跟他的女朋友赛西尔，仍旧和吕西·亚诺保持着友谊；但他们住得很远，又忙又累，常常几星期不来看她。她只能一个人对付着过日子。

她可并不厌烦，只要一点儿小事就足够培养她的兴趣，例如日常琐碎的工作：一株极小的植物，她每天早上都用慈母般的心情把那些稀少的叶子拂拭一番；还有那安静的灰色猫，好似受人疼爱的家畜一样，久而久之也感染了一些主人的脾气：它跟她一样成日蹲在火炉旁边，或是呆在桌上靠着灯，看她手指一来一往的做着活儿，有时抬起古怪的眼睛瞅她一会，随后又满不在乎的闭上。便是家具也仿佛在那儿陪着她。每件东西都有一副亲切的面貌。她把它们掸灰抹尘，连凹处都揩拭干净，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放还原位：那时她简直像儿童一样的高兴。她在心里跟它们谈着话，对着家中独一无二的古董家具——一张路易十六式的圆脚书桌——微笑。她每天看到它都感到同样的快乐。她也忙着检点衣服，几小时的站在椅子上，头和手臂都埋在那口乡村式的大衣柜内，瞧着，整理着，那猫儿在一旁看着，觉得好不奇怪。

她做完了事，独自吃了中饭，天知道她吃些什么——（她没有多大胃口），——需要上街料理的事办妥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四点左右回到家里，她靠着窗或靠近壁炉安顿下来，陪着她的就是她的活计和猫：那时她可得意了。有些时候，她会想出理由来根本不出门。倘若能守在家里，尤其在冬季下雪的天气，她是最高兴的。她怕冷，怕风，怕雨，怕泥浆，因为她自己也是一头很干净，很细巧，很柔和的小猫。伙食商偶尔把她忘了的时候，她宁可不吃东西，而不愿意出去买菜，只啃着一块可可糖，或者在伙食柜里找一个水果吃了就完事。她不让亚诺知道，这是她偷懒。那往往是阴天，有时也是大好的晴天，——（外面，蔚蓝的天光照着大地，街上闹哄哄的声音笼罩着幽静与阴暗的公寓：仿佛一座海市蜃楼包围着一颗灵魂），——她坐在那最喜欢的一角，脚下放着一张小凳，一动不动的做着活儿，身边摆着一册心爱的书，总是那些朴素的红封面的本子，英国小说的译本。她看得很少，一天难得看完一章，书摆在膝上，始终翻着那一页，或者竟完全阖上了；书上的事她已经记熟，自个儿想着。狄更斯与萨克利的长篇小说，她会几星期的看下去，而她的幻想更要维持到几年之久，老是让书中的温情催眠着。今日一般

潘奈洛泼为《奥特赛》史诗中主角于里斯之妻。于里斯出征期间，追求潘奈洛泼者甚众，潘以完成绣件后再决定为推托，实则日间缝绣，晚上拆掉，故永远不会完工。

读书又快又潦草的人，对于那些要慢慢咀嚼方能感到的妙处，是不能领略的了。亚诺太太毫不置疑的相信，小说中人物的生涯和她自己的生涯一样真实。其中颇有一些她极喜爱的人：例如那温柔而嫉妒的凯塞胡特夫人，默默无声的爱着，始终保存着慈母与处女的心，对于她好比一个姊姊：那个小东贝又好比是她的小儿子：她自己是那个垂死的老小孩陶位。对这些睁着善良百纯洁的眼睛在世界上走过的儿童般的心灵，她伸出手去；她周围尽是些可爱的流浪者，与人无害的怪物：他们追求着可笑而动人的梦想，——为首便是狄更司，存着博爱的心，对自己的梦境笑着，哭着。在这种时候，她要是向窗外眺望的话，路人中间就有那个幻想世界里某个可爱的或可怕的人物的影子。而在那些屋子的墙壁后页，她猜到也有一批同样的人物。她的不爱出门，就因为怕这个充满着神秘的世界。她发现周围藏着许多悲剧，搬演着许多喜剧。这倒不一定永远是一种幻象。幽居独处的结果，她有了林秘的直觉，使她在偶尔碰到的目光中间看出他们生活上不少过去未来的秘密，往往是自己不知道的。她又拿小说的回忆融入真实的景象中去，把它们变了样。她觉得在这个巨大的宇宙中迷失了，需要回到家里才能定下心神。

可是她也无须去看或观察别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就行了。这个在外面看来多么苍白黯淡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光明灿烂！何等的丰满充实！多少的回忆，多少的宝藏，都是谁也意想不到的！……这些回忆与宝藏是不是真实的呢？当然是真实的，既然她觉得真实……渺小的生命被神奇的幻梦改变了面目！

亚诺太太回想她的过去，直追溯到童年，于是那些烟消云散的希望，又像小小的花朵般悄悄的开放了……几时第一次爱慕的对象，是个使她一见生情的少女：她爱着她，那种爱情只有一个人在非常纯洁的年龄才会有，她曾经想亲她的脚，做她的女儿，跟她结婚；偶像出嫁了，不大幸福，生了一个孩子，不久就死了，接着她也死了……十二岁上，她又爱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性情专横，非常淘气，嘻嘻哈哈，喜欢惹她哭，然后拚命的亲她；两人对于将来定下许多想入非非的计划：不料那姑娘突然进了嘉曼丽德教会修行，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很快活……后来，她又对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很多的男人有了热情。但谁也没知道这股热情，连那个被爱的人也是茫然。她却借此把牺牲的热诚和感情大大发泄了一番……后来，又是另外一股热情；这一回人家可爱她了。可是因为胆怯，因为对自己没有把握，她不敢相信人家爱她，也不敢表示她爱人家。幸福过去了，来不及抓握……后来……后来……多少琐琐碎碎的事，对她都有一种深刻的意义：或是朋友的亲切的表示，或是奥里维无意中说的一句可爱的话，或是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他的音乐唤引起来的神奇的世界，或是一个陌生人的目光，——是的，便是在这个忠实，纯洁，贤德的女人心中，也会有些不贞的念头，使她惶惑，使她脸红。而她虽然竭力想丢开这种无邪的思念，心里究竟感到一点儿暖意……她很爱丈夫，虽说他并不完全符合她的理想。但他的心多好，有一天和他说：“我的好太太，你才不知道你在我心中占着什么地位。你是我整个的生命……”她听了心都融化了；那一天她觉得自己整个的、永久的，跟他合而为一了。每过一年，他们的结合总更紧密一些。工作的梦，旅行的梦，孩子的梦，结果是一无所有……而亚诺太太还在梦想这些。她有个理想中的孩子，因为不断的想着，而且想得那么深切，所以差不多真有这个孩子了，就像在眼前一样。她为他花了多少年的心血，时时刻刻把她认为最美的，最心爱的

成分使理想中的孩子变得更美……

她的天地不过是这么一些，但大千世界都包括在里面了。多少无人知道的，连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的悲剧，藏在表面上最恬静最平庸的生命中间！最悲壮的是：……这些满怀希望而一无所遇的生命，尽管声嘶力竭的要求他们应得的权利，要求自然所答应而又拒绝他们的东西，尽管熬着热情的悲痛，但表面上什么都不显露出来！

亚诺太太的运气是她并不只关切自己。她的生命在她的幻梦中只占据一部分。她也在体验她所认识的或曾经认识的人的生活，为他们设身处地：她想着克利斯朵夫，想着她的女朋友赛西尔。她今天又在想着。两个妇女彼此感情很好。奇怪的是，两人之中倒是壮健的赛西尔需要来依傍娇弱的亚诺太太。那高大，结实，快乐的姑娘，骨子里并没有外表那样的强。她正感到剧烈的苦闷。最安静的心也不能避免命运的奇袭。她慢慢的有了一种感情，先是不愿意理会，但它越来越强，逼得她非承认不可了：一原来她爱着奥里维。这个青年的柔和恳切的态度，近平女性的魅力，懦弱而容易受人支配的性格，立刻把她吸引了。——（一个富于母性的人特别喜欢需要她照顾的人。）——以后知道了这对夫妇的苦闷，她对奥里维更有了一种危险的同情心。当然，光是这些理由还不足以解释感情问题。谁能说为什么一个人爱上某一个人呢？往往两人对于这种爱都是不相干的，那是时间的播弄：它会突然之间使一颗不加提防的心遇到随便什么感情就被征服。——等到赛西尔把自己的心境看清楚了，就很勇敢的拔掉那支爱情的箭，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荒唐的。可是她因之痛苦不已，伤口始终不能平复。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的心事：她鼓足勇气装出很快乐的样子。唯有亚诺太太知道她骨干里忍着多少痛苦。赛西尔常常把头倒在清瘦的亚诺太太怀里，悄悄的流几滴眼泪，拥抱她，然后快快活活的走了。她喜欢这个娇弱的朋友，觉得她的毅力与信仰都比自己高强。她并不吐露心中的秘密。但亚诺太太能够在片言只语上猜到。她觉得人生是个无法消解的可悲的误会。一个人只能爱，怜悯，梦想。

要是梦想在她胸中像蜂房一般过于喧闹，使她有点头晕了，她便走到钢琴前面让自己的手在键盘上轻轻抚弄，把音响的那种安慰心灵的光明罩着人生的幻景……

然而这位好太太决不忘记日常功课的时间：亚诺回家的时候，看到灯总是点上了，晚饭也端整好了，妻子那张苍白的脸笑容可掬的等着他。他万万想不到她在精神上所作的那些旅行。

困难的是要把日常生活和海阔天空的精神生活并行不悖的放在一起。幸而亚诺在书本和艺术品中也过着一部分幻想生活，靠那些作品的永恒的火，维持着他心中摇摇不定的火焰。可是近年来他也渐渐有了许多操心的事：教书这一行的苦闷，待遇的不公平，黄缘得势的现象，同事之间与学生之间的麻烦事儿，使他变得愤懑，开始谈论政治，骂政府，骂犹太人，认为自己在教育界里遇到的失意的事都应该由特莱弗斯负责。他这种满腹牢骚的性情也传染了一些给亚诺太太。她快近四十，正是生命力动摇而求平衡的年纪，在思想上颇有些空白。某一时期，他们俩都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不知道把他们生命的网结在什么上面好。不问现实的支持是怎么软弱，好歹总得有一个，才能寄托自己的梦想。他们可是什么支持都没有，不能再互相依傍。他非但不帮助她，反而要依靠她了。她觉得支持不了丈夫，于是她自己支持不住了。唯有一桩奇迹才能把她救出来。她就呼吁这奇迹……

这奇迹是从灵魂深处来的。亚诺太太感到她孤独的心里有一个荒唐而神圣的需要，需要不顾一切的创造，为了创造而创造，需要在空间织起她的网来，让神的呼吸，让风把她吹到应当去的地方。结果是神的气息把她和人生重新联系起来，替她找。到了无形的依傍。于是，夫妇俩又用着他们最纯粹的血：很耐住的织造那些美妙而虚无的梦境。

亚诺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天快黑了。

她被一阵铃声惊醒，打断了梦想。她把活计仔细收拾好了，走去开门。进来的是克利斯朵夫，神色非常紧张。她很亲热的抓着他的手，问：

“什么事啊，朋友？”

“唉，奥里维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早上他来了，和我说：克利斯朵夫，救救我！——我把他拥抱了。他哭着说：我只有你了。她走了……”

亚诺太太大吃一惊，合着手说：“可怜！”

“她走了，”克利斯朵夫又补上一句，“跟她的情夫走了。”

“那末她的孩子呢？”

“丈夫，孩子，她都丢下了。”

“可怜的女人！”亚诺太太又道。

“他始终爱着她，只爱着她，”克利斯朵夫说。“这一下的打击使他爬不起来了。他老跟我说着：克利斯朵夫，她欺骗了我……我的最好的朋友欺骗了我。——我白白的和他说：既然她欺骗了你，她就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了。把她忘了罢，或者干脆把她杀了罢！”

“噢！克利斯朵夫，你说什么？这话太残忍了！”

“是的，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觉得杀人是原始时代的野蛮行为：我一定要听到你们漂亮的巴黎社会攻击这种兽性，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杀死欺骗他的女人，同时你们还要说出宽恕那个女人的理由！喝！大慈大悲的使徒！这批乱交的狗居然义愤填胸的反对兽性，真是太妙了！他们把人生摧残了，剥夺了它所有的价值，再来诚惶诚恐的崇拜人生……怎么！这个没有心肝没有廉耻的生命，这个肉包着血的臭皮囊，原来在他们眼中是值得尊重的东西！他们对于这块屠场上的肉恭敬得无微不至，谁敢去触犯它便是罪大恶极。杀死灵魂倒没关系，但肉体是神圣的……”

亚诺太太回答：“杀死灵魂的凶手当然是最可恶的凶手，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杀害肉体就不成其为罪恶，这一点你是很明白的。”

“我知道，朋友。你说得对。我这是脱口而出，根本设想过……谁知道！也许我真会那么做。”

“不会的，你这是毁谤自己。你的心多好。”

“被热情控制的时候，我会像别人一样残忍。你瞧我刚才紧张成什么样子！……一个人看到所爱的朋友痛哭，怎么能不恨使他痛哭的人？而且对付一个抛弃了儿子，跟情夫跑掉的该死的女人，还会嫌太严厉吗？”

“别这么说，克利斯朵夫，你有所不知。”

“怎么，你为她辩护吗？”

“我是可怜她。”

“我可怜那些痛苦的人，却不可怜使人痛苦的人。”

“唉！你以为她不痛苦吗？以为她是有心抛弃她的孩子，毁坏她的生活

吗？你得知道她把她自己的生活也毁了。我不大认识她，克利斯朵夫，我只见过她两次，都是偶然碰到的，她没跟我说一句好听的话，对我并无好感。可是我比你更认识她，我断定她不是一个坏人。可怜！我能猜到她自己心中经过的情形……”

“你，朋友，生活这么严肃，这么有理性的人！……”

“是的，克利斯朵夫。你有所不知，你虽然心好，但你是个男人，和所有的男人一样是冷酷的，尽管慈悲也没用；——你对自身以外的事都不闻不问。你们从来不替身边的女人着想，只管用你们的方式去爱她们，决不操心去了解她们。你们对自己太容易满足了，自以为认识我们……可怜！如果你知道我们有时多么痛苦，因为看到你们——并非不爱我们，——而是看到你们爱我们的方式，看到最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当作是怎么样的人！有些时候，克利斯朵夫，我们不得不把指甲深深的掐在肉里，免得叫起来：噢！别爱我们罢，别爱我们罢！怎么都可以，只不要这样的爱我们！……你知道有个诗人说过下面那样的话吗？——便是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儿女中间，表面上尽管安富尊荣，女人也受到一种比最不幸的苦难还要难忍千百倍的轻蔑。——你把这些去想一想罢，克利斯朵夫……”

“你这些话把我弄糊涂了。我不大明白。可是照我所看到的……你自己……”

“我也经过这些苦闷。”

“真的吗？……可是无论如何，你总不能使我相信，你会做出像这个女人一样的行为。”

“我没有孩子，克利斯朵夫，我不知道我处在她的地位会怎么办。”

“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太相信你，太敬重你了，我敢赌咒那是不可能的。”

“别打赌！我差点儿跟她一样……我很难过要毁掉你对我的好印象。可是你应当学一学怎样认识我们，要是你不愿意对人不公平的话。——是的，我没做出这样疯狂的事也是千钧一发了，而且还多少是靠了你的力量。两年以前，我有个时期极苦闷，觉得自己一无所用，谁也不重视我，谁也不需要我，丈夫没有我也没关系，我简直是白活的……有一天我正想跑出去，天知道做些什么！我上楼去看你……你记得吗？……当时你没懂得我的意思。其实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以后，不知经过些什么，也不知你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大清了……但我知道你有几句话……（你完全是无心的……）……对我好比一道光明……那时只要一点儿极小的事就可以使我得救或是陷落……等到我从你屋子里出来，回到家里，我关上大门，哭了一天，以后就好了，那一阵苦闷过去了。”

“今天，”克利斯朵夫问，“你对那件事后悔吗？”

“今天？啊！要是做了那件疯狂的事，我早已沉在塞纳河里了。我决受不了那种耻辱，受不了我给丈夫的痛苦。”

“那末你现在是快乐了？”

“是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怎么快乐，我就怎么快乐。两个人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知道彼此都可靠，不是由于一种单纯的爱情的信仰，——那往往是虚幻的，——而是由于多少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多少灰色的，平凡的岁月，再加上渡过了多少难关的回忆。随着年龄的老去，情形变得好起来……这些都是不容易的。”

她突然停下，脸红了：“天哪！我怎么能说出来？……我怎么的呢？……克利斯朵夫，我求你，这番话对谁都不能说的……”

“放心，”克利斯朵夫握着她的手回答。“我把这件事看作神圣的。”

亚诺太太因为透露了这些秘密很难为情，把身子转过一边，后来又说：

“照理我不该告诉你这些……可是你瞧，这是为了要你知道，便是在结合得最好的夫妇之间，便是在你……你敬重的女人心，……也有些时间……不光是像你所说的一时糊涂，而是真实的，不能忍受的痛苦，能够把你带上疯狂的路，毁灭整个的生命，甚至两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当大严。大家就是在最和爱的时候也会使彼此痛苦的。”

“那末应不应当过着各管各的，孤独的生活？”

“那对我们更糟。一个女人要过孤独的生活，像男人一样的奋斗（往往还要防着男人），在一个没有这种观念而大家对之抱着反感的社会里，是最可怕的……”

她不作声了，微微探着身子，眼睛瞅着壁炉里的火焰。随后：她又用着那种蒙着一层的声音，很温和的，断断续续的往下说：

“然而这不是我们的过失：一个女人的孤独并非由于任性，而是由于迫不得已；她必需自己谋生，不依靠男人，因为她没有钱就没有男人要她。她不得不孤独，而一点得不到孤独的好处：因为，在我们这儿，她要是像男子一样的独往独来，就得引起批评。一切对她都是禁止的。——我有个年轻的女朋友，在外省中学当教员。她哪怕被关在一间没有空气的牢房里，也不至于比她现在这种自由的环境更孤单更窒息。中产阶级对这些努力以工作自给的女子是闭门不纳的；它用着猜疑而轻视的态度看待她们，恶意的侦察她们的一举一动。男子中学里的同事们对她们疏远，或是因为怕外界的流言蜚语，或是因为暗中怀着故意，或是因为他们粗野，有坐咖啡店、说野话的习惯，或是整天工作以后觉得疲倦，对于知识妇女觉得厌恶等等。而她们女人之间也不能相容，尤其是大家住在学校宿舍里的时候。女校长往往最不了解青年人的热情，不了解她们一开场就被这种枯索的职业与非人的孤独生活磨得心灰意懒；她让她们暗中煎熬，不想加以帮助，只认为她们骄傲。没有一个人关切她们。她们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关系，不能结婚。工作时间之多使她们无暇创造一种灵智的生活给自己作依傍跟安慰。这样的一种生活，倘若没有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异乎寻常的情操支持，——我说异乎寻常，其实应该说是变态的，病态的：因为把一个人整个的牺牲掉是违反自然的，——那简直是死生活……——精神方面的工作既不能做，那末慈善事业能不能给她们一条出路呢？一颗真诚的灵魂在这方面得到的又无非是悲苦的经验。那些官办的或者名流办的救济机关：实际只是慈善家的茶话室，把轻佻、善举、官僚习气，混在一块儿，令人作呕：他们在调情说笑之间拿人家的苦难当作玩具。要是有个女人受不了这种情形，胆敢自个儿直接闯到那个她只有耳闻的苦难场听，那她看到的景象简直无法忍受，简直是个活地狱。试问她要帮助又从何帮助起？她在这个苦海中淹没了。然而她依旧挣扎，为苦难的人奋斗，跟他们一同落水。她要能救出一二个来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可是她自己，有谁来救她呢？谁想到来救她呢？因为她，她为了别人的和自己的痛苦也在那里煎熬；她把她的信仰给了别人，自己的信仰就逐渐减少：所有那些受难的人都抓着她，她支持不住了。没有一个人加以援手……有时人家还对她扔石子……克利斯朵夫，你不是认识那个了不起的女人吗？她献身给最卑微最可

敬的慈善事业：在家里收留着才分娩的、为公共救济会所拒绝的、或者是怕救济会的妓女，竭力帮助她们恢复身心康健，连她们的孩子一起收留着，唤醒她们的母爱，帮她们重建家庭，找工作，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她所有的力量还不够对付这种凄惨的，令人失意的事业，——（救出来的人太少了！愿意被救的人太少了！还有那些死亡的婴儿，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的无辜！……）——而这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的女子，这个发愿要补赎人类自私的罪行的无邪的人，你知道人家怎样批评她？公众的恶意诬蔑她在事业中赚钱，甚至说她剥削那些受她保护的人。她不得不离开本区，心灰意懒的搬往别处……你永远想象不到一般独立的女子，对于今日这个守旧的，没有心肝的社会，作着何等残酷的奋斗，——这个毫无生气，濒于死境的社会，还要拿出它仅有的一些力量阻止别人生活！”

“可怜的朋友，这种命运不是女子所独有的，我们都尝到这些斗争的滋味。可是我也认识避难的地方。”

“哪里是避难的地方？”

“艺术呀。”

“这是为你们的，不是为我们的。便是在男人中间，能够得到它好处的又有几个？”

“例如咱们的朋友赛西尔。她是幸福的。”

“你知道些什么？啊！你对一个人的结论下得太容易了！因为她勇敢，因为她不老抓着她的伤心事，因为她瞒着别人，你便说她是幸福的！不错，她因为强壮，因为能够奋斗而幸福。但她的斗争是你不知道的。你以为她天生是配过这种艺术的骗人的生活的吗？喝，艺术！有些可怜的女子希望靠写作、演戏、唱歌来成名，以为那是幸福的顶点！那末，是否因此就可以把她们别的一切都剥夺了，使她们不知道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什么才好？……艺术！如果我们同时没有其余的一切，光是艺术对我们有什么用？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能令人把其余的一切都忘掉：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

“可是有了娃娃，你又觉得不够了。”

“是的，有了孩子也不一定够……女人总是不大幸福的。做个女人真难，比做个男人难多了。你们不大想到这些。你们，你们能为了思想为了活动而忘掉一切，你们使自己变成残废，反而觉得快乐。可是一个健全的女子临到这种情形是要痛苦的。把自己压掉一部分是违反人性的。我们哪，我们在某种方式下幸福的时候，又因为不能得到另一种方式的幸福而悔恨。我们有好几个灵魂。你们只有一个，而且更强，往往是粗暴的，甚至是残酷的。我佩服你们。但你们不能过于自私！你们没想到你们自私的程度。你们无意之中给人很大的痛苦。”

“有什么办法呢？那不是我们的过失。”

“不错，克利斯朵夫，那不是你们的过失，也不是我们的。归根结蒂，你瞧，人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们说只要自自然然的生活就行了。但什么才是自然的呢？”

“对，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谈得上自然。独身不是自然的。结婚也不是自然的。自由结合只能使弱者受强者欺侮。我们的社会本身就不是自然的，是我们造出来的。大家说人类是合群的动物。真是胡说！那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如此。人的合群是为他的便利，为了要保卫自己，为了求享乐，为了求伟大。这些需要逼他签订了某些契约。但自然会起来反抗人为的约束。

自然对我们并不适宜，我们设法征服它。那是一种斗争：结果我们常常打败，而这也不足为奇。怎么样才能跳出这个樊笼呢？——唯有坚强。”

“唯有慈悲。”

“噢，上帝！我们要慈悲，要摆脱自私，要呼吸生命，要爱生命，爱光明，爱自己卑微的任务，爱那一小方种着自己的根的土地！要是不能往横的方面发展，就得向深的、高的方面去努力，仿佛一株局促一隅的树向着太阳上升！”

“是的。咱们先要彼此相爱。但愿男子自认为是女人的弟兄而不是她的俘虏或主宰！但愿男人和女人都能排斥骄傲，少想一些自己，多想一些别人！咱们都是弱者，得互相帮助，切勿对倒在地下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了。应当说：拿出勇气来，朋友。咱们会突破难关的。”

他们不说话了，对着壁炉坐着，小猫蹲在他们中间，大家都呆着不动：望着火出神，快要熄灭的火焰闪烁闪烁的映在亚诺太太清秀的脸上；平时所没有的内心的激动，使她脸色有点儿红。她奇怪自己居然会这样的吐露心腹。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话，以后也不会说这么多的了。

她把手放在克利斯朵夫的手上：问：“那末，你们把那孩子怎么办呢？”

她一开始就在想这个念头。那天她简直变了一个人，滔滔不竭的说着话，像喝醉了似的，但心里只想着这个问题。一听克利斯朵夫最初几句话，她就惦念着那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想到抚育他的快乐，在这颗小小的灵魂周围织起她的幻梦与爱，但她紧跟着又想道：“不，这是不对的，我不应该拿别人的苦难造成自己的幸福。”

可是她无论如何压不下这念头。她一边说话一边在静默的心头抱着希望。

克利斯朵夫回答说：“是的，当然我们想到这问题。可怜的孩子！奥里维跟我都不能抚育。应当有个女人来照顾。我想到也许有个女朋友可能帮助我们……”

亚诺太太屏着气等着。

克利斯朵夫继续往下说：“我想来跟你商量这件事。碰巧赛西尔上我们那儿去，就是一忽儿以前。她一知道这件事，一看到孩子，就感动得不得了，表示那么高兴，和我说，克利斯朵夫……”

亚诺太太血都停止了；她听不见下文；眼前一切都模糊了。

她真想对他嚷道：“喂，喂，把他给我罢！……”

克利斯朵夫还说着话，她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但是勉强振作了一下，想到赛西尔从前对她吐露的心事，便对自己说：“赛西尔比我更需要。我还有我亲爱的亚诺……还有我家里这些东西……而且，我比她年纪大……”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很好。”

炉火熄了，她脸上的红光也褪下去了。可爱的疲倦的脸上只有平时那种隐忍的慈爱的表情。

“我的朋友把我欺骗了。”

这种思想把奥里维压倒了。克利斯朵夫为了好意而尽量的反激他也是没用。

“那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朋友的欺骗是一种日常的磨难，像一个人害病和闹穷一样，也像跟愚蠢的人斗争一样。应当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支持不住，那一定是个可怜的男子。”

“啊！我就是个可怜的男子。我在这等地方顾不得骄傲了……一个可怜的男子，是的，需要温情的，没有了温情便会死的男子。”

“你的生命没有完，还有别的人可以爱。”

“我对谁都不信任了，根本没有朋友了。”

“奥里维！”

“对不起。我并不怀疑你，虽然我有时候怀疑一切……怀疑我自己……但你，你是强者，你不需要任何人，你可以不需要我。”

“她比我更不需要你呢。”

“你多么忍心，克利斯朵夫！”

“好朋友，我对你很粗暴；但这是为激励你，使你反抗。把爱你的人和你的生命一齐为了一个取笑你的人牺牲，不是见鬼吗！不是可耻吗！”

“那些爱我的人对我有什么相干！我爱的是她啊。”

“干你的工作罢！那是你以前感到兴趣的……”

“现在可不行了。我厌倦到极点，好似已经离开了人生。一切都显得很远，很远……我眼睛虽然看见，可是心里弄不明白了……想到有些人乐此不疲，每天做着同样的钟摆式的动作，从事于无聊的作业，报纸的争辩，可怜的寻欢作乐；想到那些为了攻击一个内阁，一部书，一个女戏子而鼓起的热情……啊！我觉得自己多老！我对谁都没有恨，没有怨：只觉得一切使我厌烦，一切都是空的。写作吗？为什么写作？谁懂得你呢？我只为了一个人而写作；我整个人生都是为了一个人……如今什么都完了。我疲倦不堪，克利斯朵夫，我疲倦不堪，只想睡觉。”

“那末，朋友，你睡罢。让我来看护你。”

但睡眠就是奥里维最难做到的。啊！倘若一个痛苦的人能睡上几个月，直到伤痕在他更新的生命中完全消失，直到他换了一个人的时候，那可多好！但谁也不能给他这种恩典；而他也绝对不愿意。他最难忍受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咂摸自己的痛苦。奥里维像一个发着寒热的人，把寒热当作养料。那是一场真正的寒热，每天在同一时间发作，尤其在薄暮时分，太阳下去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就受爱情磨折，被往事侵蚀，想着同样的念头，像一个白痴似的把一口食物老在嘴里咀嚼，咽不下去。精神上所有的力量都专注着唯一的固定的念头。

他不像克利斯朵夫那样能诅咒他的痛苦，恨造成痛苦的原因。因为对事情看得更明白更公平，他知道自己也要负责，知道受苦的不止他一个人：雅葛丽纳也是个牺牲者；——是他的牺牲者。她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怎么应付的呢？倘若他没有能力使她幸福，为什么要把她跟他连在一起呢？她斩断那个伤害她的束缚原是她权利以内的事。他想：“这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我爱她不得其当。我的确很爱她，但不懂得怎么爱她，既然不能使她爱我。”这样，他就归咎于自己。这也许是对的；但抱怨过去并无济于事。甚至也不能阻止他下次一有机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在目前倒反使他活不下去。强者发见事情无可挽救的时候，能忘记人家给他的伤害，也能忘记自己给人家的伤害。但一个人的强并非靠理智，而是靠热情。爱情与热情是两个远房的家族，难得碰在一起的。奥里维有的是爱情：他只在攻击自己的时候才有力量。在他这个心神沮丧的时期，一切的病都乘虚而入。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都来找到他了。大半个夏天，他病着。克利斯朵夫，靠着亚诺太太的帮忙，尽心服侍他，终于把病魔赶走了。但对付精神上的疾病，

他们无能为力；无穷无尽的悲伤慢慢的使他们觉得太磨人了，需要逃避了。

灾祸往往会令人特别孤独。人类对于祸害有种本能的厌恶，似乎怕它有传染性：至少它是可厌的，使人避之唯恐不及。看你在那里痛苦而还能原谅你的人太少了！永远是约伯的朋友那个老故事：提幔人以利法责备约伯不耐烦。韦亚人比勒达认为约伯的遭难是上帝惩罚他的罪恶，拿玛人琐法指斥约伯自大。“而末了，布西人兰姆族巴拉迹的儿子以利户大发雷霆，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世界上真正悲哀的人是很少的。应征的一大批，被选中的寥寥无几，奥里维却是被选中的。像一个厌世的人说的：“他似乎乐意受人虐待。可是扮这种受难的角色并没好处，只有教人家瞧不起。”

奥里维对谁都不能说出他的痛苦，便是对最亲密的人也不能。他发觉那会使他们丧气。连他心爱的克利斯朵夫对这种固执的苦恼也感到不耐烦。他自知笨拙，设法挽救。实在说来，这个慷慨豪爽，经过多少苦难的人，并不能感觉到奥里维的痛苦。这是人类天性的一种缺陷。尽管你慈悲，矜怜，聪明，受过无数的痛苦：你决不能感到一个闹着牙痛的朋友的苦楚。要是病拖长下去，你可能认为病人的诉苦不免夸大。而当疾病是无形的，藏在灵魂深处的时候，岂不令人更觉得夸张？局外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为了了一种对他不相干的感情愁闷不已，自然要觉得可恼。末了，这个局外人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便对自己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把理由说尽了都没用。”

是的，把理由说尽了都没用。你要使一个在痛苦中煎熬的人得到一点好处，只能爱他，没头没脑的爱他，不去劝他，不去治疗他，只是可怜他。爱的创伤唯有用爱去治疗。但爱并不是汲取不尽的，便是那些爱得最深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所积聚的爱是有限的。朋友们把所能找到的亲热的话说完了，写完了，自以为尽了责任以后，就小心谨慎的引退了，把病人丢在一边，仿佛他是个罪犯。但因他们暗中惭愧对他帮助得那么少，便继续帮助，可是帮得越来越少了：他们想法使病人忘记他们，也想法忘记自己。如果不识时务的苦难一味固执，有点儿回声传到他们隐避的地方，他们就要严厉的批判那个没有勇气的，受不起磨折的人：而他一朝倒下去的时候，他们除了真心可怜他以外，暗中一定还想着：“可怜的家伙！我当初没想到他这样的不中用。”

在这种普遍的自私的情形之下，一句简单的温柔话，一种体贴入微的关切，一道可怜你而爱你的目光，可能给你多少安慰！那时一个人才感到慈悲的价值，而比较之下，一切其余的东西都显得贫弱了！……使奥里维对亚诺太太比对克利斯朵夫更接近的便是这种慈悲。可是克利斯朵夫还是非常有耐性，为了爱而把心中的感想瞒着奥里维呢。但奥里维的目光被痛苦磨炼得更尖锐了，自然能看到朋友胸中的斗争，看到自己的悲伤沉重的压在克利斯朵夫心上。这一点就足够使他对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亲近了，恨不得对他说：“算了罢，朋友，你去罢！”

这样，苦难往往会把两颗相爱的心分离。有如一架簸谷机把糠跟谷子分作两处，它把愿意活的放在一边，愿意死的放在另一边。这是可怕的求生的规律，比爱情更强！母亲看到儿子死去，朋友看到朋友淹溺，——如果不能救出他们，自己还是要逃的，不跟他们一块儿死的。可是他们的爱儿子爱朋

《旧约》载，耶和華欲試驗正人約伯之心，降禍于彼，使其身長毒瘡，體無完膚。約伯三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琐法，各從本處趕來安慰約伯。因約伯自怨其生，訴苦不已，三友乃責以大義，詳見《舊約，約伯記》。

友明明是千百倍于爱自己……

克利斯朵夫虽然怀着深切的爱，也不得不逃避奥里维。他是强者，身体太好了，在没有空气的苦难中感到窒息。他很惭愧，恨自己一点不能帮助朋友，同时他又需要对什么人报复一下，便恨透了雅葛丽纳。虽然听过亚诺太太那番深刻的话，他仍旧很严厉的批判她。在一个年轻的，性子暴烈的人，这是应有的现象；因为对人生还没充分的经验，他不能哀怜人的弱点。

他去探望赛西尔和托付给她的孩子。赛西尔被这个借来的母性完全改变了；她显得那么年轻，快乐，细腻，温柔。雅葛丽纳的出奔并没使她对不敢自承的幸福存什么希望。她知道，奥里维和她的关系，在奥里维想念雅葛丽纳的时间比着雅葛丽纳在家的时间倒反更疏远了。而且，从前使她中心惶乱的情潮早已过去：雅葛丽纳的误入歧途把她的苦闷给廓清了：她精神上回复了向来的平静，已经不大明白从前不平静的原因。爱情的需要，如今在抚爱儿童的感情中得到了满足。凭着女子奇妙的幻想和直觉，她能在这个小生命中发见她所爱的人； he现在是幼弱的，委身相与的，整个的属于她的；她能够爱他，热烈的爱他，用着眼这个孩子的无邪的心与清明的眼睛同样纯洁的爱情爱他……但她的温情中并非全无惆怅的抱憾的成分。啊！这究竟不能跟一个从自己血肉里来的孩子相比……但无论如何还是甜蜜的。

克利斯朵夫如今用另一副眼睛来看赛西尔了。他想起法朗梭阿士·乌东说过的一句取笑的话：“你和夜莺是天生的一对，怎么会不相爱的？”

但法朗梭阿士比克利斯朵夫更懂得其中的原因：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人，难得会爱一个给他好处的人，而宁愿爱一个使他受苦的人。两个极端才会互相吸引；人的本性老在寻找能毁灭自己的东西，它倾向于尽量消耗自己的，热烈的生活，不喜欢俭约的谨慎的生活。对于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人，这办法是对的，因为他所求的并非在于尽可能的活得长久，而是在于活得轰轰烈烈。

可是不像法朗梭阿士看得那么透的克利斯朵夫，以为爱情是一股违反人性的力量。它把一些不能相容的人放在一起，而排斥性格相似的人。和它所毁灭的比较，它给人的好处真是太微末了。圆满的爱情消磨你的意志，不圆满的爱情伤害你的心。它有什么好处给人呢？

正当他这样毁谤爱情的时候，他看到爱神温柔的讥讽的笑着，对他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克利斯朵夫不能再上奥国大使馆去出席一个晚会。夜莺在那边唱修倍尔脱，雨果·伏尔夫，和克利斯朵夫的歌。她看到自己的成功和她朋友的成功很愉快：他现在得到优秀阶级的赏识了。便是在广大的群众前面，克利斯朵夫的名字也有了号召力；雷维一葛一流的人再没法装做不知道他。他的作品在各个着乐会里演奏，还有一部剧本被喜歌剧院接受了。似乎冥冥中有人在那里关切他。神秘的朋友，已经屡次帮助过他的朋友，继续促成他的志愿。克利斯朵夫好几次感到有人在暗中帮他活动而竭力躲着。他想要找这个人，但这朋友似乎恼着克利斯朵夫没早点儿设法认识他，所以老是不让他找到。并且他忙着别的事，想着奥里维，想着法朗梭阿士；那天早上他就在报上读到她在旧金山病重的消息：他想象她在外国一个人住着客店，不愿意接见任何人，不愿意写信给任何朋友，咬紧牙齿，孤零零的在那里等死。

被这些思想纠缠着，他避开众人，躲在一间地位冷僻的小客厅里。背靠着墙壁，站在被树木花草遮得阴暗的一角，他听着夜莺的美妙的，凄凉的，

热烈的声音唱着修借尔脱的《菩提树》，纯洁的音乐唤起了回念往事的惆怅。对面壁上，一面大镜子反映出隔壁客厅里的灯光和人物。他并不看到镜子，只望着自己的内心，眼睛蒙着一片泪水凝成的雾……忽儿，像修倍尔脱的《菩提树》一般，他莫名其妙的哆嗦起来，脸色苍白，一动不动的过了几秒钟。随后，眼泪没有了，他瞧见前面镜子里有一个“女朋友”对他望着……女朋友？她是谁呢？他除了知道她是朋友，是他认识的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眼睛对着她的眼睛，他靠在墙上继续哆嗦。她微微笑着。他既没看到她的脸庞与身体的线条，也没看到她眼睛是什么颜色，身材是高是矮，穿的是什么衣著。他只看见一样，就是在她同情的微笑中反映出来的慈悲。

而这笑容突然在克利斯朵夫心头唤起一件童年的往事……在六岁至七岁的期间，他在学校里非常可怜，才被一般比他年长有力的同学羞辱了一场，打了一顿，大家嘲笑他，老师又不公平的责罚他：别的孩子在玩儿，他却垂头丧气蹲在一旁，悄悄的哭着。一个神态幽怨的，不跟别的同学玩的女孩子，——（从那时起他从来没想到她，但此刻分明看到她的模样：短短的身材，头很大，淡黄的头发与眉毛简直像白的一般，蓝眼睛显得惨白，宽大而黯淡的腮帮，微微虚肿的嘴唇与脸庞，一双红红的小手，）——走到他身旁，站住了，把大拇指含在嘴里，看着他哭，接着她把小手放在克利斯朵夫头上，怯生生的，匆匆忙忙的，满怀好意的堆着笑容说：“别哭啦！……”

于是克利斯朵夫忍不住了，大声嚎了出来，把鼻子靠在小姑娘的围裙上。她却用着颤抖而温婉的声音又说了声：“别哭啦！

……”

过了几星期，她死了。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她大概已经落在死神的掌握中了……为什么他这时忽然想到她呢？在这个出身微贱的，在遥远的德国小城里被人遗忘的死了的女孩子，和此刻望着他的贵族少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但所有的人都只有一颗灵魂，虽然亿兆的生灵各各不同，好像在太空中旋转的无数的星球一般，但照耀那些为时间分隔着的心灵的，都是同一道爱的光明。当年在那个安慰他的女孩子苍白的嘴唇上映现过的微光，现在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了……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一群人像潮水似的把门挡住了，克利斯朵夫再也瞧不见另外一个客厅里的情形。他缩回到黑影里，躲在镜子照不到的地方，生怕自己惶乱的情绪被人注意。等到定了定神，他想再见她，唯恐她已经走了。但他一走进客厅，立刻在人堆里把她找到了，虽然不再像镜子里那个模样。这一下他看到的是她的侧影，坐在一群漂亮的妇女中间，时子搁在安乐椅的靠手上，支着头，微微探春身子在那里听人家谈话，脸上堆着一副机灵的，心不在焉的笑容。她的面貌活像拉斐尔的名画《圣休争辩》中的圣·约翰，眼睛半开半阖，想着自己的念头微笑……

然后她抬起眼睛，看到了他，一点没有诧异的神气。他这才发觉她的微笑是对他而发的。他向她行着礼。非常感动的走近去：

“您认不得我了吗？”她问。

就在这时候，他认出了她，叫了声：“葛拉齐亚……”同时，大使夫人在旁边过，说他们彼此仰慕了这么久，这一回终于相遇，真是幸事；她把克利斯朵夫介绍给“裴莱尼伯爵夫人”。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激动得那么厉

害，根本没听见：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姓字。在他心目中，她始终是他的小葛拉齐亚。

葛拉齐亚二十二岁，一年以前嫁了奥国大使馆的一个青年随员。他是贵族出身，和奥国的首相有亲戚关系：人非常时髦，喜欢玩儿，高雅大方，已经有点未老先衰。她当初是真心的爱上了他，现在虽把他看透了，还是爱他的。她的老爸爸死了。丈夫被任为驻巴黎使馆的随员。由于斐莱尼伯爵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她本身的魅力和聪明，从前为了些小事就会吃惊的胆怯的少女，在她既不卖弄也不发窘的巴黎社会中，竟变成了最受注目的太太之一。年轻，美貌，讨人喜欢，也知道自己讨人喜欢：这些都成为一种力量。同样有作用的是她生就一颗平静的，非常健全非常清明的心！欲望与命运又是非常调和，使她很快乐。这是人生最美丽的阶段：但由意大利的光明与和平培养起来的她的拉丁精神，依旧保持着那种恬静的音乐气息。很自然的，她在巴黎社交场中有了势力：她并不为之惊奇，而且懂得把这种势力运用到有求于她的艺术事业与慈善事业中去，可是不居名义：因为她在乡下别庄年所消磨的无拘无束的童年，始终给她留下独立不羁的性格，觉得社会又有趣又可厌；但她能适应自己的地位，用一副表示善意与殷勤的笑容来遮盖她的厌烦。

她没忘记她的好朋友克利斯朵夫。当年不声不响的抱着天真的爱的女孩子，固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葛拉齐亚是个极有理性而全无荒唐的幻想的女人，对于自己幼年时代的夸大的感情觉得又甜蜜又可笑。但是想到这些往事，她依旧很激动。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回忆的确是她一生最纯洁的岁月的回忆。她听到他的姓名就感到愉快；他每次的成功都使她非常高兴，好似其中也有她的一分：因为他的成就是她早已预感到的。她来到巴黎以后就想办法寻访他，邀请他，在请柬上加注她少女时代的名字。克利斯朵夫没有留意，把请柬往纸筐里扔掉了。她并不生气，继续暗暗的留神他的工作，甚至也探听他的生活状况。最近使报纸上抨击克利斯朵夫的笔战突然停止的，便是由于她的力量。淳朴的葛拉齐亚和报界没有多大交际：但为了帮助一个朋友，她能够运用狡猾的手段，笼络那些她最不喜欢的人。她把信猜狂吠的报纸经理请来，略施小技就使他大力颠倒：她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把他收拾得服服贴贴：仅仅在无意之间提了一句，表示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攻击很可诧异也很可鄙，那攻击就立刻中止了。经理把预定在第二天刊出的一篇谩骂的文字临时抽掉；执笔的记者请问他理由，反而挨了一顿骂。他还更进一步，吩咐他的走狗之一在十五天内制造一篇热烈恭维克利斯朵夫的文字：结果当然是照办，文字的确写得很热烈，可也是荒谬绝伦。她又发起在大使馆内举行几个演奏克利斯朵夫作品的音乐会，更因为知道他有心提拔赛西尔，也就帮助那年轻的女歌唱家显露头角。末了她利用和德国外交界的友谊，慢慢的用着巧妙的手腕，使当局注意到被德国判罪的克利斯朵夫。她无形中促成了一种舆论，准备向德皇要求特赦，让一个为国增光的艺术家能够回去。又因为这个特赦不能希望立刻实现，她设法使人家答应克利斯朵夫回故乡去逗留两天而假作痴聋。

而克利斯朵夫，一向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在保护他而始终不知道是谁的，此刻才在镜中对他微笑的圣·约翰脸上辨认出来。

他们谈着过去。究竟谈些什么，克利斯朵夫也不大知道，他既看不见所爱的人，也听不见所爱的人。一个人真爱的时候，甚至会想不到自己爱着对方。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她在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都不存在了……

葛拉齐亚停止了说话。一个很高的青年，长得相当美，很有风度，不留胡子，头发已经秃了，带着一副厌烦而轻蔑的神气。从单眼镜里打量着克利斯朵夫，一边又高傲又有礼貌的弯着身子。

“这位便是我的丈夫，”她说。

客厅里的声音又听到了。心里的光明熄灭了。克利斯朵夫顿时心中冰冷，不声不响的答着礼，马上告退。

这些艺术家的心灵，和统治他们感情生活的那种幼稚的原则，真是太可笑，大苛求了！这位朋友从前爱他的时候是被他忽视的，他多少年未一向设想起的；如今才跟她重遇，他就觉得她是他的，是他的实物了，倘若别人把她占有了，那是从他那里抢去的；她自己也没有权利委身于另外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并没觉察自己有这些情绪。但他那个创造的精灵代他觉察了，使他在这几天内产生了几支把苦恼的爱情描写得最美的歌。

他隔了许多时候没去看她。奥里维的痛苦和健康问题老是把他的纠缠着。终于有一天，找到了她留下的地址，他决心去了。

走在楼梯上，他听见工人们敲锤子的声音。穿堂里很杂乱的堆着箱盒。仆役回答说伯爵夫人不能见客。克利斯朵夫大为失意的留了名片，想下楼了，不料仆人又追上来，一边道歉一边请他进去。克利斯朵夫被带到一间客室里，地毯已经拿掉了卷在一旁。葛拉齐亚浮着光辉四射的笑容迎上前来，又快乐又兴奋的伸着手。他同样快乐而激动的握着她的手，吻了一吻。

“啊！”她说，“你能够来，我快活极了！我真怕不能再见你一面就走了！”

“走了？你要走了？”

阴影又罩了下来。

“你瞧，”她指着室内凌乱的情形；“本星期末，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了。”

“离开多少时候呢？”

她做了个手势：“谁知道？”

他进足了气力说话，喉管已经在抽搐了。

“上哪儿去呢？”

“美国。我的丈夫调到驻美大使馆去当一等秘书。”

“那末，那末，那末……”他嘴唇发抖了，“……就此完了吗？”

“朋友！”他被他的声音感动了。“不，并不完了。”

“我才把你找到就把你失掉了！”

他眼中含着泪。

“朋友！”她又叫了一声。

他把手蒙着眼睛转过身去，想遮掩他的情感。

“别难过啊，”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

这时他又想到那个德国小姑娘。他们俩都不作声了。

“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晚？”她终于问道。“我想法要见你。你可从没有回音。”

“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告诉我，是你帮助了我多少次而我没有猜到吗？……是靠了你的力量我能够回到德国去的吗？是你做了我的好天使在暗中护卫我吗？”

她回答：“我很高兴能为你尽些力，我应当报答你的多着呢！”

“什么？我又没帮过你忙。”

“你不知道你给了我多少好处。”

于是她讲起童年在姑丈史丹芬家遇到他的时代，由于他的音乐，她发现了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慢慢的，带着点兴奋的情绪，她又显明又含蓄的，说起当年参与克利斯朵夫被人大喝倒彩的音乐会，她对这音乐会的感触与悲哀，说出她怎样的哭，怎样的写信给他而没有回音，因为他没收到。克利斯朵夫听着，把现在对着这个妩媚的脸庞所感到的温情与激动，统统移注到过去的事情里去了。

他们天真的谈着话，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快乐。克利斯朵夫一边说一边握着葛拉齐亚的手。突然之间他们俩都不作声了：葛拉齐亚发觉克利斯朵夫爱着她，而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发觉了从前葛拉齐亚爱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如今克利斯朵夫爱着葛拉齐亚，而葛拉齐亚对他只有一种恬静的友谊了：她爱着另外一个。好比两架生命的钟：这一座比那一座走得快了一点，就可以使双方全部的生涯改观……

葛拉齐亚把手缩回去，克利斯朵夫也不勉强抓着。他们不声不响的呆坐了一会。

然后葛拉齐亚说了声：“再见。”

克利斯朵夫又叹道：“这样就完了吗？”

“也许这样倒更好。”

“在你动身以前，我们不能再见了吗？”

“不能了，”她说。

“我们什么时候再能相会呢？”

她作了一个惆怅的困惑的手势。

“那末我们这次相见有什么意思呢？”克利斯朵夫说。

但一看到她埋怨的目光，他立刻补充：“啊，对不起，我这话是不应该的。”

“我永远会想念你的，”她说。

“可怜！我连想念你都不能。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的生涯。”

她平心静气的用几句话把平时的生活告诉了他，描写她过日子的方式。她提到她和她的丈夫，始终堆着那副亲切的美丽的笑容。

“啊！”他心中有点嫉妒的说，“你爱他吗？”

“爱的，”她回答。

他站起身来。

“再会了。”

她也站起来。这时他发觉她怀着身孕，心中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温柔，妒忌，和热烈的怜悯。她把他送到小客厅门口。他转过身来，向朋友的手伛着身子，亲了长久。她一动不动，半阖着眼睛。终于他抬起身来，望也不望一下，很快的走了出去。……那时谁要问我什么，我唯有装着谦卑的脸，只回答他一个字：

爱。

那天是诸圣节。外边是阴沉的天和寒冷的风。克利斯朵夫在赛西尔家，赛西尔站在孩子的摇篮旁边，顺路来探望的亚诺太太探着身子瞧着。克利斯朵夫独自在那里出神。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幸福，可并不想抱怨：他知道幸福是存在的……噢，太阳！我用不着看到你才能爱你！便是在阴暗中发抖的冗长的冬季，我的心仍旧充满着你的光明，我的爱情使我感到温暖：我知道你

在这里……

赛西尔也在幻想。她打量着孩子，居然相信这是她自己的孩子了。噢，幻想的力量，能创造生命的幻想，真应该祝福你啊！生命……什么是生命？它并不是像冷酷的理智和我们的肉眼所见到的那个模样，而是我们幻想中的那个模样。生命的节奏是爱。

克利斯朵夫望着赛西尔，眼睛很大而带点村野的脸上闪耀着母性的本能，——比真正的母亲更纯粹的母亲。他又望着亚诺太太温柔而疲倦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清楚，看到这个做妻子的生活中隐藏着多少的甜酸苦辣，虽然人家一点没猜疑到，有时却和朱丽叶或伊索尔特的爱情同样富于喜乐与痛苦的滋味。但她的这种喜乐与痛苦更近于宗教的伟大……

人事的与神事的结合——配偶 他想，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并不在于信仰的有无，同样，结婚与不结婚的女子的苦乐，也并不在于儿女的有无。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而灵魂的最美的音乐是慈悲。

这时奥里维走进来了。他动作很安详，蓝眼睛里头有一道新的，清明的光彩。他对孩子微微笑着，跟赛西尔和亚诺太太握了握手，开始安安静静的谈话。他们都用着亲热而诧异的态度打量他，他一切都不同了。在他抱着满腔悲苦把自己幽闭着的孤独中间，好似一条躲在桌里的青虫，艰辛的工作了一番以后，终于把他的苦难像一个空壳似的脱下了。他怎样的自以为找到了一个美妙的目标来贡献他的生命，且待下文再述。从此他对于生命只关切一点，便是把生命作牺牲；而从他心中舍弃了生命的那一天起，生命就重新有了光彩：这是必然之理。朋友们都皇着他，不知道他有了些什么事，又不敢动问；但他们觉得他是解脱了，他心中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再有遗憾或悲苦了。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走向钢琴，和奥里维说：“要不要我唱一支老勃拉姆斯的歌给你听？”

“勃拉姆斯？”奥里维说。“你现在弹你死冤家的作品了？”

“今天是诸圣节，对谁都应当宽恕，”克利斯朵夫说。

为了免得惊醒孩子，他放低着声音唱着苏勃地方的一支老歌谣中的几句：

我感谢你曾经爱过我，

希望你在别处更幸福……

“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叫了起来。

克利斯朵夫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好了，我的孩子，咱们运气不坏。”

他们四个都坐在睡熟的孩子周围，不做一声。要是有人问他们想些什么，——那末，他们脸上表示着谦卑的神气，只回答你一个字：

——爱。

